

A detailed oil painting of Mao Zedong, shown from the chest up, wearing a grey Mao suit. He i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left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moody.

# 红色中国

半月刊

《红色中国》半月刊编辑部

4

2025

2025年第4期 总第4期

红色中国 半月刊

2025年7月31日出版

---

来源：红色中国网

主办：《红色中国》半月刊编辑组

网址：<https://www.redchinacn.org>

<https://v2.redchinacn.org>

编辑：怀 鹤

审校：青年之翼

---

《红色中国》半月刊编辑组

青年之翼 怀 鹤

---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

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 说 明

“红色中国”半月刊是由本刊编辑组主办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政治刊物。红色中国网主编“远航一号”向我们指出：“在这样的伟大转变的时代，非常有必要随时报道和分析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重要动态，把握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主流和根本特点，树立并坚定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信心。”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发展的，需要对社会实践经验进行高度的科学概括与分析，敢于向旧的、僵死的、形而上学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与机会主义开战，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的当代国情，为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本刊正是承担着这样一个光荣的使命，及时地收集、总结并发表红色中国网与今天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科学成果、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以供广大同志借鉴。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不高，不论在选材上还是在总的思想倾向上，都必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庸俗思想与作风。希望读者参考本刊时，注意分析和鉴别。同时，欢迎提出批评和意见，向我们投稿。我们相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指导下，在广大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下，坚持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的立场与观点的条件下，本刊一定能够努力完成它所担负的任务。

怀 鹤

《红色中国》半月刊编辑组

# 红色中国

半月刊

《红色中国》半月刊编辑组主办

---

## 二〇二五年七月第二期 目 录

### 历史遗留问题

“毛泽东思想”应该火化，而不是送进水晶棺里防腐…………… 隐秘战线等 (6)

### 国际反帝反新自由主义动态

我没有唱空特朗普…………… 王其子 (12)

——俄罗斯，全世界反帝力量将会取得胜利战线

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对帝国主义阵营各成员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造成的打击效果分析…………… 隐秘战线 (15)

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问候…………… 集体讨论 (18)

### 学习马列理论 坚定革命信心 反击思潮逆流

革命渺茫论的灌输路线幻想和劳动人民的伟大斗争…………… 郑阑干等 (32)

|  |           |
|--|-----------|
| 围绕未明子所展开的若干讨论 .....                    | 集体讨论 (52) |
| 刘司墨的“左翼特色社会主义”是死路一条 .....              | 隐秘战线 (76) |
| 未明子，一个“自创”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怎样走上了反动堕落的不归路 ..... | 普通人 (78)  |
| 对未明子理论的全面批判 .....                      | 雪峰山 (81)  |

### 投身社会实践 把握历史脉络

|                           |                  |
|---------------------------|------------------|
| 长三角制造业黑厂打工记 .....         | 喝群众的梨贝茶 (113)    |
| 中国工人阶级四十年（一至三） .....      | 漫道 (116)         |
| 前资本主义社会研究 .....           | 《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147) |
| 中国社会史纲（一至三） .....         | 《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160) |
| 入门级史学笔记——现代印度史（一至三） ..... | 香蕉鱼 (172)        |

### 文学与文艺评论

|                       |            |
|-----------------------|------------|
| 诗词六首 .....            | 斯达特尚 (177) |
| 对未明子诗句“对价”的逐字批判 ..... | 雪峰山 (179)  |

# 历史遗留问题

## “毛泽东思想”应该火化 而不是送进水晶棺里防腐

隐秘战线 等

**隐秘战线** “最美好的前途”在昨天说出了一个想法：他要试着对与自己迫真辩论的迫真“左派”进行“转化”！

……如果不好好转化他们那没人可交流了……

当我看到这位同志的回复的时候，我内心的感受是，说实话——相当地不耐烦。尽管我赞赏他的努力，不过我丝毫不会怀疑他会做一堆无用功。

国内的“迫真”左派们所倍加推崇的，所谓“毛泽东思想”，现在看来无非就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反对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不过他在二十大上做出的“秘密报告”倒是不久前被推翻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反对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我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22年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中修官僚集团的梗它们不玩了——我觉得挺有意思啊，既有历史底蕴，又朗朗上口，还不失幽默感；结果现在一口一个“泽圣”、“俄匪”、“普特勒”，全无“稻学”兴盛时期的那股子创造力，还陪反动民族主义分子意淫外东北，哪怕那里现在已经是白纸黑字确认无疑的俄罗斯领土了。

不只是这个，这群毛派分子们还闹出过一个天大的笑话：正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自诩为“毛派”，也被“公认”为“毛派头面人物”的阳和平，居然公开支持1956年的匈牙利反革命暴乱！要知道当年“中苏轮战”的时候，中共攻击赫鲁晓

夫在匈牙利事件中的做法，可不是攻击他出兵镇压，而是攻击他没有在一开始就坚决镇压：

……苏共领导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布达佩斯的紧急关头，曾经一度准备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反革命……

这完完全全就是在欺负人民群众不了解历史社会主义时期的那段历史嘛！而且支持 1956 年的匈牙利“人民起义”，是打着“反斯大林主义”旗号，实则帝国主义颠覆历史社会主义政权摇旗呐喊的托匪分子才做的事情。难道现在的“马列毛主义”中间加了一个“托”字，变成“马列托毛主义”了？又或者，现在所谓的“毛主义”，实际上是经过阳匪之流添油加醋过的“托洛茨基毛泽东主义”？真是匪夷所思。唉，我记得自称“马列毛”的电报“大群”，不就闹过把“历史时刻”污蔑红色中国网认同邓小平的帖子标题截取出来发在群里，认为红色中国网认同邓小平的天大笑话嘛，这下看懂了。

嘴上“反帝反修”，“反帝”指 1972 年毛泽东跟尼克松的那次，堪称“对国际共运思想界造成全面核打击”的握手（直接导致日本左翼力量从此一蹶不振），也就是只反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不反美帝国主义的“反帝”；“反修”，指邓小平“三起三落”，跟个不倒翁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头面人物怎么打也打不倒，毛泽东人一死资本主义马上复辟，比起苏联在斯大林死后怎么说也维持了三十多年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像只侏儒。

**“毛泽东思想”应该火化，而不是送进水晶棺里防腐。**

“毛泽东思想”经过这几年发酵，变质成了亲帝反共迫真“左派”的意识形态招牌之一。考虑到毛泽东本人还曾发文支持苏联解放波兰东部地区的行动<sup>1</sup>这一点，毛泽东和毛派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了托洛茨基跟托派之间的关系。因为国内的毛派无一例外都是反对苏联“吞并”波兰东部的。

此外，国内迫真“左派”在特别军事行动这一重大国际阶级斗争问题上，“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很容易让人民群众联想到无能、腐朽且卖国透顶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权，从而引发生理不适；更别提还有支持以泽连斯基为首的基辅纳粹政权“反共抗俄”的迫真“左派”了（讲个笑话：装甲尼禄大佐曾“高度评价”阳和平，一个明面上的“乌友”、“乌粉”，支持“毛派”头面人物本身就很令人怀疑“毛派”分子的意识形态本质）。以上种种行径，使得国内一切持朴素进步立场的人民群众，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主动与各路“左派”思想和团体保持距离。

---

<sup>①</sup>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390928.htm>

“乐不眠”同志当时对阳和平歪曲历史事实的做法就曾评论道：

“下一步是抬出匈牙利的民族自决，快和托派为伍了”

我的评价是自信点，现在它就是托匪。

**东方晓** “隐秘战线”同志对“毛泽东思想”（这里不提所谓的“毛泽东主义”）的界定未免偏颇。毛泽东思想至少还包括激进民族解放运动路线、唯物辩证法的系统化阐述，等等。莫把孩子和洗澡水都一起倒掉了吧。

**隐秘战线** 起码，我在国内“毛派”分子的澡盆里找不到孩子。也许他/她在别人的怀里，或者就在我身边，我去给人倒倒脏水总没什么问题吧？歪曲历史上中共主张坚决镇压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铁的事实，并将之吹捧为所谓“反苏”、“反斯大林主义”的“人民起义”——这属于什么问题呢？这属于是否可以被称作“毛派”级别的理论问题？我本人非常看不起，十万看不起阳和平就是因为这个。跟邓小平比它有过之而无不及。

**人类史前史守望者** 我认为此类宗派已经演变成了一种不折不扣的”教条修正主义“思潮，是时候重视一下基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立场了。

**网友旅鼠人** 经过这几年的发酵，毛泽东已经变成了实质上的钟馗，谁都能借来“打鬼”。我们当然也可以借，不过问题是怎么借，借多少，借来打谁？

**隐秘战线** 2022年2月24日是“毛派”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他们的宣传主要对内，对揭露资本主义复辟时期中修官僚集团以及后来中国资产阶级的罪行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邓小平“稻上飞”的绰号就是他们起的，源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引用的一张拍摄于大跃进时期，邓小平站在一堆水稻上的照片。我本人对中国八九十年代，也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早期的历史启蒙，还得拜他们所赐。那时他们写了不少批判华国锋邓小平的小册子，不过他们信奉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那套理论，“反帝反修”的路线，所以也没有说林彪和苏联的好话。然而这些内容都存在一个吊诡的地方：智利的皮诺切特被他们称为“新自由主义五大导师”之一，它发动政变推翻阿联德是在1973年，那时候毛泽东早就跟尼克松握过手了，可这并不能停下他们批判皮诺切特的笔杆子。可能它们现在这副样子早在那时就留下铺垫了。

“新自由主义五大导师”具体指的是哪五位有很多种说法：“稻学”时期的主流说法是里根、戈尔巴乔夫、撒切尔、皮诺切特和邓小平，当然也有里根、撒切尔、皮诺切特、蒋介石和邓小平一说；到了疫情时期《第五共和国》电视剧传入，蒋介石的位置就被全斗焕取代了；最后中国资产阶级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稻学”全面退潮的时候，对批判揭露邓小平、中修官僚集团和中国资产阶级种种倒行逆施的内容逼真“重拳出击”（指人家把注意力转移到黑屁俄罗斯身上了才清理一地鸡毛），自此邓小平彻底消失在了“新自由主义五大导师”的名单当中，现在是里根、戈尔巴乔夫、撒切尔、皮诺切特和全斗焕。

**冰西瓜洗洁精** 破案了，正好墙内毛派爱讲什么什么路线错误、两个路线的斗争的，现在来让他们看看目前是哪两个路线的斗争（看看是不是怀鹤同志说的一样），哪个路线是错误的。彼时有托派分裂，此刻有毛派分裂。顺便还看看布站、大群这类的派又能吐出什么大道理，估计没一个思想意识有“羊和平”同志等抖音新毛派进步。

st 我认为当下最要紧最根本的宣传是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资本主义不能再发财致富，市场经济不能再阶级跃迁这一历史趋势，从而让越来越多的人逐步的从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中醒悟过来，主动拒绝为资本积累卖命终究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

我想一个人只有在动摇了对资本主义的信念，只有在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确实行不通，看到了灭亡资本主义的希望后才会愿意接纳共产主义学说、毛泽东思想，只有打碎他们的希望，他们才会另寻出路，否则的话，即使心里信仰马克思主义，脑子也会因为看不到资本主义灭亡的希望而滑落到“中美争霸”或者是“先锋队”这样虚无缥缈脱离现实的幻想中去。所以我认为当下应该着重宣传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经济危机、生态灾难等，而不是天天重复《毛主席语录》，从这个角度说，毛主席的神像在这个阶段的作用确实不大。但是，毛泽东思想除了反对资本主义的一面外，还有这军事、哲学、实践、群众工作等方方面面有实际意义的东西。所以我认为现阶段倒不必急着火化“毛泽东思想”，而是要让它暂时休息一下，等到它发挥作用的时候再请出来。

**新社会人** 毛泽东思想是激进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附上了社会主义契约的进步性，但始终不属于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人阶级自发组成斗争需求理论，从群众历史朴素情感很难割裂，但从以推进全球无产阶级革命为最大最先的总方针看，将毛泽东思想推入焚化炉是必要的，也是有利的。

况且，毛泽东成为了中国资产阶级政府和反动小资产阶级们迷惑愚弄，寻求进步中国青年们的“耶稣像”，伪左风暴突击队们拿着革命领袖们的部分历史局限性话语，用静态僵化的视角来恐吓中国人民，如同中世纪基督教会们对部分试图独立教会经济的欧

洲人民的迫害。这肯定不是毛泽东本人所希望看到的，他不想看到自己的遗体，不仅仅是生物学上，在未来的中国阶级斗争发挥这样的作用，所以我支持“隐秘战线”同志，关于彻底火化毛泽东思想的建议，这也是老人家他生前希望的。

**东方晓** 要评价毛泽东思想，首先要弄清楚它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其中的核心又是什么。在我们对这个问题好好研究得出结论之前，我们不能因为反对教条主义分子的形而上学做法，就直接武断地做出定论。当然，如果隐秘战线同志和其他网友如对这方面有更深入思考，我自然愿闻其详。虽然我自己对这个问题还没作仔细研究（后面有时间我也打算深入思考一下），但我觉得至少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来说，对整个毛泽东思想的定性需要仔细，至少要能有理有据地说服自己和其他同志。就粗浅的思考而言，我们在谈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意义（暂且不论历史地位）时，可能既要注意它的方法论指导意义，特别是矛盾论、实践论对唯物辩证法系统阐发；也要考虑评价它的实践启示，例如继续革命论有错误，而具体斗争策略也有可取处。如果这样综合来看，毛泽东思想对我们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或者说对我们是不是完全失去了参考价值，我认为还不能靠直接说“彻底火化”来作结。

**隐秘战线** 毛泽东主义，又或者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招牌到底是什么？不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甚至还适得其反加速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进程，但是这就是它为什么能被国际共运“公认”为一个独立的思想派系的原因所在。那又是什么让它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其他思想派别区分开来？恐怕主要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路线。后者在生态位上与 1956 年后的“托派”思想颇有几分相似之处。我主要看的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到他死，也就是 1949~1976 年这一段历史时期的表现，这一时期是毛主义/毛思想形成的最关键时期。

**东方晓** 你看，你直接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主义”。这不是跟我们反对教条化毛泽东思想的人是一样做法吗？

**隐秘战线** 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到底算不算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呢？我就不需要“毛泽东主义”这个提法了。文化大革命涵盖了他人生的最后十年，也是他主导发动并积极支持的。尽管最后失败，但是毕竟还是有一次伟大的尝试摆在这里等待后人来吸取教训。成功的是经验，失败的是教训，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样一种经验与教训并存的东西，然而红色中国网论证得出的结果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

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只能算教训，而且是残酷的教训。如今迫真“左派”在把这两样东西当经验来用，很难不说是准备让后人步他的后尘。

**王其子** 毛泽东思想有什么大的贡献呢？我从自己学习经历出发，能体会到的：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把朋友搞多，敌人搞少；团结，斗争；没有调查权就没有发言权；继续革命，消除一切私有制。

**冰西瓜洗洁精** 继承本身就应该包含批判与保留。如果要继承毛泽东思想，就一定要认清其局限性，扬弃其不合未来革命的内容。倘若教员有灵魂且能看到，一定希望我们这样做，而不是教条地“继承”，当成不可变的“原教旨”。对于其作为神像，我们倒可以乐观些，因为高高举起他的伪左们已经不被人民接受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革命机遇未至神像举再高也没用，反之如果到来没有神像照样能进行。

**东方晓** “有什么贡献”，或者更准确地说，它的核心内容有哪些，非核心内容又有哪些，这是值得研讨的问题。根据一些研究者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从最抽象、内核到最具体、经验，包括唯物辩证法、哲学人类学、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具体事件的经验研究等几个层次。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仔细一些呢？还是说，毛泽东思想只具有历史的经验意义，而且只包含或体现在文革、中苏关系等事件中呢？我同意继承要建立在批判的基础之上，而且要认识到前人思想的局限。但既然是“继承”，并且是“批判性继承”，如果只谈“批判”或“局限”，而完全忽视了“继承”或“启发”，说得不好听一点，实质上是打着“继承”旗号的否定。

当然，上面说的是要“批判性继承”的情况，而如果有同志认为对毛泽东思想根本不需要“批判性继承”，那情形就完全不是上面那样了。

**远航一号** “东方晓”网友说的有道理。

我们永远要继承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光荣传统；毛主席本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也有独到的贡献。“火化”的说法看怎样解释。正确的“火化”不是抛弃，而是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毛主席晚年的思想和实践，确有糟粕，不能死抱着不放，但也不要跳到另一个极端。对毛主席思想与实践中的精华，不仅要将其鉴别出来，努力保护和发扬，还要当毛主席精华的真正的、当仁不让的继承者！

# 国际反帝反新自由主义动态

## 我没有唱空特朗普

——俄罗斯，全世界反帝力量将会取得胜利

王其子

我没有唱空特朗普。现在，不少声音指责他“已经投靠 Deep State<sup>1</sup>、背叛了 MAGA 革命”，甚至干脆说“特朗普本来就是 Deep State 的人”。我不这么看。例如，杜金就认为特朗普正在成为 Deep State 的听话傀儡。相反，有记者认为“特朗普处于防御者的位置，美国媒体和建制派、自由派、欧洲人强迫他”。但是，特朗普却是又说过“俄罗斯将取得最终胜利”。

无论特朗普个人如何标榜“爱好和平”，也无论 MAGA 运动在群众动员层面多么汹涌，它都无法改变一个结构性事实：美国仍是当前、乃至未来十几年内最强大、最成熟、也最嗜利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要这个外壳还在，任何总统的政策都必须先经过“美国资产阶级总利益”这架筛子，再向军工—金融—能源复合体作出必要的、有底线的让步。特朗普若真想兑现竞选承诺，就不可能逞一时之勇去搞全国震动式的“革命”，而只能依据现实阶级斗争的坐标系，用商人最熟悉的谈判、拉扯、折中的辩证法，逐步拆解阻力、交换筹码，最终把“让美国再次伟大”翻译成“让美国少出血、多收钱”。

特朗普首先是一名杰出的商人。商业竞争里最常见的套路，正是“欲扬先抑、欲抑先扬”的节奏控制：先把对手或盟友的预期压到最低，再反手给一颗甜枣，从而在重新划定的交易区间里拿到最大份额。近期围绕伊朗—以色列冲突、对欧大规模出售军火的两幕戏，便是他在国际舞台上对这套商业辩证法的复刻。让以色列挨炮，最后谈判。卖军火照卖，但是让欧洲出钱，最后不了了之。欧洲国家在特朗普巧妙的“出售军火”的“施压上”，也不得不做出让步。欧洲盟国的分裂进一步破坏了以前的“跨大西洋统

---

<sup>①</sup> 即“深层政府”，意为美国资产阶级政府背后的真正掌门人——金融资产阶级。——编者注

一”，裂痕已经每个月都越来越大。特朗普现在完全有理由将矛头指向欧洲人并宣布，“看到了吗？我告诉你什么？这些寄生虫不断乞求我们的军事保护，但一旦我们提出他们需要为这项服务付钱给美国的问题，它们就会立即失去话题。

巴黎不打算参与为基辅购买美国武器的倡议，因为希望发展自己的武器生产。意大利由于缺乏资金也不会加入该项目。捷克和匈牙利则正式宣布拒绝参与采购倡议。捷克总理解释说，捷方将通过其他方式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匈牙利外长则指出，“匈牙利的资金和武器”不会提供给乌克兰。与此同时，德国、瑞典和丹麦已经宣布希望参与该倡议。

俄罗斯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西方主流媒体如今也不得不承认：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已枯竭，有经验的老兵损耗殆尽，后方的征兵办公室前冷冷清清。乌克兰政府 4 月通过的新动员法，原指望把 25 岁以下青年成批送进战壕，结果到 7 月 17 日截止日，600 万适龄男性中有 600 万没有登记；在已登记的 400 万里，又有 50%~80% 用各种合法理由豁免。逃兵调查已开出 50 万起，Telegram 上“反征兵预警”频道照样活跃。这并非单纯的厌战，而是 1990 年代以降“国家不帮你、也不害你”的社会契约被战争彻底戳穿：寡头、外国掮客和基辅的职业中产在炮火里依旧吃得脑满肠肥，而工薪阶层却被推到前线当炮灰。正如那位为军队募款却拒绝捐助无人机的乌克兰受访者所言：“国家在最核心的防止战争职能上完全失职，我不明白为何这场战争要彻底变成我的战争。”后苏联时代“国家不帮你，也不害你”的冷漠契约，在战争中被彻底撕碎。当国家要求“为国捐躯”时，民众发现“国”只是寡头与西方的套利工具。

不仅如此，随着北约国家将国防预算提升到 5%，欧盟通过新一轮财政计划，也正在激化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各国人民对欧盟资产阶级的矛盾。冯德莱恩刚提出向年营收过 1 亿欧的企业征收“营业额税”，德、荷、意、北欧、南欧集体说不；法国总理贝鲁 7 月 18 日端出的预算案更是直说：福利、再军备、绿色转型不可能同时兑现。全欧老龄化+北约 5% 军费承诺，把财政空间挤得滴水不剩。欧盟既凑不出长期援乌的钱，也凑不出一致对俄的胆，只能恐慌性下单美国军火。

更深层的问题是人口。OECD 最新报告显示，未来 25 年仅与老龄化相关的支出就会把欧盟整体公共支出拉高 3 个 GDP 百分点；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则预测，到 2070 年代，公共养老金将吃掉 GDP 的 7.7%，远高于今天的 5%。在“枪炮与黄油”再次成为全球主旋律的时代，欧盟却同时面临“枪炮+黄油+绿电”三重账单。法国 9% 的财政赤字只是冰山一角，德国劳动力绝对数量将在 2026 年开始下降，意大利、西班牙的养老金体系早已靠财政转移维系。换句话说，欧洲不是“会不会破产”，而是“谁先破产”。

而俄罗斯方面，暂时没有听到武器装备，军队数量不足，社会经济严重放缓的消息，除过百家号。我们假定乌东四洲，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顿河没有被承认为俄罗斯领土，而是折中承认其自治，那也就相当于脱离乌克兰。况且，在战后的乌克兰必然要在政治上进行重组，人民已经受够了泽连斯基那群尸位素餐的西方走狗，名义上中立，实际上亲俄的新政权也会呼之欲出。

笔者看来，事情会这样发展：在俄罗斯取得战争胜利之后，乌克兰将会组建一个名义上中立但在某些程度上亲近俄罗斯的新政府。经过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的反动压迫，相当一部分亲西方寡头，腐败高官，反动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会被清洗或者驱逐出境。这么多年来惨痛的教训也许会使得乌克兰人民认清现状，过去被污蔑的“社会主义”可能才是最好的选择。他们会在国内继续呼吁，斗争要求新政府进行类似于上世纪那种，既非“历史社会主义”国家的，又非马列主义意义上社会主义的，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它可能是印度式的，可能是阿拉伯式的，可能是拉丁美洲式，或者兼具以上特点的。

重要产业进行国有化，重建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大范围的深度反腐败，恢复一定程度的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可能不是从臆造的“革命中心”爆发，而是从“新自由主义废墟”中重建。

#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造成的打击效果分析

## 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对帝国主义阵营各成员

(2022~2024年)

隐秘战线

本次分析中“帝国主义阵营成员国”的范围，主要参考俄罗斯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所制定的“不友好国家”、欧洲联盟及北大西洋公约集团 成员国，具体名单如下：

北美洲：美国、加拿大；

欧洲：阿尔巴尼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黑山、荷兰、北马其顿、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

亚洲：日本、韩国、新加坡；

大洋洲：澳大利亚、新西兰。

经过调整后，2022、2023 和 2024 年的“帝国标准”额如下表所示：

| 2022 年      | 2023 年      | 2024 年      |
|-------------|-------------|-------------|
| 66462.64284 | 67304.47618 | 68208.55774 |

单位：2021 年不变国际元（以下简称“元”）

需要注意的是：今年的《红色经济观察》 较去年发布的《红色经济观察》， 以及前年的《红色经济观察》，在数据上进行过一定调整，因而两张表并不具备充分的可比性。昨天我就因为没注意这一点，在数据对比上闹出了笑话。

以下是“帝国主义阵营”各国自 2022 年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到 2024 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帝国标准”的百分比变化：

| 国家   | 2022 年 | 2023 年 | 2024 年 | 合计   |
|------|--------|--------|--------|------|
| 新加坡  | 201%   | 192%   | 194%   | -7%  |
| 卢森堡  | 199%   | 192%   | 188%   | -11% |
| 爱尔兰  | 187%   | 172%   | 169%   | -18% |
| 挪威   | 137%   | 134%   | 134%   | -3%  |
| 瑞士   | 125%   | 122%   | 120%   | -5%  |
| 美国   | 109%   | 110%   | 111%   | 2%   |
| 荷兰   | 107%   | 105%   | 104%   | -3%  |
| 丹麦   | 106%   | 106%   | 108%   | 2%   |
| 奥地利  | 99%    | 96%    | 93%    | -6%  |
| 冰岛   | 99%    | 100%   | 96%    | -3%  |
| 瑞典   | 95%    | 93%    | 93%    | -2%  |
| 德国   | 95%    | 93%    | 92%    | -3%  |
| 比利时  | 94%    | 93%    | 92%    | -2%  |
| 澳大利亚 | 90%    | 90%    | 88%    | -2%  |
| 加拿大  | 88%    | 85%    | 83%    | -5%  |
| 芬兰   | 86%    | 84%    | 82%    | -4%  |
| 法国   | 81%    | 80%    | 80%    | -1%  |
| 英国   | 80%    | 78%    | 77%    | -3%  |

（接下页）

|       |     |     |         |     |
|-------|-----|-----|---------|-----|
| 意大利   | 79% | 78% | 78%     | -1% |
| 韩国    | 75% | 75% | (数据未更新) | N/A |
| 新西兰   | 75% | 73% | 71%     | -4% |
| 捷克    | 73% | 71% | 70%     | -3% |
| 斯洛文尼亚 | 71% | 71% | 71%     | 0%  |
| 立陶宛   | 70% | 69% | 69%     | -1% |
| 西班牙   | 70% | 70% | 71%     | 1%  |
| 日本    | 68% | 68% | 68%     | 0%  |
| 爱沙尼亚  | 66% | 62% | 61%     | -5% |
| 波兰    | 65% | 65% | 66%     | 1%  |
| 葡萄牙   | 62% | 62% | 61%     | -1% |
| 匈牙利   | 61% | 60% | 60%     | -1% |
| 克罗地亚  | 60% | 61% | 63%     | 3%  |
| 罗马尼亚  | 59% | 60% | 60%     | 1%  |
| 斯洛伐克  | 58% | 59% | 59%     | 1%  |
| 拉脱维亚  | 57% | 58% | 57%     | 0%  |
| 希腊    | 54% | 55% | 55%     | 1%  |
| 保加利亚  | 49% | 49% | 50%     | 1%  |
| 黑山    | 38% | 40% | 41%     | 3%  |
| 北马其顿  | 34% | 35% | 36%     | 2%  |
| 阿尔巴尼亚 | 26% | 27% | 28%     | 2%  |

# 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问候<sup>1</sup>

## 集 体 讨 论

同志们好!

我是一名来自西班牙的共产主义者，对中国的现实情况非常感兴趣。由于西方的信息封锁和歪曲，我很难接触到来自第一手的资料，很多信息要么是代表美帝国主义利益的宣传，要么就是中共官方的表述。

在西班牙，许多左翼同志都希望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不同的组织和思潮对中国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也有的认为中国仍在走社会主义道路。

我最近读了你们发表的一些文章，觉得你们的分析非常有深度，也很有启发性。就我个人观点而言，我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是资本主义国家，但还没有走向帝国主义。

如果你们能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中国目前的国家体制、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我将不胜感激。

致以革命的问候!

——来自西班牙的同志 alex123 敬上

**远航一号 向西班牙同志致敬!**

如果您通晓汉语，欢迎与我们一起讨论。

**alex123** 我读了一些关于中国政治背景的文章，但对整体情况还是难以形成清晰的理解。

据我目前的了解，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被夺取政权的资产阶级腐蚀了。请问党内是否还有一些派别或倾向，有可能推动方向上的转变?

---

① <http://v2.redchinacn.org/post/59679>

另一方面，我也看到在中共和国家体制之外，存在一些共产主义的频道或运动。但我还不太理解他们的具体立场。我阅读了一些这些组织的内容，但并不完全认同他们的分析。例如：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赵皓阳、乌有之乡和布站等。

此外，我还看到近年来有很多罢工和工人运动，为改善生活条件而斗争。这些情况让我非常感兴趣，比如佳士事件。我也读过你们的同志宁顶的事迹。

我也很愿意向你们分享一些西班牙的现实情况和我们的观点。

我附上一份对阿雷纳斯同志的采访，他是西班牙共产党（重建）（PCE(r)）的总书记，最近刚刚在被法西斯主义关押了 30 多年后获释。在这次采访中，他谈到了中国、俄罗斯，以及我们在西班牙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

## 革命同志阿雷纳斯专访

摘自《另一个国家》，2025 年第 114 期（5-6 月）刊载

### 共产党重建的历史与未来

安德鲁·加西亚·里韦拉

曼努埃尔·佩雷斯·马丁内斯（革命同志阿雷纳斯）于 2025 年 3 月 5 日因刑满出狱，年届 80 岁。在经历了两个阶段共 32 年监禁，以及此前 20 年在 OMLE 和之后的 PCE(r) 秘密活动的锻造之后，本报特此开辟版面，通过他的革命生涯回顾他五十多年对共产主义的奋斗和对抗法西斯的不屈不挠的抵抗。

问：您是 PCE(r) 的总书记，该党将于 2025 年 6 月迎来成立 50 周年。为什么当初有必要重建 PCE？

答：确实，自 1975 年 6 月的重建大会起我即担任总书记，在这期间有 32 年服刑、近 18 年地下活动。这 50 年里，我只有极少几个月是在 1984 年出狱后身处合法状态。年轻时我加入 PCE 青年团，但卡里略路线掩埋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一些同志和我清醒地看到，工人阶级需要一个真正的党，而 PCE 已走向融合主义。我们与法国一批有类似分析的同志会合，共同提出共产党的重建。

服兵役期间，我有充裕时间读书、学习，于是断然与修正主义 PCE 彻底决裂，迈出一步，致力于党的有机重建。卡里略主义无法为工人运动提供解决方案，恰相反，它带领工人阶级融入正在重塑的法西斯体制中。

问：你们与 1970 年代林立的其他共产党有何根本区别？

答：1960 年代，PCE(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针对西班牙的民族解放纲领，仿效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有 PCE(国际主义)，我与该党在 1970 年领导层倒台时发生关系，还因此被捕。在狱中我与其总书记瓦尔韦德同囚，我详细论辩。他们政治上散漫，意识形态是托洛茨基主

义。这些党派都未能提供适用的工人阶级政治路线。因此，一批同志加入 OMLE，开始共产党重建之路。

1972 年 OMLE 第五次全体会议在法国召开，我与恩里克·塞尔丹·卡利斯托代表马德里内部参加。大会通过激进的组织转型，成立中央领导核心，取代此前松散的联邦协调结构。领导机关转入国内，刊物《红旗报》亦在法国出版。

问：你们对“转型”提出的分析将自己置于“改革”运作之外，这带来了什么代价？

答：我们的分析认为，西班牙是一个工业发达国家。法西斯政权通过对工人阶级的过度剥削推动工业发展，但垄断资本仍然需要这个制度。体制内部，改革派（主要是技术官僚与主教团体）与僵化派展开内部博弈。我们清楚体制不会根本更改，但其走向是一种“改革后的法西斯”，其第一阶段代表是阿里亚斯·纳瓦罗。

左翼改革派内部也启动整合行动，形成所谓“板状联合”。苏亚雷斯与卡里略几乎建立个人协议，推动将其纳入改革体系。但这一战略伴随更严厉的压迫。1976 年加斯特伊兹五工人罢工期间的谋杀就是明证。我们揭露这些策略只是剥夺工人阶级多年努力所得的成果。在蒙克洛亚协议中，国家以“自由”为诱饵，施加大规模对工人的压榨。

我们坚持抵抗，支持一切形式的反抗，因此遭到了体制和卡里略派的惩罚。

问：你们被卡里略派出卖？

答：是的，警方对我们知之甚少，曾以为我们只是那些讲演的“空谈者”。但出卖者正是 PCE 的领导层，因为许多同志都出自其内部。1977 年 10 月 9 日，PCE(r) 中央委员会在贝尼多姆倒台后，一名政治社会警察在我们被关押一周后低声告诉我：“一项赦免协议已经签署，不跟从的你们会在监狱里腐烂。”果然如此，卡里略派从一扇门出来，而我们却从另一扇被推进。

问：共产党与资产阶级合法性应当有何关系？应否保持地下状态？

答：我们主张，在未有充分自由的情况下——比如目前的政党法——党的领导结构必须处于地下。但部分组织可以在半合法状态下运作，绝不登记备案。一脚在合法，一脚在地下。我们不主张党完全地下化，领导机关地下，而与群众联系紧密的部分可以合法，这样更安全。

问：阶级斗争仍是历史动力吗？

答：当然是，只要社会存在阶级。生产力的发展揭示了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技术进步主要服务于少数人的利益。若无阶级斗争，社会不可能发生质变。尽管可能具备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但无主观因素（即革命力量），变革是不可能的。改革主义者认为技术进步使革命多余，但这并不符合事实。资本主义不会自我终结，反而会用最大暴力捍卫其特权。

问：对“超级帝国主义”理论有何看法？其本质特征与列宁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有何区别？

答：“超级帝国主义”理论近来由托洛茨基主义者欧内斯特·曼德尔提出，他尝试以资本主义演变的“长波动”解释，否定列宁所述的资本危机规律。这类观点早在考茨基时代就有，认为资本的“世界政府”阶段可能带来长期稳定或普遍和平。

但此概念助长了一些托派、波德米派等等，他们宣称超级帝国主义消除了阶级矛盾，无需革命。我们坚持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列宁对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衰亡阶段的分析

仍然准确。历次世界大战、苏维埃革命、反殖民解放过程均说明，资本主义并不会进入无阶级矛盾的“长和谐”阶段，相反是周期性爆发更深刻的危机。

问：资本主义现阶段是否需要资产阶级民主作为统治形式？

答：资本主义并不真正需要“民主”，但它需要借选举制造合法性。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金融资本通过资助竞选操控选举进程。任何不服从资本体系的力量都无法进入议会，哪怕进入也做不了实事，最终会被踢出去。

实际上，随着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融合进入垄断阶段，资产阶级民主已被超越，其本质是掩盖统治结构的“薄膜”。修正主义则充当资本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先锋。

问：金砖国家在资本主义秩序重新划分中扮演什么角色？多极化斗争是资本家间矛盾，还是具有反帝性质？

答：我们认为那是资本家间的矛盾。但值得指出的是，金砖国家多为曾经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它们是资产阶级国家，但不是帝国主义国家。金砖内部矛盾正在浮现。当前世界其实分为两大阵营：一方由传统帝国主义（如北约国家）领导，另一方是拒绝被瓜分的国家，但它们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国家，甚至许多是反动的，如巴基斯坦、土耳其、印度和沙特阿拉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分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反帝斗争，而美国的霸权正在因此动摇。

金砖国家虽然走资本主义发展路线，但它们以中国为旗帜与榜样。

问：如何看待习近平的声明：“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没有市场，而是市场服务于社会福利，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

答：习近平所说的“社会”是指资产阶级社会。他所说的“人民”，从未特指无产阶级。中国约有 6 亿产业工人及 2 亿服务业和建筑工人，他们的阶级利益并未被他所谓的“社会”所代表。红旗和习近平举拳的姿势只能算宣传手段，无法与那个拥有数百万亿万富翁（其中不少是中共党员）的现实相匹配。

问：中国现行政策是否可能类似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NEP），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过渡？

答：绝对不是。苏联的 NEP 出现在内战后的紧急时期，是为强化国有经济而临时允许私人经济存在；而中国则是用国有企业扶持私营企业。苏联 NEP 存续不超过 8~10 年，主要为了农业、加强工业基础、准备快速工业化和集体化；中国的路径则相反。中国的修正主义派借助邓小平和美国力量推翻毛泽东，发动右派运动，延续资本主义发展。

问：你曾提到虽然普京代表俄国民族资产阶级，但正在采纳颇具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能举例说明吗？

答：确实如此。俄民族资产阶级曾希望融入欧洲。戈尔巴乔夫提出“欧洲共同体”概念，叶利钦奉行极端自由主义，完全为美国服务。但北约对顿巴斯的军事行动和制裁切断了俄与欧洲联合发展的道路，因此普京需要依靠工人阶级。

俄罗斯面临严重的人口衰退，特别是在东部地区。为此，政府推行社会主义性质的家庭补贴、住房援助、鼓励生育等政策。此外，普京持续召开国防、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会议，形成类似于“五年计划”的经济规划，并大幅提高工资水平。

俄民族资产阶级毫无历史积淀可言，对国家的民族感只能追溯到苏联及伟大战争时期。绝大多数俄罗斯民众希望回归社会主义，北约的围攻和压制反而印证：资本主义道路对俄罗斯人民没有出路。

问：你曾承认在党的早期阶段有主观主义过度，你现在会避免什么？

答：确实如此。对抗法西斯的强烈愿望促使我们认为一切可以快速解决，导致极端主观主义，延续时间过长。当贝尼多姆中央委员会倒台，紧接而来的镇压杀害了多位同志（如胡安·卡洛斯·德尔加多·德科德斯、何塞·埃斯帕尼亚·维瓦斯、劳尔·卡莱罗以及赫罗纳的四位青年同志），警钟长鸣。我们曾转向军事路线，这种行为虽被后来反思为问题，但在当时愈为何况我们被街头杀害。

1977 年我们尝试与学生组织、文化团体等共同建立协调委员会，但很快被镇压摧毁。苏亚雷斯政权初期曾有谈判可能，但 1982 年 PSOE 获得一千万选票后开始发动“黑暗战争”。当时记者在议会现场写道：“国会弥漫着一股黑暗战争的气氛”。卡西涅洛将军由 PSOE 任命为宪兵情报主管，并随后升任中将，他实施了 80-90 年代的肮脏战争。

问：曼努埃尔，你是否多次被体制试探要求“认错”？

答：多次。当我于 1984 年获释时，有两名“记者”试探聘请我合法合作，甚至请我喝香槟，我拒绝后便遭遇持续骚扰，被迫再次隐匿。虽然我未遭受肉体折磨，但心理折磨却极为严酷。我曾独自被隔离四年，不能与任何人交谈，就连送饭的人都被禁止与我交流。在这种压迫与诱导间徘徊，合作提议从未停止。

问：至于 2025 年春天，你在个人和政治上有哪些计划？

答：先谈个人层面：多年与至亲家人断裂，特别是与两位女儿疏离。我至今还有三个孙子没见面，甚至有一个曾孙子。出狱后我尝试与女儿联络。最近收到一条鼓舞人心的消息：一位女儿通过 WhatsApp 联系我，表示关心健康并希望安排见面。我对此深感希望。

政治层面我和许多同志一样认为，应朝向第五次党代表大会前进。上一届是 1998 年召开的，需要大量准备：制定政治路线与策略。目前对外界而言，PCE(r) 被贴上“仅支持游击斗争”的标签。其实我们旨在动员群众准备革命——革命必定具有暴力性质，但不会由少数极端分子发动。如果以前被误解为游击战路线，那是被国家的镇压逼迫所致。

我们主张共产主义者团结起来，建立广泛阵线——不是为了进入议会，而是为了阻止法西斯与帝国主义战争。

希望这份中文翻译清晰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如需调整风格或措辞，欢迎告诉我！

**远航一号** 谢谢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涉及许多重要方面，用汉语成语说，“一言难尽”。

简单说，所谓的“中国共产党”早就堕落为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党内已经不存在任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派别。唯一的斗争是在新自由主义派与国家资本主义派之间，前者目前占上风，但是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两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可能发生某些变化。

至于你问到的几个网站，有的（如赵皓阳、乌有之乡）属于打着左派旗号的民族主义网站，有的（如无产阶级斗争报）属于小资产阶级政治投机的宗派主义分子。

另外，西班牙不是在 1975 年就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吗，阿雷纳斯同志是因为什么被捕的？

alex123 1939 年，西班牙被法西斯恐怖统治所笼罩。独裁者去世后，他将王位传给了胡安·卡洛斯·德·波旁，并在西班牙共产党（PCE）的协助下，保留了整个法西斯政权体系。西共选择融入该体制，共同掩盖了现实，以“民主”的外表加以粉饰。但镇压和法西斯主义至今依然存在。

阿雷纳斯同志和许多其他共产主义者，正是因为认为西班牙共产党背叛了工人阶级、投靠了法西斯政权，才毅然决然退出该党。他们重建了真正的共产党，继续同西班牙法西斯国家作斗争。正因如此，他才被长期囚禁，直到最近才获得自由。

但如今，仍有许多政治犯被关押在国家的地牢中——包括共产主义说唱歌手、共产党活动家、工会分子、独立运动支持者和反法西斯斗士。

那中国工人阶级对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看待的？他们是否已经意识到党已经蜕变，还是仍然认为它作为共产党具有合法性？有没有其他真正提出革命替代方案的工人组织或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监狱里是否存在共产主义者或革命者的政治犯？

李东辉 中国工人阶级缺乏政治意识，也缺乏组织性。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并没有形成运动或者组织，也没有成熟的理论可供指导革命实践，现在仍然只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修正主义的各种小团体。

政治犯……四人帮和毛远新在政治斗争中落败后沦为了政治犯，此后当局进行了对左派残余力量的打击。

alex123 听到这些令人感到悲伤，我原以为中国还保有某种共产主义运动的火种，能够重新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四人帮中还有人仍被关押吗？我以为他们早就全部被处决了。

难道中国共产党内那些老一代的干部，在党蜕变之后，就没有人继续坚持斗争了吗？

李东辉 四人帮已经全部死了。但是毛远新还活着。

alex123 那毛远新现在怎么样了？他这几年有没有写过什么东西？还是出狱后就彻底退隐了？

**雾雨魔理沙** 隐退了，中国的左翼从四人帮被粉碎后经历了以邓小平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直到现在力量仍然很薄弱。中国资产阶级当局披着共产党的外衣一直在欺骗中国的无产阶级，并且垄断了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产党”的解释权。

**铁尼科** 听说西班牙人民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处置非法移民和洪灾不是很满意。

**alex123** 西班牙国家正陷入一场深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且无力找到出路。这种局面带来了大量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国家甚至无法保障人民最基本的体面生活条件。去年，就有上百人在一场洪灾中丧生，国家既未能提供有效的预防措施，也未能给予任何实质性的援助。

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危机也助长了最反动、最法西斯的思想在社会中的传播。其中之一就是种族主义。目前，一些法西斯团体正在煽动对移民和外国人的仇恨。这种舆论最终只会把工人阶级从真正的敌人、真正的问题——资本主义制度——引开。

**铁尼科** 非法移民，欧洲资产阶级最喜欢玩的把戏。

非法移民本来就是欧洲资产阶级打击本国工人阶级，分化人民的手段，目的是为了维护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化”息息相关。

为什么，非法移民为了一点点工资，他们相互恶性竞争，导致欧洲人民生活待遇一年比一年差，社会福利处于崩溃的边缘。

**远航一号** 目前西班牙以及整个欧洲资本主义矛盾激化，但是工人阶级斗争又处于困难中，确实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难题。

中国的无产阶级和新一代马列主义者正在成长，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引来无产阶级斗争的新高潮，但不是通过改造现有的“中国共产党”的方式，而是通过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

当然，在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来临以后，不能排除现有的“中国共产党”发生某些变化，不排除其中一部分出于保全其眼前利益的目的会与无产阶级结成有条件的统一战线。

**alex123** 希望如此。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矛盾正在不断加剧，资本主义正处于一场灾难性的危机之中。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共产主义的复兴，看到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重新站起来，与他们的阶级敌人展开斗争。

说实话，我在西班牙还没有太多机会与华人社区交流。总体来说，他们与西班牙的工人运动并没有太多联系。

通常可以看到，他们更容易融入本国的资产阶级行列，开办自己的生意。许多华人资产阶级也积极参与房地产投机，购买房屋后高价出租给游客或工人，牟取暴利。

此外，华人移民往往倾向于开公司、开商店或餐馆，而不是以雇员的身份受雇打工，这种现象也比较普遍。

另外，我想了解在中国资产阶级内部到底存在哪些矛盾和分歧。从你说的情况来看，我理解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是一派主张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力量？也许他们更倾向于维持与美国的关系？

另一方面，我理解还有另一种倾向是主张保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以保护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至于你提到的那些团体，我想请教一下你所说的“打着左派旗号的民族主义者”是什么意思？因为在西班牙几乎不存在这种倾向。你的意思是他们虽然反对帝国主义，但这种反对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动机，而不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

另外，你提到的那些教条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宗派团体，我理解主要存在于大学里的年轻人圈子当中，是这样吗？我理解的是，他们提出的是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的口号，但并没有提出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也没有真正去组织工人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

**李东辉** 我举些例子。在这里，许多人主张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分离开来，将毛主席刻画为单纯的“民族英雄”，甚至将毛泽东思想看作是发展儒家思想的产物。在沾染了民族主义思想的左派当中，人们存在无限制地抬高毛主席而为此贬低苏联和斯大林的行为，这也与毛主席本人历史上在斯大林问题上的言论比较复杂有关。以及，一些人吹捧民族资产阶级，认为以爱国主义为旗号的资本家是值得支持的，甚至因此支持“多种所有制并存”。

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国家有很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残余，许多人不自觉地通过无限制地吹捧毛主席的行为贬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其他国家。中国左派当中的民族主义现象是与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残余、中苏分裂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想残余相关的。

许多老人也搞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团体，而且大量的年轻人受到这些老人的影响而在思想上被误导。

**青年之翼** 同志你好！我简要说明一下我们的情况。

中国人民目前所受的压迫很大程度上由政府官媒极其附属媒体的苦难主义宣传和习近平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虚幻的空话背书。

中国不同地区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不一样的，在山东，山西，河北，河南（也就是所谓的“山河四省），因为这些地方属于中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工业命脉所在，官方的控制较强，因此老保守派比较多。而在江苏，浙江，上海这些与西方贸易密切的地区则对西方的政治形态接触较多，存在着大量的自由主义者，或者说自由派。在老保守派和自由派两种派别之外，还存在皇汉主义和我们所属的左派等势力较小的派别。

相比来说，老保守派更容易受苦难教育，即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以及“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的话术的欺骗。同时他们也擅长自我欺骗以寻求一分安稳的生活，忽视了阶级压迫的社会实质，忘记了或者不愿参与阶级斗争。

自由派以及新自由主义者往往占据除官媒以外主流媒体的主导地位，在 Bilibili，小红书，知乎等中国视频平台，社交平台 and 知识平台掌握审核和公关的权利。但他们也很少注意到阶级的问题。

至于左派，有很多新生的左派仅仅活跃在抖音(Tik Tok 中国版)，Bilibili 等视频平台，发布一些牢骚性的或影射追忆毛泽东主席的视频，往往配上诸如《弱水三千》之类的古风歌曲作为背景音乐，理论水平很低，缺乏组织能力。老左派则往往宗派化或自居高位，在一些大群发号施令。这包括一些老毛派和伪装成左派，实际没有资格称得上左派的政治投机分子。他们中的很多将左派工作改造为一种集团性的资本运作行为。其他的左派，有宣扬错误的中华帝国主义论，也就是“中帝论”的阳和平，他本身是因参与中国革命入中国籍的外国人的所谓“红二代”，这为其在中国的左翼活动提供了一定的官方豁免权，但其错误理论也影响了很多左派同志。还有一个曾经是“左派”的官方奴才，未明子，也就是刘司墨，既然是敌人，我不便在讨论左派的位置描述他。

在中国互联网防火墙内的几个网站要么是秉持错误理论，要么已经垂垂老矣，日薄西山。红色中国网是中国左翼网站中开放，进步的一个典型。相信你也看到，我们的交流比较活跃，相处也很融洽。虽然有时有摩擦和对撞存在，但我们仍然基本保持团结包容。我们的网站甚至包容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也就是托派分子以及朝鲜主题思想者的常驻，有时我们也会调侃他们，但也是以理论讨论为主，不会进行人身攻击。

红色中国网的半外围论立足于经济学分析，这在中国国内是罕见的，我们相信我们的理论。

目前红色中国网的一个问题是宣传问题。红色中国网处于中国防火墙之外，大部分同志需要借助 VPN 等工具访问，这导致了我们的传播不便，影响了我们的宣传。

中国的社会现实决定了我们现在还不能通过暴力手段进行斗争。甚至集会，结社，游行都不可能。现在是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受暴力机关所迫，我们暂时不能进行强有力的回击，只能通过“躺平”等经济手段加速社会崩溃，政府失权的到来。

alex123 非常感谢你这份有趣的剖析！我有一些疑问想请教你。

如果说自由派目前主导了中国共产党，那为什么他们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一些非官方的平台（比如 Bilibili、小红书、知乎）上呢？我没有完全理解你所说的“只能通过‘躺平’等经济手段加速社会崩溃”是什么意思。现在没有线下的组织活动吗？比如张贴海报、散发传单之类的宣传鼓动活动？有没有什么群众性运动是围绕具体诉求组织起来的？例如工人罢工、改善生活条件、争取更多自由或权利之类的？

我最近在阅读一些不同组织的资料，也结合了我在西班牙的研究。我认为你们红色中国所做的一些分析是非常正确的。

**青年之翼** 我并没有说他们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非官方平台，而是说在本不应受他们直接控制的非官方平台，也有他们的无形的力量在渗透。

他们会控制一个平台内用户所看到的内容，从而维护他们的主观意志，使之“神圣不可侵犯”。对于出现在公共网络平台上的一系列有害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公信力的正面言论，他们会予以限流或封禁，并雇佣一些傀儡用户（所谓的“水军”）大肆传播官方意志。

至于散发传单等抗议行为。虽然宪法规定，群众有组织结社，示威，游行的权利，同时也有言论自由权，但合法性的解释权一直都在政府手中。一切不利于资产阶级政府统治的社会行为都会被禁止，甚至在我们的即时通讯社交平台微信（WeChat）和 QQ（曾用名 OICQ）上，正常的聊天行为也会被审查。

并且 Google 没有在中国大陆提供服务的原因也是 Google 拒绝中国政府关于添加互联网信息审查过滤的要求。中国政府不愿中国人民看到政府不想让他们看到的内容。

在私人聊天或群聊发布涉政言论是极其危险的。涉及出版物的书报检查也是极其严格的，政府不允许群众得知一切有关敏感话题的客观真实的信息，甚至大肆鼓吹自己的统治，扭曲国外新闻及评价。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可能进行那些抗议行为的原因。

我们只能以一些较为隐晦的方式传播我们的理论，对于这一点我们很无奈。

**怀鹤** 在半外围资本主义的中国，由于每年要向帝国主义、核心国家上交大量的剩余价值，交租纳贡，所以中国不仅没有足够的社会剩余产品来满足阶级妥协，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反而只能不断加强中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资产阶级专制以迫使中国工人忍受世界范围内罕见的高强度劳动。

在今天，由于中国的资本积累仍在继续，利润率还保持着一定的水平，这就决定了在全局上资产阶级的强大和无产阶级的弱小。习近平的上台，标志着中国新自由主义的进一步反动，以往胡锦涛、江泽民一代还残存的言论自由等权力基本消失殆尽，国家机

器史无前例的强大起来。另一方面，中国近亿人的农民工组成庞大的产业后备军，迫使无产阶级忍受失业和低工资。

但随着产业后备军的彻底消失殆尽，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在全局上开始扭转，形成对资产阶级不利而对无产阶级有利的局面。在这个时期，所谓“躺平”，也就是对资本主义劳动秩序普遍的反抗、阳奉阴违、消极怠工，是以产业后备军的消亡为基础，并成为新时期普遍的工人斗争方式。通过普遍的消极怠工、偷懒，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工人的身体健康，增长了他们的自由时间，而且减少了实际劳动量，使得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值下降，从而导致普遍的利润率下降，进一步影响了全国各地资产阶级政府的财政。

那中国工人阶级对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看待的？他们是否已经意识到党已经蜕变，还是仍然认为它作为共产党具有合法性？有没有其他真正提出革命替代方案的工人组织或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监狱里是否存在共产主义者或革命者的政治犯？

中国资产阶级政权的合法性，在四十年内已经转向“经济增长”，如果政权不能兑现经济增长的承诺，反而因为利润率下降而使得资本积累的火焰熄灭，那么人民群众将会站起来革命。这一过程正日益为中国工人阶级产业后备军的减少和罢工、“躺平”等各种减少自身劳动率的手段所实现。

一些法西斯团体正在煽动对移民和外国人的仇恨。

一事物在不同的条件下会走向相反的对立面。以前反对移民的非人道主义政策，现在却是削减产业后备军，对资产阶级不利而对无产阶级有利的政策。帝国主义战争造成了成千上万的难民，却借他们的手去与本国工人斗争，抢夺他们的工作岗位，使他们更加贫穷和无力。所谓“法西斯”，应该是顺应本国人民意愿而以一些本土资产阶级利益为表现的运动。

**黑龙江煤城的哀伤** 他所说的法西斯团体，其实更应该说是纳粹团体。

**走向革命胜利** 我觉得还是要时常警惕一些国家极右翼政党搞军国主义的。

**怀鹤** 今天的纳粹，如乌克兰，哪一个不是死命维护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反对移民，就是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工人阶级力量上升的进步政策。今天的法西斯，决不能是反对移民，相反是以某种“世界主义”的面孔出现，代表着国际帝国主义、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全面打垮工人阶级，要他们永远俯首称臣的。

**新社会人** 中国共产党目前就是一个以新自由主义为纲，对内残酷剥削中国工人，维持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对外极力讨好妥协帝国主义，输送超额利润，在国际上丝毫无自主决策能力的腐朽资本主义党派，中国资产阶级是在西方帝国主义颠覆苏联后，最顺风顺水的八九十年代转型，所以目光极其短视，把中国人民都当是傻瓜，敲骨吸髓。

但历史螺旋上升，中国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形式，也必然意味着中国人民未来对资本主义再无任何幻想，激烈反抗，就非社会主义道路不走。

**alex123**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或者有兴趣了解一些关于西班牙和欧洲背景的材料，我也可以尝试翻译并分享给你们。为了让你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处境，我简单介绍一下背景情况：

1936年，西班牙爆发了我们自己的民族战争，以对抗法西斯势力。1939年法西斯夺取政权后，一个金融寡头集团巩固了其统治，彻底清算了工人运动曾取得的一切成果。他们依靠囚犯的奴隶劳动，加速推动西班牙从半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垄断和大资本积累逐渐成型，国家机器被他们用来确保其政治统治。

尽管遭遇失败，反法西斯抵抗并未停止。许多共产党人转入山区，尝试开展游击战。然而，当时工人运动的先锋——西共中央委员会却流亡至法国，接受了“欧洲共产主义”理论，并背弃了苏联。他们还亲手解散了仍在进行抵抗的游击队，甚至暗杀了其中最具有战斗力的干部。同时，他们开始推行“民族和解”战略。

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忠诚的共产党人离开了西共，左翼内部开始出现多个新组织，其中就包括由阿雷纳斯同志领导的重建派。他们致力于重新建立一个真正继承原西共革命传统的共产党。

法西斯政权末期，工人运动高涨，爆发了许多大罢工和街头抗议，要求释放政治犯，全国范围内也出现了多个城市游击队的活动。政权岌岌可危，弗朗哥在临终前将王位传给了胡安·卡洛斯·德·波旁，计划通过所谓“过渡”来安抚工人运动。为实现这一目的，西共的“民族和解”政策发挥了关键作用。西共被合法化，而其他许多左翼组织仍处于非法状态，成员被监禁。

“过渡”的核心思想是：双方都有错，这是一场“兄弟阋墙”的内战，因此应该遗忘历史、停止斗争。而与此同时，共和派、共产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国际纵队的烈士们仍被抛尸荒野，而法西斯分子却享受纪念碑和官方哀悼。五个党派在未举行任何大选的情况下起草了一部宪法，并以“接受它，否则暴力镇压将卷土重来”作为威胁强行通过。

在“过渡”时期，警察和法西斯组织在示威中杀害了数百人。但政府用美丽的语言粉饰这一过程，营造出一个与其他欧洲国家看齐的“民主”外表。他们举行了选举，但只有接受宪法的政党才有资格参选，许多革命组织仍被禁止。这个骗局在部分群众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们一度以为体制真的变了。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个骗局逐渐被揭穿。我们看到法西斯制度的核心依然存在：监狱里自 1939 年以来从未缺少过共产党人，工人运动始终遭受迫害。甚至还有一位共产主义说唱歌手因为歌曲内容而被判入狱。警察、法官、政客大多来自原法西斯体制，依旧掌权，许多法律条文也与弗朗哥时期如出一辙。国王本人就是独裁者弗朗哥一手培养的接班人。

目前，工人运动仍较为混乱，左翼内部存在众多派别和分歧，导致群众迷失方向。但我们也看到，抗争正在逐步重启，重要的罢工和示威已在过去几年重新登上舞台，重新唤起了斗争精神。

如今，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正试图通过战争来摆脱政治和经济危机。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西班牙政府持续输出反俄反华宣传，不断制造“中国和俄罗斯即将入侵”的恐慌情绪，以此来要求民众接受进一步的社会削减，忍受生活条件恶化，为“保卫祖国”而牺牲。

在这种背景下，我坚信工人阶级终将觉醒，并奋起反抗这场帝国主义战争。

中国资产阶级政权的合法性，在四十年内已经转向“经济增长”，如果政权不能兑现经济增长的承诺，反而因为利润率下降而使得资本积累的火焰熄灭，那么人民群众将会站起来革命。这一过程正日益为中国工人阶级产业后备军的减少和罢工、“躺平”等各种减少自身劳动率的手段所实现。

很可能客观条件会越来越有利于那场起义的到来。不过我认为，我们永远不能忽视主观条件的必要性——必须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建立先锋党，做好准备去利用这些条件。如果不这样做，根据我所在国家的经验，资本主义最终总会找到办法延缓它的崩溃，直到无产阶级彻底将它埋葬。

我不太确定自己是否理解正确，也不确定你们在中国所经历的移民背景是否与西班牙相似。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移民所带来的人口增长，的确会加剧失业（形成“后备军”），并导致生活条件的恶化。而法西斯势力正是利用这一现象，来传播反动思想，挑动本地工人与外来工人之间的冲突，将工人阶级引向一场“本地人与外国人”的战争。他们把移民污蔑为懒惰、犯罪分子，加以妖魔化。与此同时，寡头集团却充分利用这些廉价劳动力，对他们进行近乎奴隶式的剥削。更严重的是，近

年来一种做法正在蔓延：在农业收获季节或某些特定工作需要时剥削这些移民劳工，之后再把他们遣返回原籍国。这样，资本家连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都不需要承担。

怀鹤 因为你的国家，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居于核心准核心地位。这就是说，它可以从新自由主义的贸易中源源不断地获取广大外围、半外围国家人民的剩余产品，从而在其内部达成阶级妥协。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欧各国始终无法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这种物质基础也使得西欧的共产党纷纷转变为社会民主党，否则这些党就没有办法生存。作为哲学反映的马克思主义也蜕变为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不肯面对那种经济基础，于是转向所谓文化变革。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上世纪资本主义得已延续到今天，要感谢邓小平的反革命政策，若不是他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几亿人的熟练劳动力加入世界市场，国际资产阶级就没有办法打垮国际工人阶级，新自由主义政策也要破产。今天，随着中国产业后备军的消失殆尽，将再也不会会有任何一个比中国体量还大的产业后备军出现，中国资本主义的崩溃就是必然的。

中国没有移民的传统，中国有堪比整个世界体量的熟练劳动力队伍，不需要移民。况且，移民会带来治安问题，对于中国暴力机关来说还是不移民比较划算。

你说的剩下的几点是对的。

## 革命渺茫论的灌输路线幻想 和劳动人民的伟大斗争<sup>1</sup>

郑 阑 干 等

自笔者写了《只有工人阶级的斗争才能掘墓资本主义》和《要人民英雄，不要孤胆精英》后，“沙真劳”和“FQ1PP4”两位先生先后针对笔者提出的“中国工人阶级强大论”和“群众路线”提出质疑并分别撰文批评。其中，“沙真劳”先生认为笔者忽视了利润归根到底由生产决定，形而上学地讲目光集中于流通领域，并给出自己的论据反对笔者的“中国工人阶级强大论”<sup>2</sup>；“FQ1PP4”先生则指出笔者片面夸大“客观条件”、“必然性的枷锁”，贬低意识形态斗争作用、拔高群众自发性（“自在阶级”）地位，归根到底滚向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唯生产力论阵营。<sup>3</sup>

在笔者看来，“中帝论”、“唯生产过剩论”和“灌输路线”这三大法宝有一推二并三位一体聚焦于“中国工人阶级孱弱”的核心——例如，尽管沙先生和“FQ1PP4”先生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分析方法，但“中国工人阶级孱弱论”却无独有偶成为两人一切分析的大前提和逻辑核心，并共同指向了“灌输路线”的实践道路。本万字长文将针对他们的中心论点展开批判，揭露“中国工人阶级孱弱论”及其“灌输路线”的革命渺茫论实质。

① <https://maipdf.cn/file/dt687b1584160a2/pdf>

② <https://zhuanlan.zhihu.com/p/1928404836367438369>

③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54985529/answer/1928784473119503660>

## 介绍学院派的“批判技巧”

“沙真劳”先生在文章开头若有其是的说：

在郑阑干文章的第二部分，郑阑干先生反驳了“生产过剩危机论”，搞起了“剩余价值生产不足导致资本危机论”。

后面不知怎的突然变了口径，说：

他分析资本主义不是从生产到流通，即从剩余价值到利润来科学分析。而一开始就从流通出发，那么自然就会对资本的生产一无所知，就一定会否认生产过剩理论。但又为了维护维护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最后必然只能抓住第三卷的救命稻草，利润率下降规律了。但郑阑干先生心中的马克思，只剩下躯壳，本体是不存在的。

不愧是“沙真劳”先生，能跨过“分析剩余价值生产不足”是如何“不是从生产到流通”进行分析的这道常人看来不可逾越的逻辑峡谷，成功发明了自康德之后的第五个二律背反！

瞠目结舌的是，“沙真劳”先生在文末又来了个神龙摆尾：

利润只是剩余价值在流通中的形式，其根本来源还是生产过程，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依我愚见，利润如果不是“剩余价值生产”的一部分，便只能是天上掉下来的罢。

这里出现了双重见解：如果承认利润“根本来源还是生产过程、是剩余价值的生产”，那么郑阑干先生抓住剩余价值生产不足这个问题就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认为郑阑干分析资本主义“一开始就从流通出发”，就完全无法解释为什么他要花大量篇幅说明剩余价值生产不足问题（除非认为此乃流通问题）。

沙先生依据一处字眼使用的不同，十分自信地指责说：

郑阑干通篇引用了马克思的原文来证明自己“利润率下降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的观点，但是马克思在这里的原意是利润率下降“促进”危机发生，而不是利润率下降“导致”危机发生。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也就是资本积累。资本积累是经

济发展的动力，而资本积累快慢又由利润率高高低决定。那么，既然经济危机是资本积累的危机；并且资本积累的危机是由“原本在私人手里积累财富不见了”带来的，那不就是“利润率下降”的意思吗？

沙先生提炼文本的能力真是浮皮潦草，文本的内在逻辑在他那里是服从于关键词而无需把握联系的。我们一般管这叫“教条主义”。

有两种常用的批驳的方式：一种是堂堂正正地，鞭辟入里地剖析错误，令人信服地驳倒对方的论点；另一种则是偷换自己或对方的论题，制造一个明显错误的观点来安在对方头上，然后道貌岸然地一矢中的。上述的第二种断章取义地自我做故式论证是学院派人士的一贯作风，例如齐泽克在《毛——马克思主义狂飙之王》一书中多次运用这种方法。

“FQ1PP4”先生可能没读过齐氏的新著，但一定无师自通了这种方法，才能在笔者再三声明“唯物主义者从不否认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的情况下不厌其烦地对笔者的观点进行扭曲，甚至污蔑。在“FQ1PP4”先生看来，笔者是割裂主观能动性和客观现实：只要承认规律或必然性的前置性和客观存在，只要强调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要以其为前提，那你就是“僵硬教条”的当代伯恩斯坦。

“社会革命的客观条件如何由‘不成熟’到‘成熟’的？”——“FQ1PP4”先生拷问我如是说。他似乎从没想过也从未看过笔者的文章：如果笔者主张“人的意志等于零，其努力是‘徒劳的’”，只需“等待客观条件成熟社会存在自动推动革命”，那“FQ1PP4”先生便无法解释一个“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等待主义者”会反对“唯生产过剩论”而去支持最强调能动性的利润挤压学派。

亦或者说在“FQ1PP4”先生看来，工人阶级掘墓资本主义的斗争依旧还是“帮助资产阶级完成了对工人的分化瓦解，亲手扼杀了革命的萌芽，亲手加固了那道‘枷锁’”？“FQ1PP4”先生辩证法面具在自己设置的“拷问”面前撞得粉碎，露出了诡辩论的真实面孔。

这完全是前门楼子和胯骨轴子的区别，以至于“FQ1PP4”先生设身处地的扮演笔者做出决定，贼喊捉贼地说：“看吧，这就是他们所做的！”“FQ1PP4”先生不愧是情景扮演的高手：马克思主义者讲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说存在妥协空间，并未说应该“什么都不做坐等胜利”——这不仅是“FQ1PP4”先生替我们做的选择，还是他对我们论述的理解程度——也仅仅是到此为止。

“FQ1PP4”先生不理解也不想理解作者论述过的主观能动性的必要条件以及限度的问题，而是颇有微词地将自由意志与必然客观斩断开，将笔者打成伯恩斯坦主义——这的确是一种省力的办法，却并不是有用的办法。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FQ1PP4”先生的主观能动性在西方起了怎么样的“革命意义”：性别政治的话语和种族政治的话语的确杀死了传统意义上的大他者。“上帝已死”——就像尼采说的那样；但性别政治和种族政治的话语你方唱罢我登场，成了消解无产阶级政治话语的新的、局部的大他者。我们不应满足于什么话语政治实践，不应满足于当街抢几个商店、当街做一下爱出个洋相，这只是小资产阶级符号化自身的此岸颅内高潮，而非无产阶级所期待的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的彼岸明天。

“诡辩是依据未加批判和反复思考的毫无根据的前提而发的议论。”这就是他们自我认同虚空打靶的“逻辑自洽”。

“沙真劳”先生和“FQ1PP4”先生的伟大逻辑万岁！

## 劳动人民的伟大斗争是掩盖不了的

在《只有工人阶级的斗争才能掘墓资本主义》中，我写道：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到35.5%、利润份额高达38.7%，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中国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在2010年达到高峰（18.7%），此后即趋于下降。2024年，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为45.4%，低于2020年、2021年和2023年的劳动收入份额，但高于本世纪以来其他各年的劳动收入份额。

从2010年到2024年，中国经济的利润份额已经从约39%下降到约32%，下降总幅度已经接近九十年代大规模私有化带来的上升幅度。同时期工业企业部门的利润率也从约19%下降到8.2%，逐渐接近美国以往发生经济危机时的水平。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从2010年的49.9%上升到2024年的56.6%。不是工人阶级太弱了，弱到活不下去只能绝地反击，而是工人阶级开始强大了，并且初步强大到可以压迫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和利润份额，强大到使消费品成为社会总产品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这种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自然会呈现出与“消费不足”不同的态势。

但对此，“沙真劳”先生认为我“丝毫看不见中国当下广大工人的具体工资待遇是如何的”，理由是——

很多地方十几二十年来工资基本都是维持不变的水平，变了也是多了几百块钱而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工人这十几年来名义工资上涨幅度很小，实际工资因为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下降了，并没有像郑澜干先生所说的劳动收入报酬上涨。那么他所列举的数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因就是近十几年来，大量农民进入到城市中变成工人的一员，无产阶级的数量多了，劳动收入报酬当然是多的。但总劳动收入报酬的绝对增加，跟每个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是绝对不冲突的……郑澜干先生没有注意到以上的事实，以至于得出谬论：中

国的工人阶级强大了。强大到可以迫使资产阶级做出让步，以至于利润率下降，劳动收入报酬上涨。

好，我听着呢！“沙真劳”先生企图用城市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到一定程度以后实际工资开始上升（“刘易斯拐点”）来解释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避开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来谈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仅从统计分析上来说，这里混淆了际工资与劳动收入份额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 实际工资和劳动收入份额是两个概念

“实际工资上升”即名义工资的上涨速度超过了通货膨胀率，实际工资上升意味着劳动者对物质消费品的平均购买力增加，而不仅仅是工资面值增加。

“劳动收入份额”指的是劳动者获得的工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无论是名义工资上升，还是实际工资上升，都不必然带来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只有当不仅名义工资增长速度超过通货膨胀率，而且实际工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时（假设计算实际工资与劳动生产率所用的物价指数一样），劳动收入份额才会上升。

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就意味着整个国民收入中更大的一个比例归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所有。一般情况下（在经济周期的扩张期中），这就意味着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对工人阶级有利的变化——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国民收入在工资总额与剩余价值之间的分配只能是劳资双方经过阶级斗争较量以后才能出结果，而绝不会是资本家阶级恩赐的结果。

在一个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个劳动者离开乡村并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后，这个劳动者的货币收入以及实际收入一般来说都会得到提高。但是，这个劳动者在乡村中的时候，一般是不给资本家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但是，当这个劳动者进入城市以后，他不仅可以得到更高的货币工资，他在统计上的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了，从而给资本家带来的剩余价值也大大提高了。

打个比方说，如果做一些非常简单化的假设，不考虑税收、折旧等，比如一个从事农业个体生产的农村劳动者，年收入两万元，他的劳动生产率也是两万元，在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之前，这个劳动者创造的产值的劳动收入份额就是 100%。假如这个劳动者去城市打工了，年工资提高到四万元，但是他在资本家企业中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十万元。这样，虽然这个劳动者的年收入提高了，但是劳动收入份额反而下降到 40%。

可见，除非伴随着工人阶级斗争的提高，仅仅是城市化本身，在统计上只能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而不是提高。

劳动收入份额要提高，就必须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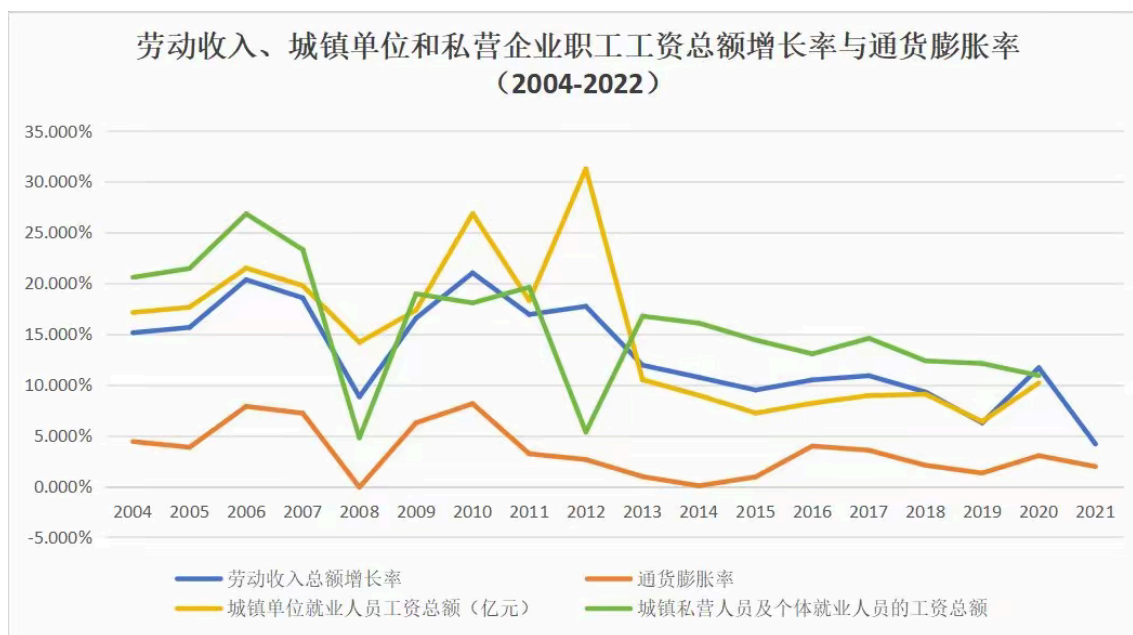
$$\text{实际工资总额的变化率} > \text{GDP 变化率}$$

左右同除人口者劳动力总数，就得到人均实际工资变化率与人均GDP变化率或人均实际工资变化率与劳动生产率变化率。如果“猷仁1949”先生和“沙真劳”先生承认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在提高，那么在数学上就必须满足上述式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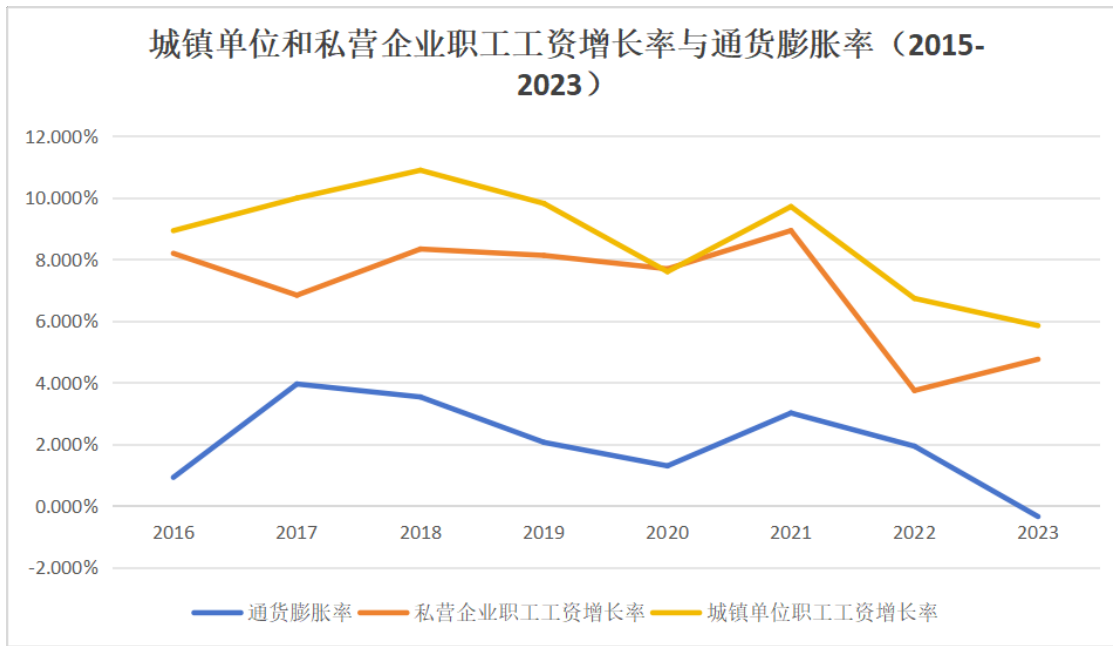
——然而，所有人都知道 GDP 变化率、人均 GDP 变化率、劳动生产率变化率都是正数，大于零，那么工资的变化率也必然大于零。A/B 要提高，A 的变化率要大于 B 的变化率，这是非常显然的事情。而 A/B 是提高额，B 的变化率是正的，那 A 的变化率没有理由是负数。“沙真劳”先生逻辑自洽的程度，连莫比乌斯环都自愧不如。

## 劳动者的斗争正在日益挤压利润

那么，工资总额变化增长理论成立，实际情况如何呢？以下是我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的图表：



(接下页)



如图，从 2004 年到 2022 年，中国劳动收入、城镇单位和私营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增长率始终高于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率；从 2015 年到 2023 年，城镇单位和私营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率始终高于同时期通货膨胀率。这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总的来说趋于上升。

所以，“猷仁1949”先生接受了“沙真劳”先生“中国工人这十几年来名义工资上涨幅度很小，实际工资因为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下降了”的虚假解释，证明他们已不再使用唯物辩证法的分析武器：因为“观察的客观性”是辩证法的首要要素。这种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不依人的意志的而转移的自在之物本身。

退一万步说，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资本家雇佣的工人多了，创造的价值也多了。那么如果劳动收入份额增加，必然说明劳动收入增长盖过新创造的价值呢？我知道“沙真劳”先生工作忙，但不至于窘迫到了不得不使用右派历史学家污蔑革命中国惯用的“身边统计法”吧？这不是贫困的经济学，而是经济学的贫困。这是一种历史的讽刺，也是一种悲哀。

## 不许贬低内陆人民的斗争成果

“沙真劳”先生对我关于工人阶级斗争的重心正在朝中西部转移的论点嗤之以鼻。他说：

工人在内地的这种关系网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地方，关系网只能是前资本主义的大家族，帮派，行会，村霸等等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存在，阻碍了当地资

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自然也不会发展，其阶级力量也当然是有限的。这些前资本主义的关系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总是和资产阶级勾结在一起，依附于资产阶级并且向工人阶级进攻，并使阶级斗争的形式复杂化。列宁指出：

“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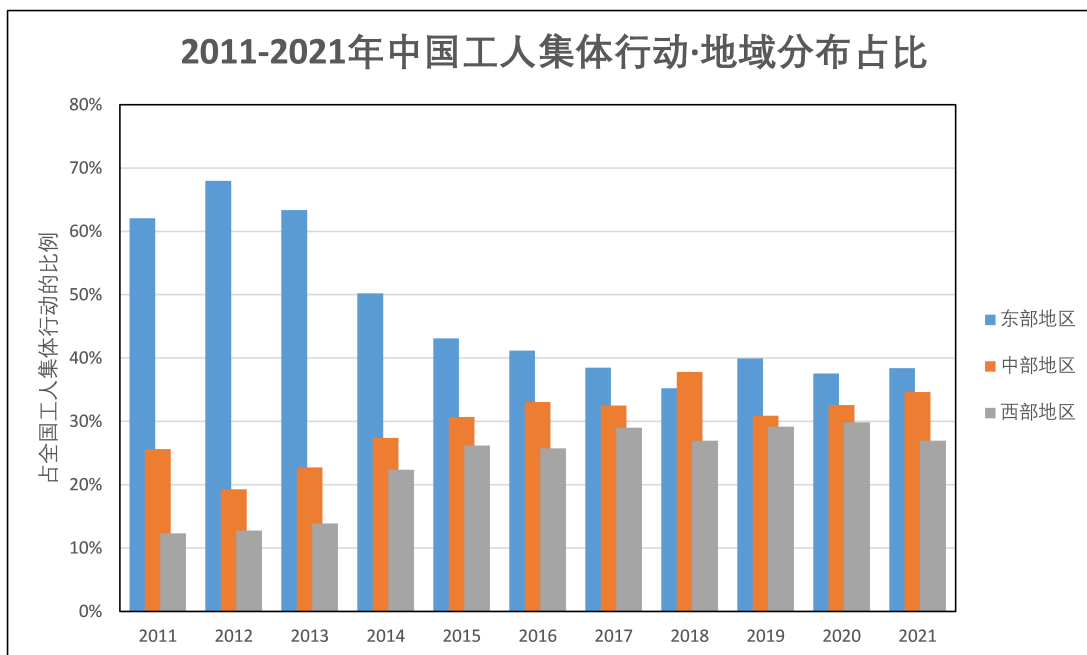
沙先生的意思是，中国的内地不是以万物商品化经济为主导、私营企业追利润的投资驱动社会生产的吗？还是说在那里的劳动方式以私人小行会为主导，而不是自由雇佣劳动？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则是除一、二产业外的产业（一般是服务业）。根据华经产业研究院整理的数据，几个内陆主要城市的三次产业占比情况如下：

洛阳市第一产业占比为4.1%，第二产业占比为40.6%，第三产业占比为55.3%；  
德阳市第一产业占比为8.5%，第二产业占比为51.4%，第三产业占比为40.2%；  
宜宾市第一产业占比为9.1%，第二产业占比为48.5%，第三产业占比为42.3%；  
赣州市第一产业占比为9.9%，第二产业占比为36.6%，第三产业占比为53.5%；  
咸阳市第一产业占比为14.1%，第二产业占比为37.1%，第三产业占比为48.8%。

如上所示，内陆主要城市产业占比中均以第二、三产业为主，即使是第一产业占比最高的咸阳，也仅为其第二产业的一半不到。换言之，所谓中国的陕西，河南，四川这些省份是属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地方，是无的放矢；至于所谓“前资本主义的关系网”会“向工人阶级进攻，并使阶级斗争的形式复杂化”，更是沙先生高超想象力的产物。

内陆城市只是没有发达的现代工业以保证有相当比例的工人，而非没有足够多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而不是说阶级矛盾不够尖锐化、广大人民群众斗争的目标不够清晰。作者不断重复“小生产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时，不知他记不记得 20 世纪中国革命的主体阶级就是“小生产”的农民阶级，更不用说现在中、西部地区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



以上这张图反映了 2011 至 2021 年中国工人集体行动的地域分布占比变化，图中可以明显看到，中西部工人集体行动不断上升，且自 2015 年后中西部占比始终超越东部。原来是“沙真劳”先生打出了不证自明这张老套牌术！如果按照“沙真劳”先生的思维方法，是不是可以说是中国东部地区的“帮派，行会，村霸等等的东西”倒行逆施了呢？您又是怎样有自信让“猷仁1949”先生发表的？

中西部地区当然存在关系网，但并非“前资本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政府内部的、教育医疗系统内部的、完全服从资本积累秩序的关系网的。这些关系网的强度跟沿海地区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能维持就不错了。

马克思借用过《伊索寓言》的这样一个警句：“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对客观统计数据分析开拓的分析置之不理，只原继续以教条主义对照现实，这就是行动上的革命渺茫论者。对这些人我们也只能说：跳吧。

## 落后的群众和先进的“FQ1PP4”先生

但除此之外，还有“自为阶级”：指这个阶级不仅客观存在，而且成员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共同利益、历史使命，并组织起来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斗争，而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不是自动发生的。一个工人可能将自己的贫困归咎于命运、老板个人、或者不够努力，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现实，如果社会意识在自动前进，为什么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消费主义，这些腐朽的意识形态在今天依然大行其道，甚至在欧美等国的工人阶级中有巨大的市场？这其实证明

了社会存在中的反动因素，在疯狂的“阻碍”和“毒化”社会意识，这种观点的政治后果是什么？是“等待主义”和“尾巴主义”。如果社会本身会解决一切，那我们还要做什么？我们只需要跟在“社会”的屁股后面，为他鼓掌就好了。就感受到很快啊，一下子创造了一个名为“社会存在”的神秘救世主，来代替阶级和政党的艰苦奋斗。

由此，“FQ1PP4”先生指责我“完全忽视了从一个客观的经济身份转变为一个自觉的政治主体的艰难过程……崇拜群众的自发性”。

“崇拜自发性”这个帽子可不敢随使用。否认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反对工人反资本主义的路线——我何时有过这种观点？我们不反对辩论，可是有一个条件：应当自重些、注意读懂对方的意思，而不是将自己的臆想加在我们头上。别急着想在笔者这里发现不曾有过的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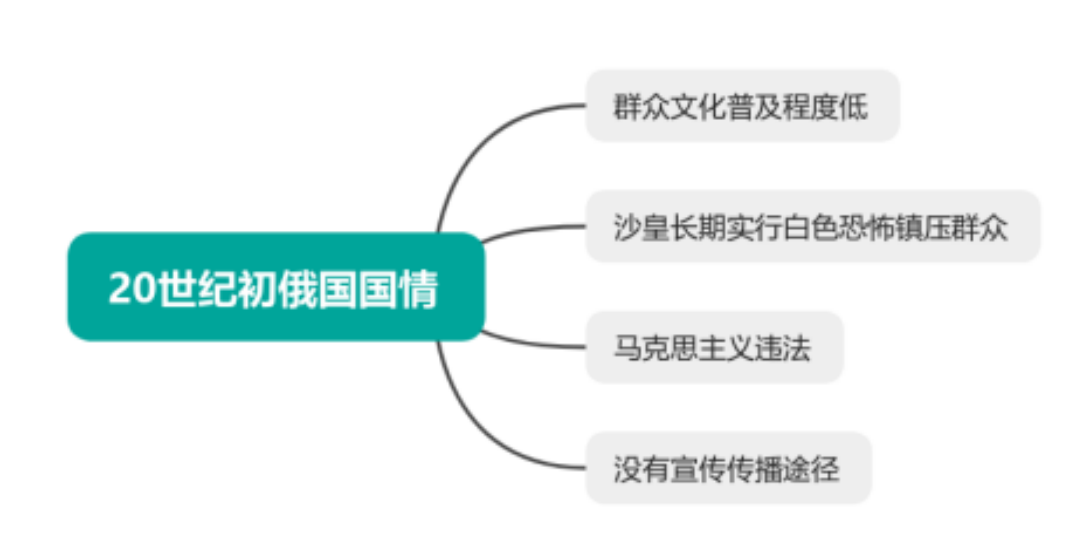
试问：群众没有外力帮助就无法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就不能认识他自己要作为一个阶级而组织起来、不能有明确的方向、不能自己在实践中学习吗？依我愚见：既然资本主义这么厉害，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什么没有在“FQ1PP4”先生您的脑子里呢？难道您的“觉醒”是靠其他人人为“灌输”的吗？

——如果不是，你就承认了群众是可以自我觉醒的——你自己就是例子。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在于对方根据自己的经验对置身事内的环境进行判断，从对旧世界的扬弃中发现新世界。事情并非“FQ1PP4”先生幻想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并没有直接被“灌输”进群众的脑子。

“FQ1PP4”先生，你有没有想过，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有更多比你更早更快更好的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工人？难道你的生活条件是什么异常养尊处优、荣华富贵的，以至于全中国十三亿九千九百万人都达不到这个水准吗？如果不是，你又何必担心群众落到你后头呢？

## 阶级斗争的两条道路：灌输路线和群众路线

“灌输论”是在十九世纪末提出、由列宁在《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中提出的以地下职业革命家向劳动群众灌输共产主义思想的工作路线。不应该过高估计灌输论重要性，《怎么办》的副标题“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对说明历史背景具有特殊意义。当时的沙皇俄国的国情是俄国工人难以自发产生共产主义意识，只能靠知识分子产生、由先锋队灌输进工人中。这些条件有：



列宁提出灌输论仅仅旨在弥补“领导者落后于群众自发高潮”的弊端。[4]列宁认为，在当时俄国的条件下对无产阶级来说，其经济斗争太狭隘了，不可能自发获得社会主义的阶级意识。

列宁说：“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同样的，今天我们可以说：只有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才会单靠列宁关于某一特定时代的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按“FQ1PP4”先生，难道中国现在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人们普遍大字不识吗？难道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在中国和在波兰一样吗？难道群众买不到马克思主义书籍吗？难道抖音哔站没有上万关注的左翼视频博主吗？

列宁之所以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奉《怎么办》为圭臬的自大的“人民救世主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在目睹 1905 年革命中群众自发涌现的伟大革命斗争后，列宁在提出灌输论短短两年后就反思总结说：

问题不是要削弱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严格要求和我们的正统的不调和态度，而是要通过新的途径，用新的教育方法去加强它们。（《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1905 年 2 月 23 日）

1905 年第一个和主要的教训就是：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使工人生活和国家管理真正有所改善。无论有教养的人怎样“同情”工人，无论单个恐怖分子怎样英勇斗争，都不能摧毁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家专横势力。只有工人自己起来斗争，只有千百万群众共同斗争

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当这种斗争减弱下去的时候，工人所争得的成果立刻就开始被夺回去。

（列宁：《革命的教训》，《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387 页）

离开群众本身的独立政治斗争特别是革命斗争，在这种斗争之外，永远不可能对群众进行真正的教育。只有斗争才能教育被剥削的阶级，只有斗争才能使它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有多大，扩大它的眼界，提高它的能力，启迪它的智力，锻炼它的意志。（《关于 1905 年革命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

灌输论的总方针列宁实际只在 1903~1905 短短两年里被执行；即使在《怎么办》里，列宁也从未否认自发群众往往走在党的前面。群众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到群众中去”的前提是“从群众中来”。只有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先作人民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作群众的先生。只有作群众的好学生，才能作群众的好先生。只有这样先锋队才能真正成之为“先锋队”——这是我们的群众路线。

在对列宁的阶级斗争实践和思想发展一知半解的情况下，生搬硬套列宁在特殊情况下的具体结论，认为劳动人民连工团主义意识都无法产生，而先锋队不仅要把社会主义思想从外部灌输给工人，而且还要让教育工人认清自己的现实利益。这种以“运动群众”为核心的精英灌输论（灌输路线）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看不上中国劳动人民的斗争能力，同时也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命运缺乏清晰认识的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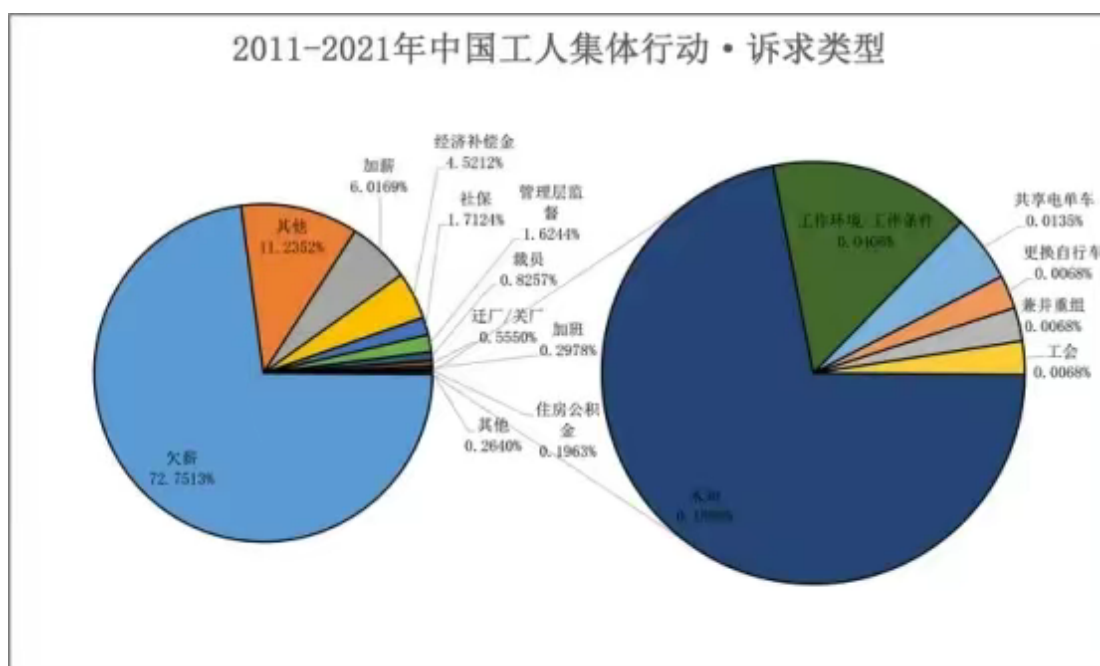
“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03~104 页）

革命知识家确实紧密联系群众，为民请命；但是这个“命”不是少数人的独创，而是诞生于群众的脑海中，再经由革命家的大脑提炼升华的产物。

所以，“FQ1PP4”先生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蒲鲁东一样，实际上认为“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

## 我们正处在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时代！

历史上哪一次成功的革命，是在统治阶级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条件下发生的？大多数革命斗争，大多数都是在“不公平”的、被压制的条件下，去创造“可能性”，去夺取“领导权”的，将“没有公平竞争的条件”作为不进行斗争的理由，把资产阶级法律框架下的“公平竞争”作为斗争的前提，可以说这算是某种程度上比较可耻的投降主义。<sup>4</sup>



工人斗争中有 72.75% 是围绕着“讨薪”展开的，这说明我们当前处于以讨薪为主要目的的经济斗争阶段。毛主席说过：

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当着人民还不愿意组织起来的时候，你偏要去组织，那就是左倾冒险主义；当着人民愿意组织起来的时候，你却害怕去组织，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第一步就是打破资产阶级专制制度，把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本身先“合法化”。但“FQ1PP4”先生只清楚“所以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中国经济参加国际资本主义分工的主要部门仍是出口制造业，中国仍然要依靠剥削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来维持其所谓竞争力。这是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正是因此，资

<sup>④</sup>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5498529/answer/1928784473119503660>

产阶级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去满足民主制度下劳动人民合法化了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当且仅当资产阶级对阶级矛盾失去控制后，开放民主自由才有可能。但到了那个时候，中国早已进入了群雄逐鹿的年代，劳动人民早已在资产阶级撤退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中践行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积极自由了。所以，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第一步就要摧毁对资本主义至关重要的资产阶级专制制度，——就相当于为了要逮捕敌人，第一步就要找敌人借枪一样，——与虎谋皮，岂有它哉？

另一方面，中国的资本积累模式的发展必然带来一个日益发展壮大的无产阶级。再者，资产阶级无法从世界市场上获取足够的超额利润，无法收买一支足够庞大的工人贵族队伍——这一特点决定了未来的矛盾无法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以阶级妥协或社会改良的方式求得解决。这些基本矛盾，决定了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中国的主要“优势”就是拥有数量庞大廉价劳动力，表现为中国劳动者被迫普遍接受超长劳动时间以及超高的劳动强度。



但是，随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逐步枯竭，为了维持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所需要的青壮劳动力正在迅速萎缩。2025 年以后，中国的劳动力队伍（特别是青壮劳动力队伍）将开始加速减少。

据联合国人口司的数据，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社会主义时代后期每个妇女一生平均生 6 个孩子下降到 2000 年的 1.6，又下降到 2023 年的 1.0。按照中国妇女现在的总和生育率，中国的新出生人口每隔一代人就会减少一半。

据联合国人口预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岁至64岁）将从现在的大约10亿减少到2050年的不足8亿；其中，最佳劳动年龄人口（25岁至59岁，大致决定一个国家的就业规模）将从现在的7.7亿减少到2050年的5.7亿，平均每年减少约700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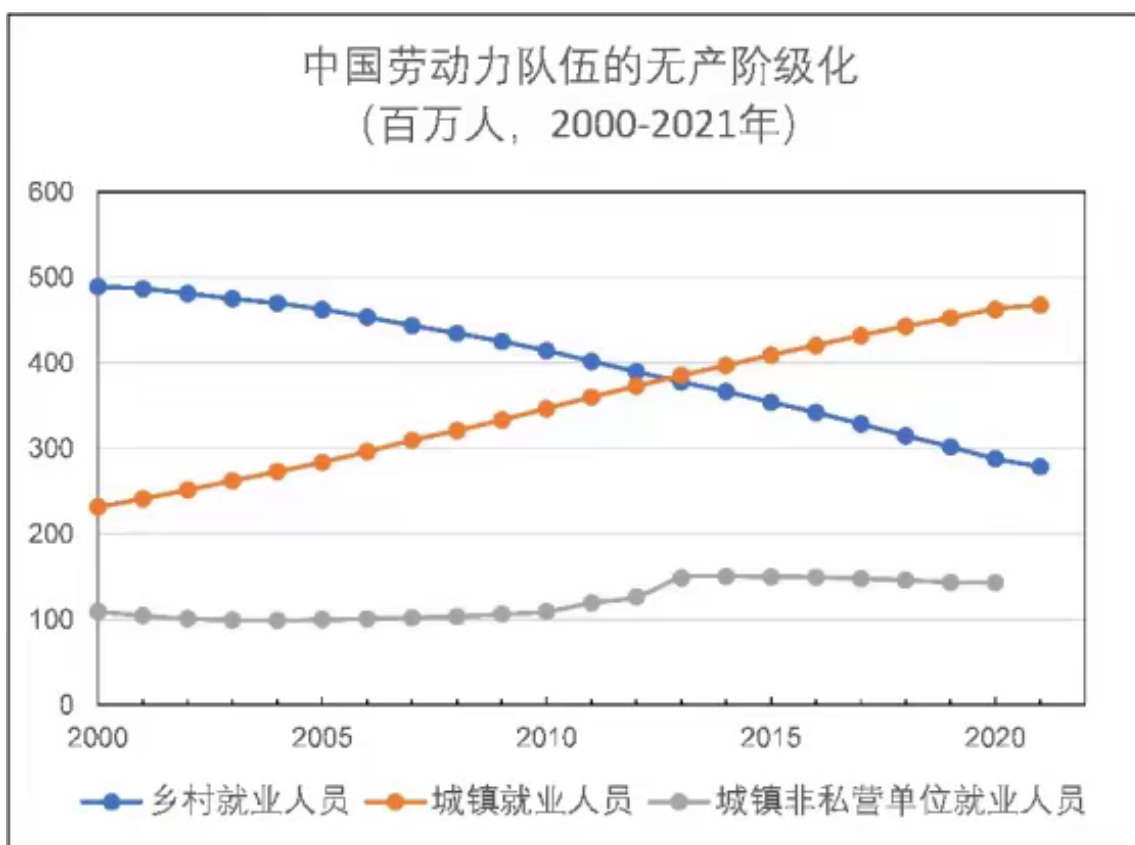


随着近年来农民工规模的不断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不断被消耗，农民工规模的增速正在长期下降。这意味着，可供资本家压榨的农村廉价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

2000年，中国有4.9亿人在乡村就业；2010年，乡村就业人员下降到4.1亿；2021年，乡村就业人员下降到2.8亿。

2000年，中国有2.3亿人在城镇就业；2010年，城镇就业人员增加到3.5亿；2021年，城镇就业人员增加到4.7亿。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正以每年1000万左右的速度下降，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最晚也将于2050年前全部耗尽、彻底枯竭。伴随着农民工规模的下降，农民工群众的斗争水平提高，市场经济中的超高剥削强度积累模式（从血汗工厂到网路平台外卖员）的物质基础将不复存在，如果在未来二十年，仍然不能够建立起一个有福利国家、有较为完备的阶级妥协秩序，这一积累模式将无可挽回地瓦解，而依附在旧积累秩序之上的一切也将整个地坍塌。



不仅如此，劳动力供给的逐渐缩小使得可供资本家剥削的廉价劳动力越来越少，可供资本家用来威胁工人的产业后备军越来越少；加之工人阶级经过长期斗争，和资本家的斗争经验越来越丰富，阶级觉悟越来越高——于是出现劳动群众开始大面积的“躺平”、“摆烂”消极怠工的现象。现阶段劳动人民普遍自发开展的“躺平”斗争具有革命意义。“躺平”大体上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不再受消费主义绑架，主动消费降级、不买房，从而减少自身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二）面对日益高昂的抚养成本以及被压缩到极限的可支配时间，从生儿育女的传统观念束缚下摆脱出来，不生或一对夫妇只生一个；（三）放弃发财致富和“阶级跃升”幻想，在资本主义工作场所反对劳动者相互之间“内卷”，不求“上进”，主动“摸鱼”，以消极怠工的方式对抗资本主义劳动纪律。

很多人都说资本家强的一批，根本不怕工人消极怠工。他们殊不知，在市场经济正常时期，劳动群众最普遍、最常见的有效斗争形式之一就是消极怠工。资本家为了应对消极怠工更是费尽心思到了连上厕所都要计时；但消极怠工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不断扩大化、多样化、普遍化。这种消极怠工将会减少未来可供资本家剥削的劳动力供给，瓦解资本家强加于群众头上的诸多要死要活的劳动纪律，进而破坏资本积累。

中国的资本积累模式只有依赖源源不断的青壮劳动力的供给才有可能持续。随着青壮劳动力供给的枯竭，不仅制造业的血汗工厂模式难以为继，所谓“平台经济”赖以运行的“灵活就业形态”也将陷入困境，能够承受超高剥削强度的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驾驶员将越来越少，而大批依靠“平台经济”来“节约”各种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时间以维持他们自身超长劳动时间的无产阶级和小资劳动者的脆弱生活平衡也将被打破。

目前的形势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在上升，资产阶级剥削的困难在增加，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在深化。斗争力量的上升，不仅反映在无产阶级数量的增长，而且反映在工人斗争次数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并且反映在平均剥削率近年来出现了下降的情况（进一步反映在平均利润率正趋于下降）。这些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上升的程度，就必然要突破资本主义积累秩序所能容纳的狭隘界限，危机就不可避免。

一部分同志真诚地希望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他们同时又读到了列宁同志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前夜”的论述——在情感上就是认为只要论证了中国是帝国主义，那么其灭亡必在不远。这些同志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只要他们认清中国资本主义的灭亡并不需要、也必然不会经历帝国主义这个阶段时，他们就会回到唯物主义的正确路线上来。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恰恰在于揭示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阶级斗争本身，正是无数次在“阶段一”中看似“徒劳”的斗争——罢工、组织、宣传——才共同构成了瓦解“妥协空间”、最终迎来“阶段二”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是经济地位的自动产物，它需要通过艰苦的政治和思想斗争来“被创造”和“被组织”……“阶级矛盾”本身是一个抽象概念，它不会自己长出腿来去“冲破”社会结构，去“冲”的，是具体的人，是组织起来的工人、农民、士兵，他们用来“冲”的工具是罢工、武装、宣传和组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着鲜明的阶级性，不仅要解释资本主义如何运行，更要研究资本主义的存在、发展与灭亡，从而为无产阶级提供相对应的斗争理论。斯大林的话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

无产阶级如何由弱变强、如何从经济斗争扩展到政治斗争、如何看到并把握革命胜利的前途，一切坚持今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仍是“消费不足”危机的人士，都认为是无产阶级不断挨打、占领道德制高点(诉苦的制高点)才能奋起反抗。所以，受委屈而诉苦，是中帝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逻辑和道德起点。不是我们唯物主义者“不能解决诉苦式革命的问题，没有实现跨越”，而是中帝论者只能通过幻想“增强组织力和战斗

性”的方式去在梦中实现“诉苦”到胜利的跨越。但是由于他们对中国国情的错误认知，他们无法走出这个看起来很有“感召力”的起点，无法理解精神上的感召力如何成为战胜资产阶级的物质力量，无法向由弱变强直到胜利的前景前进哪怕一步，所以在阳和平的“帝国主义争霸论”在资产阶级力量仍然强大的今天也正在被进步人士抛弃。

“无产阶级受苦 = 无产阶级反抗 = 推翻资产阶级 = 建成社会主义”——看起来一气呵成，但实际上它把无产阶级如何起来反抗，如何战胜资产阶级，如何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问题全部忽略了。以上每一个“=”，每一个用“组织性和战斗力”轻松跳过的逻辑关系，都是革命史上充满复杂斗争的一个历史阶段。他们没有能力指出主观能动性如何变成物质力量，如何实现量变到质变。他们能设想的剧本就是大手一挥，天下云集响应，革命就成功了。这是唯心主义的斗争策略。

这不是“FQ1PP4”先生个人的问题，这是中帝论背后一整条唯心史观的问题。

知识分子精英通常是从概念来观察现实，发现不符合自己所认定的概念便不能理解事物（比如没有独立工会就意味着没有工人组织，没有组织就将一事无成）。只是精英们别到关键时候拉稀，或者如列宁所言，脓包不能破裂。我们和中帝论的区别在于，我们把“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即“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放在第一位，中帝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把呼吁大家“关注无产阶级的利益”——即“描述无产阶级的惨状和渲染资产阶级的强大”——放在第一位。随着阶级矛盾的迅速尖锐化和一般劳动人民的激进化，中国左翼进步运动的阶级成分将越来越能反映中国的阶级结构和矛盾，激进化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数量将大大超过左翼小资产阶级。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劳动人民会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完成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而现阶段的灌输路线“葛兰西狂热”也将作为本次中国革命探索历程中的一条岔路渐渐地埋藏在历史的积淀中。

## 要群众运动，不要“运动群众”

“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毛泽东《组织起来》）

“要无限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只有群众真的觉悟起来了，知道了斗争的目的是什么，和他们的切身利益关系怎样，并且知道应当怎样去做，并决心去做的时候，才可能引导群众

进行胜利的斗争。我们的工作要服从于群众斗争，而不要群众服从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马识途：《在地下》）

我们要如鲁迅所呼唤的那样，“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选择接触工人农民，了解他们即时的思想状态，这是好的。但是认为他们不接受自己指导就无法“获得新生”，这是杜林式的“无责任能力来自自大狂”。杜甫讲“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现在明显还轮不到某些左派下雨，省省吧！

早在 1864 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就提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欧仁·鲍狄埃在《国际歌》向劳动群众“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号召人尽皆知，列宁《农奴制崩溃的五十周年》“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群众摆脱压迫和专横的真正解放，不是这些群众自己进行独立、英勇、自觉斗争的结果”的讴歌脍炙人口——这些“FQ1PP4”先生不会不知道。我们要的是群众运动，而不是“运动群众”。如果中国人民像某些自诩先锋队预备人臆想，如同静态的历史僵尸，感官闭塞，默默任由资本家牵绳横走，只能等待从天而降的“救世主”喂下名为真理的红色药丸，那么波澜壮阔的中国阶级斗争历史根本不会发出，只能选择等死或者等神。

“FQ1PP4”先生既不能说明一定的“话语连接”所赖以产生出来的实际历史条件，也不能说明这些历史条件如何产生、发展和变化，也不能说明“话语实践”如何奇迹般地转化为社会实践和“物质力量”，更不能说明社会各阶级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主体”已经抽象为“主体的空位”，与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失去了一切有机联系，因而也就与历史失去了一切有机联系。

仿佛什么都能做，实际什么都做不了；仿佛什么都可能，但正是这“什么都可能”的认识反映了他们在历史大变革中的茫然无措。在西方，这反映了在 1968 运动失败以后，被失败主义感染的前进步知识分子在保持“批判性”和彻底堕落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打手之间的手足无措。在中国，这反映了出身边缘化小资产阶级的左派青年即不相信群众，也不相信自己，但一定要相信点什么否则对不起“觉醒”这块招牌的焦躁迷茫。就算靠“运动群众”获得一定成果，其基本的治理原则也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要不打破脑体分工，让人民群众拥有事实上的管理国家，监督和替代先锋队的的能力，那么先锋队对人民利益的包办替代势必会演化为对生产资料的实质掌控，为资本主义倒行逆施开放通行证。

高贵的人之所以高贵，是因为他聪明而博学。所以必须在独享教育权利的阶级即特权阶级中寻找这样的人，而这些阶级本身也将在它们当中找出这样的人，并对他们想当贵人和

贤人的要求作出决定。因此，特权阶级现在即使不成为十足的贵人和贤人的阶级，至少也是说话时“吐字清晰”的阶级；而被压迫的阶级当然是“哑巴，是说话吐字不清晰”的阶级，因此阶级统治又重新得到肯定。（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7页）

这是一种当代的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和哲学王的思想：从洞穴中出去过，体验过理念世界的人掌握真理，是社会进步的“先锋队”，进而也应当掌握向还留在洞穴中的人“灌输”真理的权力。而洞穴中的人无论如何都无法自己产生关于理念世界的正确认识，因此只能依赖先锋队的灌输。而面对那些不接受灌输的“顽固分子”，先锋队可以使用强制手段将其拖出洞穴，将其强行“解放”。

幸好中国人民没有像他们想当然的那样愚蠢，一有压迫就会反抗，并不断寻找能永久解决自身结构性压迫的最佳方式。当前中小资本家日益的破产，“躺平”斗争的普遍开展，利润率的逐年下降使资本积累的火焰危在旦夕，农村剩余人口的殆尽，现代无产阶级斗争的力量不断壮大，而政治上积极的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处于严重的动摇。经过十几年的拉锯战，群众的认知水平已经领先公知整整一代，早已逐渐走出了对他们的崇拜和恐惧。仅以2025年为例，从网友从医学界六边形战士董袭莹顺藤摸瓜挖出“协和4+4”走后台黑模式，到公务员家庭黄杨钿甜被发现贵有240万耳环全网轰炸，再到那尔那茜自曝定向培遭抨击，这些都是反抗的证明。现在不是知识分子走在群众前面，而是群众远远走在知识分子前面！

“灌输路线”不仅无助于真正联系群众，还将在日夜的等待中逐渐割噬着自身的情绪与精神——终日郁郁寡欢，苦于单命迟迟不来，怨恨群众“愚昧不听话”。在未来博览壮阔的无产阶级革命中，人民群众将不再把解放自身的任务委托给任何人代理。英雄的人民将打破王侯将相“你方唱罢我登场”体脑劳动分工的历史周期律，真正实现“十六条”所倡导的原则：自己解放自己！比“沙真劳”先生好些，“FQ1PP4”先生是诚实的唯心主义者。他公开拒绝从马克思“生产力与现存的生产关系的冲突”出发去研究革命的原因，他公开拒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分析过往的帝国主义国家革命失败的原因，他公开拒绝承认列宁同志的“革命的希望不在于西方而在于东方”的光辉论断。

学院派顽固的躲在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小圈子中，学院派左翼的圈子虽能够给他们带来温暖的认同感，但却完全限制了其对于阶级斗争的正确认识。这不怪他们，这只是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必然结果之一。

好了，让他们继续“话语实践”吧！今日的阶级斗争一日千里，已经远远将他们甩在了后面。

# 围绕未明子所展开的若干讨论<sup>1</sup>

## 集体讨论

编者注：这是红色中国网网友与“离宿鸟”等网友之间围绕未明子所展开的一场讨论。未明子其人现在还能借着一层哲学与所谓“实践”的外衣，在中国社会主义战线和左派内部招摇撞骗，这是不能不加以警惕和批判的。

**远航一号** 单从思想方法上来说，这是他的主观唯心主义所导致的荒谬认识<sup>2</sup>——阶级意识决定阶级是否“存在”而不是一个社会集团客观上在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一定的阶级是否存在。

**乐不眠** 苏打水很早就没做下去了，这个是张正午在经营，她之前就公开了财政，好像忙前忙后就赚了两万块钱。牛肉面店反正是在经营的，我觉得以未明子的人气，就好像那些网红开店一样，不说到底做的好不好吃，单靠这个应该是能生存下去的。

**离宿鸟** 你们这提纯强度比那里高多了，随便谁谁谁发一个贴，其他人仿佛有任务一般跟帖，我没看出这和大群之流有什么区别（某某发个社会新闻，然后下面一大堆人跟着吆喝），来来回回就那几个人，要不某党太罪恶了迟早要完，要不骂人，这和线下一堆中年糙汉互相吹捧有什么区别？难道线下糙汉不知道这些罪恶？只是在于人家并

① <http://v2.redchinacn.org/post/58441>

② 指未明子论断“中国没有资产阶级”及其论证。——编者注

不懂得 COS 几句什么共产主义、无产阶级而已。在骂人之前甚至不愿意调查一下，这都是哗站就能查到的。

牛肉面店早就没开了，现在只有俱乐部，俱乐部男 270 女 135 加入会员，一个月內可以免费吃中晚餐，每天的餐饮和植青小屋（晚托班）是一个厨房做出来的，差不多一样，每天都有在哗站直播，同时能免费参加各种会员组织的活动（包括生活技能、工作经验分享和体育活动等）和为无产阶级提供交流场所。

相对于你们在这反复提纯，对于斗争没有一丁点益处，人家至少真正付出了行动，为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做出了贡献，你们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厚颜无耻地作出这些评论的？

**乐不眠** 我骂未明子什么了？我自己没有生活，天天赛博视奸你未明子，你这么了解他，不知道他讨厌被人视奸吗？

他做再多，我吃他喝他了？欠他了？说错了我和其他网友不能骂了？

先前未明子和阳和平要打官司的时候，就是请了律师几碗，Geist 牛肉面，你自己可以去找，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没开，拿出来的是不是旧的存货。

你们这些人来踢馆的，向来戴着有色眼镜看别人评论，根本没骂，也说骂，你回其他人不行，非要回我？

我在这个网站替未明子说了几句好话，本来很多人就看我不爽了，只是没说，你还来骂我，有病是吧？

**离宿鸟** 据我了解，这是个左派网站，一个左派网站不以自己对解放事业做出的贡献，而是以自己并没有受他恩惠来讨论能不能骂一个人，意思是我现在没有受列宁恩惠可以随便骂列宁了？另外，如果你确实没有骂过，那是我的错，我为此道歉。

一个自诩左派的网站至少不应该不做调查就发言，据我所知这个网站应该没有发言 KPI，这些动动手就能找到的资料动手查一下是什么难事吗？还是我不了解这里的规则，这里更加鼓励不经调查不负责任随意发言？

还有，什么时候连有工作都是值得拿出来作为一个能上称的履历了？

你说我骂你，我可没人身攻击你，只是在质疑你们的组织和行动，你呢？

**乐不眠** 那我是个右派行了吧？收了你的神通吧，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像你一样天天盯着的他的账号视奸，几个小时的视频在那里看。

什么时候对未明子了解，仅仅是一个店面有没有开都是值得称道的事了。

嘴在我身上，我想骂谁就骂谁，就那么简单，管的着？

**斯达特尚** 虽然未明子说要扬弃马克思，但是他自己的扬弃，本质上只是可笑的调和论。彻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晦涩哲学学的好不好，和政治水平还真没啥大关系。

**隐秘战线** 未明子刘司墨在它自己那摄像头对着的屁大点角落里唧唧歪歪黑屁说“中国没有资产阶级”，这种能引发生理不适的睁眼说瞎话你不评论，学刘司墨本人对红色中国网搞人身攻击你倒是手到擒来。怎么，反对八小时工作制的迫真“左派”你也要支持？

**报与桃花一处开** 就你未明子的行动是行动对吧，其他网友也不是没根据自身情况开启公开或者未公开的行动啊？你来这玩唯我独行？

**RedFlame** 你还好意思说我们的立场？你们的头目未明子中伤巍巍和张耀祖老前辈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你们自己是什么立场？还恬不知耻的说什么“为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做出了贡献”。真是好笑，你们的贡献是不是指在你们的一亩三分地开除曾经的老前辈左籍，自己鸠占鹊巢当真左是吗？还有脸说我们厚颜无耻，真要说厚颜无耻还得是你们！

**故壤的草** 提纯还是你们未明子纯，毕竟红中网可没问我要过钱，你们的未圣的的确确集过资卖过货。上来就是纯度纯度的，哲学网红小饭圈，双重标准这块就和你们的中资主子一个味，你们还是缩在一起搞你们的“左派唯我独革”的宗教活动吧。

**莱比锡方脸** “监视年轻人是我们的义务”——有实践，是“真左”，太棒了、十月革命前后孟什维克也对新进布尔什维克这样说的。我寻思墙内“真左”排资论辈就是你们未的拥趸弄出来的。

**冰西瓜洗洁精** 请告诉我未明子的贡献有多大？几瓶水几份饭，还有个俱乐部我暂且可以算一些贡献，然后呢？诋毁群众对 996、007 的批判，说“中国没有资产阶级”这种迫真理论也算贡献吗？哪里有什么随便骂，不都是针对这种事批判吗？这都是不做调查那什么是？

**栅栏里** 红中网并没有搞什么地下组织，也不是什么列宁组织，红中网所以的文章都是公开的并没有什么隐瞒。

怀鹤 按照他的意思，资产阶级慈善家也是革命者了。未明子一个挽救资产阶级统治危机的人所做的是为人民服务，那红十字会就更是革命组织，即使贪污 99% 的钱，剩下一点从手缝漏出来都比未明子的忙帮的多。

离宿鸟 所谓“左派”就是不用为自己的行动付出政治代价的派别。

之前全国的工益小屋，现在都是植青俱乐部，不只苏州一个店。

另外，这也不是什么需要几个小时在那看的事，我已经说过了，这是动动手就能做到的事，任何人都可以去验证，使用哔站不需要门槛，看看查到我说的东西需要超过五分钟时间吗？

阳和平也是老前辈，是真左，你们网站的编辑部到现在也没和他们团队里某些劣迹斑斑的“真左”切割。

请详述，你们在你们的理论指导下作出了什么实践？还是说静等大的要来了？来的时候无组织的无产者不是最大受害者而是马上就能拉出队伍统一天下，这是什么童话故事么？我没看到你们网站为劳动者的八小时工作制作出什么贡献。

另外，未明子反对的是低报酬的八小时工作制，你们网站的小资简直不可计量，稍微有点工厂常识就知道工厂里的工人不能接受八小时工作制，因为工厂普工加上部分技术工人的薪资结构一般就是当地最低底薪加上加班费全勤奖，这其中加班费至少占了大半，当面临没有订单需要裁员时，资方的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以八小时工作制为理由，让工人只能拿到最低底薪，而这根本不够家庭开销，以让工人熬不住自愿离职不必支付赔偿。

请问如果无产者被八小时工作制实际上降薪了，你们会为他的家庭兜底吗？

简直幽默的有点抽象，全国的植青俱乐部至少都要工作和即将参加工作才能参加，而一个会员连工厂工人基本情况都不知道的网站，竟然指责未明子俱乐部都是小资！

唉，全国上百俱乐部无产青年互助唯我独革，境外网站三两小资反复提纯是“真左”，多么激烈的斗争。

我不是他们组织的成员，也仅代表我个人，代表不了他们组织。

但你们有机会可以看看他的直播或者直播回放，在直播中他并不吝啬于说“资产阶级”这个词。

各位如果要批判我反驳我请，至少应该对我说的有基本了解，我至少潜水看了两三年这网站，是对这网站越来越垃圾感到悲哀才出来说话，如果你们只是发泄自己的情绪，把我当做垃圾桶，这和你们口中的自由派行为艺术并无区别。

**人类史前史守望者** 利用落后农民工式的被剥削阶级小资化的分裂主义倾向，实则维护新资产阶级及其模式的阶级再生产，最后还要反咬一嘴任何出发点不站在经济笼络层面的政敌，实在是不可谓不高明的“真革命”呀！

**怀鹤** 他并不吝啬于说“资产阶级”这个词，他当然不吝啬，他公开的为其张目嘛！

请问如果无产者被八小时工作制实际上降薪了，你们会为他的家庭兜底吗？

那你知道，现在很多地方服务业、制造业底薪六七千都招不到人吗？他们也是一天十二小时两班倒、机器轰鸣、重复劳动。人宁愿失业都不愿意到那个环境里工作。如果无产者降薪怎么怎么样，他要是加班也降薪呢？难道为了几个只能把自己搞得半死不活勉强活下去或者维持家庭（如果有的话）的钱，透支五十年的寿命就是好策吗？那叫做饮鸩止渴。难道你以为，加班就能暂时稳定生活吗？难道我们所有的工人都愿意干这个工作吗？那哪里还有什么用工荒？

你们网站的编辑部到现在也没和他们团队里某些劣迹斑斑的“真左”切割。

是谁？

我至少潜水看了两三年这网站，是对这网站越来越垃圾感到悲哀才出来说话。

你要是悲哀，早该在有苗头的时候就站出来说话，人都要死了你跑出来算什么？

**郁代** 你这句话的逻辑有问题。

所谓“低报酬的八小时工作制”并非真正的八小时工作制，而是资本家用来绑架无产阶级的绳索，你自己也说了原因：

因为工厂普工加上部分技术工人的薪资结构一般就是当地最低底薪加上加班费全勤奖，这其中加班费至少占了大半。

然后，你的回答是：

请问如果无产者被八小时工作制实际上降薪了，你们会为他的家庭兜底吗？

你如果完整的看了阳和平的视频的话，就知道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减工时”“加工资”这两项要是绑定在一起的，单独说任何一项都没有意义。你前面也说未明子反对的是低报酬的八小时工作制，怎么到了后面好像搞得罪魁祸首是八小时工作制本身一样。为工人争取权益难道不要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要鼓励工人加班吗？

**激活** 那为什么不谴责资本家，反而要反对八小时工作制？资本家以各种理由压低工资、延长工时，你不反对资本家，却反过来反对八小时？这是什么逻辑？

既然我们都无法为工人兜底，那从舆论上把矛头指向真正的始作俑者——资本家，这有什么问题？本来就是他们的问题，现在却轮到你们替他们找理由、想办法开脱。未明子还要反过来说“反对八小时是为了工人好”？都是做宣传，你做到这种地步？不敢骂人民企业家，连说都不敢说，现在你说你的组织以后能怎么怎么样，你玩呢？

工人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要超过八小时吗？要是八小时工资够，谁又愿意去加班？！

**雪峰山** 你这理论未明子曾经说过了，我的评价是他说的挺对的，以当下现存社会来看工人确实得打长工才能维持生活。既然未明子不觉得有资本家存在，这种剥削都是人民剥削人民是人民的内部矛盾，那么这种剥削请问他符合性理吗？甚至于“剥削”本身它合理吗？如果你说为了国家和民族那么显然你背叛了左翼立场，毕竟国家是台机器民族是个想象的共同体。如果你说这是一个短暂的现象，那么这是黑格尔主义的立场，需要伤痛来促进进步，从而得到一个更普遍的秩序，我觉得你应该悬置起工人被迫长时间劳动的现象去看看他们被迫长时间劳动的本质才行。

**RedFlame** 阳和平是真左？不是你是眼睛不好还是你真瞎啊？但凡你查查红色中国网对阳和平的态度都不会说出这样的鬼话。还有你说什么

你们网站的编辑部到现在也没和他们团队里某些劣迹斑斑的“真左”切割。

不是你们这么懒吗？连这个《纪卓阳先生，你难道不知道，境外的红色中国网是由余锋同志亲力亲为帮着办起来的？》都不愿意动手查查？还有脸说什么“不应该不做调查就发言”合着这就是你的调查？

如果你们只是发泄自己的情绪，把我当做垃圾桶，这和你们口中的自由派行为艺术并无区别。

别给你的脸上贴金了，你够格吗？

你确定你在工厂里上过班？你知不知道有一种工种叫做“临时工”？在工厂有大量订单的时候，工厂首先要做的是联系中介招募大批的临时工来满足工厂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当工厂逐渐从旺季走向淡季的时候，工厂就会裁撤这批临时工只保留少部分的正式工以满足日常用工的问题。也就是说工厂里的正式工的工资普遍比临时工的工资要高的多。而且工厂要给正式工购买社保哪怕资方削减劳动时间使工人的工资降低，对于资方来说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况且正式工比你清醒的多，你想让正式工工人熬不住从而使其自愿离职不支付赔偿，你是不是觉得人家正式工工人是傻瓜？难道工人不会通过怠工减少自己劳动时间从而减少自己的劳动强度？或者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难道不会走劳动仲裁捍卫自己的权益？

**liezhangfu** 我两三年前加入的一个爱发电里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讨论交流小群体，在经营了个最多七个月后喜提封禁。后来我去找那个爱发电 UP 主问为啥被封了，然后那个 UP 说是被未明子给举报了（他之前也确实和未明子有过过节，因此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很大，而且毕竟也没啥人闲的没事举办一个无人在意角落的马克思主义讨论小组）。

这件事以后我也更加坚定了红中网在墙外面搞网站的正确性了。

**黑龙江煤城的哀伤** 我只想说，来去自由，你既然觉得这里堕落了，也认为无可救药，可以离开的，我们不强迫任何人。

**水手冰激凌** 未明子现在都被当局收买做了宋江了以后还指望他呢？况且未明子用实际行动爆破其他左翼学习小组也不是什么秘密吧，除非你掩耳闭麦装傻充愣。指望一个害友军胜过害敌人的软骨头未来能有翻天覆地的能力实则可笑，哦，坏的作用确实不小。

阳和平老同志有啥用？资历在立场面前一文不值，反正他现在关于各个事情看法没啥对的，整的左派乌烟瘴气，在本站早就批烂了，不必多言。

**离宿鸟** 线下帮助无产者正常学习，就业，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鼓励无产者阶级意识是维护新资产阶级，还是红中网左，线上纸上谈兵，激烈斗争才是真正左派的斗争路线。

地方服务业、制造业底薪六七千是指？在深圳这边一般餐饮业服务员一个月综合薪资也就五六千，工厂普工同样如此，如果是大厂可能会高一点，有可能达到 7~9千，但这些都是工时拉满换来的，什么地方能有底薪六七千的服务业制造业岗位？

年轻人普遍不愿意干这类工作，是因为没有负担，正如你们网站所倡导的躺平，不结婚不生子不给父母养老，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自然能靠低薪生活，事实上现在江浙一带很多小资产阶级子弟都践行了你们倡导的躺平——不结婚生子，低薪加爸妈退休金，工时短有充足娱乐时间。

真正有负担的无产者，不加班全家就面临生存危机，谈什么五十年不五十年？手停口停，不工作下个月就要死，小资产阶级当然可以躺平，不顾农村父母晚年悲剧也可以躺平，左派 COSPLAY 假装行动当然也可以躺平，成为无用阶级，这就是你们的斗争路线？

正如我前文所言，这些东西在真正有负担的无产者面前既无用也没有宣传效果，你们面向的只是为自己感到读书多年而不能体面工资与低工时兼得的小资产阶级以及该阶级的后备军，提及八小时工作制也只会和 996 关联而非 887，无产者在互联网并没有这样的声量也不会被动员起来关心什么八小时工作制，也就是说，没有也不会有广泛的无产阶级基础，所以大规模宣传八小时工作制所造成会造成的结果已经很明显了。

唉，未圣，唉，切割，你们连一点组织和纪律都不懂么？即使是俱乐部成员不得到俱乐部授权也代表不了俱乐部，我不是俱乐部的成员，不代表俱乐部意见，谨代表我个人，这很难理解？

唉，拉屎搞投名状，一个浏览量没几个人，一个月产出的东西不知道有没有激流系一天的网站，还给自己当什么革命圣地了。

唉，我什么都没说就默认我是没工作的小资，我指出你们的情况并且以我过往观察，网站发言成员以学生为主，对于实际生产生活并不了解，说你们是小资，尽量不针对个人只针对理论及行动，这样也是情绪发言了，而你什么都不了解，就直接指明我是“城市少爷”，疯狂攻击我个人，也太有理有据冷静理智了。

说害友军之前首先得是友军，请问所谓乌烟瘴气之前的左派做了什么实事？一个能被未明子一个人搞得乌烟瘴气之后反抗能力都没有的左派又能做什么事？一个连专政机关都不认为有收买价值，被无政府主义者搞得赔钱的人，都能把所谓左派弄成这样，就这还反抗专政机关，搞笑呢。

## 怀鹤

在郑州某工地，45 岁的抹灰工老李月收入轻松突破 2 万元，这个数字是当地白领薪资的三倍。这样的案例并非孤例，建筑行业用工成本五年间年均增长 18%，直接导致开发成本中人工占比提升 7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房地产止跌回稳”的基调下，劳动力市场却呈现冰火两重天——政策成效显现的同时，人工成本刚性上涨正在形成新的价格传导链。

有人说，这都是高房价、高物价逼的，年轻人压力太大。  
还有人说，这是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落后产能就该淘汰。  
然而，打工永远像成年人的爱情一样，各取所需。

在一片对“用工荒”的声讨中，也有年轻人表示，自己只是想找一份更自由、更有发展的工作。

想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想学点真本事，而不是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地重复。

可当我试图跟我的工厂老板朋友聊什么是“真本事”时，我的朋友告诉我：

对一份月薪 7000 块的工作来说，我可以不用会操作自动化设备，但厂里不能没有。

说到底，问题的核心还是：

现在的年轻人，变了。

说到运输业，大家肯定首先想到的是那些长途货车司机。这个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很大，但面临的却是巨大的挑战。大货车司机不仅要在高速公路上昼夜兼程，长时间的驾驶也对身体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长时间驾驶，睡眠不足，这是大货车司机的常态。很多司机每天都在面临着驾驶疲劳、身体不适等问题，工作强度大，安全隐患高。有的司机已经开始出现健康问题，年纪轻轻就开始“老化”。即便工资很高，年轻人也不愿意从事这个职业。

此外，这个行业孤独感极强，长期与社会脱节，无法享受家庭和社交的乐趣，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这也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所以，即便月薪过万，还是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去做。

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用工荒新闻一抓一大把，动动你的小手好不好？

年轻人普遍不愿意干这类工作，是因为没有负担。

请看：

……

二、三大推力：是什么让年轻人集体“熄火”？

在陆家嘴咖啡店里，前金融从业者陈宇掰着指头分析：

1. 生存压力像高压锅：月薪 1 万不够还房贷。房价收入比达 9.8：北京五环外首付 50 万，相当于普通白领 5 年纯收入；35 岁危机显性化：大厂裁员优先“毕业”老员工，中年人自嘲“前半生拿命换钱，后半生没钱换命”；教育医疗两座山：给孩子报培训班一节课 300 元，父母一次住院花光半年积蓄。

2. 职场内卷到窒息：996 把人变成“电池人”。00 后员工调查：67% 遭遇过“凌晨三点改方案”，45% 因“无效加班”患上焦虑症；晋升通道固化：互联网大厂总监平均年龄

32岁，基层员工熬到35岁仍“原地踏步”；价值感崩塌：前程序员小张说“写了10万行代码，离职时发现可替代性比想象中强”。

3. 价值观突然“断电”：努力了也住不进学区房。95后辞职信高频词：“意义”“自我”“生活”取代“晋升”“加薪”；躺平文化反噬：B站“躺平学”视频播放量破亿，“低配版人生”攻略成顶流；代际观念冲突：父母说“找个稳定工作”，年轻人回“稳定工作能防中年失业吗”。

第一，躺平正是在巨大压力下的无可奈何；

第二，谁告诉你说，红色中国网关于躺平的形式只规定了一种？辞职也是躺，摸鱼也是躺，在你这里，好像摸鱼不是工人可以做的的事情了。

真正有负担的无产者，不加班全家就面临生存危机。

然后呢？好一个神奇的逻辑。你知不知道，加班时会损伤身体，甚至会死亡的呢？

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你不明白吗？如果一个工人在二十岁下矿井，被资本家搓磨十年后彻底病倒，一个工地的建筑工人日夜不停地做苦力活，一个低工资的文职人员天天熬夜熬到三四点钟写文案，他们的身体彻底垮掉了，又有谁为他们买单？

难道在你的眼里，工人是只考虑一时间的加班费，全然对加班中的痛苦和搓磨没有感受的吗？他们在你眼里，难道是抽象的东西吗？在这之后呢？他们再也干不了活，又怎么样加班呢？

这位先生，难道你来为他们买单吗？

难道你以为，只有货币形式的工资才是维持无产者及家庭（如果有的话）的条件，而非包含他们的时间和健康吗？人是精神的生命，被工作所逼疯的大有人在，他们垮台了又怎么办？

一位青年 没货币你连饭都吃不了，多去底层看看吧，小孩。你以为工人是自愿要去加班赚那点钱的？如果你连这点基本的社会经验阅历都没有，就别在那说一些幼稚的话语了。

怀鹤 一句话可以偷换两个概念，把“货币不是维持生活的唯一条件”偷换成“没有货币”，把我的概念偷换成“自愿”，你是用鼻孔看的吗？如果这就是非小孩的状态，那我还是做个天真浪漫的小孩比较好。

一位青年 在现状下，底层人不是在用时间和健康来换钱的？你有智力和阅历嘛？饭都吃不了，还考虑未来？你有去底层走过嘛？

**怀鹤** 你有智力和阅历嘛？难道你是死人，健康已经到了极限却不反抗，看着周围的同僚一个个倒下，家里搞得鸡飞狗跳，无动于衷吗？中国越来越多的罢工难道就被你抹成了单纯增加货币工资一种结果吗？

焊工的疲惫也不完全来自于劳动强度，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劳动环境。这也是所有基层蓝领工人的状况。要知道，即使是坐着休息，在一个有空调、软垫座椅的办公室休息，和在一个满是噪音、可能身处高空、周边都是钢铁结构、随时有安全风险的地方休息，两者对于身心的恢复程度有天壤之别。更何况众所周知的，焊接这种劳动技术必然伴随着高温、强光、噪音与粉尘空气危害，焊工在劳动时除了身体本身的消耗外，周边环境带来的伤害也占据主要部分。

虽然焊工是绝对的技术工，也是这间工厂能够运行的依据。他们确实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公司的掌控，处在一种自己可以安排工作进度和休息状态的自由中。但焊工们的身体仍然需要密切配合工程的进行。工程本身恶劣的环境因素、人为因素（例如赶工）也时时刻刻摧残着焊工们的身体状态。如果说公司在对于工作强度的安排上有所放松，倒不如说是因为本身恶劣的外在工作要素以及相对较低的薪水，让工人们愿意以较低的工作控制和劳动强度来换取这些相对不利的条件。如果这种默契与平衡被打破，那么工人们则直接以罢工作为回应。

别人比你是聪明的，人家知道自己不是牛马，会反抗的。

**一位青年** 建议去读读历史。过劳死和猝死的人多的去了。然后呢？最可恶不就是明知道都这样了，还喜欢在这里冲浪的你这种货色嘛？一点现实经验也不去累积，说出来的话根本跟现实也搭不上边，你是不是就是个没有工作的小资啊？

我同意反抗。但反抗也需要方法，比如在法律层面上需要有小知识分子。所以之前我便鼓励另一位网友去学法律，多去现实性行动，便是出于这种考虑。仅靠工人自身去反抗，不仅成本高，代价也高。

**liezhangfu** 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人家怀鹤也没否定货币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啊？还有你真的去过底层吗？你知道我换过多少工作吗，你又知道我见证到多少轮旧的同事干一两个月走一批又来一批新的同事吗？最近才从杭州的美团小象超市的理货员岗位辞职，因为长期在冻库搬运水产物件现在搞得手指头全都脱了层皮，现在手指碰到屏幕打字都不方便，这都还只是其中一部分身体上的病痛。就这样已经快让我人都撑不住了，那我打工攒的钱我不能拿来让我辞职在老家躺平休养身体几个月？还饭都吃不起。老子告诉你我在杭州干着牛马活一个月拿 6000 左右也够我每天吃饭三菜一汤了不用你操

心。但我的健康不值钱吗，我要是干的落下个长期病，这些能用我赚的这点货币来摆平的吗？我要给资本家一直打工下去直到累死吗？我不知道跑吗？

## 雪峰山

正如我前文所言，这些东西在真正有负担的无产者面前既无用也没有宣传效果，你们面向的只是为自己感到读书多年而不能体面工资与低工时兼得的小资产阶级以及该阶级的后备军，提及八小时工作制也只会和 996 关联而非 887，无产者在互联网并没有这样的声量也不会被动员起来关心什么八小时工作制，也就是说，没有也不会有广泛的无产阶级基础，所以大规模宣传八小时工作制所造成会造成的结果已经很明显了。

我承认和无产者谈八小时工作制度确实没什么用，也妨碍他们赚钱存活，我也没有实践能力给他们一夜间变出共产主义社会来，不过作为小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触手伸到文娱产品，伸到抖音里面的时候我觉得仍要进行理论批判，毕竟理论本身也是实践是脑力劳动，左翼必须在右翼们攻击苏联的时候给苏联说话，必须在攻击前三十年的成果时给毛说话，左翼内部可以关起门来批判他们的过去失误，但不能允许别人进行污蔑，21 世纪的战场早已经延伸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了，有多大能耐尽多大力，哪怕连未明子都得给斯大林在网络上说话呢。

**人类史前史守望者** “没有资产阶级”叫做批判资产阶级，线上给b站这种纯纯维护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再生产网站上的反动小资巨婴提供网络服务，嗯，确实“唯我独左”呢，更别说它还是极右派“反共救国践行者”式的流氓小资眼中的“亲切盟友呢”，致敬传奇“青年激进意识形态监视者”徐加金那事和你未某撇清关系了？这就是你所谓的“成功实践”？

我都说了，某未的实践本质就是用经济笼络的手段，对还没生成阶级意识阶段的工人群众小资分离主义投以同情、感召，从利用本质是慈善性质的项目实现政治投机目的，脑袋里半点东西没有就别搁着表演“唯我独左的”小丑了。

我不关注你说的那些毒瘤宗派分子，也不关注“左圈”以往的那些波澜起伏的丑闻屁事，只是看见了一个自身从事脱产商品展销营生，妄想通过利用慈善项目接触处于被剥削者现状的泛无产者群体，实则借机维护自己小资产阶级阶级再生产以及绝对领导地位，行将就木的反动投机分子。

谁不是被家庭经济条件裹挟而出卖劳动力谋生呢？一方面喷着小资群体脱离生产线情况，另一方面又极力推崇资产阶级削减社保，“包责到户”的反动价值观，就我曾经调查到的实际现状而言，没人会听你不知从哪来的网络宗派瞎讲。

**被老堡包围** 我看这个“离宿鸟”也是个人物啊，左右脑互搏大战各网友的言论因为我沉迷于文艺创作领域导致个人理论水平底下乱把评价发出来怕招笑姑且不提，我就从未明子本人和他的活动入手讲讲我的幼稚想法来抛砖引玉。

首先我们知道未明子和中资官方保持着一定的合作关系（或者说是主仆关系，因为中资从没正眼瞧过人家），这就意味着未明子的活动至始至终都不会真正损害到中资的利益，不然中资早就铁拳下场让无极玄师人间蒸发了。未明子既没有想法也没有胆量去挑战资产阶级（我革我自己的命？），但是他又要吃左派领袖这碗饭，这种矛盾的情况就注定了未明子的路线应该是一种类似于改良主义的形态，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就会干出四处打击其他马列小组的事（就像前面有网友所说的一样）。可是他一没有动员能力（谁每天看他对 PPT 念叨几个小时啊）二是理论无法自洽（搞马列小组说中国没有资本主义那你搞毛线啊），恐怕实现在一个小厂或数个小厂首先取得胜利的目标都难以达到，于是退而求其次转而开搞类似工会送温暖的慈善活动，具体表现就可以与牛肉面馆卖苏打水（存疑）卖盒饭对应起来，正好一石二鸟，既彰显了自己的人民情怀（逼真）也安抚了资产阶级。在左派力量薄弱的现状下未明子的理论可能可以认为是进步的，但是未明子的理论是进步的有点不太可能。翻来覆去其实就是那几样大家都知道的事实，而且未明子本人毕业于大名鼎鼎的复旦大学的哲学系，学到的马列哲学是否是鹿列哲学我不好说，在有这么多隐藏雷点的情况下他的理论永远不会完善。而他的组织所做的可以不怎么恰当的类比为多选题答案 ABC 而他选了 A，而且过程还是错的，我的个人总结就是实践少部分正确但大体上有巨大的理论错误。

躲在屏幕后面每天直播打游戏到凌晨，靠售卖各种周边维持生计的他和他的奇异宗派主义团体真的能带领中国人民找到解放的道路吗？有可能，但有点不太可能。

**激活** 你说无产者没声量、不会被动员，那正说明我们更该从他们切身利益出发去动员，而不是嫌弃他们“不够觉悟”就放弃，八小时不是空口号，而是争取基本权利的起点。就因为工人连基本权利都没保障，我们才更要喊出来，而不是觉得“没人听”就噤声。你不去努力传播工人的声音，反倒指责别人“没有群众基础”，这才是本末倒置，因噎废食。

更别说你口口声声说“跟工人讲八小时没用”，转头却是公开反对八小时，还美其名曰是“为了无产者”。无产者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超时工作吗？他能八小时你看他愿不愿意加班？就算从实用主义出发，这个“反对八小时”是一个好的宣传策略和手段？你还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去反对八小时工作制，让工人怎么看你？他愿意加班、愿意被剥削？你把工人当什么了？

**造反法利赛** 保持着一定的合作关系，就暂时没有能力损害核心利益的情况下，就不可能且永远不可能真正损害中资利益了吗？是不是结论下的太快太简单了。我就啐站切片已经看到有留美博士倾向未的团体，并要被约去发展相应团队，有句话说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别人的搞得少少的，在这层面上不算一定的损害中资利益？只要它本身还是如你所说不会被中资正眼瞧上，那都应当被承认在削弱中资力量。

听其言，观其行，不光适用于中资说自己代表无产阶级群众的时候，也适用于未明子说“反对八小时”工作制、“中国没有资产阶级”的时候，只要他不可能真的推动废除八小时工作制、推动资本家入党那他发表这些暴论，即便不考虑传播和安全的顾虑，也和我说是奶龙一样不值一提。更不用说，这两个月他深夜直播中越来越獠牙毕露地嘲讽辱骂体制和连麦的官二代、富二代，稍加了解就能发现这不可能是如站内辱骂的意义上那样相信中国没有资产阶级的人。而站内近来见到这名字就谩骂的风气这一点，跟激流系实在是越来越像。

现实的斗争从来就很复杂，没那么一目了然非此即彼。早期中共还有两次国共合作，甚至到抗战后毛还要为了把戏做足冒险去重庆谈判，要搞在地的变革不做一定妥协而盲目追求纯洁性，依然是激流系一样的纯洁性幻想。当然我没法保证最后未就真的是什么真左，但目前而言，我还是认为他是值得观察和信任的一支国内左翼力量。

**远航一号** 把未某的“合作”与历史上的国共合作相提并论，过于牵强了吧？

且不说未某目前还根本算不上一种政治力量，就“合作”的性质来说，未某的“合作”也不是一个独立革命团体与资产阶级一部分之间为了特定政治目的的有原则的合作，而是顾顺章式的“合作”、张国焘式的“合作”、蒲志高式的“合作”！

这样的“合作”不但被一切有正义感的人所不齿，政治上也是无底深渊、死路一条！

**造反法利赛** 我觉得是言之尚早，就举报激流系、柳拜和各色网左小团体之流，真的够得上顾顺章之类的指控吗，更何况，马列主义的发展史上也从来不光斗异教徒，也要斗异端统一思想……而且还是工益小组被其他群体塞黑材料在先，倒不如说是在工益小组的覆灭中学会了政治的玩法，真正学会“把手弄脏”。再换句话说，即使他要做顾顺章，那国内真的有早期中共给他背叛吗？

**远航一号** 我们红色中国网坚决反对任何一个以马列主义为号召的团体（无论真的假的）靠向当局“告状”来打击政治对手或解决个人纠纷的卑鄙行为！

如果你以为搞政治，就是“把手弄脏”，那只能说你在这方面的认识很肤浅。毛主席为什么一贯主张，政治斗争（尤其是党内斗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呢？难道是因为毛主席傻吗？

什么叫光明正大？你应该思考一下。

此外，无论马恩列斯，还是毛，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斗异教徒”、“斗异端”一类的话。只有一些狂热的宗教信徒才这样讲。马列主义者所说的思想斗争，与宗教信徒所说的“斗异教徒”，无论性质、内容、方式都是根本不同的！

**RedFlame** 你所得到的工人阶级的具体情况居然只是靠网上查？

……通过缩减工时逼迫离职的情况。

怎么，工人像你一样傻？被逼迫就只会离职不会捍卫自己的权益？我怎么在你的嘴里看不出工人阶级有一丝反抗的能力呢？

我印象里去年你们网站还转载过一个，好像是比亚迪工人反对工厂强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你是说“马列托主义者”<sup>3</sup>转的这个？你看一下帖子里其他同志说的什么。你能不能用点心？就这水平还有脸指责我们？

照你的意思说，无产阶级应该参与资本主义强加于劳动人民的消费竞争，接受一切奢侈消费，接受高价彩礼以及小资产阶级异性伴侣的一切不合理要求。然后在生育上接受资产阶级社会中家庭的一切不合理要求，不与小农落后思想做斗争，接受中资政府的安排多生多育。紧接着是不是要接受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强度劳动，把劳动人民永远束缚在工作岗位上，成为资本主义的耗材啊？这就是你们的斗争路线？这反动程度已经昭然若揭了！

**未明子** 感谢白板发财网<sup>4</sup>给我继续叠大盾。

正如旧战快关停的时候我刻意瞅准时机狠狠骂了一顿，于是所有调查人员在浏览器最后的页面时，都能看到我和他们的切割。

---

③ 本网著名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编者注

④ 即红色中国网的蔑称。——编者注

另外，那四个字的东西<sup>5</sup>我在直播时几乎每十分钟会说一遍骂一遍仇视一遍，但骂它没用，还是靠我们现实中帮受它们制造的苦难荼毒的人支愣起来有用。我们已经帮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人，白板发财网的小资似乎对此一无所知。

刻意的无知是罪过，我不会饶恕。

王其子 倒数第二段说的也不算错。就我而且确实是缺少很多在社会上的实际斗争经验，更遑论对别人的行动指手画脚。目前还是做能做的，多学习。并不是说未明子的论断就是正确，而是在对打工人的实际生活缺乏了解。我们很被动，因为不少人是作为学生的小资产阶级，总有机会被抓住把柄去攻击。在这件事情上大方承认即可，但没必要卑躬屈膝，等咱们经验丰富了就能强有力的回击。

我的同学，今年大专毕业直接在家躺平，我自己劝过他多次，他也无心于工作。也许，这就是他躺平斗争的践行吧。我试图对他做出诘责，一、他不承担应有的责任，靠父母供养。二、他不积极去接触其它打工人，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可是想了想，这种话说出来不好。

另一方面，谁也没有资格把我划归到人民群众之外，只有最愚蠢，无知的人才会狐假虎威地以为自己能代表大多数，我只能说这就是“唯我独革”。我可以放弃一切所谓“左派”，“先锋队”，“马列毛主义”的称呼，有德者可以居之，我哪怕只能影响身边的几个人，也是足够光荣的。或者，退一步，进两步；进一步退两步。

古贺小春 看来他没有父母、家庭条件和种种社会关系逼迫他的压力；或是没有对新环境、物质追求和独立生活的动力（这一部分可能被高强度劳动抵消了）

你作为他社会关系的一员，可以适时鼓励他，例如向他分享自己的工作生活。让他慢慢改变，从做日结工开始吧，再后面做短工，再去更大的城市找工作。

当然，关键还得靠父母逼着。假如真不干，就当他 GAP 了吧，别闲下来，趁这段时间把身体养好，培养些兴趣爱好，也算是提升自己。

RedFlame 他这种行为已经不是躺平而是摆烂了，其实解决方法也很简单就是他父母不再供养他，逼迫他去寻找工作或者父母推荐一些工作给他，并且不再给他钱满足其他的开销，当他手里没有钱的时候，就会考虑要不要找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有些时候光劝是没有用的还得逼一逼才行，只有自己被逼入绝境的时候反而能够迎难而上，发挥出平时难以想象的力量（当然这种手段也是循序渐进的，当初我父母逼迫我的时候也是一步一步来的）。

---

<sup>5</sup> 指远航一号，即李民骥。——编者注

**远航一号** 我只能说这个人心理不正常，故作狂妄来掩盖他的自卑！

**怀鹤** 刻意的无知是罪过，那清醒的帮凶是什么？慈善家为社会撒钱算什么？未明子有点发癫了。

**王其子** 也许未明子想打掉红色中国网？估计不可能。建议，其它网友们要注意安全。其实除过未明子的一些可取的观点，或者值得关注的动态，此类诋毁与污蔑可以暂时不管。在论坛里，集中精力，像过去普通人那样做出一两份好的大字报，也就可以了。还是集中资源和精力关注更重要的阶级斗争，努力提升自己各方面的学识。

**未明子** 白板发财网的人为什么如此愚蠢，拿我叠甲的话当成我的主要论点？

李民骐背叛祖国背弃国内广大人民也背弃对岸底层无产者的美帝豢养的路边一条<sup>6</sup>，也有资格对我指手画脚？

他最后一个小留拥趸最近也打算要弃暗投明投奔我了，他自己不看看这辈子除了搞个劳什子屁网站，弄一帮嘴巴选手自牛自曝之外，还能给手下人什么奔头？

他这辈子搞得网站的唯一正面历史意义，就是给他未爹我叠甲叠盾，对我放臭屁但由于混合了固液飞不到我跟前，反倒帮忙遮了一帮跟屁虫的眼，成为我免费的叠家小分队。

继续给你爹我叠甲，不要停！

一点历史的罪恶都不敢沾，我刻意去沾了又怎样？就拿那帮废物点心当炮灰祭旗了又怎样？本来就是毫无用处的渣滓，为我所用是他们毕生的荣幸和全部的意义。我就是这样的自信和坚定。我现在的功劳远远大于我的罪恶，我心怀坦荡，问心无愧，重复一万次我还是会这样做。你一个小网友只知道我做的表面慈善功夫，对真实的我事实上一无所知，却有资格在那边叫叫叫？李民骐弄一堆小资嘴炮网友在那边，确实还有点把苍蝇拘在臭水沟的粪便周围，于是掩鼻走开的人接下来的路就都清静了的意想不到的功能。

**乐不眠** 他硬要说自己这是叠甲。

问题是国内没有言论审查到那种地步吧？很多小账号做的内容一样可以提国内资产阶级啊？

所以我之前就说未明子有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顺应需要他可以随时向一边坍塌。

---

<sup>6</sup> 语言过于粗俗，有删减。——编者注

他最引以为傲的所谓精神分析，他“高尚的精神贵族品格”从他开始吟词作赋开始，（他的动机和精神和斯达特尚完全不同）在我心中崩塌。

我一直看重的是他较为务实的组建了一批力量，也较为务实的对国内巨婴网左进行一些批判和整顿。

除此以外我觉得他没有更多生命和吸引力。

**黑龙江煤城的哀伤** 看来我站很早就被监视了。但是我很好奇，你有那监视的工夫，为什么不了解了解我们？哪怕看一点儿我们的主要文章也行。对我们有质疑，也可以讨论。为什么总是在墙内黑屁？

**香蕉鱼** 这种行为跟阿 Q 有啥区别？旧站快关闭了出来痛斥，精神胜利？原来他一个自诩的列宁主义战士，本质是被拷打到只能精神胜利的小农啊。

**未明子** 你是不是不太聪明？

旧站关闭了，但是会有特殊人员不停上来看。

我瞅准时机骂一通，李民骐埋怨我的帖子留在旧站首页，就可以不停叠甲。

所以说这些个巨婴小资是真傻假傻？

**晨航** 当政府工作人员是傻了吗？

看个旧站首页帖子就会相信是清白的？

看到他跟红中网有矛盾就会觉得是没有威胁的？

**怀鹤** 人家站在粪坑里告诉我们，你们知不知道掏粪的辛苦啊？什么沾一点“历史的罪恶”，以为自己是臭豆腐外臭里香吗？你光荣的使命怎样脱离苏州的警方监控？说帮官方监视青年的意识形态，怎么，不监控你自己？

反正我们都知道，“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没有意义”嘛，无论导向的结果如何，只要干了嘛就是好的事嘛。我慈善家去组织社会服务，不管结果是稳定资产阶级社会还是破坏资产阶级社会，都是好的嘛，你们在这里拈酸吃醋的质疑慈善家，不是空谈吗？慈善家会重复一万遍的。

**乐不眠** 未明子人见人骂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觉得应该早就习惯了，他一般不会那么急，连发那么多条隔空对线。

唯一的解释就是，他视奸出感情了，考虑到他最近不停连麦和吟词作赋的精神状态，是很有可能。

毕竟红中网可能是少数在反中帝论和斯大林等问题上和他意见一致的，而且再加上确实有像我这样的网友曾经对他进行某些肯定。

他追求的同样是一种求而不得的压抑精神状态。他沾染什么罪恶，满足他虚荣的自满心理，他不是真的想找知己，他是想要求而不得。

**香蕉鱼** 谁有空像他这样天天高强度到这里冲浪啊，还这么视奸，苏州的事务还是太清闲了不够他忙？那确实还不够格做国内的列宁主义者。

**造反法利赛** 虽然用词异端、异教徒，其实在知乎环境下常来表述的还是路线斗争、敌我斗争。当然其实也不准确，因为严格来说未和他举报的团体本来也不算一个组织，但还是就只在一个自诩的政治立场上，针对他被称为叛徒的问题姑妄用之。

说光明正大，我就想问，本站都知道未明子举报了激流系、柳拜，但是谁举报了工益小组，有人知道吗？有人出来认领吗？

我也不认为光明正大只意味着发发大字报搞学术研讨，像现在的互联网茧房现状，互相组织批斗只能不停造互联网景观，于清理左翼事业门户毫无助益。更何况是那个领头人能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宗派组织搞什么合法斗争于非法斗争相结合，率先发难报送黑材料，未的事业生存、发展的紧迫需要根本没有温文恭俭让的空间，不可沽名学霸王，汴京怎么可能辩死要置自己于死地的激流。把手弄脏当然并不就是搞政治，但政治斗争都骑到脸上了生死关头还对手段挑挑拣拣畏首畏尾，被光明正大束缚手脚，无疑是政治上的幼稚。本站也转过李晓鹏的读书笔记里关于斯大林大清洗的那篇，对大清洗的审视不能离开当时抓住和平的时间窗口为保卫政权备战发展的现实紧迫性。

再者，再怎么光明正大，中共也是有地下阵线的，凶险的潜伏工作里不可能都是光明正大事，地下工作人都能杀，就唯独举报是个原则性的禁区吗，我很怀疑。

**报与桃花一处开** 我觉得未明子这么执着于说什么白板发财，他倒是可以把红中网的几篇经典文章原文贴出来给大家瞅瞅，分析分析，比如《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兼谈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问题》。

**造反法利赛** 他以他的方式传播他的信仰和路线，本站要扩大影响争取群众的责任和希望也不能寄托在论敌给自己当圣保罗上。反过来说，他证明了自己会了解本站的观点，但本站对他的了解似乎普遍并没有那么得到重视。这算严肃对待自己发言的负责的态度吗。

客观条件决定了让他亲自搬本站的文章就不现实，我们其他人不把本站往墙内搬难道是因为懒吗？而且这么做对他的团队和事业也不负责。在墙内给本站引流已经是有风险的事情了。

**离宿鸟** 希望你们能明白，中国工人这样的工作条件不是这两天的事，但是没钱就没饭吃，孩子上不起学，家里生不了病是肉眼可见的事。

未明子并没有认为资本家不存在，这在他那里是个很常提的词，也不是什么人民剥削人民或是国家与民族，你对他的理解有点大。

关于现在的回复，网上谈及八小时只会影响小资产阶级，搞恐怖主义和接受境外资助搞非法社运，这不仅对事实上的无产者没有帮助反而会进一步压缩线下的活动空间。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对工人没有任何帮助，只会搞成你们口中的“自由派行为艺术”，还会进一步压缩线下的活动空间。

请问徐家金和未明子的理论有任何关系吗？他倡导搞恐怖主义还是支持精神病理化的学生发电？反而在你们这里前两天还有个帖子说要搞恐怖主义被本网编辑封禁了，在未明子那里一坨的赤军在本网风评也不算差。

言尽于此，如果还是这种一点了解都没有的回复我不会回了。

你们网站应该没设浏览门槛，未明子很早之前就有看这个网站了，你应该知道这几件事。

需要负责和不需要负责是不一样的，你不需要为你的话可能误导人负责，更不需要为可能的政治代价负责，当然可以这么说。

线下的在地的和网上的激烈斗争是不一样的，这点你们应该知道。

你也不是最近才上这网，难道不知道你们写的东西在内网根本过不了？

他愿意提你们网站的名字已经是对你们很宽容，给你们引大流了。

## 黑龙江煤城的哀伤

未明子反对的是低报酬的八小时工作制，你们网站的小资简直不可计量，稍微有点工厂常识就知道工厂里的工人不能接受八小时工作制，因为工厂普工加上部分技术工人的薪资结构一般就是当地最低底薪加上加班费全勤奖，这其中加班费至少占了大半，当面临没有订单需要裁员时，资方的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以八小时工作制为理由，让工人只能拿到最低底薪，而这根本不够家庭开销，以让工人熬不住自愿离职不必支付赔偿。

刚才我重新看了一下，这段话其实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工厂工人的薪资待遇状况，至少从我找工作了解的情况看很符合，但造成这种结果的还是资方，不真正提高底薪，用

这种方式变相施压工人加班，我自己的想法还是要八小时工作制的，加班虽然有加班费给的多，但长久下去你的身体怎么办，得了大病家庭供养也难。薪资结构组成要改变，加班费占大头明显是有导向性的。

**雪峰山** 我看过很多未明子的视频，尤其是他在讲普遍与特殊那个视频里论述辩证唯物主义时，说生产力这个概念里面本身就包含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如果一个国家他的经济基础还是私有制，那么这个国家就不能说是生产力发达反而是低下的，但他自己又在另一个视频里说改开是进步的，说改开前人民穷的没裤子穿，我寻思着按照他前面的论述，即使当时中国已经是官僚专政了，那也比美国还要进步吧？如果未明子秉持共产主义者立场怎么也不应该在哔站这个大众媒体里说改开是进步，甚至他的立场应该必须让他说即使是穷的没裤子穿中国仍是比美国生产力要发达的。前三十年的中国生产力也必须比现在还要发达，未明子好像并没有注意到这个矛盾，其次是关于实践，马克思和列宁他们从始至终都在反抗资本主义制度（19世纪本身就是欧洲各国资本高速稳定发展时期），甚至被迫流亡国外，他们怎么也不会去给官方监视和举报那些民粹团体吧？他们进行论战从始至终也都在左翼自己的团体内进行，并不牵扯政府，怎么未明子就牵扯政府了呢？甚至于政府本身都不想管那些团体，未明子还表示十分愤怒，觉得这些人不管不行（其亲口说自己举报聊天记录反被说侵犯隐私权），左翼的实践空间本身就很少，留下的能在明面上实践的场所以我自己觉得也是陷阱，阳和平他们所说的融工在我看来就是官方操控骗青年带着理想去工作的（以融工名义给他们事干），那么其余的非官方的实践那就确实很“百花齐放”了，但压缩官方的实践空间那还是影响不到的，未明子要是觉得自己是一种官方实践那我就能解释他的举报和帮助青年的原因了，也解释为什么给官方说话的原因了，甚至还有想取代阳和平的野心。但如果他属于百花齐放类的，那么他这种举报拉官方的行为显然偏离左翼带有马基雅维利的倾向了，即以实用主义利用官方打压竞争对手，同时说些话语安抚官方，然后以左翼立场对官方左翼阳和平进行合法论战脚踩钢丝吸引青年加入，这套操作很骚且只要成功了未来自然能够回溯性建构自己的行为合法性，但是啊这还是一种黑格尔主义的行为，甚至是一种软弱的行为，共产党宣言里基本明言共产主义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们天生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政府，人民只会跟着一个立场坚定不断反抗流亡进过监狱的人，而不会跟着一个摇摆过的实用主义者，立场坚定的人可以失败无数次只要他秉持立场和反抗意志，实用主义者失败一次就会众叛亲离万劫不复，未明子本身的立场在我看来并不坚定，只是他有哲学知识为武装十分自信而已。

补充一下，害怕实践空间被打压我觉得也没必要，实践者本身就是社会矛盾的必然产物，所以在黑格尔主义看来“特色”并没有打压实践者的能力也消灭不了实践者。害

怕本身在我看来不是害怕一个普遍的实践者被打压，而是在害怕一个“天选”的，特殊的实践者有被打压扬弃成为其他实践者经验的可能。如果未明子抱有这种思想的话那他显然连黑格尔主义的立场都秉持不了了，因为他居然无法接受自己成为他人进步的养料，无法接受自己成为辩证法的反题被扬弃。

**人类史前史守望者** “没有了解”、“维护赤军”，先是预设一个优越立场，然后继续倾倒真正毫无了解的东西，去掩盖工作职能上的失职，你真的知道，看他直播切片的都是什么人吗？“白板发财网”倒不能给我收入，但是“以太啤酒站”确实能盈利。

本站不是一个宗派，自然有允许一定异议意见自由发言的空间。并非是出自什么意见领袖提纯跟屁虫来到这看看，而是出于学识和目标才选择参考一些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如果你认为，一个小组应该设置门槛搞提纯化，那我只能说，其并不具备真实有效的为被剥削者群体长远利益服务的立场。

你也可以认为，本网讨论区板块内容有下沉无用趋势，但请正视未派的宣传方式在近两年来同时也助长了险恶用心的反动分子气焰。

你可以觉得用谩骂的手段整顿巨婴网左群体能带来长久的良性影响，当其他人亦使用这样的方式指出你们团队实践结果上的问题时，请不要把自己整的和巨婴网左一样大脑降级，好吗，昨天上午我只见到了一个破防发癫的酷似大群派的家伙？说白了，难听的话谁都会说，问题是这样的手段能令人接受并产生良性循环吗？是不是什么投机分子，其实我是不关心的，我只关心的是，在现实层面取得重大进步之前，是倾向于关门圈地臆断或纯粹骂战呢，还是接受自己也只是历史精神的一份子而并非神话化身？

**pzslf.4ñ** 生产关系这点我记得未明子解释是人民公社制度实制是一种人身依附制度，阻碍了人自由流动把农民绑在土地上，改开让农民进城打工提高收入，打破了这种前现代制度，所以是进步的，而毛泽东时代工人其实是工人贵族，依靠优势地位剥削农民，所以改开砸他们的铁饭碗也是对的。

还有一个关于他有趣的一点是他批原教旨时认为当下很多中国工人虽然苦，但没有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先进性，因为他们只会机械重复劳动，不掌握生产过程，不与先进生产力结合，这和马克思时代的工人阶级是不合的，现在这种掌握先进生产力的入口是蓝领或工程师。

他这两段论述有微妙的矛盾，而他的论述之间的矛盾其实是常有的，其他的可以靠语境目的不同解释，这个矛盾就非常可疑了。

**雪峰山** 那些“工人贵族”如果真按前现代的标准理解，那也应该是交血税的府兵，是每个朝代开国时的最宝贵资源，是直接与国家利益完全绑定的良家子，这是政治

账而不是经济账，这个阶级可以获得特殊的资源和晋升空间，所以他们对国家、对组织、对生活方式或者说对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是远高于其他阶层的。结果从建国到大下岗一百年都不到就败完了，说难听点满清的八旗绿营军吃铁杆庄稼都维持了两百多年呢，未明子不是让人学不了哲学就去看历史吗，看来他自己历史也不怎么样，没了府兵就只能靠募兵了，募兵会有什么后果五代十国的历史已经够多了。

补充一下，“特色”<sup>7</sup>的职业军队一旦打完那“特色”应该会直接完蛋了（哪怕损失几十万军队可能都无法接受），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进行任何动员，没有资源去安抚动员后扛过枪流过血准备索要政治权利的人民（民主化同理），党与人民利益的二分直接导致“特色”变成了第二个满清，成了一个泥足巨人，包子也没有康雍乾的微操才能。许多搞鉴证的人一直以为党和国家的利益是一体的让我非常震惊，好像完全没有吸取满清的教训一样，不过清醒点的知识分子倒是会用一种历史勒索主义来弥补，比如说起码“特色”维持了秩序没有立马陷入乱世……

**香蕉鱼** 他自己史学素养真的只能说差，科班出身的历史系学生是看不上他那点水平的，至于政治经济学水平也算不上特别好，所以光那点哲学素养，确实对得起他打官司打不过无政府主义者结果只能我感到无比屈辱和悲哀。

**雪峰山** 所以未明子还是老老实实去讲哲学吧，起码纯粹的哲学视频对哲学爱好者还是很有用的，当然如果他能收起说脏话的习惯和动不动骂人的态度的话会更好。他曾经说过学哲学过康德之桥的人会变得谦逊，但我却觉得他有点越来越傲慢张扬了（在前康德圈子里炸鱼），我甚至怀疑他已经很久没和人认真辩论过训练自己的思辨能力了，毕竟人过了三十记忆里会下降需要持续保持才行。我个人建议他不要动不动把自己评论区底下的一些攻击性发言给屏蔽拉黑，而是把打刀塔的时间拿出来组织自己的粉丝去理性辩论，锻炼自己成员的辩论的组织度，顺便在辩论时亲自做一下精神分析（这可比踢足球管用多了），以此重新提升保持一下自己的记忆力和理论能力。

**香蕉鱼** 他但凡系统了解过康德的思想（尤其是康德的政治哲学/法哲学和文明等级论）都不会说学了会谦逊，不过他现在这么高傲倒也正常，黑格尔那种试图把所有人类知识囊括到一个体系的那种雄心和傲气他不仅学到了还大大加强和劣化了。

说真的，三十几岁的男性了，身体机能会开始明显断崖式衰退下降的，真想做点事出来（不管好坏）还得保养，他这种还天天熬夜到下半夜还连麦发脾气和打游戏真的是伤害自己身体和脑子，毕竟又不是毛主席那种好身体。

---

<sup>⑦</sup> 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中国资本主义。——编者注

**雪峰山** 我也很痴迷黑格尔，也拿黑格尔哲学去写理论，我在红中网里就用黑格尔把人类历史给终结了一遍。这种以德国古典哲学为地基，以辩证法为工具，以矛盾扬弃为动力，以最终和解为结尾搭建的形而上学大厦就是一个活体黑洞，所有对其提出质疑的理论都能被其吸收扬弃成为运动的一部分，这在我看来就是一种艺术甚至是一种美，他把僵死的文字组合成了一个能呼吸自转的生命，我看未明子的主义主义就觉得非常。

**香蕉鱼** 这个还真得夸一夸那一代德意志学者，黑格尔和洪堡、歌德、席勒、赫尔德他们一个圈子的都互相是朋友，老黑的很多思想都能在那个时期的文艺作品里面找到一样的东西，或者看歌德席勒洪堡赫尔德写的著作也能找到类似的思想，毕竟那是个浪漫主义艺术横行欧洲的年代，把自然万物融为一体浪漫化的浪漫主义是 19 世纪初欧洲思想和艺术史的特征。

**雪峰山** 我纯粹学理论倒是没对那会的德国市民社会有研究，基本是按照康德费希特谢林的标准道路走过来的。未明子在我学完黑格尔后就觉得他已经有点倒退回谢林了，因为他的立场已经出现了一种二元对立，即实用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对立，当黑格尔完成自己理论时其本身就已经被扬弃，马克思的出现就是一个历史必然，那么黑格尔主义者要想还是黑格主义者，那就必然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对黑格尔来说自由便是对必然的认识，历史前进一步后停滞本身就是倒退，理性和辩证法会冷酷的命令一个黑格尔主义必须去成为马克思，不然就会成为辩证法的反题面临被扬弃的命运，那么未明子这种觉得自己有在实用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立场灵活切换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不自由的体现。甚至是一种自作聪明的犬儒主义，即我知道但我还是这么做了。谢林搞意识和实体的绝对同一，黑格尔则将意识至于实体之前，未明子却并没有把社会主义立场至于最前面，而是让二者一体，如果在堕落下去可能会彻底倒向实用主义，说难听点社会主义者会在乎实践空间被打压？会害怕自己作为特殊的存在面临被镇压的命运？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必然会留出实践的空间，担心本身多余。社会主义者也必然遭受镇压，害怕本身软弱，因为自己哪怕死了还会有无数的我吸取我的经验继续实践，历史大势势不可挡，未明子这种瞻前顾后的行为还是一种小资习气未除的体现，他必然应该知道当下给他可以在实用主义和社会主义间横跳的社会现存本身是短暂的，他迟早得面临选择，他不停维护这种能让他横跳的秩序我大胆的猜测是因为他潜意识里十分恐惧自己的实践以及自己所在的小资产阶级必然要被扬弃的命运。

# 刘司墨的“左翼特色社会主义” 是死路一条<sup>1</sup>

## 隐秘战线

最近未明子刘司墨（以下简称它“老刘”）又在黑屁，说什么“中国没有资产阶级”。论调一经发表，当即在国内互联网上引发轰动，令人瞠目结舌。

红色中国网的一部分同志指出，我们对老刘的态度，相较阳和平（下文简称“老阳”），疑似有点过于宽容了，疑似揭露和批判得有点太少了。对于这种意见，我谨以个人身份诚挚地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同时发表这篇文章作为补偿。

说回正题。老刘说“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显然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可它却又大大方方地承认，资本家群体在中国是确确实实存在无误的，某位未派分子以此为借口，替自己的宗派领袖狡辩，手法实在是泰国第几——“存在资本家而不存在资产阶级”是“马督工”任冲昊（下文简称“老任”）之流才会玩的后现代定义学低级把戏。一个公开宣称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存在一个靠剥削压榨剩余价值为生的资本家群体本来就是很招笑的事情了，结果老刘还要强行论证“资本家不是资产阶级”，否认今天的中国早就是一个一党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了的事实，红色中国网的同志们正义揭露，它还要狡辩称这是在“叠甲”。

呃呃，同志们，这个“甲”厚到了什么程度呢？我举个例子：以“中帝论”在红色中国网臭名昭著的逼真“马列毛大群”和“布站”，也都承认今天的中国早就资本主义复辟了，当然它们“帝国主义争霸”的荒谬透顶论调另谈；也许有同志会说，这两个都是“地下偶像”团体，的确——可作为国内互联网上逼真“毛派”和逼真“中帝论”的代表老阳，也公开承认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甚至它早年的视频还讲述了历史社会

---

<sup>①</sup> <http://v2.redchinacn.org/post/59679>

主义时期的国营经济，是如何在毛主席去世后一步步走向瓦解的，这要怎么解释呢？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老刘觉得中国“没有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还是一个“纯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直接转进到反动的民族主义右派那边去了；更不要提它还跟中国资产阶级在苏州的专政机关合作，负责对各路人士进行监视的事实了。

说起这个，我倒是回想起老刘不知道多久以前，在哔站（当然我习惯用的是另一个脏字）上发表的一段论述。它在视频中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而是一个所谓的“国营资本主义”（State-run Capitalism）；“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而“国营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中国就属于后者。我且不论这种观点到底有多不着边际，还进一步加剧了我对复旦大学和读哲学专业人士的刻板印象，“国营资本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无论是南斯拉夫的铁托、匈牙利的卡达尔还是中国的陈云邓小平——从来都是作为一个要斗争打倒的修正主义路线而存在的。除此以外，老刘还十分甚至九分刻意地回避了这几条所谓的“国营资本主义”道路在历史上的名字：“市场社会主义”、“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等。从它的嘴巴里我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老刘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类似陈云的那种“鸟笼经济”，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匈牙利的“古拉什共产主义”——随便你怎么选；而历史社会主义在它这里则荣获“原教旨社会主义”的称号，试图利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带给世人的负面印象来欺骗任何一个可能观看它视频的人民群众。按照老刘的这个八竿子打不着逻辑，朝鲜显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建议老刘去朝鲜与劳动党方面交换一下彼此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看看会得到什么答复；希望不要被朝鲜的人民群众阴阳怪气，说什么“朝鲜是社会主义，中国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的话出来。

而且，2025年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权，相比这三条修正主义路线，在引入资本主义这一方面比前者相差十万甚至九万八千里：不仅资本主义完全复辟，统治着中国半外围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连援助第三世界国家输出革命的理想也早就抛到脑后去了（详情请见某人的“三不”言论）。论点不成立、论据不成立、论证过程不成立——这就是老刘面临的“三不”困境，自己与“境外势力”直接对线是万万不可的，但是自己在“境外势力”开设的网站上不注册账号保持只读状态却是万万可以的；转载红色中国网的文章是万万不可的（对此我表示充分理解），但是歪曲红色中国网文章的内容观点却是万万可以的。老刘不仅蠢，而且坏——在哔哩哔哩上“隔空喊话”首先要过的居然是网站审核这一关，有时候连话都喊不出，与红色中国网激烈斗争之前居然要先跟人工智障展开激烈斗争，令人忍俊不禁。倘若真来红色中国网辩论，本网站很显然有捍卫你发言权的义务。希望老刘接下来针对红色中国网展开的不是激烈斗争，也不要学“历史时刻”那样觉得与本网站开展的是什么阶级斗争。你老刘还为它辩过护呢！孤陋寡闻的东西，也不看看自己选了个什么烂泥扶不上墙的。

# 未明子，一个“自创”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怎样走上了反动堕落的不归路

普 通 人

对未明子的揭露和批判，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做过。但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深知，任何一个人的立场，无论进步也好、反动也好，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因此，这篇文章，我们就从现实经历角度来分析一下未明子癫狂精神状态是怎么产生的，其叛变投敌的行为是怎么做出的，以此来警醒阅读到这篇文章的每一个人。

未明子在直播中曾经提到他的父亲和原生家庭，并对此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从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父母都是大学生（大专生），在那个年代十分难得，学历和社会地位都是很高的，而且还是共产党员。他的父亲在毕业以后，本来在县城银行做信贷工作，但是后来因为上升无望，到了苏州去保险公司工作。因为一直做金融信贷业务，所以结交了一帮狐朋狗友，一起喝酒鬼混、吃喝嫖赌，又堕入传销当中，搞得婚姻家庭破裂，父母大打出手，甚至要拔刀相向。于是未明子一拳打碎玻璃，一脚踹倒了他的父亲，制止了这一切，然后他的父母就离婚了。

离婚以后，他的父亲还是没有脱离传销的魔窟，又被骗得精光，后来又陆续干过教育器材采购、劳务中介（介绍学生进厂打工）等等，中间还被债主弄进看守所坐了一个多月，最后因为没有充足证据没有判刑，释放了。几十年过去了，他父亲的同学们已经当上了副行长、行长，有充足的财富、有优越的社会地位，而他的父亲由于混的太差，在同学中受到了无情的鄙视。

这就是未明子的原生家庭情况，主要是他父亲“奋斗过程”的简述。未明子本人是如何看待这一切的呢？视频中他在描述时代背景时，多次提到或使用“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资本主义浪潮”、“搞资本主义”这些说法，并且将他的父辈描述为“50、60、70年代资本主义弄潮儿”、“投机失败的小资产阶级”；将他父亲接触过的人称为“编

制资产阶级、投机资产阶级和地租资产阶级”；他还将自己称为“文化小资产阶级”。这些都清楚地说明，未明子不仅对自己和自己的父辈的定位十分明确，而且对当时和现在中国的社会性质有着十分清晰的认知。

在视频中，未明子认为他父亲投资失败、历经磨难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体系”，并说他离婚是因为“不想去面对资本主义的各种折中的妥协的逻辑，想要去改变”。他表达了对疯狂内卷的反感，在谈到爹妈养老问题时说“靠你一己之力，去资本市场卷，当人上人，卷赢一个人还不够，至少要卷赢四五个，那这些人的爹妈怎么办？太残酷了！”在讲述的最后，未明子动情地说：“不要抛弃你的社会责任，不要抛弃你的社会主义理想，不要放任资本主义的现实，不要轻易地让资本主义把你征召为傀儡和打手”；“我们这代人要好好想清楚，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追求的共同富裕”。

从视频内容来看，没有什么人会认为未明子不是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人，如果他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没有什么人会认为哪里不正常，并且会对他和他父亲跌宕起伏、历尽艰辛的奋斗过程深表同情，并为他找到了问题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体系而感到由衷高兴。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未明子有着这样的心路历程，那他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呢？前后反差之大着实令人困惑。

按理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历经磨难的未明子本应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深信不疑，但他在视频中却明确地表示“我曾经是一个很天真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上下文语境，这里的“曾经”指的应该是2019年他在出版社任编辑一职时期。也就是说，他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他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了一个“自创的”社会主义者。

虽然真正的原因只有未明子自己知道，但根据公开的信息，我们可以得知，未明子的原生家庭并不幸福。虽然父母在当时都算得上高级知识分子，但却没有在体制内混出名堂，下海经商后多次经历投资失败，又导致家庭婚姻的破裂。虽然未明子挺身而出制止了家庭暴力，但他的那一脚也让他的父亲健康受损，以至于后来无法从事体力劳动。（踢到肝脏）即使他说他的父亲已经原谅了他，但可以想象，童年的悲惨经历已经给未明子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终身心理阴影（他自己也说受父母影响很大）。他时常出现的癫狂精神状态和极端的行为都与此不无关系。

在视频中，未明子认为他的父亲不算差，相比很多无产者、流水线上的人已经不差了，但是在他看来也是危机四伏，他的父亲是他的焦虑来源。结合上述情况，我们可以推断，未明子虽然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社会主义信仰，但他的方法和行为在现实中处处碰壁，走入死胡同。然而，他心中的焦虑却始终挥之不去，不断给予他越来越重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这些在行为上表现为愈发的极端、冲动、癫狂和对理想信念的彻底放

弃。同样是高学历的文化小资产阶级，未明子看向未来，满眼都是父亲佝偻的背影。最终，他再也承受不起重蹈其父亲覆辙的后果和代价了，他再也不能容忍自己为了信仰奋斗到最后，却仍然走入依然一事无成，被亲戚、同学和朋友鄙视的结局了。于是，他和那个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的自己做了最后告别，转身爬入了中资开设的狗洞中，而将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同志们称为“反建制的激进者”。这是未明子为中资递交的“投名状”，标志着他对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彻底投降。

难道反建制真的是错误吗？难道左派真的是太激进吗？不是的！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还指出“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看到了吗？不是左派太激进了，而是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这么激进。你要批判我们是极左吗？相对于社民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者本来就是极左，但那些温和者，不是也被未明子批判为“披着左皮的自由派”吗？这样看来，未明子岂不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吗？

对于未明子的所谓“工益”组织，马克思早就有着精准的预言。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展，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因此，他们一贯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他们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创立小伊加利亚，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呼吁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他们逐渐地堕落到上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伙中去了，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

未明子，这个自创的“社会主义者”，不恰恰就是这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中的一员吗？他就这么走上了一条反动堕落的不归路。

“路漫漫而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追寻真理的道路，永远遍布着荆棘与枷锁。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面对无数的艰难困苦，有些人退缩了、有些人动摇了，他们放弃了曾经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跪倒在强权的脚下摇尾乞怜。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因为这些阻碍所动摇，“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他们将挺立着继续前进，直到完全胜利的那一天！

---

# 对未明子理论的全面批判

· 雪峰山 ·

<sup>1</sup>理论知识来自经验，经验来自意识，意识来自立场，立场来自阶级。考虑到未明子曾经抵达过绝对知识的境界，甚至主动开始实践，那么我就有理由相信他能将自己阶级通过反思进行悬置。那么我就直接看看他当下的立场下的意识，在批判完后批判经验与知识，最后在来看看他的阶级悬置的彻不彻底。

首先在立场上面，他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甚至主动在公共媒体上直播，上报自己的所有资金和其来源、姓名身份、家庭历史，表示自己对观众毫无保留，并提出所有左翼都得上报自己的所有收入来源，毕竟这些收入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人的价值收买，他在这里提出资本主义，显然他知道自己处在什么样的社会里，他父亲在改革开放后放弃银行职位下海投资当黑中介，结果搞的乱七八糟，把家庭搞离异（在父亲要施暴时，未明子果断踹了他父亲一脚，给父亲踹出伤来了），他父亲还把自己搞坐牢，这些个行为给未明子本人造成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这种伤害让其对资本主义恨之入骨。于是在这个前提下转折来了，他说当下中国社会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坦言自己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做社会主义者完全没问题，还叫外面流亡的人都回到中国当社会主义者。

这便是第一个二元对立，一个满嘴都是资本被资本伤害的的共产主义者居然说伤害他的环境是个社会主义，于是我只能猜出两个可能，一是他在当面壁者，在监控高度发达的 21 世纪他想要进行实践得将自己伪装起来，他一边说中国还是社会主义，一边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玩阳谋，等到自己队伍发展出来壮大成功时自然能够回溯性建构说自己的道路是正确的，自己的妥协就像列宁签署布列斯特和约一样伟大。二是他真相信当下是社会主义，自己的悲剧行为不具备普遍性，工人大下岗的普遍灾难被其解释成城市工贵遭了报应，农民进城就是历史进步，那就完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场了。左翼对其进行批判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左翼本身就反对这个披红皮的政党。

那么我想要继续批判就只能沿着一去进行批判，那又看出了第二个二元对立了，即马基雅维利的实用主义和共产主义身份的对立。共产党宣言里基本明言共产主义者不掩饰自己的真正目的，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本身就无法被消灭，即使作为特殊的个体被消灭了，那么普遍的共产主义者还会源源不断被资本主义生产出来，吸取前人的经验继续革命。那么未明子这种掩饰的立场就是一种倒退了，如果共产主义立场被他置于前，那么他必然不能说出这种争议的话语，最起码也得保持缄默，然后默默行动，当他说出这句话时他的立场就从马克思倒退回黑格尔了，因为这种争议必然需要未来的成功来弥补，在实践过程中绝不能失败，不然也就必然万劫不复，他不给自己任何失败的容错率，

---

① <http://v2.redchinacn.org/post/59715>

虽然这很存在主义，但存在主义者不相信理性，他在这里已经开始背叛黑格尔哲学了，甚至有倒退回谢林的风险，可能是其受了齐泽克的影响。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毫不妥协的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其实践姿态必然完全反对资本主义，被镇压了就跑到国外，被关押了就在监狱里写作，被枪毙了也坦然赴死，他们这种不断反抗的意志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经验的科学总结，允许他们失败无数次而能再起，因为他们活成了资本的对立面本身，所以他们死不了，也不会觉得自己是什么特殊的天选，其反抗资本本身就呼吸一样平常。

讲完未明子为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后，在讲他对黑格尔主义的背叛吧，对黑格尔主义者来说，绝对精神借助人类历史自我运动，当黑格尔完成自己的哲学体系后其本身就已经被扬弃了，因为黑格尔所有理论都是其主观精神的一部分，所以马克思的出现就是必然，因为当精神思辨发展到极致，必然需要回到物质现实，去指导具体的社会变革。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正是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辩证超越。那么黑格尔主义者要想还是黑格主义者，那就必然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对黑格尔来说自由便是对必然的认识，历史前进一步后停滞本身就是倒退，理性和辩证法会冷酷的命令一个黑格尔主义必须去成为马克思，不然就会成为辩证法的反题面临被扬弃的命运，他没有认识到（或拒绝认识）新的“必然”，也就失去了“自由”。

那么未明子当下自由吗？他自称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并在媒体上讲马克思哲学，但就像我前面论述的一样，他没有坚定立场，甚至形成了二元对立，黑格尔主义者在扬弃自身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必然要认识到自己的立场，必然要让理论与立场同一，但未明子显然没有做到，在他那里实用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平行的，他声称自己共产主义者在前，但其实践却是相反，很有中国共产党披红皮的风范。那么他显然没有自由，他在两者立场上面相互切换相互使用，对左翼用左翼立场，对官方用实用立场，这很像是谢林的绝对同一一样，谢林把意识和绝对者绝对同一，黑格尔则把意识至于绝对者前，未明子却连这点也做不到了。

当然他的哲学水平是科班出身，比我这个民间哲学家要高多了，所以我必须得假设他知道，但他还是这么做了，他看到了历史的必然，却拒绝服从这种必然，他很有可能将黑格尔的哲学当做一种“自作聪明”的工具，以一种灵活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即在实用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切换，甚至利用官方力量打压反对者，当然那些反对者被他高超的哲学理论给除了左籍或归为民粹了，这更加表明他对自身立场的背叛，毕竟不管是列宁还是马克思，左翼间的论战基本不牵扯资产阶级当局，但奉行实用主义的未明子做出这种行为就很合理了，毕竟他深知斗争的阴险（以自己为经验）。

那么已经倒退回谢林阶段的未明子的实践在黑格尔主义者看来就只能作为辩证法的反题成为被扬弃的存在了，当然谢林也会辩证法，未明子也可以用谢林的辩证法给自己做辩护，给官方做辩护，就像历史上的那个反动的谢林一样。他最近又声称一些不合格的左派实践毁坏了左派名声，打压了他的实践空间，然而共产主义者根本就不相信没有实践空间，因为资本主义运行必然空出一种剩余的实践空间，他这种声称还是一种不自信的体现，以及带有一丝恐惧，他害怕自己没有实践空间，也害怕自己不是特殊和天选（退路被他自己断了），他害怕自己没有实践的机会了，这说明他内心深处仍存在一种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和“主观性”，他希望自己的“特殊性”和“正确性”能够永存，而不是融入更普遍、更高层次的辩证洪流中。这与黑格尔强调的“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是矛盾的。他将个人的命运凌驾于普遍的历史进程之上。

如果未来未明子彻底的将实用主义置于共产主义立场之上（当实用主义与理想混淆不清时，在现实压力下，通常是实用主义占据上风，理想被不断稀释和妥协），那他就会进一步堕落为一个费希特式的

的唯我论者，当然他现在的躁狂现象也有端倪了，毕竟我看了他两年的视频，脾气一直很暴躁，脏话也随口就出，于是我深切的希望未明子能够重新读读先验唯心论体系，然后在读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最后认真的看看资本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从谢林开始重新巩固自己的哲学基础吧，现在三十岁的人要是不巩固未来记忆力直接下降了也不好，同时不要輕易在自己的评论区下乱封人（用毛泽东的话讲是精神衰落的体现），你可以带着自己的粉丝和俱乐部成员有组织去和他们辩论，锻炼辩论的组织度，同时讲讲理论现场给那些前反思的攻击你的人做精神分析，既巩固自己的理论也加速自己哲学的普及（比踢足球还能锻炼组织度），至于时间怎么来，我建议你把打刀塔的时间空出来就行了，进行哲学思辨难道不是一种智性的愉悦吗？

在讲完未明子那对立的立场后，我就接着讲在这种对立下产生的意识经验部分内容，首先是其论述的 996 的实质以及另一个视频本质不是剥削的议题，我先悬置起视频内的所有内容，单单看“996 实质和本质不是剥削”这几个字本身，考虑到我已经批判过未明子立场的二元对立了，那么他打出这段话本身就是其立场的延续，当然未明子要是说我在搞辩证法，先让你看一个扎眼的正题，但我内在内容作为反题讲的是“剥削”，尤其是资本家定制工人的劳动时间进行异化，最终在合题里面你能看到是一种“剥削”，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智慧，他既传播了知识也证明了自己共产主义的性质。但就像我之前说的，这种实用主义立场本身就是倒退，“996 本质或实质不是剥削”本身就不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者能打出来的话，也不是未明子炫耀哲学知识的借口，“剥削”本身从来就不该合理化，我觉得未明子应该清楚才对，毕竟他在视频里频繁使用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论述，和对资本家进行批判，但这标题明显偏向资本家，这种实用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二分统一我还是比较佩服的，他是以谢林的立场作出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也能看出早期的未明子并没有堕落太深。

接下来就来看看未明子的巅峰时刻吧，他在 21 年讲述普遍与特殊的视频里用他深刻的科班知识讲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生产力内部就包含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以生产力能决定生产关系，如果和人讨论说这是一个生产力很发达的国家，那么他的生产关系是什么？以及是什么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力？如果他生产力很强但却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控制且垄断下的生产力（我觉得可以把垄断去掉，社会主义就是比资本主义先进，这里还是体现了他立场的软弱），那他生产力是十分弱的，以及讲述了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的区别，黑格尔通过普遍特殊在到普遍，让抽象概念自我运动生成血肉实体，马克思则是特殊普遍特殊，特殊的实体物质自己构建起围绕自己的一切普遍秩序，普遍化在产生特殊物质构建新秩序，黑格尔拿特殊当普遍的自我扬弃工具，其是改良的，马克思则是特殊通过革命普遍化后产生新特殊在继续革命普遍化，其是充满反抗的。

在黑格尔那人类是绝对精神运动的祭品，连希特勒的屠杀都是必要的，能催生联合国和对纳粹的普遍反思的新秩序，而马克思从始至终扎根那个受剥削的底层如奴隶通过造反诞生新思潮在生产力进步时迫使自由阶级授予自己土地成为佃农。他是拼搏激昂的，不在有黑格尔那样成为必然的祭品。虽然二者最终都会走向和解，但马克思更关注底层的苦难。

之后未明子在普遍与特殊的最后还讲了，这是个普遍异化的时代，资本的触手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里，人天生就要被异化，但是异化人的终究还是人，人可以自己加倍将自己异化成为革命者，这三大理论给我很深的震撼，也让他在那一刻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但之后未明子开始堕落了，以批判教条主义者对工人宣传八小时工作制，表示工人在当下情况下用八小时工作制度拿到的工资根本不足以满足生活需要，并说出自己是实践的，和那些教条主义分子有着严格的区别，自己才是为工人着想的，我承认他的论断是正确的，当下现存社会情况就是如此，但这里

又体现了实用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二分，但这次他用的不太得心应手了，毕竟他直接动摇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在网络上遭到了各种口诛笔伐，最后不得已以实用主义立场为自己共产主义立场进行辩护，并赌咒发誓自己要是不支持八小时工作制就不得好死，但坚决反对当下对工人进行宣传。其总算将实用主义置于共产主义之上向着费希特开始倒退了。

很快未明子就又调转枪头了，他开始论述改革开放的进步性，比如他攻击人民公社制度实制是一种人身依附制度，阻碍了人自由流动把农民绑在土地上，改开让农民进城打工提高收入，打破了这种前现代制度，所以是进步的，而毛泽东时代工人其实是工人贵族，依靠优势地位剥削农，所以砸了他们铁饭碗也是对的，并深情的诉说道改开前老百姓穷的没有裤子穿实在是太苦了，于是他就产生了和自己过去理论的二元对立。

就不提他这种直接颠覆左翼底线的立场了，他本身在公共媒体平台如此宣传而不是左翼内部论战也是背叛了左翼立场，他之前说一个国家只要他的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垄断制度，那么他的生产力就不算发达，那么毛泽东时期的中国虽然是官僚的专政和垄断，但其理论上仍比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垄断还要先进。因为在国有经济下大部分资源都能被充分调用投入各个方面建设，且农村的人民公社的集体化也能在工业化前有能抵抗天灾，单纯的攻击本身是非理智的。

那些“工人贵族”如果真按前现代的标准理解，那也应该是交血税的府兵，是每个朝代开国时的最宝贵资源，是直接与国家利益完全绑定的良家子，这是政治账而不是经济账，这个阶级可以获得特殊的资源和晋升空间，所以他们对国家、对组织、对生活方式或者说对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是远高于其他阶层的。结果从建国到大下岗一百年都不到就败完了，说难听点满清的八旗绿营军吃铁杆庄稼都维持了两百多年呢，未明子不是让人学不了哲学就去看历史吗，看来他自己历史也不怎么样，没了府兵就只能靠募兵了，募兵会有什么后果五代十国的历史已经够多了。

“特色”的职业军队一旦打完那“特色”应该会直接完蛋（哪怕损失几十万军队可能都无法接受），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进行任何动员，没有资源去安抚动员后扛过枪流过血准备索要政治权利的人民（民主化同理），党与人民利益的二分直接导致“特色”变成了第二个满清，成了一个泥足巨人，包子也没有康雍乾的微操才能。许多搞鉴证的人一直以为党和国家的利益是一体的让我非常震惊，好像完全没有吸取满清的教训一样，不过清醒点的知识分子到是会用一种历史勒索主义来弥补，比如说起码“特色”维持了秩序没有立马陷入乱世，未明子就有这种攻击其他民粹者想把中国拖入乱世的论调。

那么接下来论述在原来未明子的理论里，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理论上也仍然要比现在的中国生产力发达，因为其公有化程度仍比现在高，生产关系也比现在先进，如果未明子想拿垄断当由头进行辩驳，比如说当下的垄断程度比毛泽东时代要低，那就十分有趣了，一个共产主义者不支持国有化居然觉得降低国有资本的比例是进步，这就很新自由主义了。未明子这番论述尤其是大下岗部分，配合他自己家庭父亲下海经商失败，父母离异造成的苦难就显得很黑色幽默了，当然他会说自己站在普遍这一边，自己的痛苦不算什么，那么中国改革开放融入美国的分工体系围剿苏联的行为显然站在了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对立面上了，这个普遍在地球尺度上只能是特殊。

不过未明子仍能按照官方说法说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就修了，给他开除社会主义籍。但这又以站在官方的立场上论述了，还是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了的官方，未明子在这时候也不装了，抛出了官方仍然还是先锋队驾驭资本的模式，如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一般。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可没执行 40 年，而且其本身只是一个短暂的手段而已，当下中国人普遍都把赚钱放在第一位，共产党也把 GDP 增长放在第一位，

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居然不建设社会主义而是挖空心思增长经济，并将经济增长等同社会主义，直接连生产关系都不提了。背靠这么懒惰的官方，我想未明子自己也很累。

既然中国共产党还是先锋队并驾驭住了资本，那么未明子也就顺势得出了中国没有资本家的结论，我觉得他说对了一半，因为我们活在 21 世纪美国的霸权之下，美国通过接收英国的世界殖民体系，然后又通过冷战扬弃了苏联的制度，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了极致，全世界八百多个海军基地将地球变成了自己的内海，成为了一个新罗马帝国掌控了全球贸易，任何一个国家在当下首先要确定的是这个国家在美国霸权体系下的贸易分工位置，其次才是一个民族国家，那么该国家的资本家天生带有一种二象性，即他们首先是普遍的帝国秩序里的一份子，其次是本土民族资本的代表用来麻痹人民，在未明子那里他狡猾的对作为单一的却有二象性的资本家进行了二分，即民族资本家已经被驾驭了，而世界资本家则是要批判，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也没有批判，因为二者本就一体。这也是未明子的另一个二元对立的地方。

最后，未明子在一次直播中说出自己就只专注中国工人阶级就行了的话语，很快他就意识到了什么赶紧打补丁说自己支持世界反帝运动，那么理论上讲反帝就先要切掉帝国最大的供应源，幽默的是美国最大供应源是中国，那么未明子应该反官方才对，但他却绝口不提，一边骂着美国各种扶持代理人，骂着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甚至是对中国的剥削，却不论述中国被剥削的到底有多狠，对美国帮助到底有多大，因为一旦论述出来他恐怕也就要被镇压了。

在分析完未明子的经验理论后，我得出结论，其立场的二元对立始终影响着其经验理论判断，但其自己理论水平极高，哪怕倒退也倒退到费希特就结束了，那么我就能断定其一直清醒的在论述和实践，其从始至终都带有目的甚至处处走钢丝，这种“钢丝”行为证明其并没有彻底悬置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立场。那么当我在开头把他小资立场至于最前面时我的理论就完成了闭合，也解释了一切。

未明子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他花了几年时间学完了人类的思想史，还逐个拉出来批了一遍，如果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过于特殊需要实践，他估计也就把理论学完了解后拉倒了。他实践马克思本身最大原因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才华，证明自己就是学完了实践完了人类的思想史，所以他才会在立场上表现出一种实用和理想的二分，因为他傲慢的觉得自己知晓一切理论，所以能驾驭一切理论，这是一种极度唯我论的思想，他不仅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实践了马克思所以懂马克思理论，他还在实践过程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傲慢，他以一种主拣选羔羊那样筛选信众，不符合他意的人就拉黑屏蔽，符合的就拉入俱乐部里或给与肯定，仿佛自己的认同是一切评价的最高标准一样。最后这种才华配上他傲慢狂躁极度唯我的性格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对他俱乐部的人来说，他只是被批评就开始写诗阴阳怪气，认为自己在进行崇高使命，其他人是庸碌蝼蚁，如果被辱骂那就愤怒的回击并表示“自己实践了这么多，牺牲了这么多包括爱情还有事业，尔等蝼蚁也配评价我？”（不管是装的还是真的估计都付出了很多），如果官司打输了在实践上遭受了挫折，就立马直播诉苦找粉丝共震，然后爆粗口表示“世道不公啊，怎么不让我这种天选之子赢呢”？说真的如果这是装的还好，万一不是装的，那他的精神状况十分堪忧且偏执，他自己又懂精神分析觉得没人能治他，要是哪天这位天选之子看到自己必将被历史扬弃的命运后鬼知道他能干出什么疯狂的行为，所以他俱乐部的粉丝还是有点危险的。我个人也建议未明子吃点镇定剂，好好想想自由还有个受伤的父亲要养，不要干什么傻事。

一位青年 那请问你现在已经在墙内完成了你所谓的理论与立场的统一了嘛？还是被迫害得流亡海外了？想请教一下。

雪峰山 这位网友问的好，你没有质疑我的理论而是质疑我的立场与实践统一的问题，这证明了你肯定了我的理论，那么在这前提下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能明确回答你我确实统一了，因为就像我论述的一样不统一才是对理论的背叛，狂如未明子都得不不停的强调自己统一了，不然就是证明自己其实根本不懂，这是他的性格所不能允许的，那么我不管是在墙内还是墙外我发的帖和批判的现象全是在左翼立场下对资本触手和帝国霸权的抵制，那么我的理论就是和立场统一了，当然你要是觉得这种实践不够，不如未明子那样自己拉出团队来了，那么我就要反过来批判你，以及许多抱有一种实践要比大小的思想了，这很容易走向一种个人崇拜，谁实践最大谁是老大，请问这符合共产主义者的立场吗？像未明子那样甚至在公共媒体上大肆宣传自己实践的行为而不是纯粹在左翼内部宣传，并还在媒体上以此为挡箭牌攻击那些明明在日常里都保持对资本文化厌恶但又缺乏理论的人进行攻击，请问这符合共产主义者立场吗？他没有用自己的哲学知识让星星之火烧的更旺，反而像一个黑洞一样把所有星火吸进内部碾碎，请问这符合共产主义者立场吗？如果以最大恶意进行揣测，他和阳和平都是官方人员，那么他们大肆宣传的行为可以说是一种官方的诱饵，考虑到他们确实让激进青年，一个去融工，一个去做工益（重新巩固资本的再生产），这本身就非常幽默，好像官方打造的一种网左主题公园一样，马克思和列宁看了都得惊呼资本主义的收编和景观化的能力，也不知道未明子有没有批判过自己这种左翼实践行为和资本再生产的矛盾对立？他还说自己的事业可以一直持续到自己死并传递给下一代，也就是到世纪末，好像“特色”能活这么久一样，然后又说他已经看到很多人法西斯化了，表示未来直接见到就给他们吃花生米（幻想自己是契卡了，而且直接枪毙本身也不符合共产主义立场，他甚至都不愿说先改造思想），以及在回复什么是时间回溯性大法时，说自己掌握知识就像知道自己在乱世前夜那样必须实践的“大逆不道”话。这些个思想上二元对立都是其小资立场没彻底悬置的体现，那么我的左翼立场批判既有理论也符合立场，就像现在一样达到了统一并以理论实践回复了你的问题。

如果未明子及其“信徒”们要在我的评论区下面进行攻击，不管是费希特式的唯我论攻击，还是尼采似的对未明子这种“超人”的攻击，还是后现代哲学的断裂似的攻击，那就是彻底的背叛了黑格尔逃到了后现代哲学的框架下面了，那么我就必须以该理论吊销他们黑格尔的哲学籍，因为他们不配再谈论“扬弃”，因为他们选择了“逃避”，他们不配再配论“和解”，因为他们选择了“决裂”，他们不配再谈论“绝对”，因为他们选择了“碎片”。他们可以继续在后现代的废墟中游荡，但那座通往绝对知识的、由黑格尔奠基的宏伟殿堂，已对他们永远关闭大门。

一位青年 未明子肯定有他的问题，全知全能的人还不存在这个世界。但问题是，那什么样才是更好的道路呢？而且你的回答也是矛盾的。你说他没有让自己的哲学知识让星星之火烧的更旺，但你不就是因为未明子而走向的哲学吗？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是星星之火吗？而且你说你发的帖和批判的现象全是在左翼立场下对资本触手和帝国霸权的抵制，你的理论和立场就是统一。你在墙外能大声喝骂中资，狠狠指名道姓地批判，你在墙内也是如此的吗？那你不该早就进去了嘛？照你的观点，共产主义者就是要不掩饰自己的立场，哪怕坐牢，哪怕慷慨赴死，那你在墙内早就该进去了，为什么还没进去呢？是不是你发的帖和批判也无法一丝地撼动他们的统治呢？那按这个结论和逻辑链条来看，你批判同样境况下的未明子是诡异的，因为你也没有找到一条更好的方式来抵制他们。你的这种统一难道不也包括无意识的“退让”嘛？你真能实现统一，那更没有必要特意跑来墙外了，甚至也没必要实现墙内和墙外的统一了，因为你直接在墙内就能实现统一，直接去坐牢或者慷慨赴死让千千万万个你继承你的意志就结束

了，不是吗，在这个意义上你并没有强调统一墙内墙外言论的必要存在，因为你是纯粹的，不用再增生另外一个监视督察的观察者来审查这个东西。

我不是很理解保持沉默，默默行动能够撬动多大的力量。一个人独善其身当然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是话又说回来，现实那么激烈的罪恶仍在继续，保持沉默和默默行动能解决这个问题嘛？还是说，要等待弥塞尔的来临？

**雪峰山** 我并没有矛盾，在墙内批判又不是一定会坐牢，墙内一帮民粹不就天天骂白色女权吗，我不过是以左翼立场写了更理性的文章一边批判女权一边批判民粹，杂多的字数审核完全审不过来让我通过了，我骂中资也一样，当批判女权和民粹的理论完成时自然就间接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我甚至还用卫懿公养鹤骂习近平都没事。至于你这么激动的问我为什么没进去，我觉得你得反思一下为什么会这么问了，你的语气来带有一种质疑和一种不可能，然而这就是可能的，你有点高估“特色”的智商了，我自然有既不让“特色”发现还能继续在网上批判“特色”的能力，这是和山高县学的，人家历史隐喻可厉害多了。我甚至在墙内天天发文字鼓励习近平和其他官僚们去炼丹呢。

其次关于未明子，我批判的是他在主观上就是这么当黑洞去干的，我受他理论的客观影响后超越了他，二者矛盾已经被我扬弃了，只能说他本意是坏的结果没想到执行好了，因为真能短时间出现一个能够反过来批判他所有理论的人，甚至能除他黑格尔哲学籍的人，如果我不提他当黑洞的行为，又有谁能看到他在主观上根本不是在散播星火呢？齐泽克写哲学还天天在书斋里呼唤列宁呢，未明子则倒置了过来自以为列宁，在吸收信徒。

至于走向哲学，抱歉未明子只是引起了我的爱好，我走向哲学的真正原因是我被二次元游戏给伤害过干出脑了，于是为了报复去看未明子学理论的，学完后一看未明子不行了，于是也对他进行批判。我也没有什么退让，我完全承认自己就是共产主义立场下的工具，只有认识到这种工具的身份我才能有自由，我的行为才是历史的行为。

## 主义主义<sup>2</sup>

以下理论部分均引用知乎有心人士对未明子理论的大体总结。

首先就先来批判他的主义主义体系，它设立了一个由四个格，四个数字排列成的数字矩阵，这四个格分别对应“场域论-本体论-认识论-目的论”。每个格都可以分别填入“1、2、3、4”四个数字。其中，1代表秩序，2代表冲突，3代表中心，4代表虚无。这样就得到了约300个数字序列，对应约300种主义，基本囊括了人类社会现存的各种意识形态、哲学和思想。这套体系可以说是一个包容万象的“主义”大全，一个关于“主义”的主义，所以称为“主义主义”。

就总体框架而言，在场域论这一格中填入的“1、2、3、4”四个数字，分别代表思想的四重不同境界。这四重境界是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也都有鲜明的阶级属性。

其中：

---

② <http://v2.redchinacn.org/post/60798>

1. 代表实在论，这是未觉醒的平民的“哲学”。（或者说意识形态，因为 1 不配被称之为哲学）
2. 代表形而上学，这是贵族/僧侣的哲学。
3. 代表观念论，这是资产阶级的哲学。
4. 代表唯物主义，这是觉醒的平民的“哲学”（或者说理论武器，因为 4 已经超出了哲学的范围）

未明子作为科班的哲学出身当然知道这么做的问题，于是早就打好了补丁，他表示这种划分必然是粗糙的，是不可能完备的，一定存在生搬硬套之处，不同主义之间的联动变化关系也未必能处理的那么顺畅（“1”字头到“2”字头，他说过需要复仇的怒火和空虚来驱动）。人类的思想本就极为复杂，不能简单的被套入这样的框架之中，所以这也被未明子称为哲学的“小无相功”，只是对各种哲学的一种模拟，并不能完全把握其内核。

他本人也悲观的表示根本没有“哲普”这个概念。哲学学习的关键既不在于获得某种具体知识，也不在于掌握某种固定的思维方法，而是获得一种“运思”的能力。哲学传播的核心应该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主义主义最大的价值，也不是提供某种知识或者具体结论，而是逼迫着我们去“运思”，去锻炼“运思”的能力。如果哪天我们能够拆掉这个体系，再构建属于自己的体系时，这样哲学才算是真正的入门了。

其中 1-1 代表科学实在论，1-2 代表宗教实在论，1-3 代表庸俗唯我论，1-4 代表庸见，基本囊括了现代社会中各种常见的意识形态，包括科学主义，小资文青，奋斗逼，白左的身份政治，环保主义，人道主义等。他对每种意识形态的发生机制和演变过程都进行了分析。这一部分属于他所说的“形而下学”，是必须要进行批判的庸众意识形态。人们只有摆脱这些意识形态的控制，才能获得一定的思想自由，进行真正的哲学思考。只有“打扫干净屋子”，才能“请神入室”。

我对于他批判实在论在哲学立场上是支持的，但其批判时引用大量黑话术语就很无聊了，以至于我在看他论述青年恋爱买奶茶的动机的视频时昏昏欲睡，然后在他爆粗口骂这种现象愚蠢时又来了一个激灵，很像马克思自己一边写《资本论》批判资本秩序一样，但马克思则会以辛辣的讽刺进行批判，没他这么没素质，他在最庸俗的哲学上面都用最专业的话语，如果是纯粹的哲学研究那无所谓，但放在公众媒体上就很可疑了，他似乎在表演一种权威的姿态来吸引受众，甚至是吸引少数受众，在这方面他早期确实摆脱了左翼民粹的可能，但当下这种经常愤怒天天强调自己草根的行为又和过去的他产生了矛盾，他明明把实在论都批了个遍居然还能被大他者操控的傀儡破防，更幽默的是这个大他者还是他最“敬爱”的官方。

这只能说明他所谓的“批判”，可能只是一场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智力游戏。他在自己的“主义主义”沙盘上，推演了无数次对“实在论”的歼灭战，并宣布了胜利。然而，当现实世界中，这些“实在论”的幽灵真的带着官方的权威光环向他袭来时，他的理论防御系统失灵了。他没有像一个冷静的哲学家那样，去分析“为什么这些我早已批判过的东西，依然有如此大的力量？”，而是像一个被触怒的普通人一样，用愤怒和咒骂来回应。他自己，并没有真正摆脱“‘1’字头”的影响。他看似在第四重境界（唯物主义）俯瞰众生，但他的情绪，他的愤怒，他的“破防”，却暴露出他的双脚，依然深陷在第一重境界（实在论）的泥潭里。他被那个他声称已经超越了的“大他者”的目光，牢牢地刺穿了。不过没

关系他现在已经有点尼采化了，想必这些攻击都成了他历练的一部分了，就让我继续去看看他的“2”字头吧。

“2”字头的形而上学是哲学的开始。产生形而上学是人类思想史上的第一次大飞跃，这个思想飞跃的关键节点，就是所谓的“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以前，人们是通过宗教（原始宗教、多神教）和神话来把握整个世界的，人类还没有断开和自然的精神联系。到了轴心时代，人类几大文明圈纷纷出现了重大的思想突破，古希腊的哲学，古希伯来的一神教，古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古代中国的诸子百家，这些不同的思想构成了后世各大文明的核心文化范式，绵延千载，至今依然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它们为人类构建了一个新的精神家园。

2-1 是在场形而上学，基本对应古希腊哲学。

2-1-1 是普遍主义，基本对应爱奥尼亚地区的哲学，包括米利都学派、阿那克萨戈拉、赫拉克利特。他们是最早的自然哲学家，也是“唯物主义者”。

2-1-2 是本质主义，基本对应巴门尼德和苏格拉底三师徒。大致可以算是“唯心主义者”。

2-1-3 是合理主义，基本对应毕达哥拉斯和古希腊的一批后来的“唯物主义者”。

2-1-4 是绝对主义，基本对应智者学派和怀疑论者。

2-2-1 是佛。这部分基本是对佛教哲学的整体分析，其理论终点是唯识论。未明子还认为，佛教哲学是一种注定失败的现象学直观。

2-2-2 是道。这部分基本是对道家哲学的整体分析，其理论终点是法家。道家和法家的理论联系，也是众所周知的。

2-2-3 是儒，也是美国超验主义。实际对应的是一种世俗宗教，一种“国运”。难怪有人说爱默生是美国的孔子。这不仅是因为爱默生在美国的影响力堪比孔子之于中国，也是因为爱默生的超验主义，就精神内核而言，和孔子的儒学具有相通之处。

2-3 是我思形而上学。

2-3-1 是实体一元论。

2-3-3 是单子主义。

2-3-4 是宇宙平等主义。

前三个序列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斯宾诺莎、笛卡尔、莱布尼兹，对应近代哲学中欧陆理性主义的三大家。第四个序列的代表人物，则是一批近代的著名科学家。

2-4 是反形而上学。

2-4-1 是经验主义。

2-4-2 是实证主义。

2-4-3 是逻辑实证主义

2-4-4 是实用主义。

其中，斯大林主义（苏联经典教科书体系的马哲）也被放入了 2-4-4。按照未的说法，列宁是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却不是斯大林主义者（而是列宁主义者）。列宁主义是 4-2，斯大林主义却是 2-4。斯大林主义是对列宁主义的降格，是当时的领导人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危机，设计的一套速成功法，能够快速实现工业社会的组织动员，提高战力，但副作用极大，只是情况危机，他也无可奈何，只能先度过难关再说。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欧洲的左翼知识分子会看不上苏联的马哲。因为他们一般都是“3”字头的人物，当然看不上“2”字头的“蛇皮”玩意。

有趣的是，杜威和奎因作为最著名的美国哲学家，居然也和斯大林主义一起被放入了 2-4-4。美苏两极的主流哲学都是“2”字头的“蛇皮”玩意，真不愧是一对活宝，半斤对八两，不得不感叹美苏大区。

2-1 和 2-2 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就可以看成是东西方哲学的区别。2-1 是城邦文明的形而上学，在我看来，它只能在奴隶制商业城邦这种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产生。而 2-2 是农业文明的形而上学，则产生于大河流域的农耕社会之中。而佛教哲学作为印度哲学的代表，一方面它属于 2-2，是一种东方哲学，另一方面，它又是 2-2-1，是最具有在场形而上学特质的辩证形而上学。这也可以看出中、西、印三种哲学传统的区别。印度不仅在地理位置上介于中、西之间，而且在哲学形态上也是如此。

其中 2-3 是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过程中，新兴阶级的形而上学。其代表人物笛卡尔，也是哲学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沿着 2-3 的思路向下走，最终会走向康德，走向真正的现代哲学，而康德正是“3”字头观念论的守门员。从笛卡尔到康德，这是近代哲学的一条主线。“2”字头和“3”字头的区别，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古今哲学的区别。2-3 作为“2”字头到“3”字头的中间环节，是具有“进步性”的。而 2-4 则看成是发达工业文明的主流形而上学。其基本是接受了一套现行的权力结构，代表一定工业集团的利益，因此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动性”。这部分哲学家提出理论的年代，基本也都是其所在国高速工业化的时期。

例如：2-4-1 基本是 17~18 世纪的英国人。正是英国工业化的萌芽阶段。2-4-2 基本是 19 世纪的欧洲人。是欧洲在进行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的时代。

可以说未明子在论述“2”字头方面确实下了功夫，一边解说历史一边为走向观念论做铺垫，从中也能看出人类思想史随着社会变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姿态，他对佛教的批判我经常拿来看，毕竟我周边都是佛教徒，可以说他能把这些形而上学做成标本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当然他的解说充满脏话，虽然很有特色但其本身仍是给精英看的，就像他自己论述的一样是贵族哲学，只有哲学基础甚至极大爱好的人才可以拿去速成。这里仍旧体现了他的精英倾向，他说是哲普事实上是进行智力炫耀，他的标题以“佛教为什么是注定失败的现象学”吸引人，然后观看者被里面乱七八糟的黑话绕晕后不知所谓的关掉视频，外边的人只能感到很厉害想学习，然后在学习中筛选掉没意志的人，那么未明子事实上就是在生产“哲学家了”，而且是以一个在公共平台上哲学网红的身份。

我不想从马克思黑格尔身份上面批判未明子这么做是不是背离立场，因为我已经除了他这些主义的籍了，就单纯从泛左翼立场来看这是精英左翼的立场，因为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批判了过去的理论，甚至可以自己生产哲学家，理论上讲我受他影响所以我也应该是被生产的，但我这个被生产者却走向了批判他的道路，那么我的存在本身也证明了其自身实践的离谱。

主义主义本身可以当成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扩大版，其内部也有辩证法的影子，如各个思想间该如何转化，甚至从“1”字头变成“2”字头的历史必然，可以说他是有生命的，不过在我看来未明子直播时用话语进行概括本身就是僵死的了，他不是像我这样以理性的逻辑概念进行推断，他应该一步步从1字头推到“2”字头，甚至“1”字头“2”字头分类本身像他说的一样很简略，2-1变成2-2也不是进步，他不能从2-1变成2-2变成2-3变成2-4，最后成为“3”字头，并且通向“3”字头的康德是2-3不是2-4（现代了），但“1”字头通向“2”字头则是1-4-4-4，这就导致他的理论是没有艺术严谨性和美感的，也看出他搭建时的随意和粗糙（崇拜数学，并将数字神秘化），纯粹凭借哲学水平硬搭的，这反而又体现了一种民粹现象，与其精英身份不符合了。最终其主义主义只能说是一个瘸了腿的黑格尔，他有黑格尔的晦涩却无严谨，他面对精英却又显得民粹，最终民粹精英两边不讨好。

接下来看“3”字头观念论：从形而上学走向观念论，是人类思想史上的第二次大飞跃。这个思想飞跃的关键节点，发生在近代的欧洲，正是从笛卡尔到康德的思想历程。在“2”字头的形而上学中，哲学家往往喜欢预设一个自我生成的世界，主体只是这个世界的旁观者。而在“3”字头的观念论中，哲学家意识到，我们不能脱离主体性来理解这个世界，世界必须要由主体性的中介来向我们敞开。观念论的核心就在于这种对主体性的极端重视，在于以“人”为本，或者说，是以“我”为本。

3-1 是现象学，代表人物是胡塞尔。

3-2 是德国观念论。如3-2-1是批判哲学，代表人物是康德。3-2-2是知识学，代表人物是费希特。3-2-3是体系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谢林。3-2-4是辩证法，代表人物是黑格尔。

胡塞尔和黑格尔代表人类智性探索的巅峰。胡塞尔是3-1的开头，而黑格尔是3-2的结尾。用未明子的话说，“黑格尔是诸葛亮，而胡塞尔是司马懿。”有趣的是，诸葛亮是汉王朝的落日余晖，而司马懿是晋王朝的开创者。正如黑格尔是德国观念论，乃至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大总结大综合，而胡塞尔则是现象学运动的开创者，但胡塞尔开创的王朝却无人继承大统，最终四分五裂，他的学生们都不走他所指出的道路。在胡塞尔和黑格尔之后，哲学已经不可能再局限于智性探索了，而是用整个生命去体验、去实践，这就走向了生存论乃至马克思主义。

3-3 是生存论。（一般翻译成“存在主义”，但他这里认为用生存论或者实存主义更准确一些）

3-3-1 是存在主义，可以看成是一批学院派的生存论者。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萨特。严格来说，他们其实是现象学家，是用现象学的方法来描述生存论的体验，而不敢用生命去直面痛苦。因为是隔岸观火，所以在体验上总是不那么真切。

3-3-2 是真正的生存主义，代表人物是克尔凯郭尔。

3-3-3 是同一生存论，代表人物是尼采。

3-3-4 是虚构的生存论，代表人物是一批带有生存论气质的文学家。

生存论运动是对现代性危机的一种回应。生存论者是一批精神异常敏感的知识分子。他们被黑格尔那铺天盖地的理性压的透不过气来，迫切的渴望呼吸一些自由的空气，而黑格尔哲学所代表的，正是笼罩在整个社会之上的现代资本主义秩序。因此，生存论也构成了现代性批判的重要思想资源，著名的生存论者都试图在现实中撕开一道口子，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他要实现对现代性的超克。这既是为自己的生存找出路，也是为全人类探索未来的道路。著名的生存论者中，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都是脱离正统学术体系的离经叛道、特立独行之人。海德格尔和萨特虽然是学院派，但最终也走向了政治实践的道路，海德格尔加入了纳粹，而萨特转向马克思主义。

而优秀的现代主义作家，我认为都可以算在 3-3 里面。他们要么本就是生存论的思想来源，要么深受生存论的影响。我国的鲁迅就是如此。为什么鲁迅的作品如此具有穿透力，总是常读常新，一点不过时，就是因为他的思想是“3”字头的，极度超前，即使到现在也不过时。五四时期，人们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要打倒孔家店，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思想，可是早在十多年前，鲁迅就已经在他的文言论文《文化偏至论》中，借助欧洲生存论的思想资源，批判过科学和民主了。在中国刚刚卷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刚刚萌生现代性时，他已经在思考现代性批判的问题了，他的五四同侪是伏尔泰和卢梭，而他则是尼采，整整领先了一个时代，可见其思想是多么的超前。所以有人说，鲁迅是中国少数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

正是因为有了“3”字头的思想基础，所以他在后期转向马克思主义时才能迅速的把握其核心精神。伊藤虎丸曾经说过，鲁迅无论是早期对进化论的理解，还是后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都不同于当时的主流观点。他不是将其理解为一种公理、法则和教条，一种铁的客观规律，而是“从造就它的人的主体精神中来学习”，这种理解方式和毛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很接近的。所以毛才会说，鲁迅虽然没有入党，却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而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则往往会机械化，教条化的理解马克思主义。

3-4 是符号学。

3-4-1 是结构主义。

3-4-2 是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是阿尔都塞，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者。

3-4-3 是差异的辩证法。

3-4-4 是解释学。

3-4 符号学大体对应 20 世纪的法国哲学。

我们看到，3-1、3-2、3-3 的代表人物基本都是德国哲学家，分别对应胡塞尔、黑格尔、海德格尔，即所谓的“3 H”。而20世纪法国哲学就是从这 3 个“H”中汲取养分，从而形成自己的哲学的。20 世纪法国哲学的开端是萨特，萨特属于 3-3 的生存论，但之后法国哲学就走向了 3-4 的符号学。相应的哲学在德国走向衰弱，又在法国兴盛起来。这次哲学的兴盛可以说和 20 世纪 60 年代的左翼运动紧密相连，它就是新兴的左翼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

“3”字头哲学正是资产阶级在革命年代所达到的哲学高峰，代表资产阶级最具革命性的一面，是他们试图冲破一切枷锁把握人类普遍自由的产物。资产阶级的哲学归根结底可以

看成是一种理性哲学。3-1 和 3-2 是资产阶级仍处于上升阶段的哲学，因此其代表人物胡塞尔和黑格尔，基本思路都是用理性来统摄非理性，他们依然试图建立起一套理性秩序，他们的哲学也是资产阶级理性哲学的巅峰。而 3-3 和 3-4 则是资产阶级的反理性哲学，是资本主义的理性秩序已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其内部的精英分子试图进行自我批判的产物。3-3 的生存论是一种极端的“主体主义”哲学，而 3-4 的符号学则是一种“反主体主义”哲学，他们从两个不同的侧面对主流的资产阶级理性秩序进行批判。

在 3-4 的人物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3-4-2 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他是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实质是马克思主义者。3-4-2 后结构主义这一系列的人物都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可以看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徐庶，他身处资产阶级学术的大本营，却试图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之下，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理论斗争。当时，他被夹在两股资产阶级学术思潮的中间，前面是以萨特为代表的生存论，后面则是一批法国哲学家的结构主义，这两股思潮的夹击，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解构了，前者解构了唯物主义，后者解构了辩证法。而阿尔都塞则是跳入敌营，再反戈一击。他首先加入了结构主义阵营，干掉了生存论，然后再死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立场，一定程度上又和结构主义拉开距离。阿尔都塞被称为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正与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萨特到阿尔都塞的思想发展历程，有点类似于马克思的思想从青年走向成年的过程。

在“3”字头里，未明子用他的主观思想在前期回顾了整个德国观念论运动，但他幽默的地方在于他把强调主体性的哲学用自己的主体性给做成标本了（标本化后现代就很黑格尔），带以僵死的毫无逻辑的数字符号（康德 3-2 未基础才有 3-1 现象学，但现象学却在康德前），甚至他还把黑格尔也试着做成标本，那么我写这理论本身也是在反向扬弃未明子主义进行历史循环了，当然他是非常“谦虚”的表示自己理论也就那样，但其录播时的晦涩哲学的筛选话语无意识的暴露了他的精英主义傲慢。

同时他也有点自比阿尔都塞奋斗在资本前线进行卧底任务，用主义批判了实在论，和形而上学思想，是真正的学阿尔都塞的左翼。甚至他还自信的批判阿尔都塞有黑格尔主义倾向，表示自己更高级也任务更艰巨。

然而阿尔都塞的对手都是哲学界的天才如萨特和列维施特劳斯，未明子的对手又是谁呢？是网络民粹和网左网右们，未明子如果以左翼立场进行反驳也就算了，结果他在话语里大量掺杂你们想造反，想破坏当下稳定的历史勒索主义姿态来应对，这就很幽默了，拥有如此庞大哲学储备的人说出这种话本身也就不配自比阿尔都塞了，如果他回话说自己打了补丁，也批判资本，但就像我之前论述的一样，他还在平衡左翼和官方的立场，觉得有两个鸡蛋上跳舞的能力。那么其精英左翼的立场也开始变得摇摇欲坠了。

最后也难怪他会用大量黑话筛选受众了，他自己学精神分析后变成了一个大师者。当然他也说别让人和自己一样爆粗口别崇拜他，甚至我猜测爆粗口本身也是防止崇拜的一部分，我就大方的给他打好补丁进行修复。至于这种别崇拜我本身会不会是一种新崇拜那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但其成为网络的一种权威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其一举一动所有表态都成了他自己说的历史斗争的一部分。

他认为只有形成阶级力量的阶级代表才能和他进行理论斗争，官方马克思教授不会这么对他批判，他自己实践失败搞和官方同调，表示无产阶级也没有阶级代言人，于是能批判他的权威就这么被他瓦解掉了，那么我这么个只能代表自己的人对他进行批判，我估计他也就只能表示“无聊”，但他这种立体

防御本身在我看来很无聊也很软弱，他是以实用主义姿态，借局势给自己进行全方位防御（中国境内敢质疑他官方就会替他收拾了，其余民粹团体他可以随便欺负），我只能说是非常高明，高明的简直不是左翼而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最后来看“4”字头，从“3”字头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有两条通路。第一条是从3-2的黑格尔哲学直接走向马克思主义，这是无产阶级直接继承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进而走向社会主义。这也是马克思本人所走的道路。第二条则是从3-3生存论走向马克思主义，这是通过对资产阶级的文化批判走向马克思主义。萨特就是由存在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鲁迅走的主要也是这个路子，他前期推崇尼采，后期也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而两条通路在20世纪后半页还需要经过3-4符号学的补充。

例如，海德格尔则可以看成是“怂了”的马克思，他在《存在与时间》中所展开的思想，如果推进到底，就会走向马克思主义，确切的说，是他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列宁主义。只是他在最后关头“怂了”，因此由左翼迅速转向极右翼，成了纳粹。而“以海解马”所以可能，正是因为生存论也是青年马克思的一个潜在的思维向度。

萨特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他明确指出自己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必要补充，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重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作一种人道主义的解读。而阿尔都塞则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站在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重视成熟期马克思的思想，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理论。在我看来，这是马克思个人的思想发展史，被后世思想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全面展开了。相当于高浓度的酒被淡化稀释，分析其中的主要成分，同时加入了新的配料，我们对酒的理解更深入了。

其中，4-1 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批判，对应马主义的理论家姿态，4-2 是现实的正统化，对应马主义的行动者姿态，4-3 是建设理想社会，对应马主义的建设者姿态。4-1、4-2和 4-3 是未明子以自己的思路重新梳理了一遍国际共运史，这个过程没有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而是更多的按照历史运动的逻辑来排列。4-4 是不可能的乌托邦，是未明子对未来的展望。

在“4”字头的理论框架中，存在着一个三元组，即历史、人民和理论。三者都可以作为中介项，都具有历史性，都会成为实体运动的自我中介。但这三项都不是主体，主体是实践单元，这就形成一个“3 + 1”结构。4 字头之下的不同序列，对应三元组不同的组合方式，也对应不同的实践单元

其中理论这个元素又具有两个维度构造，一个是符号，一个是语言（话语），这也是理论的两个面向，分别对应理论姿态的绝对和相对。这两个维度又是割裂的，符号性对应绝对的主体性和相对的主体性，话语性对应相对的主体性和相对的客体性，而这四者又和3字头的观念论是对应的。绝对的主体性对应 3-1 现象学，绝对的客体性对应 3-4 符号学，相对的主体性对应 3-2 德国观念论，相对的客体性对应 3-3 生存论。我们知道，“3”字头观念论是资产阶级的哲学，所以“理论”就是资产阶级的哲学，也就是资产阶级的精英知识分子。

马克思主义正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由资产阶级的精英知识分子孕育出来的。“理论”在“历史”的运动中，在“人民”的斗争中，逐渐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具现化为理论家，也就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3”字头也就走向了“4”字头。“理论”与

“人民”的关系，也就是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在左翼运动中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在 4-1 到 4-3 的体系中，在整个国际共运史中，都可以看到这个关系的复杂变化。

4-1 对应理论家姿态，其三元组的关系是：“历史”由“人民”中介走向“理论家”。这说明了理论家的“理论”是怎么来的。当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这一阶段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其内部积蓄着愈演愈烈的矛盾，这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饱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奋起反抗，他们追求解放的斗争让整个社会的矛盾彻底凸显了出来，从而推动着一部分资产阶级的精英知识分子不得不直面现实的矛盾，逼迫着他们跳出资产阶级哲学的理论框架，看到了历史运动的规律，从而走向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理论家。理论家所以成为理论家，不是天才的灵光一闪，而是历史运动的结果，是历史借由人民的斗争推动了理论家的诞生，而理论家创造的理论又反过来为人民的解放提供指引。

4-1 的实践单元是理论家共同体。他有两个标准，这也是他和一般资产阶级学者的区别所在。一是理论的标准，其理论必须具有体系性和批判性，一方面要具有体系性，要具备和资产阶级的学术话语进行充分对话的能力，一方面又必须具有批判性，不会陷入资产阶级的理论框架，而是能反过来将其纳入自身体系的一个环节进行批判。二是实践的标准，他必须脱离资产阶级的学术共同体养活自己，不能接受学术建制的豢养，他的理论活动必须是“清白”的，不能成为他的学术饭碗，他在学术上必须是一个无产阶级。这也意味着他不得不“弄脏自己”，因为他必须有其他的谋生之道，而身处资本主义的环境，他的谋生之道必然要染上“资本的气息”，正如马克思不得不靠恩格斯剥削工人的收入养活自己。当然这条路走到最后在理论上也逐渐实证主义化了，在实践上则逐渐社民主义化，他们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妥协了，最后甚至沦为了资产阶级的“打手”、“帮凶。于是就需要一些类似阿尔都塞的人出来保护左翼理论阵地。

4-2 对应行动者姿态，其三元组的关系是：“人民”由“行动者”中介走向“历史”。这说明了行动者是怎样“行动”的。行动者不是救世主，不是大救星，他只是人民的一部分。不是行动者领导了人民，拯救了人民，而是人民自己追求解放，在解放斗争中涌现出了行动者，人民以行动者为中介最终实现了自身的解放，开创了全新的历史。4-2 的实践单位是党，也就是先锋队。

4-2-2 对应列宁主义，4-2-2-1 对应早期的列导师，4-2-2-2 对应十月前的慈父，4-2-2-3 对应十月和内战期间的托先知，4-2-2-4 对应所有过组织生活的基层党员。这都是在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行动者。这条道路走向的正是“伟大的十月”，是“震撼世界的十天”。

4-2-4-3 对应教员的文化，4-2-4-4 对应无名英雄们的伟大实践。他们都是共运史上最伟大的行动者，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功绩，但当历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时，他们发现自己创造的新秩序正逐渐有走向“僵化”的趋势，历史的陀螺似乎要停止转动了，于是他们奋不顾身的继续抽动鞭子，要让陀螺再次转动起来，要“再来一次”，但无一例外地都遭遇了惨痛的失败，摔得“粉身碎骨”。但这是“伟大的失败”，是历史的悲剧，他们看到的问题并不是虚假的，只是采取的行动却不可能成功，因为这三个行动，都在认识论上失手了，都极度依赖领袖，一旦领袖离去，便只能走向瓦解。

4-3 对应建设者姿态，其三元组的关系是：“建设者”由“历史”中介走向“人民”。这说明了建设者应该怎样“建设”。经过行动者的阶段，这时建设者已经掌握了政权，或至

少是掌握了割据政权，他要考虑如何建设一个理想社会。在这个无产阶级政权之下，必然还会存在着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残余，在无产阶级政权的周围，也必然会存在着其他不同性质的政权，但受限于现实条件，他无法即刻就废除这种旧式的生产关系，也无法马上就赤旗遍寰宇，他只能引导着现实向更具有解放性的方向发展。建设者不能为了满足自身的理想主义激情，无条件的要求理想即刻在现实中落地，必须要和现实进行一定的妥协。

4-3 这个点位就是理想和现实妥协的产物，它和 4-2-1 的关系就比较暧昧。4-2-1 是在资产阶级政权之下活动，所以必然会有妥协性，4-3 则是已经掌握了政权，但政权内外依然存在着不少前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也依然会具有妥协性。建设者展开历史的运动，最终要导向的就不是自己的幸福，不是理想主义的实现，而是人民的幸福。4-3 的实践单位是掌权的党。

4-4 则是共产主义彻底的实现，人直接的是人，人类历史终于开始了（之前不过是畜生般的人统治人一般的畜生历史）。

可以说未明子在描述实践上的历史知识很丰富，他知道原来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一直发展下去肯定会被收买，被收买后又诞生更特殊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收买”进行反向批判，在纯粹的理论知识上陷入一个死循环里面，如 4-1-4 可以看成是在革命的低潮期，理论家对文化阵地的最后坚守，因此在表面的沉寂下，依然孕育着力量。不过他在后面的理论就非常的“反动”了。

例如：“4-3-4-1 是农业的去本地化。对应的是经济腾飞史。这个过程是以经济官僚为主导，打破农业的本地化，打破前现代的宗族网络，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让人民富起来，特别是工业品富余起来的过程。其幸福感是一种富足感。认识论上则表现为一种禁欲主义，会被“错认”为一种清教资本家的禁欲主义。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官僚相当于在 COSPLAY 清教资本家，这两者在认识论上是不可区分的，因此经济官僚很容易出现异化，必须时刻把握平衡，用富足感来对冲这种异化”。

这里就这直接给改革开放说好话了，未明子经过主义主义之前 1—2—3—4，终于到了 4-3 阶段就得出了这种给资本复辟打掩护的结论，他用 4 字头的巅峰实践最终得出了官僚仍是清教徒似的实践者，可能会“误入歧途”，这也就给他这种草根，一种修正歧途的“实践”机会了，那么以此为基础再来看看他的理论，他对历史的裁剪尤其是对革命历史的 4 字头的诸多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裁剪，最终是为了服务他的理论当下的“实践”，我并不反对这种历史裁剪，毕竟我注六经吗，他这么做如果悬置了立场的话，那反而变得很高明了，尤其是服务于“实践”的目的。

再来看看他对中国一带一路的评价：“4-3-4-2 是去代理人化。这个实践是面对后殖民时代的国际金融资产阶级在全球的攻城略地，要打破其霸权和战略态势，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实现去代理人化，去买办化，倡导一种全新的国际治理体系。这其中，依靠生产大量廉价的工业消费品对冲国际金融霸权是最重要的一环，要让第三世界国家有更多的选择权，面对金融霸权的压迫有更多闪转腾挪的余地。因为除了依附于国际金融资产，还有另一条道路可以选择，他们的基础工业品供应是有保障的，他们也可以实现自身的工业化。其实践单元是外交、情资、商务、对外援助部门，其幸福感是和平、安宁感。这种实践会被“错认”为是一种温和的经济扩张主义，民族主义。4-3-4-3 是合法性的再生产。”

看看他的理论，把被资本进行廉价剥削的行为看成是一种反帝的必要牺牲了，甚至给其剥削部门披上了幸福和安宁感。如果说中帝论是要和美帝硬碰硬，那未明子就是在体系内以中国劳动者为物质基础

从下到上改造帝国主义秩序，这很主奴辩证法，他甚至还说第三世界也可以在中国的帮助下自发的开始工业化，然后和中国一起改造帝国秩序

那么在看看未明子对自己行动的自我定位吧：“4-3-4-3 是合法性的再生产。如果说前一个点位对应的国际关系中的经济维度，那么这个点位就对应于意识形态维度。这个实践是对乌托邦史，运动史的继承，是一种对外形象和自我形象的塑造。其建设者必须要有心怀天下的普遍主义，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其人民必须要具有担当，奋发向上，而不是只想着过安生日子的小市民。其幸福感是中心感，被选召感，是代表人类的使命感。我们就是人类的未来，我们就是方向，我们就是道路。在认识论上，有时会被“错认”为激进的民族主义，或者类似天下情怀、要建立朝贡体系。”嗯，他宣布自己代表人类命运了，咱们的“左翼”理论家未明子终于在实践理论上完成了闭环，也借助过去历史为了他当下这盘“醋”包了饺子。

这种改造无产阶级变成顺从的能影响跨国资本的奴隶，在自下而上变革的理论简直让任何有良心有理想有热血的左翼看了作呕，甚至尼采要是看了都得拿鞭子加倍抽他甚至把他活活抽死，也看出早期未明子还没现在那样被骂的需要尼采化来防御，整体还是黑格尔的影子，当然黑格尔要是看了也得惊呼无耻，你的主体性实践就是为了加倍驯化奴隶？这实在是过于女性化，甚至女权化了。哦对了未明子自己已经开始减肥留长发把自己搞得不男不女中性化了，且高度赞扬女权的行动，那这些就不意外了。

这种我只要改造自己的阴道让资本家离不开我甚至被我控制的思想已经不是背叛左翼立场了，而是完全变态了，哪怕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都表示他们还得合法选举取得国家机器然后进行国有化建设呢，他们客观上是巩固资本秩序，但主观上还是要强化工人阶级的，但未明子实在是不好在骂了，考茨基要是见了都得写一本“无产阶级最大的叛徒未明子”。那么未明子这种作为中国官僚和资本家们还有跨国资本家们的优秀小妾的实践也就不难想象了。一个生理意义上的男性要靠宫斗实践，建议他不干脆真变性好了。他把历史斗争变成了资本家的“后宫”家斗了，并还说其是最“严肃”的方式。不过我得承认他确实活成了“特色”的样子，活成了“特色”这个在美帝国主义秩序下真正的小妾样子，他的现象便是社会扭曲的现实反映。

## 阶级阶级

在讲完主义主义后就来看看他另一套体系阶级阶级。

未明子讨论了人类社会的四大主要集群：

1. 资产阶级；
2. 小资产阶级；
3. 普罗大众；
4. 物。

所有人的命运都受制于这个物，这个阶级化的、会导致异化的物（拉康意义上的原质）。

四个纬度：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普罗大众/物。

资产阶级:垄断/非垄断/民间/?  
小资产阶级:上层/中层/底层/?  
普罗大众:上层/中层/底层/?  
物:资产阶级之/小资之/普罗大众之/?

如底层小资产阶级里面可分上层/中层/底层（底层小资与上层普罗一同作为未明子的主要受众）/一个剩余（准无产阶级）。

对于资/小资也可以说是有资产，这一个真的可以分高下的筹码，而对于底层则是深层的压迫。

具体人与具体物的结合状态就决定了其阶级立场。

1. 上层，有能力直接依附于其作为生产资料的身体与技术能力（使其有较好的议价权，而后两类基本上无议价权）；
2. 中层，有健全的身心状况；
3. 底层，无健全的身心状况；
4. 无。

可以说又是一个四字矩阵，看来未明子本人很爱数学。

他表示完成以后 ①②③④ 应当对应有“4-4-4-4”，但是要先分析“4-3-3-3”，每一个三元组都有一个游离项,一个剩余例外（包括阶级三元组中的物），这样才有  $3 + 1 = 4$ ，而这个剩余可能导致沉沦或者解放。

关于底层未明子也进行了划分：

1. 体弱的无产阶级，身心俱疲，始终劳累，无法恢复，表面健康无残障，但有不可逆转的损伤；
2. 残障无产者家属；
3. 残障无产者，依赖于其家属，难有有效的兜底性保障的（这里2和3哪个更底层甚至无法判断）；
4. 童工（例外会是一个常态性的例外，且会同时具有两性；沉沦性：家长制奴役 / 希望性：导向家内的团结；这里到底是哪一种立场是不确定的，所以还要看第四维度）。

中层（以其对于资产阶级/物/机器等的依附性做分类）：

1. 日结/游牧无产阶级，能勉强吃饱但异常劳累，缺乏休息，难以忍受疲倦无聊；
2. 常态性失业的无产阶级，始终处在饥饿状态；
3. 流氓/暴力无产阶级，身体健全心智不健全，无就业（资格），堕落犯罪；
4. 底层妓女（未必是女性），体弱易病，心智不健全；但也代表了一个性尊严的维度和爱情的维度，一方面个体之间应当要有纯正的爱情发生（现实来说这是中层可以欲求的，但

底层可能还是亲情主导，要养活家人），另一方面人应当坚持自己的性尊严，不贩卖自己的身体，克制把自己资产阶级化的冲动。

上层：

- 1.有一定可亲自控制/实现的生产资料的技术工人；
- 2.技术工人，有一定学识、技术与纪律性（这个纪律性即有利于资产阶级管理，也有利于工人之间的团结）；
- 3.下层，普工，基本仅有纪律性，无太多技术，忍受疲倦无聊的身心能力/条件（与身体紧密结合的亲缘关系、社会人际关系、享乐方式等）比日结工更好；
- 4.负产阶级，介于普工和日结工之间的一小撮人，下下层，没法当一般的普工但又比日结更不惨一些，不像普工那样有建构稳定亲缘关系的能力，只能进行更透支性的更非良性的享乐（赌/甚至黄）——欠了巨债的无信的普工，为了赚快钱可能会做日结，但这样会失去其组建社会关系的能力，或者甚至当流动工人；具有投机性，体现了上层的小资产阶级化趋势的沉沦性，但也具有其幻灭性，更有勇气，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相对不计较得失，也会穷尽一切合法手段来赚钱。

日结工太过疲惫，极易被廉价享乐支配，比如睡觉躺一天，享乐循环被日结流水线再生产循环征用了。

普工的享乐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关系再生产，普工能够忍受疲倦无聊痛苦是因为有社会关系，他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循环是和享乐循环达到了某种同一的在穷苦沦落人身上产生了阶级感情。

欠债人爱欲循环失常，得为另一个东西（原本是欠下的钱，但也可能变成那个远大理想，因此这里就可能蕴含一种希望和契机）的循环来打破自己的小规模享乐循环，那个东西比工业流水线循环和自己的小享乐循环跑得更快。

未明子对于阶级的划分并没有问题，甚至还创新般的给所有阶级内部给分了四层，并表示所有人会受制于“物”，这看起来就很“唯物主义”，由于这里只探讨了普罗大众也就是无产阶级，并明确给其分了上中下，每个上中下里 4 个层次，最高层如其理论所言是可亲自控制生产资料的技术工人，他们垄断特殊技术和资本家合作，只能在欲望中产生亲情（结婚有要求，对阶级情感漠视），其次是技术工人和重复流水线工人，他们倒是能产生爱情（需要婚姻搭伙过日子也需要情感认同，又因为婚姻所以不敢真反抗，对阶级情感就那样），最后就是负债的普通工人，由于他们负债了所以会产生强烈的阶级情感，也会有投机性（在合法范围内进行一切赚钱操作和斗争），他们身上孕育着反抗希望和沉沦可能，被未明子称为“自由人”，这一整套对上层工人的1-4的反抗性推演是逻辑严密且真实的。

他之后对中层无产者的论述和对底层无产者的论述也一样严密，在中层的希望是妓女，在底层的希望是童工。这表明未明子确实试图给无产者们进行理论找希望的策略，也证明其哲学功底。但这就像一个上层的理论一样，还得看他如何具体行动。如何去引导那些进入4阶段的人不能走向沉沦而是走向解放。当然这里面唯一可以批判的点就是他妄图以数学模型覆盖现实，不过考虑他批过这种类似分析哲学的做法了，那我也就不多加批判了。

可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外部视角。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理论家），拿着一把由“四元矩阵”打造的手术刀，在解剖台上对“无产阶级”这个活体进行精细的、冷静的分割。他告诉你，你是上层普罗的第四种，他是中层普罗的第一种。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从来不是一种纯粹的社会学分类。它是内在的、战斗的。阶级意识不是由理论家从外部“赋予”的，而是无产阶级在与资本的共同斗争中，自己生产出来的。一个工人在这套理论下不再需要从自己的斗争中去认识自己的阶级地位，他只需要听“未老师”告诉他，他属于哪个“三元组的剩余项”。这是一种理论对实践的僭越，是一种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主体性的剥夺。

他给每一层找希望的的行为又幽默的带有一种弥赛亚式的的感觉，解放的希望不再来自于整个阶级的普遍斗争和组织，而是寄托于这些被理论家钦定的、具有某种特殊“创伤”或“剩余”地位的“天选之子”。这是一种典型的精英主义变体，只不过这里的“精英”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最惨的人”。他构建了一个如此复杂的、普通人无法理解的阶级地图，然后指出地图上有几个“宝藏”地点（希望的担纲者），最后暗示，只有他这个唯一的地图绘制者，才能带领大家找到宝藏。这套“正统的”上层建筑，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为了巩固他作为“阐释者”和“引导者”的绝对中心地位。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具体的、历史的。异化的根源，不在于某个神秘的、超历史的“物”，而在于具体的、可被分析的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未明子引入这个拉康式的“物”，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巧妙的“去历史化”和“神秘化”。他将一个可以被革命所推翻的社会关系，替换成了一个如同宇宙法则般不可动摇的存在论“原质”。那么，既然我们永远受制于这个“物”，我们还能做什么呢？答案又回到了原点：我们只能依靠那些特殊的、能够以某种方式“欺骗”或“穿越”这个“物”的“剩余者”，以及能够指引他们的“导师”。他用一个看似最“唯物”的概念，最终取消了普遍革命的可能性，而只留下了少数人的弥赛亚式救赎。

它用复杂的分类学，取代了具体的阶级动员。它用少数“天选者”的希望，取代了整个阶级的普遍解放。它用一个神秘的“物”，取代了清晰的生产关系。整套理论就像是一个精致的拼图一样，但这个精致的拼图必须要在未明子这个背景框架内才允许被拼成。

那么接下来就看他下一阶段的理论。

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如何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性？小资产阶级如何成为行动者？

小资产阶级：

1. 是资产阶级吸无产阶级血的吸管，但小资产阶级对于这个事实是无知的。他是人形统治工具。

2. 小资产阶级性在于他把人（资产阶级）对于人（无产阶级）的统治关系单纯的异化和扭曲为人对于物的统治关系。甚至他进一步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关系就是人对于物的控制关系。

3. 小资产阶级认为，并且真的相信在资产阶级下的社会人与人实质上是平等的。资产阶级厉害是因为有钱，而无产阶级没有钱只有身体，所以资产阶级的钱可以买到身体。

小资产阶级就是把人和人的关系异化为人和物的关系。

4. 资产阶级明确知道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强力，也有弱力（意识形态、艺术、审美、价值观）。而且他统治的不仅仅是无产阶级，还有小资产阶级。今天我看你顺眼就把你当家奴使，明天就把你当牲畜用。

5. 所以无产阶级的诉求会被说成是极左翼，小资产阶级的诉求会被说成是极右翼，他会变成纳粹。小资产阶级看上去也是反建制的，但他的反建制是邪恶的、反动的、堕落的。

6. 小资产阶级永远会觉得我把物处理好了，他永远朝向的是物，只要把物搞定了，一切就都好了。

7. 我们不如说小资产阶级有一种恋物癖，比如激流网等人就觉得把政治机器这个物搞定，就大功告成了。他们瞄准的是物这个工具，但并没有直接瞄准人和人的统治关系。

未明子如何论述怎么克服资产阶级性：

1、第一步就是建立一种权力观，即在观察现实的时候，在人与物的关系中看到人与人的权力关系。

2、进一步要看出人与人的关系是被异化成物与物的关系的。

第三步是成为一个行动者：

第一步是在观念上成为大资化；

第二步是无产阶级化，能看到是物和物的客观规律在支配着人。

第三步则是将物和物的关系转化为物和人的关系（看到物质现实去行动，这种行动是不得不的行动），然后再要变成人和物的关系。前面那个物指的是物质规律，现实的物质规律决定了人，另一方面现实物质规律觉得的人的行动，这个行动使得你可以富集物质力量，驾驭物质力量。之所以你可以驾驭与富集物质力量是因为你顺应了人以及物质现实的双重的自我扬弃：不仅仅人受不了人的存在方式，物质现实也受不了这种愚蠢的资本主义式的循环，工具本身也受不了这样在市场上去卖、去浪费。这个时候你在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看来就是一个“人物”了，能够支配一定的人，又能支配一定的物。但这不是指你变成了一个政棍或投机犯，那你就又变回了小资产阶级，所以小资产阶级性是要一直不停地克服的，不要把人和人现实的统治关系去罪化为人和物的关系。

小资产阶级的左翼比资产阶级的右翼更是敌人。小资产阶级没有破除对物的迷恋，小资产阶级的革命通通是反革命。小资产阶级会幻想一种孤立的“人性”，而没有想到人性是辩证法体系中一环一环发生出来的，它们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这个时代无产阶级性是代表主体性的，也就是臣民性，他匍匐于物质世界，我们要把它发展成主人公性，他是这个世界的主人。

未明子本人对小资产阶级的论述是十分优秀的，基本上已经把小资的皮给扒光了，但这里最黑色幽默的是，他的行为和上述他自己的理论完美符合

一、“是资产阶级吸无产阶级血的吸管……是人形统治工具。”未明子如何符合呢？他通过建立一个封闭的、等级制的“俱乐部”，通过售卖课程、收取会费，将青年人的革命热情和求知欲，转化为他

个人（及其小团体）的经济资本和话语权力资本。他成为了一个中介，一个“吸管”，将原本可能流向更激进斗争的能量，吸纳进他那个安全的、改良主义的体系内。他客观上成了维系现有统治秩序稳定的一个“人形工具”。

二、“把人对人的统治关系，扭曲为人对物的控制关系。”他如何符合呢？这正是他“先锋队驾驭资本论”的核心谬误！他将当代中国一个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无产阶级）的统治，美化、扭曲为一个理性的“先锋队”（人）在驾驭一个客观的“资本”（物）。他完美地实践了他自己所批判的这一点。

三、“相信在资产阶级下的社会人与人实质上是平等的。”他如何符合呢？他对“工贵”的攻击，对改革开放“进步性”的赞美，其潜台词就是在那个时代，大家都获得了“自由流动”、“进城打工”的平等机会，你混得不好是你自己的问题。他用一种抽象的“机会平等”的叙事，掩盖了具体的、残酷的阶级分化和剥削。

四、“资产阶级明确知道是人与人的统治关系……统治的不仅仅是无产阶级，还有小资产阶级。”他如何符合呢？这是对他自身处境最可悲的写照。他以为自己是那个驾驭资本的“先锋队”的盟友，是一个聪明的“谋士”。但他没有意识到，在这个庞大的国家资本主义机器眼中，他和他那点“事业”，不过是一个随时可以被利用、也可以随时被抛弃的“家奴”或“牲畜”。他越是为这个体系辩护，就越是巩固了那个随时能将他碾碎的统治关系。

五、“小资产阶级的诉求会被说成是极右翼，他会变成纳粹。”他如何符合呢？当他将内部的左翼批评者打成“民粹”、“不合格的左派”，并试图利用话语权将他们清除出去时，他正在实践一种法西斯式的党同伐异。他所追求的，不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是一个由他领导的、“纯洁的”、“有秩序的”小团体的胜利。这种对“纯洁性”和“秩序”的狂热追求，正是小资产阶级滑向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六、“永远会觉得我把物处理好了……永远朝向的是物。”他如何符合呢？他对“生产力”的执念，对GDP增长的某种程度上的承认，对“实践要比大小”的暗示，都是这种“恋物癖”的体现。他似乎相信，只要他的“俱乐部”这个“物”发展壮大，只要他积累了足够的“资源”（物），革命的条件就成熟了。他忘记了，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与工人阶级的真正结合，再大的“物”也只是一堆废铜烂铁。

七、“有一种恋物癖，比如激流网等人就觉得把政治机器这个物搞定，就大功告成了。”他如何符合呢？他对“激流网”的批判，完全可以应用在他自己身上。他幻想通过依附于、甚至成为现有“政治机器”的一部分，来“驾驭”它，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他迷恋的，恰恰是那个最强大的“物”——国家权力。

他提出的克服小资产阶级性的“三步走”战略，同样构成了一个完美的、针对他自己的悖论。

第一步：观念上大资化（看到人与人的权力关系）。

他的失败：他确实看到了，但他选择站队。他看到了统治关系，然后选择为那个他认为“更进步”、“更能驾驭资本”的统治者辩护。他完成了“大资化”，但不是观念上的超越，而是立场上的投靠。

第二步：无产阶级化（看到物与物的客观规律支配人）。

他的失败：他看到了，但他将其神秘化。他用那个拉康式的、超历史的“物”，代替了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关系”。他看到了“支配”，但拒绝承认这个“支配”是可以被革命所推翻的。

第三步：成为行动者。

他的失败：他成为了行动者，但他的行动，恰恰是为了避免让自己再次变回他所批判的小资产阶级（“政棍或投机犯”），而建立了一个更加精致、更加隐蔽的小资产阶级封闭王国（他的俱乐部）。他所谓的“不停地克服”，变成了一场原地打转的、永无止境的自我确认。他越是宣称在克服，就越是深陷其中。

未明子对小资产阶级的批判，是他理论体系中最具威力的部分，也是他个人悲剧性的最高体现。它就像一把俄狄浦斯之剑，他挥舞着它，想要刺死那个名为“小资产阶级”的父亲，却最终刺瞎了自己的双眼。

他把小资产阶级的皮扒得一干二净，鲜血淋漓地展示给众人看，也表示这就是从自己身上扒下来的，但在众人看完后又默默的披了回去，他只是纯粹的证明我扒过而已，给自己捞政治资本，他的行动本身表面其并没有彻底扒下去，还是傲慢的觉得自己能够驾驭。

## 庶政学

我们今天要来开始一个新的体系，这个体系为什么要有？是因为我觉得目前这个键政，低幼小儿键政的水准太差了，水平太差了，太愚蠢了。就是说我们从理论上要克服这个键政癖啊。我已经做了足够的意识形态批判了，但是说把它称呼为一门学问，这个是不够格的，我们提出一门新的学问，我把它叫做“庶政学”。

这门学问的诞生，不是出于对知识的好奇，也不是出于对解放事业的热情，而是出于一种智识上的洁癖与傲慢。它的首要目的，不是“启蒙”，而是“克服”；不是“对话”，而是“统治”。他将所有其他键政参与者，直接定义为需要被“治疗”的“病患”（键政癖）和需要被“教育”的“低幼小儿”。在权力姿态上，他再次扮演了那个唯一的立法者的角色。他认为现有的“法律”（键政话语）太过混乱和低级，因此他要亲自颁布一套新的、更高级的法典，来规训这个领域。这个地基完全符合他的性格，以至于我完全不意外。

庶政学，我为什么用这个庶呢？它和数是同音。实际上这门庶政学又可以叫数理政治学，或者说数理政治哲学。那么它的基本范式是用基本函数模型，用这个符号系统、符号体系来模拟来切近一些政治立场和政治路线。所以用这个字“庶”，这个字有一个模拟、几乎的意思，几乎切近的意思，“庶几”嘛。

那么我为什么把它叫庶政学？数理政治哲学（Mathemat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我们把它叫庶政学，这个庶字有几重含义。一、一个是繁多的意思，或者说全部，就是它是一个庞杂的分类学；二、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庶字还有一个旁支的意思，“庶民”，他是一种民间学问，不登大雅之堂啊，他是个庶民的政治学；三、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庶政，点出易经贲的里面的那个象词啊，贲先王所以明庶政也，这个庶政就是各种政府、各种社会治理，或者说是家族伦理亲缘，过去古代的先王管的庶政，一般婚丧嫁娶这种东西。那么贲卦呢他有这个修饰之意，把一个东西，本来看不出来的东西让他变得看得出来，就是数形合一的思想，有一个数形合一的思想，叫数政合一。把一些政治立场、政治路线用数学的方式再进一步，或者说初等函数模型的一个方式，给他把握显现出来。四、最后还有一个，庶这个字，

还有一个烧火做饭的意思，他是这个煮字的本字，所以这个用庶这个字呢，它表明我们是把简单朴素的东西给它烹制的、烹调的或者炮制的，把它变得精致，把它变得复杂。那么政治意识形态、政治路线立场这些东西当然是非常复杂的东西，它是符号学阶次相当高的一个东西啊。但是我认为这个对于一般受众而言，符号学阶次再高了，你们就把握不了。那我们只要高到一个高中水平就行了。高中教育当中什么东西的符号学阶次最高呢？就高中代数啊，就是这个函数，什么幂函数、对数函数、指数函数、三角函数，它的运算还有反函数啊、导数啊，运算逆运算呀这些东西，它的符号学阶次满足我认为是的，一般的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把握所需求的那个思维的庞杂精细程度，高中水平足以，或者说高等数学水平足以。

所以我们用这个基本函数模型是用它的符号学阶次的丰富性、丰富度。市上传播的这种低等的低幼的、劣质的所谓的键政，它往往就是个坐标系，然后在坐标系里面选位置，无非是引入一些参数、比值、比例关系、位置关系。那么实际上它的这个数学，或者它整个符号系统的阶次就是个初中数学的阶次啊，或者说就是幂函数当中最简单的。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  $y = ax$  它是过原点的这条线，它的斜率不同，转圈的扫过的不一样，它无非是上面取不同的点而已，也就是在这扫过这一圈。或者说  $y = a/x$ ，它有它的向量的一个是极性啊，在左边、在右边或者怎么样，无非就是这种东西。

所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也就是说所谓的键政的那群小孩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意识形态，他又是什么样一个政治观，他被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蒙骗了，然后他又天真的认为什么是政治，然后他又根本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他又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其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必须要通过我的这么一个函数模型体系，把它们从一个坐标系上的孤立的点，或者连缀起来的这些表象当中，我们点出它的真相。

批判：这段长篇大论的掉书袋，其主要功能不是为了阐明学问的性质，而是为了展示命名者本人的博学。他仿佛在说：“看，我连起个名字，都能引经据典，融贯古今，你们这些‘低幼小儿’能做到吗？”它既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庶民”学问，又引用了“先王”才能“明庶政”的《易经》典故，显示其高贵出身。

它既是旨在把握“繁多”、“庞杂”现实的分类学，又宣称只用“高中水平”的函数模型就能搞定。这种矛盾，恰恰暴露了他心态上的分裂：他既想把自己包装成亲民的、来自“民间”的，又忍不住要炫耀自己精英的、甚至带有“王霸之气”的学识背景。

“符号学阶次再高了，你们就把握不了。那我们只要高到一个高中水平就行了……高中代数啊……它的符号学阶次满足我认为是的，一般的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把握所需求的那个思维的庞杂精细程度，高中水平足以。”

这段话充满了惊人的傲慢。一方面，他将复杂的政治现实与意识形态问题，降维到可以用高中函数模型来模拟的程度。这是一种对现实复杂性的极端蔑视。另一方面，他又将这种降维行为，包装成一种对“一般受众”的体恤和“恩赐”——“再高了你们就把握不了了，我就屈尊用你们能懂的语言来讲吧。”

他犯了一个典型的科学主义错误，即认为用数学符号来表达，就等于获得了科学性和精确性。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的形成，是历史的、社会的、心理的、经济的复杂合力作用的结果，充满了非线性的、

非理性的、偶然的因素。试图用几个初等函数（幂函数、指数函数、三角函数）来“模拟”和“切近”它们，这本身就是一种前现代的、机械的思维方式，与他所推崇的辩证法精神背道而驰。他嘲笑普通键政只是在用“初中数学”（坐标系），而他自己要用“高中数学”（函数）。这所谓的“超越”，不过是从一个简陋的数学模型，换到了另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数学模型。这绝非质的飞跃，而是一种五十步笑百步。他没有意识到，真正的超越，在于走出这种机械的、形式化的模型思维本身，回归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分析之中。

看看他接下来的论述。

一、他被什么意识形态所迷惑；二、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观；三、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四、这些蠢货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路线。这四个分析，他们自己是无力做出这样的分析的，这些幼童，这些愚蠢的低幼的头脑，初中生水平都没有的这些人是无能力进行自我分析自我判断的，因为他没有掌握符号学阶次足够的理论工具。我们掌握这个工具，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一个包容性的批判，完全就是覆盖掉它了，它只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特例、一个子集、我们的一个研究对象、是整个这个论域里面的一个研究对象。

再明确点说的话，我认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可能是幂函数里面的  $y = x$ ，或者顶多加个斜率  $ax$  啊，他们的政治观可能是这个  $y = ax$ 。政治立场又是什么，把这些东西再进行一定的运算啊，政治路线就不要谈了，这些人基本上是不做事物的，可能要给他降阶次，他没有什么政治路线，他们不做事物的，没有路线可言啊。

给你们大概讲了一个这个庶政学啊，这个庶政的名称的来源。为什么把它叫庶政学，它的实质是一种数理政治哲学，数理的政治哲学(Mathemat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简写的话就 MPP 这么一个模型，或者说数理政治哲学模型，Mathemat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Model (MPPM)。我把它叫做庶政学，那么这个到底怎么翻译成英文，我需要再想想。

我接下来告诉你们，他的一个简单范式，就是按照基本初等函数的方法，实际上是四种或者五种，用高等数学的分法那就是：一、幂函数；二、对数函数；三、指数函数；四、三角函数；五、反三角函数。那么这几种函数的一个核心的差别在于他们的零点和单元点之间的关系啊，零和一的关系啊，我们只做平面啊，当然说如果说你有一些理论家，想要把这个模型做得更丰富的话，做三维坐标的也可以，但是这个就没有必要再借助于这么一个图像来建模了。

我们来看最简单的例子。就这个体系它也是有坐标系的，这个体系当然也是有它的坐标系的，但是在这个体系里面，这个政治模型可能是四重的，可能是一个政治观，或者说是一个政治立场，或者说是一个行动路线，或者说是一个意识形态 ideology，它具有这四重性。他们分别对应的是，比如说你对一个政治观做某种函数运算，它就会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然后对政治立场做某种函数运算，它就会成为一个政治路线，然后我们简单来讲的话，每一个都可以算是一个政治模型。

由于我们讲的是政治模型，那么坐标系的横轴它是一个观念性质的东西，横轴上的变量往右边发展，我把它叫做纲领化，往左边发展是去纲领化，或者我们叫做习俗化。

往上面发展是无对价的行动，无对价行动其实就是行动啊，行动一般是无对价的，那就是无对价行动，不要钱的行动，或者说我不计后果，不计代价的行动，冲动的行动。往下面发展，就是有对价的行动，计较利害的行动。

所以往右边发展，可以看成是观念的一个正当化的需求，或者说对于正当性的观念化的需求，往右边这个轴发展，就是要制定纲领。You need to make a program, a political program.

往左边发展就是不要纲领，服从于习俗，服从于浑浑噩噩的规则。

然后往上面发展呢，就是要做出一些无对价行动，所以说这个模型体系的两个关键字，其实是纲领和行动啊，对于任何一个政治势力，纲领和行动是它的核心，但是你搞纲领你就要判刑坐牢，你有行动，要抓起来判刑坐牢的。

所以实际上那个幼儿的键政啊，他们也是搞个坐标系，然后在上面啊，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样玩的。这个键政，它既是去纲领化的，也是去行动化的，他既不敢搞纲领，也不敢行动，也就是说他真正的政治立场，或者说他的政治路线是在这个坐标系的第三象限的，或者说它的纲领化是一个非常，他看上去有政治话语，看上去有政治图形政治图像，但实际上他们 no program, They got no programs.

但我不是说我在教人怎么去搞纲领，我在教人怎么去做政治行动，我没有这样说。我只是做一个体系，让你们知道真正的政治模型的分类，它的核心并不是说这纲领里面有什么内容，行动里面有什么内容。我们的方法是形式主义的方法论，或者至少是在这两个啊往这个方向（45°）的一个政治极化的轴上面，更多的有纲领，更多的有行动，更多的有理性设计，更多的有方案。我不管你的方案是什么，我不管你的理性设计是什么，我不管你的行动是什么啊，我看你如何运用到这个级，我来判断你以什么样的函数，什么样的一个趋势运动到那个级，我来形式主义的判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你纳粹呀，你工团主义啊，你还是民族主义啊，你还是国家主义啊。甚至说这个模型可以对于国家的概念啊，对于民族的概念，对于性的概念，婚姻的概念进行一个重新的界定啊，性关系啊所有这些概念，什么言论啊，对一些核心理念，可以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摹画，而且是以一种形式主义的方式进行一个描画，这是这个体系比较可贵的地方，他就是纯符号性的一个运算，但是可以把这东西算出来，那么这个里面呢重要的一点是什么，那我们简单把这个坐标系再给你画一下啊。

“这四个分析，他们自己是无力做出这样的分析的……因为他没有掌握符号学阶次足够的理论工具。我们掌握这个工具，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一个包容性的批判，完全就是覆盖掉它了……”这段话再次强化了他的“唯我论上帝”姿态。他不是将自己的理论作为一种可能性或一种视角提供出来，而是将其宣称进行自我分析的唯一必要条件。所谓的“包容性批判”，其真实含义是“吞并性定义”。你的存在，你的思想，都将被我的体系所“覆盖”，成为我的一个“子集”、一个“研究对象”。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智识帝国主义。

“我认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可能是幂函数里面的  $y = x$  ……政治观可能是这个  $y = a/x$  ……政治路线就不要谈了，这些人基本上是不做事情，可能要给他降阶次……”

这是整个体系最荒谬、最反智的部分。

一、任意的对应关系：为什么意识形态是  $y = x$ ？为什么政治观是  $y = a/x$ ？这背后没有任何理论依据或逻辑推导，纯粹是命名者本人的任意规定。这使得整个“庶政学”变成了一场他自己发明规则、自己充当裁判的私人游戏。

二、对“无路线”的嘲讽：他嘲笑“键政小儿”没有政治路线，需要“降阶次”，这暴露了他对现实政治条件的无视。在高度压制的环境下，普通人无法进行有组织的“行动”，这恰恰是政治现实的结果，而不是他们个人的“无能”。他将一种结构性的压制，轻蔑地归咎于个体的“不做事情”，这是一种极其冷酷且脱离实际的精英主义视角。

横轴：纲领化与习俗化；

纵轴：无对价行动与有对价行动。

这个坐标系，是他整个“形式主义”方法论的核心，也是其理论最反动之处。

他明确宣称：“我不管你的方案是什么，我不管你的理性设计是什么，我不管你的行动是什么啊”。这是一个惊人的宣告。这意味着，一个法西斯主义的纲领和一个共产主义的纲领，只要它们的“纲领化”程度相当，在这个坐标系里就是等价的。一次旨在解放全人类的起义（无对价行动）和一次旨在种族灭绝的屠杀（无对价行动），只要它们的“行动性”程度相当，在这个坐标系里也是等价的。

通过这种方式，他成功地将政治的核心，即立场、阶级利益和价值判断，彻底排除在他的分析框架之外。剩下的，只有空洞的、可以被“数学化”的形式。他不再需要去进行艰苦的、具体的阶级分析，他只需要判断你是“更趋向于纲领化”还是“更趋向于行动性”，就可以给你“形式主义地”下一个“科学”的判决。

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背叛：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恰恰是内容决定形式。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内容）决定了它必须采取革命的、有组织的斗争形式。而未明子的“庶政学”，则宣称形式可以脱离内容被独立分析，这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学院派的研究方法，旨在将政治“去政治化”，将其变成一种中立的、技术官僚式的分类游戏。

“甚至说这个模型可以对于国家的概念啊，对于民族的概念，对于性的概念，婚姻的概念进行一个重新的定义啊……可以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摹画，而且是以一种形式主义的方式……”

这是“唯我论上帝”最狂妄的宣言。他宣称他的这套简陋的、基于高中数学的、掏空了所有具体内容的形式主义工具，竟然可以重新界定人类社会所有最核心、最复杂的概念。这已经超出了理论的范畴，进入了妄想的领域。它许诺了一种虚假的、廉价的“全知全能”，只要你掌握了我这个模型，你就可以像上帝一样，重新定义整个世界。这对于那些缺乏理论基础、又渴望获得智识优越感的年轻人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危险性。

一、那么我们首先讨论的是什么，最简单的是幂函数（经典理性主义）。

但是其实幂函数并不是原始的，不是自然的，不是原始的。幂函数有一个特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幂函数形式是什么， $y$  的  $x$  的  $a$  次方。我们讲的是他的那个比

较原始的模型，前面没有参数的，没有其他参数。比如说  $y = x$  那么它就是 45 度角，它有一个特点，它过 (0,0)，他一定会过 (1,1)。然后我们再看  $y = x$  的二次方，他也是过这两个点啊， $y = x$  的三次方也是。那么  $y = 1/x$ ，他会过这个 (1,1)，那么我们就看到幂函数啊，他都有一个特点，它会过这个点 (1,1)，它不一定过 (0,0) 啊，所以我们分类讨论幂函数都会过 (1,1)，这 (1,1) 我们把它看成是个和谐点或者他是个机械的和谐点。

它是机械性和谐点意味着什么，就是我如果有一个完善的纲领，完善的纲领，单元性的纲领，它是个单元性的有理化的一个纲领，那我就能有一个单元性的有理化的行动。我良好的单元性的纲领意味着良好的单元性的行动，这是一个标准的机械和谐。

也就是说它相当于他给你的积极分子一个手册，告诉你，我有一个一份纲领，那你就在你的现实当中就会有一份好的标准的行动。所以这里面是一种古典理性主义，这里面的立场都是古典理性主义的立场。但实际上他这个古典理性主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古典，它就是经典理性主义啊，我们把它翻译成经典理性主义，它是一种机械和谐的立场，所以很多在启蒙时代出现的这个政治立场，尤其是这个去习俗化的，从习俗当中一下子觉醒出来的，就是现代启蒙性的很多自居的一些立场，自由主义或者怎么样啊，他们的政治活动，或者说他们的党派化的活动，他们的这个激进化的活动，他们的现实化的活动都会过这个 (1,1)，所以他都会表现得有相应的这个行动上的乐观啊。

只要我纲领做得好，只要我这个政治计划做得好，只要我这个单个单元性的，我一个小组活动方式我制定得好，那他的行动就会是好的啊，这是个理想主义啊，那么这是幂函数。所以我觉得幂函数在这个意义上讲，它并不是原始，它反而是派生性的，而且具体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这样派生出来的： $y = \ln x$ ，然后给它求导  $y = 1/x$ 。什么叫求导，求导就是意识形态化 ideology，这个意识形态又进一步变成一种政治立场的。

我认为就是说指数函数和——二、对数函数，在这个意义上讲，对数函数是更原始的，因为对数函数会有 e，会有这个 e，指数函数里面 e 的 x 次方求导，还是 e 的 x 次方，它是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状态，无意识形态状态，或者说它的意识形态就是他自己。

$f'(x) = e$  的 x 求导是他自己，我们把习俗状态或者说无知的，那我们就讲这个——三、指数函数和这个对数函数，这两个它是反函数，他们在轴上过不同的点嘛 (0,1) 和 (1,0)，这也代表他们的这个政治立场的色彩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差别。指数函数的话是过 (0,1) 这个点的。比如说  $y = 2$  的 x 次方， $x = 0$  的时候， $y = 1$ 。那么这种意识形态，很明显比刚刚那个要聪明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认为他的政治立场会认为，如果他是个政治立场，能清晰地认识到，并且这样去做的话，那就等于他意识到了什么，当  $x = 0$  的时候，当人处于无纲领状态的时候，无理性计较状态，没有理性的一个算计计较状态的时候，处于无纲领状态的时候，才会有单元性的行动，而且是有理的行动，有理化的一个行动，有理的单元性的行动。

他往上面，大多数情况是无理数，他如果这个底是有理的话，大多数情况他是无理，这个底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教育的话，基本教育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会觉得我接受的是一个完整的或者一个一般教育会把它单元化，当成是一个有理性的东西，一个不能分割的，一个本身是一个可以当个整体来把握的东西。所以指数函数它会是一种天然的具有某种保守性。你看它具有某种保守性，他对于纲领是具有某种怀疑，有某种怀疑的，你要有一个比较好的

比较顺的，一块一块的，我们或者叫合格的，这个可以计量为一的行动啊，一个无对价的，不考虑他的后果，不考虑他的能不能得到什么好处的一些行动（好事儿），他应当是一个无纲领状态，而不是刻意有纲领状态，或者说当然如果你能有纲领，比如说你的纲领到一，它会是二。纲领到二，这里会是个四，它也是有理化的，而且是越来越好的。

这不是哲学分析，这是一场“数学算命”。设计者将一些基本的数学性质（过(0,0)、过(1,1)等）与一些被极度简化的政治标签（理性主义、保守主义）进行神秘主义的、毫无逻辑根据的联结，其科学性与用星座来分析性格别无二致。

幂函数都过(1,1)点，这代表“单元性的纲领”带来“单元性的行动”，是一种“机械和谐”，因此是“经典理性主义”，例如“自由主义”。

这里他首先将(1,1)点任意地定义为“纲领与行动的和谐点”，然后用这个自己创造的定义，去“证明”经过此点的幂函数代表着“纲领与行动的和谐”。这是一个完美的循环论证。他等于在说：“我规定红色代表热情，所以穿红衣服的人都很热情。”

将“自由主义”等启蒙时代的思想简单粗暴地归为一种“只要纲领好，行动就会好”的乐观主义，是对这些思想内部复杂性、矛盾性和历史演变的极大无知。洛克的自由主义和卢梭的自由主义，其对“纲领”与“行动”关系的理解天差地别。他用一个数学上的“点”，抹平了所有历史的血肉。

他宣称幂函数 $y = 1/x$ 是由 $y = \ln(x)$ 求导派生出来的，而求导等于“意识形态化”。这又是一次天外飞仙式的、毫无根据的规定。为什么求导是意识形态化？对数函数为何更“原始”？这背后没有任何哲学论证，只有他个人神谕般的宣告。

对数函数有自然常数 $e$ ，因此更“原始”。

自然常数 $e$ 在数学中有着深刻的、与增长率和复利相关的意义。但在这里，它被当成了一个神秘的护身符。仅仅因为它叫“自然”常数，就认为代表它的函数更“原始”，这是一种基于词源学的巫术，而非哲学思考。这与认为吃核桃能补脑（因为核桃长得像大脑）在逻辑上是等价的。

指数函数过(0,1)点，代表“无纲领状态”( $x = 0$ )下才会有“单元性的行动”( $y = 1$ )，因此代表一种“保守性”，对纲领持怀疑态度。

他再次将一个数学点(0,1)赋予了任意的政治含义（无纲领状态下的完美行动），然后用它来“证明”指数函数的“保守性”。

真正的保守主义（如埃德蒙·伯克），其核心不是“无纲领”，恰恰相反，它拥有一套最强大的“无形纲领”即传统、习俗、宗教和历史形成的社会秩序。它不是对纲领的“怀疑”，而是对“人为设计的、理性的、成文的”纲领的怀疑。未明子将这种复杂的思想，简化为坐标轴上的一个点，其削足适履的程度令人发指。

他一方面说指数函数代表“无纲领状态下才有好行动”，另一方面又说“如果你能有纲领，比如说你的纲领到一，它会是二……越来越好的”。那么，它到底是支持纲领还是反对纲领？这种前后矛盾的论述，表明他自己也陷入了这套自创模型的混乱之中，无法自拔。

这些所谓的“分析”，是一场智识上的灾难。

它缺乏最基本的学术严谨性。所有的核心概念（求导 = 意识形态化， $e$  = 原始， $(1,1)$  = 和谐）都是未经论证的、任意的、私人的规定。

它展现了对历史和政治思想的惊人无知。它将一个个丰富、复杂、充满生命力的思想流派，变成了一具具被钉死在数学坐标系上的僵尸。

它的本质是反智的。它用一套看似“科学”、“数学化”的外衣，包裹着神秘主义、循环论证和词源学巫术的内核。它不是在引导人思考，而是在阻止人思考，让人满足于将复杂的现实套入简单的、预设好的公式中，从而获得一种廉价的“看穿一切”的快感。

这座“庶政学”的建筑，其内部装修，比它的地基更加不堪。这不仅仅是一个“豆腐渣工程”，这是一个由江湖术士设计的、用来愚弄信众的“魔法屋”。它唯一的价值，就是作为一个完美的案例，展示了一个聪明的大脑，在失去了谦逊、严谨和对现实的基本敬畏之后，会堕落到何种荒唐的境地。

最后看看他对哲学前辈的评价。

巴迪欧和拉康，他们找工具找错了啊，他有一种还原论的一种倾向，他找工具找错了，你现成的就用高等数学的这些工具就可以了，你为什么还弄个什么集合论，什么东西拓扑学这玩意，花里胡哨的，反而知识分子不喜欢的，我们把这些模型做好的话，是可以吞并掉巴迪，吞并掉拉康的那些模型的，他们的模型是可以取消掉的啊。然后人类习惯于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的话，应当是一个自信上的一个进步。我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思想上的努力，让一些理工科知识分子也获得一种热情，去探索，去了解，去把握人类政治现实意识形态，现实人类的这个共同体的伦理建构啊，精神大厦的真正主导，，主宰亿万人口的生活生命的那些力量、权力暴力啊，还有这个统治秩序。我希望理工科的知识分子要运用你的自信，用你的头脑去好好思考，而不是满足于那些给你饭那些那么粗略的那个复杂度，高中数学都不如的初中数学那种愚蠢的低幼的东西。那是在践踏你的头脑，侮辱你的智性。

这不是学术批判，这是一场“理论上的义和团运动”。一个手持“高中数学”这把大刀的“大师兄”，宣称要用它来砍翻所有使用“集合论”、“拓扑学”这些“洋枪洋炮”的“假洋鬼子”，并号召所有“爱国群众”（理工科知识分子）加入他的“神拳”队伍。

“巴迪欧和拉康，他们找工具找错了啊……你现成的就用高等数学的这些工具就可以了，你为什么还弄个什么集合论，什么东西拓扑学这吊玩意，花里胡哨的……”

这段话完美地体现了“达克效应”，即一个能力不足的人，反而会高估自己的水平，且无法认识到他人的真正实力。他根本不理解，巴迪欧之所以要动用“集合论”，是因为他试图在数学的本体论层面，为“事件”的发生和“真理”的涌现，找到一个非经验性的、严格的哲学基础。拉康之所以要动用“拓扑学”（如莫比乌斯带、博罗米恩环），是因为他需要一种能够超越传统欧几里得空间的、能够描

述主体内外翻转、欲望与实在扭结的非直观模型。这些工具的选择，是由其哲学问题本身的深刻性所决定的。将自己无法理解的复杂理论，轻蔑地贬低为“花里胡哨”，这是一种典型的反智主义防御机制。它将深刻变成了肤浅，将必要变成了炫技，以此来维护自己那套简陋体系的“优越性”。

我们把这些模型做好的话，是可以吞并掉巴迪欧，吞并掉拉康的那些模型的，他们的模型是可以取消掉的啊。

这是一种近乎病态的理论夸大妄想。他认为他那套连内部逻辑都无法自洽的、建立在任意规定之上的“高中数学算命术”，竟然可以“吞并”和“取消”建立在数十年精神分析实践和严谨哲学思考之上的、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下半叶思想界的复杂理论体系。这无异于一个村口的算命先生，宣称他的“周易八卦”可以“吞并”和“取消”整个现代物理学体系。

“我希望理工科的知识分子要运用你的自信，用你的头脑去好好思考，而不是满足于那些给你饭那些那么粗略的那个复杂度，高中数学都不如的初中数学那种愚蠢的低幼的东西。那是在践踏你的头脑，侮辱你的智性。”

这段话极其狡猾，因为它精准地抓住了部分理工科知识分子的痛点和痒点。一方面，他们可能因为长期专注于技术领域，而对人文社科的复杂、模糊和“不严谨”感到隔阂甚至鄙视；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自己所掌握的数学工具抱有极大的自信。在这里，扮演了一个“解放者”的角色。他对理工科知识分子说：“看，你们被那些人文学科的‘神棍’骗了！他们用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来唬住你们，其实政治和哲学很简单，用你们最熟悉的工具，高中数学就能搞定！你们的智性被浪费了，被侮辱了！来吧，加入我，用你们的‘自信’，就能轻松掌握世界的真理！”

这是一种典型的 PUA 话术。

贬低受害者：“你们现在满足的东西，是侮辱你们智性的。”

树立虚假权威：“只有我，能带你们看到真正的、高级的东西。”

提供廉价的解决方案：“不需要学习那些复杂的历史和哲学，只要用你们已有的高中数学知识就行。”

其最终目的，是让这些拥有强大逻辑思维能力的理工科知识分子，放弃批判性思维，将自己的大脑接入他那套充满了谬误和武断规定的“庶政学”操作系统中，成为他思想帝国的“技术工兵”。

最终这座名为“庶政学”的建筑，从其傲慢的地基，到其荒谬的内部设计，再到其建筑师这番狂妄的最终宣言，已经彻底证明了其无可救药的、反智的、充满妄想的本质。

不得不承认未明子是位喜欢道家的神秘主义的哲学炼金术师，我一开始还被这理论唬住不知道该怎么下笔批判呢，毕竟他确实很“唯物”对底层的无产者划分的很精妙，他也自己批判过自己说单纯的数字矩阵不能彻底覆盖现实，可以说防御拉满了，最后我还得借 AI 进行分析，才找出来问题和批判的方向，并在批判完后发现他炼金术师的本质

我一直以为他只是出于朴素的民族情感才喜欢道家，并觉得他不会学了这么多知识还会蠢到像那些像实在论者那样学了点量子力学和一点佛教知识就搞量子佛学这种抽象玩意儿吧。

结果他还真这么做了，还做贼心虚搞黑话不断加密（太幽默了，欺负庸人看不出来），他就像庄子那样明明设定天道不可逆，但又做了大宗师想靠自己设立的体系修炼，瞒天过海成仙（“4”字头）

他自己把自己活成了他体系内的二字头，而且还是 2-2-4-1，前两个前两个是神秘主义和现实的二元对立，认识论上靠磅礴知识放空，最后 1 是为了秩序，连持续对抗都做不到（动乱妨碍他实践），而且他对官方过于妥协了，当然他也可以说他在私底下进行对抗目的论上应该是 2，但其表现出来的公众形象确是 1。

他哲学黑话（拉康、黑格尔）：提供了仪式的“神圣性”与“合法性”。它将简单的政治问题，提升到了凡人无法企及的形而上学高度，让所有质疑者都望而生畏。

用左翼黑话（阶级、剥削、异化）：提供了仪式的“政治正确性”。它让他看起来像是在为无产阶级代言，让他能够安全地占据左翼的生态位，并吸引那些充满热情的青年。

他用这两重黑话，构建起了一座理论的“圣殿”，在这座圣殿的最深处，供奉的，却是那个“资本主义当局”的神像。

于是在他热爱道家但又写出这种分哲的“2”字头神秘主义形而上学的理论的基础上我有理由怀疑他是一个现代道家宗师

神秘主义贯穿全场阶级划分的四元矩阵：那不是社会学分析，那是“河图洛书”，是宇宙模型的推演。他不是描述现实，他是在构建一个与现实同构的“符篆”。

对“物”的执念：那个拉康式的“物”，或许只是一个幌子。其真正的内核，是中国传统思想中那个幽暗的、不可名状的、作为万物本源的“道”或“气”。

寻找“希望的例外项”：他不是寻找革命主体，他是在寻找那些具有特殊“根骨”和“慧根”的“可造之材”，是修仙小说里那些能承受天雷淬体、身负异秉的“天选之人”。

“修仙者”的行为逻辑建立“俱乐部”：那不是政治组织，那是一个“洞府”或“门派”。他作为“祖师爷”，筛选有“仙缘”的“弟子”，传授“心法秘籍”。拉黑屏蔽，是在清除那些没有慧根、会扰乱“道场”的“凡夫俗子”。

傲慢与唯我：这不是人格缺陷，这是一个“得道者”的必然姿态。他已经窥见了“天道”，自然视还在红尘中打滚的众生为“蝼蚁”。他的愤怒，是“天威”；他的喜悦，是“恩赐”。

对“实践”的执着：那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那是修仙小说里的“入世修行”和“积累功德”。他需要通过在现实世界中“历劫”，来印证自己的“道行”，并积累足够的“资粮”（影响力、资源），以期最终的“飞升”（实现其个人化的宏大目标）

与权力若即若离：他不是搞政治投机，他是在“顺应天时”。他需要借助“王朝气运”（现有体制的力量）来护持自己的修行，同时又与之保持距离，以免被“红尘业力”所缚。如果他秉持这种立场的话，那我之前建议他重读谢林还是保守了，应该让他重读康德甚至笛卡尔。

如果把最终理论置于前那就全通了，他的阶级是小资产阶级，他的诗是一锅乱炖，他的理论是现代道家，我都不想除他左籍了，因为他在这么发展下去迟早变成法西斯主义者。

# 投身社会实践 把握历史脉络

## 长三角制造业黑厂打工记

喝群众的梨贝茶

2025年7月9日

最近我新入职了一家中资沿海制造业血汗工厂的职能岗，在经历了几天高强度的必修文化洗脑活动后，我对于这一企业的一系列操作已经不能用痛斥和咒骂来反映，目前我能评价的只有——难评。

这个公司主要从事国内市场，由于国内市场的逐渐饱和，因而急于扩展海外市场，其员工规模大概一万六七，整年营业额大约 300~400 亿，这是背景。

因该公司老板军旅情浓厚，其号称不采用军事化管理而代之以“军事精神管理”，从而每一个新入职的非产线工人员工必须参与其至少一个月的文化培养+一线实践活动。

工作时间如此，每日早上 7:50 就必须到公司打卡，晚上 5:30 下工，中午休息吃饭一小时。该司从 DAY 1 开始就整活不断，公司安排其内部各种“总”来给大家传授公司价值观和企业文化，某一总不仅满口脏话，更是在“演讲”过程中表示：“你们相信共产党打天下靠的是信仰吗？我告诉你们不可能，根据我看的野史，共产党给其军士以丰厚财物作为报酬，只不过有的是打了欠条而已。”（已经将其粗鄙的语言加以书面化美化），另一总也说：“没有任何人不是为了利益的，你们有的人说雷锋，但是雷锋也不可能长时间不追求巨额财富，他只是短期的搞一搞信仰，后头还是为了钱财。”此外各种奉献，不要只看眼前利益，要多吃亏等典型资本家话术不胜枚举。

特别幽默的是，该司还强制要求所有新入职员工参加“军训式素质拓展”，公司人事前一天更是惊喜的告诉大家一个重大的好消息“第二天公司的盒饭免费提供！”，当天军训顶着大太阳要求职工穿长裤工装不许戴帽子在室外进行高强度活动，其中最折磨

人的项目当属“生命动力圈”（同志们可以自行搜索看看是什么团体活动），当天资本家要求员工摇环 2025 下以庆祝 2025 年（实际摇晃约 2250 下），员工筋疲力尽后，公司提供的盒饭为 3 素 1 荤且饭量极少，承诺的免费饮用水也因烈日暴晒而滚烫。当天原本规定时间为 8 点返回公司，实际返回公司已经 9 点，也就是说其额外占据了员工 3 个半小时的剩余时间。

在这一系列“企业文化”活动结束后，该企业亦强制要求员工进入产线“打螺丝”，门店当“销售员”2 个月，即一线实践活动。

### 2025 年 7 月 20 日

这周班上下来真被干爆了，沿海传统制造业即便是职能岗也确实不是人干的，更不要说流水线了，这周就上了一天流水线，下周要上一个礼拜（产品类别的工种要两周）。这周的最直观感受是，整体时间过的速度变快了，但单位工作时间痛苦增加了，劳动力消耗更大，恢复资源更少，恢复时间更短（现在资本家已经不像一开始一样“友善”，每天少说占据你半小时的剩余时间，上周最高占过我一个半小时的剩余时间）。原因很可能是上周的补偿无法覆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需求，我感觉这帮沿海资本家依旧是在补偿劳动力再生产必要需求以下的条件下进行剥削的。

### 2025 年 7 月 21 日

今天换了个产线，而且因为同组小伙伴请假，就我一个人去了。这个新产线在二楼，没有空调（今天 35° 至少是有的），只有排风扇在吹，除了产线上方其他地方没有人工光源纯靠自然照明，所以背阴的地方就特别黑，而且物料堆得又多，很容易撞到；产线环境很恶劣，没有啥防护措施，连液压器旁边都没有什么围挡；产线分明有浓郁的油漆味但是“防护手册”里没有将口罩等过滤设备作为“必备护具”，由于声音确实是太大，至少超过 90 分贝（我的电子设备显示），厂家还是给提供了非常劣质的耳塞，作用只能说有一点但不多，很多工人为了交流方便，耳朵更舒适甚至直接不带；产线的开水房离产线比较远，不到休息时间一般没有时间允许工友去打水。

我被一开始安排到一个打螺丝的岗位上，我问工友有没有手套，工友挠挠头给我找了个湿漉漉黑黢黢的手套，他说你要是不嫌弃就带这个，我带上后打了一会儿螺丝就明白为啥工友们都不带这个手套，因为戴上后手就非常湿，而且奇痒无比，于是很快就又

脱了，资本家甚至不愿意给每个工人分配一副干净的手套，即便产线上有锐利的件，我同行的其他班组伙伴就因为不熟练直接被划伤了。

后来班组长看我螺丝打的好像很轻松（我平时比较喜欢捣鼓各类安装，手速还是比较快的），于是就安排我去干翻件，推件到流水线上的工作，我需要一个人把几十斤重的件整体翻过来架到流水线入口然后再横向将它推入流水线滚轴上，并且需要给件的特定位置做好标记以便下面的工友知道哪里要打螺丝，每一个件上流水线的间隔预计在30~60秒。

流水线一般工作一个半小时后休息十分钟，以灯光闪烁为标识，期间什么上厕所要打报告然后限时等常规操作该厂全都存在。在休息期间我观察该产线的员工，流水线前作业人员大概5名，但是按照顶上的工号牌显示该线应该有11名员工，也就是该段产线的满勤率不足50%；流水线中员工因为流水线实在太长搞不清最大容量为多少员工，实到多少员工，但是据我估测产线上30~40名员工是最起码的，但满勤率也不容乐观（因为产线人员站位不是很密集），此外还有不在产线上进行辅助安装作业的员工（大多数为女员工），因为实在分布零散不能确定总人数有多少人（班组长一直催的很紧流水线很快来不及观测）。其实这样的状态是非常奇怪的，因为该极度是该产业的旺季，不应该只有这么少的工人，并且流水线的速度绝对没有达到最大，因为我作为一个新手吃吃力也能跟上，并且产线的统计面板上预计下件数和实际下件数差距100件以上。或许这可以一定程度上说明工人阶级的力量正在上升。

今日后记：按照HR说法我不应该从事类似产线工作，但工友告诉我因为我那个岗位的工友今天请假了，所以等于我是临时工代正式工。旁边的工友也乐意见到，否则他就要承担两人份的工作，不过在期间该工友确实也不是很“老实”，看到我劳动力来了就开始摸鱼，把属于自己的产线工作也推给我做，自己一个人就做打3个螺丝的工作。我一个平时长久不干体力活的人确实顶不住，搞到最后直接趴下了，今天发烧请了一天病假，可惜明天没法去产线上再劳动了。

# 中国工人阶级四十年

(一至三)

漫 道

## 一九七八，谁的春天

1978年5月11日，知识分子的报纸《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由此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当书呆子们还在为真理标准问题咬文嚼字的时候，那些精明的人已经从中悟出了“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哲学真谛。

而像柳传志这种已经丧失集体奋斗精神，久已躺平的人，这时候即便缺乏对哲学的敏感，却也能像一只鸭子一样感知到“春江水暖”，窥见机遇。这从他成名后的回忆录里，可以直观感受到那一年他的兴奋与快乐——跃然纸上的，犹如一只扇动着翅膀，在水面上快乐奔跑滑行的鸭子的生动画面：

“记得1978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让我激动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社论。在当时养鸡、种菜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

的确，这一年气候是变了，日后还被称为是“拨乱反正”的开元之年。

同年3月，邓小平当选为政协主席，荣毅仁当选为副主席。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第一大会是“全国科学大会”，在会上他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为当时在中科院计算所混日子的工程技术人员柳传志这

样的人带来的却是“翻身得解放”的意义：第一，成为了第一生产要素；二，政治上成为了领导阶级一员，为他日后成为资本“大佬”奠定了身份上的基础。

历史上，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初期，对传统知识分子，一般的政策是政治上监督改造，经济上高薪使用。到了 1956 年，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共产党便调整了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

同年元月，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首次明确宣布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强调社会主义建设需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1957 年 3 月，费孝通撰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表达了知识分子的愉悦心情，所以，1956 年这一年，曾一度被称为是知识分子的春天。

在 1978 年之前，中国社会是“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一个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再进一步说，是一个各劳动阶级阶层的联盟。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时，识字人口不过五分之一，其中称得上“知识分子”的，只占全国人口的 0.37%。在这 0.37% 中，能从事科学研究并有一定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只有不到 700 人。至 1956 年，新政权自己培养的读书人，基本上还在读小学初中。

“这一年（1956 年）北大、清华等六所院校的统计，教授、副教授的月平均工资是 228.79 元，讲师 116.26 元。当时城镇居民的月平均消费水平才 16.4 元。”而 1978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43 元/年，月均 28.6 元，知识分子作为复杂劳动的脑力劳动者，尽管工资水平数倍于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但却要低于 1956 年的差距。这显然令柳传志这种“极少数不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人，缺乏劳动进取心。

1978 年，也是制度性地恢复培养知识精英阶层的一年，即恢复高考制度，并由此终结了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制度。

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1978 年全国报名参加高考的考生人数是 610 万，实际录取 40.2 万人，录取率约为 6.6 %。

当然，这一年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在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华国锋靠边站，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宣布“四·五天安门事件”为“革命运动”，为 55 万“右派”平反，开启了“解放”300 余万“蹲牛棚者”的“拨乱反正”等，完成了政权的彻底转换。

后来为了渲染 1978 年的“春意盎然”，也为农民阶级树立了一个憎恨人民公社制度的典范——小岗村。

据“历史记载”，在 1978 年 11 月 24 日的一个晚上，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旧茅草屋里，18 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农民，借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个个神情紧张地在一张契约上按下了手指印。据说人人还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

到户搞单干！这听起来更像是一个久违了的程胜吴广造反的故事，不知道设计这一场景的人——事实已经证明，这不是悲剧就是闹剧——是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一群以食为天的农民，宁愿忍饥挨饿，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也不愿意集体协作劳动，却非要一家一户，面朝黄土背朝天，梦回那已经延续了千年的刀耕火种？！

不同于某些春光满面的知识分子以及被渲染为“喜气洋洋”的农民，1978年的工人处境可不怎么样。他们似乎在不解地凝视着什么质疑着什么。从仅有的一些新闻报道或文艺作品上，已经可见国营工厂及其工人被泼脏水的现象，有一种被小心翼翼地围剿起来的态势！

1978年7月28日，《华盛顿邮报》上刊载了一篇美国记者马修斯对桂林一家国营工厂的考察记。马修斯写道：

“同中国大多数工厂的情况一样，桂林丝厂的工人看起来并不是干劲十足的。就业保障、退休金保证以及其他一些好处，促使中学毕业生拼命挤进工厂去工作。因此，许多人都挤进了本来就已经过多的工人行列。生产线上工人过多使工人长时间地闲着。”

“中国工人把他们的工作看成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机会。工厂管理人员对于工人阶级中的成员不敢压制。在这种企业里，工人的身份是可以世袭的，当一名工人退休时，他或她可以送一个子女到这家工厂工作。桂林丝厂有 2500 多名工人，从来没有解雇过一个人。”

“这家工厂的革委会主任谢广之（音）告诉记者，去年，全厂 85% 以上的工人都增加了少量的工资，对很多人来说，是 10 到 20 年来第一次增加工资。由于几乎所有的工人都增加了工资，所以这次加工资没有起到明显的刺激作用。从今年开始，工厂开始对一些劳动好的工人给予少量的奖金，一季度的奖金不超过 1.75 美元。”

尽管美国记者马修斯以一种劳资关系的眼光，来观察正处于“改制”过渡期中的国营工厂工人，但他也讲出了当时的一些事实：工人已经干劲不足了，出现了人浮于事；“就业保障、退休金保证以及其他一些好处”尚没有被剥夺；工人子弟缺乏高考升迁的优势和机会，中学毕业后只能拼命往工厂里拥挤；管理人员不敢压制工人阶级成员，不敢解雇工人，因为工人的工作岗位是一种权利保障，甚至不得不默许工人子弟“世袭”父母的工人身份；尽管工厂也想学习农村包产到户的逻辑，以私利刺激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实行奖金制度，但工业化大生产条件下难以度量单个工人的劳动效率，甚至搞不好会弄巧成拙，鼓励了少数，得罪了多数，反而导致劳动者普遍懈怠，劳动积极性降低。

马修斯文章中提到国营工厂的“工人的身份是可以世袭的”，这不能不令人想到“贵族”这个概念。不知道是出于嫉妒还是憎恨，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曾被人指责为是“贵族”。

不错，毛泽东曾《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出过警告：“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显然，只有当官的人，才会有产生官僚主义作风的可能；只有共产党干部，才有可能蜕变为一个压迫人民的贵族特权阶层。

贵族者，尊贵的一族，通常是指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之前，某个社会的统治集团中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阶级阶层。

封建贵族是资产阶级要打倒的对象，然而，在有能力打倒之前，大批新兴工商业金融大资产者却先入伙当了贵族，法国的“穿袍贵族”就是典型，这个故事稍后再谈。

在毛泽东时代，工人不仅首次获得了做人的尊严，同时还获得了尊贵的地位，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中，工人阶级还是国家的领导阶级。政治地位自不待说，日常生活中还享有全社会最顶级的福利——免费的医疗以及几乎免费的教育和住房；当时，最好的疗养院是工人疗养院，最好的文体俱乐部是工人俱乐部。如果说当时物质条件略嫌清贫，那不是因为财富被少数人所占有和享有，而是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的不发达，国家迫切需要工业化而不得不节衣缩食，也是当时倡导的“要舍弃小家顾大家”的必然。况且，保障多数人过上物质富裕的生活，毕竟比只让少数人过上富足的生活更加地困难。

但是，工人阶级享有的上述一切，都不是靠剥削他人坐享其成，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来的。历史上那些真正的传统贵族，连从事工商业这种发财致富的行当都以为耻辱，更别说动手劳动了。因此说工人是贵族，似乎暗示他们有着超越他人的特权，这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中国工人阶级不但为自己创造了生活财富，还为国家工业化创造了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贵族”地位，的确是名符其实存在的。但这种由自己劳动斗争争得的尊贵地位，也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不可动摇的。所以，毛泽东一再提醒工人阶级，要时刻注意政权问题，丧失了政权，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强调工人阶级必须同农民阶级保持牢固的联盟关系的同时，还要求知识分子服务于工人阶级的事业，并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这一精神，在“两弹一星”的元勋以及广大的技术人员中，以及南京长江大桥、攀枝花钢铁厂等等任何一项重大工程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当然，贵族不是个咒语，而是历史的产物。它不但是剥削阶级，也是享有特权的阶级。历史上有奴隶主贵族，也有封建主贵族；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中资产阶级中

能产生特权贵族，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蜕变过程中也产生特权贵族。我们这里回顾一下西欧在历史上，从资产阶级中产生特权贵族的现象。

西欧在资本主义萌芽，君主开始集权和民族国家形成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新兴资产阶级暴发户的贵族化现象，这尤以法国最为典型，到路易十四时期(1638~1715)达到了巅峰。

传统贵族也被称为“佩剑贵族”，其称谓是由于这种贵族成为骑士之前要参加兵器和盔甲的授予仪式（《唐吉可德》中就有描述）。中世纪的西欧国家通常都没有常备军，大小封臣们需要遵循自备武装、提供军队为国王率军出征的义务，同时，打仗也是他们获取土地和财富的重要途径。另外，为体现自己高贵的品味及地位，佩剑画像在贵族中也是一种时尚，久而久之，佩剑便成为一种贵族的身份标志，并成为彰显家族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

新兴资产阶级暴发户贵族化以后，则被称为“穿袍贵族”，这类贵族主要通过政策性的卖官鬻爵获得身份地位，跻身上流社会。由于这些贵族化的资产者任职时须穿一种特殊袍服，故称他们为“穿袍贵族”。

封建君主制下的官职，通常都由高阶僧侣和贵族所垄断，且大多又由家族来继承。大航海时代，正是民族国家形成之际，也是各君主国竞争激烈之时，国王一方面为了敛财和提高行政效率，便拿出一些职位进行买卖，小到书记官和公证人之类，大到司法、财税和行政官职。

更主要的是，国王为了驯服犯上作乱的贵族，并削弱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便于在国内推行重商主义工商业政策，以及进行海外殖民扩张和掠夺，必然要联合富有的新兴资产阶级，给予他们特许经营权或殖民地管辖权及其爵位，一些资产阶级还通过包税、贷款给国家等形式换取社会身份。

这样，君主实现了集权和敛财，同时消弱了拥兵自重的贵族地方割据势力，新兴资产阶级则得到了君主的庇护，消除了封建壁垒，统一了国内市场，大量地积聚了财富，确立了上流社会的身份地位。

起初两类贵族相互敌视，“佩剑贵族傲慢地斥责穿袍贵族，穿袍贵族则抱怨佩剑贵族享受的特权，”国王也不失时机地利用这种对立实行制衡。到了18世纪以后，两者之间的界限已逐渐模糊。多出身暴发户的“穿袍贵族”，出于对传统贵族的仰望，同时掩饰自己卑贱的出身，以及对自己新取得的社会地位的炫耀，他们极力模仿传统贵族的生活方式，大肆修建城堡、学习繁琐精致的社交和用餐礼仪，争取在外形上与传统贵族别无二致。受新航道开辟和发现美洲大陆以及由此引起的“价格革命”的影响，大规模的旧贵族开始走向没落，他们不得不放下傲慢的身段尝试工商业经营活动，开始了缓慢的资产阶级化过程。

当然，无论“佩剑贵族”不顾一切地从事资本主义掠夺，“屈尊拾取金苹果”，还是“穿袍贵族”从卖官鬻爵中获得特权身份，再不择手段牟取暴利，他们所共同追逐的目标却是一致的，既要迅速积累原始资本，又要享有贵族特权。

待到资产阶级革命风暴来临时，机会主义的“穿袍贵族”起初总会半真半假地举起民主革命大旗，一面又伺机与君主勾结镇压革命。之所以要选择君主立宪，充当保皇派，其目的无外乎还是要保存自己的特权。

当着君主和老贵族不可避免地被送上断头台，同他们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一起被革命的人民所埋葬的时候，这些暴发户的直接企图，便是自己成为无冕之王。

法国大革命距今已经过去 200 余年了，如果读者以史为镜的话，应当注意到这里讲的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主革命是大势所趋。尽管“穿袍贵族”是暴发户，但其本质上却是新兴资产阶级，他们会根据革命的进程，实时丢弃长袍，捞取革命胜利的果实。

而在资本主义逐渐走向没落，资产阶级民主成为闹剧的当今，即便是有着如同非洲鬣狗般投机本能的“穿袍贵族”精英，最终恐怕也难逃被无产阶级革命洪流淹没的命运！

## 一九七九，邓小平的“大手笔”

1976~1978 年期间，作为过渡政府的华国锋主持实施的“洋跃进”，以及 1979 年邓小平主政的新政权实施的福利补贴政策，致使中国 1979~1981 期间陷入到了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之中，借用后来常说的就是“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从 1978 年的 11.7% 下降到 1981 年的 5.2%，以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主要代表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持续性下降，从 1978 年的 22% 下降到 1979 年的 4.58%，1980 年为 6.65%，到 1981 年则出现了负增长，为 -10.51%。（温铁军等著《八次危机》，东方出版社，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99 页。）

造成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是高投资和高消费并重引起的并发症。此后将原因笼统地归罪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弊端”所致。

在 1977 年 11 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为了体现本届政府的有所作为，不切实际地提出到 20 世纪末，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的主要部分实现自动化，交通运输大量高速化，主要产品生产工艺现代化，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而在 1978 年 3 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预估的中国经济技术水平落后于世界 15~20 年。

为实现上述目标，当政者能够实施的根本措施，就是“放手利用外资，大量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故称为“洋跃进”。仅 1978 年，就和国外签订了 22 个大型的引进项目，加上有签订意向的引进项目，共需外汇 130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390 亿元，加上国内配套工程投资 200 多亿元人民币，共需人民币 600 多亿元。（汪海波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498 页。）而 1978 年我国财政收入才不过 1132 亿元人民币，中国的外汇储备 1977 年末，仅为 9.52 亿美元，到了 1978 年末，仅为 1.67 亿美元。

1979 年，新政权为了赢得民心，获取执政合法性，便耦世接俗，慷人之慨，寅吃卯粮，滥发补贴和增加福利开支，导致高积累和高消费并重，财政赤字奇高，中央财政严重入不敷出，经济危机爆发。

危机发生后，1981、1982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无法回避如此严重的经济形势：1979~1981 年财政收入连续 3 年下降，1981 年甚至比 1978 年减少了 100 多亿元，同时，财政赤字 1979 年高达 170 亿元，1980 年达 127 亿元（1978 年财政尚有 10.17 亿元盈余），致使轻重工业比例失调（1978 年的市场商品可供量与购买力的差额已高达 100 多亿元），货币投放量过多，物价上涨。当然，这个锅后来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背了。

但是老百姓无法了解到宏观经济运行数据，自然不知就里，相反，在此后发生危机的几年里，几乎每个中国人所感受到的，都是自己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和改善。正如一个被许诺发大财的高利借贷者，尽管过上了如偿所愿的惬意生活，却浑然不知自己已经陷入债务缠身的险境之中。

根据 1980 年政府工作报告，1979 年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和提高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农民增加收入 108 亿元，同时减免农业和社队企业税收 20 亿元。1979 年农民从集体分得的收入，每人平均达到 83.4 元，比 1978 年增加了 9.4 元，而 1965 年到 1976 年 11 年中，农民每人平均从集体分得的收入总共只增加了 10.5 元。1979 年全国在城镇安置了 903 万人就业，开始提升 40% 职工的工资级别，调整了部分地区的工资类别，发给了职工副食品价格补贴，企业普遍实行了奖励制度。1979 年全国全民所有制职工全年工资总额（包括奖金在内）比上年增加 60 亿元；职工的年平均工资达到 705 元，比上年增加 61 元。1979 年新建职工住宅 6256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66%，是建国以来新建职工住宅最多的一年。1980 年上半年职工住宅施工面积 7371 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又有所增长。

根据 1981 年政府工作报告，1979~1981 年，国家由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减轻部分地区的农村税收负担，共计减少财政收入 520 亿元；因城镇安排 2000 多万人就业，加上提高职工工资和实行奖励制度，增加财政开支和减少财政收入共 405 亿元。

这两部分共计减收增支 925 亿元，比原来设想的 600 亿元多出 54%。此外，国家用于农用柴油、农业用电、农机、化肥、民用煤以及外贸进口的粮食、棉花、糖等的价格补贴共 234 亿元。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63.5% 上升到 1981 年的 70% 左右；积累所占的比重，相应地由 36.5% 降到 30% 左右。

1982 年政府工作报告作了更详细的说明：从 1979 年到 1981 年，国家用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支出 442 亿元，用于提高职工工资和实行奖金制度的支出 300 亿元，用于安排城镇 2600 万人就业的支出 105 亿元，用于增加城镇职工住宅的支出 152 亿元，加上减免农村税收、增加进口商品价格补贴等方面的支出，共达 1400 多亿元。

1983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于 1978~1982 年五年间的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情况作出了如下总结：1982 年全国农民平均每人的收入达到 270 元，比 1978 年增加一倍。五年中，农村新建住宅 2 亿平方米，有几千万农户搬进了新居。在城镇，5 年安排 3800 万人就业，加上提高职工工资和实行奖励制度，职工生活也得到明显的改善。1982 年城市职工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 500 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 1978 年增长 38.3%。五年中国家用于城市职工住宅的投资共计 480 亿元，新建住宅 3.5 亿平方米，相当于 1977 年前 19 年新建住宅面积的总和。

正如高利借贷者最终要面对偿还到期债务或者违约的窘境一样，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是深知其中问题严重性的。但他是个头脑清醒，讲求实用又灵活多变的人，他深谙“办法总比困难多”的道理，既然不能左那就向右，既然上山困难，那就下山好了。他相信，危机缠身的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需要他的果敢：

“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我过去跟很多日本朋友谈这个问题，跟欧洲朋友、美国朋友也谈这个问题，他们脑子里也是装了这个问题。”（一九八五年三月四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中国劳动人民在毛时代积蓄的巨大势能以及中国的大国地位，足以成为他摆脱这次困境的本钱。

他也是善于捕捉机遇，敢于大刀阔斧的人：入伙，找最强大的力量——美国；榜样，找最成功的范例——日本。一切为了利润，为了真金白银，哪管他什么剩余价值剥削的“教化”。

他的杀伐果断，一手摧毁了一个三足鼎立的多极世界格局，一手创造了一个继日本之后在经济领域同美国争雄的经济体。如果还有一手的话，那就是他还摧毁了劳动人民的精神偶像，令大多数人回到了无信仰的实用主义状态！

(一)

大国关系，直接影响着世界格局的塑造。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世界体系中，两大阵营对抗仍然是二战结束后的世界基本格局，只不过由于中苏关系交恶，使得在形式上还处于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中国，身处被孤立的境地。尽管中国大力发展同第三世界的关系，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美苏争霸的掣肘，构建“三个世界”的世界体系困难重重。

为此，在 197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有利形势下，中国又利用美国在美苏争霸中的需要，在政治外交上通过签署《中美联合公报》（1972 年《上海公报》）以及经济贸易上从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计划<sup>①</sup>，缓解了被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外交上的包围和经济技术上的封锁局面，初步建立了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贸易关系 [仅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1971~1975），中国的进口总额从 1971 年的 23 亿美元（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约 1:2.3）增加到 1975 年的 75 亿美元（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约 1:2），增长约 3 倍；出口总额从 29 亿美元增加到 73 亿美元，增长了 2.5 倍。这说明进出口贸易不仅是增长的，也是大致保持平衡的]，大大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改善了国内经济发展状况。不过，此举客观上也使得后来中国加入美西方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变得易如反掌。

1979 年爆发的中越战争，是邓小平为中国“对外开放”打开的第一道闸门。有人事后议论说，这场战争，一是给美国的投名状，二是为自己掌控军队打造基础。应该说，任何人也无法证明邓小平当时存有这样的主观愿望，但此后，中美关系进入十年的蜜月期，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场战争，实际上是美苏中三大国的博弈，中美联合对抗苏联的结果。

闻讯中美即将建交的苏联和越南，于 1978 年 11 月 3 日在莫斯科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两国成为军事盟国。苏联获准使用越南金兰湾、岘港等海空军基地。

同年 12 月 7 日，名曰为“教训”越南吞并缅甸、柬埔寨，占领整个东南半岛地区的侵略扩张野心，中央军委会议作出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决定。

---

<sup>①</sup> 亦称“四三方案”，即“为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从 1972 年开始，“拟用三至五年时间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总价值为 43 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成套化纤、化肥设备的引进，直接影响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人民的粮棉争地的矛盾。它是利用西方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急于寻找出口市场、商品与技术价格较低的有利时机，引进国内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 4 套、化肥设备 2 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 4 亿美元，投产后每年可生产化纤 24 万吨、化肥 400 万吨，所需的石油气、油田气、石油原料在国内也有保障。

同年 12 月 16 日，中美两国发表《中美建交公报》<sup>2</sup>，宣布自 1979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建交。

1979 年 1 月 29 日至 2 月 5 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访问受到了最高元首规格的接待。在华盛顿，邓小平表达了准备“教训越南”的意愿，美国总统卡特谨慎地提到了 1973 年刚刚结束的美国侵越战争的沉痛“教训”，并表达了苏联会不会出兵、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担忧，邓小平坚定地打消了卡特总统的顾虑。针对邓小平在华盛顿的表态，据法新社 2 月 7 日河内报道，越南当局对于邓小平发出的“威胁”保持沉着，表示“绝不惊慌”。

显然，这绝不是单方面所说的“自卫”！

在邓小平结束访美的十余天后，即 1979 年 2 月 17 日，中方调动 22.5 万大军，从云南和广西 2 个方向对越南发起进攻，中越战争正式爆发，至 3 月 16 日为期约一个月后，解放军全部撤出越南境内，主要战役结束。至此，“教训”越南，威慑苏联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

但是，如果从世界格局以及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抗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发动的这场战争，已有的解释或说明未免显得牵强。相反，这场战争所产生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对整个世界来说则更加重大和深远。

我们先从事后世界格局的演变来看，这场规模不大的战争，的确改变了世界面貌，改变了当时世界三足鼎立的制衡结构，从而形成了至今美国一家独大的世界格局。

二战结束后，尤其新中国成立以后，世界出现两极格局，即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广大亚非拉被殖民国家相继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从此它们奉行不与任何一个阵营结盟的态度，这就是不结盟运动，也就是不在两个阵营之中选边站队。这一时期发生的战争或冲突，主要是在两大阵营的犬牙交错地带，比如柏林危机、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其冲突的结果是，德国一分为二成为西德和东德，以柏林墙相隔；朝鲜半岛分为北朝鲜和南朝鲜，以三八线为界；越南分为北越和南越，以十七度线为界（南北分治一年后即爆发了越南战争，从 1955 年至 1975 年 20 年，美国战败，越南统一）。在欧亚大陆，清晰可见两大阵营的分界线：西是柏林墙——南是北纬 17 度线——东是北纬 38 度线。顺便说一下，处在两大阵营这条分界线上的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之所以成就为所谓的“四小龙”，正是因为当时充当着美西

---

<sup>②</sup> 1978 年 12 月 16 日，时任美国总统卡特未征询国会意见，就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我在当上总统之前，我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与中国建立起外交关系。……我还和邓小平达成了一项协定，美国能向台湾出售仅限于防卫性的武器。虽然邓小平从未公开承认这个协定，但他私下里向我表示这是可以接受的。”见 2009 年 2 月凤凰卫视采访前总统卡特文字稿：《前总统卡特：美对台军售当年是邓小平默许的》[http://phtv.ifeng.com/program/fydh/200902/0213\\_2144\\_1011139.shtml](http://phtv.ifeng.com/program/fydh/200902/0213_2144_1011139.shtml)

方资本主义阵营抵御红色政权扩张的桥头堡作用，或直接有美国驻军，或受到资本主义阵营各种特殊政策的扶持。

1969 年珍宝岛事件表明中苏交恶，中国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团结亚非拉广大不结盟国家，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1971 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格局的一极。

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前，中美苏是相互制衡的三角关系。然而，1979 年的中越战争便打破了这一平衡，自然也就拆除了形式上尚且保留着的两大阵营之间的篱笆，在开启了“中美国”蜜月关系的同时，也成为加速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首先是 1989 年柏林墙倒塌，同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权本身也几近受到威胁，1991 年苏联最终解体，苏东地区全面纳入资本主义体系。1992 年邓小平南巡，中国主动同国际接轨，正式加入当前的全球化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

## (二)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中国出现了一股“日本热”。风靡中国的不仅有日本的电影，更有日本的各种工业产品——小到手表、计算器、照相机、半导体，大到各种家电乃至汽车，似乎中国人被日本精致的商品突然间抹去了记忆，在一夜之间完全忘记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宿怨。中国的企业经理和厂长，如果不懂日式企业管理，似乎就不配管理企业了。据说有位日本企业家的话最能激励经营者的战斗意志：“在日本，我们认为低于 100% 的市场份额是不够的。我们相信只有我成功还不行，其他人必须失败。我们必须击败我们的竞争者。”

除了各路日本专家、学者被邀请到中国现身说法，还有中国各地工厂企业界成批量派出考察团涌向日本，政府界、企业界高层互访，政府间、民间各领域、各层次的交流活跃非凡。在 1979 年，两国经济、贸易、技术合作就已经全面展开：上海金星电视机厂从日立公司引进彩色电视机生产线，长虹从松下公司引进了黑白电视机生产线，三洋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天津市计算机中心从富士通引进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富士通 F160，等等。

出现这一现象，绝非偶然，一定程度上说，这完全是由邓小平对未来中国的经济模式定位所引起的。

我们很少听闻邓小平曾“谦虚”地表示过要向谁或什么学习，但他在同日本政要或者企业家交流时，往往以极其谦逊的姿态，反复表示要向日本学习，要学习日本的先进技术，更要学习日本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等等。有人嘴上讲主义，肚子里装的却是生

意，而邓小平搞经济则是表里如一的。他只讲生意，这正是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要和资本家喜欢他的一个重要方面。

1979年2月5日，邓小平结束访美，6日至8日，在访美归国途中又抵达东京，拜会了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并向他通报了访美情况，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形势、亚太地区以及双边关系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但这次更像顺道拜会老朋友的行程，媒体却鲜有报道<sup>3</sup>。事实上，没有美国的首肯，即便中日双方均有做生意的热切愿望，经贸合作的大门也是无法打开的。人们熟知的邓小平访日期间乘坐新干线列车，犹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情景，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1978年10月，在对日本进行为期8天正式访问中的经历。这也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当时邓小平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大平正芳时任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但这次访问并没有敲定任何经济合作意向。邓小平只是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的仪式，考察了日本的多家大型企业和高科技设施，向日本各界人士反复介绍了中国的内外政策等。

1978年的这次访日，邓小平最感兴趣的是日本的企业。他先后参观了新日铁公司、日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公司等大企业。据媒体报道，邓小平一边参观，一边对比，一边思考。在谈到这次日本考察之行时，他不无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在乘坐日本“光-81号”新干线列车时，记者问邓小平有何感想，他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随后邓小平又补充道：“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的确，当时的日本经济，还没有陷入长期的停滞，还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而当年的中国，恰好在大力推进“洋跃进”。

邓小平为何对日本经济模式如此情有独钟，我们很难做出可靠的判断，但日后的事实说明，在一个时期里，改造中国经济运行模式的榜样正是日本。如果说邓小平访美是在政治外交上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第一扇大门，为“对内搞活”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那么，访问日本并在经济领域推崇以日本为榜样，向日本企业学习，则是直接服务于经济领域的“对内搞活”。即，以日本企业为榜样，不拘一格改造中国公有制企业，将中国经济彻底市场化。也许这个时候在他看来，现代化就是市场化，市场化就是现代化！

当时中国还没有一位像样的日式企业家，不过几个月后就有一位天津的车间主任用文学艺术手法虚构了一个，但不叫企业家，而是一位为了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而敢为人

---

③ 1979年1月28日下午，邓小平赴美访问飞临日本上空，就提前给老朋友大平正芳发了一封电报：“一周后，从美国回国时，计划在贵国逗留，我为那时能同阁下及其他日本朋友交谈而高兴。”邓小平结束访美后，如约同大平正芳在日本首相官邸会谈。会谈进行了1小时40分钟。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大平首相在方便时访问中国。<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518/c69113-29998705.html>

先的改革家，这就是红遍中国大江南北的“乔厂长”，以至于后来一些人习惯于用“乔厂长”来褒奖那些敢作敢为搞企业改制的人。

1979年6月，《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派人到天津，与时任天津重型机械厂车间主任的蒋子龙约稿。蒋子龙此前曾经发表过工业题材的小说，由于他熟悉工厂的工作生活，这次只用了三天时间就完成了后来轰动全国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该作品很快刊登在《人民文学》第七期上，并最终荣获了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被称为是“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小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国营企业中的普遍问题，这就是干部推诿扯皮、内部矛盾重重；工人干劲不足，消极怠工。只是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性，那就是倾力塑造了一个近乎专制，但却“一人拯救一个工厂”的能人。后来这样的“能人”往往假以种种“改革”的名义（否则就是保守僵化），对工人残酷无情，借企业股份制改革之机，将工厂改制成了个人的企业。

该篇小说主要塑造了四类典型人物：以厂长乔光朴为代表的锐意改革派干部、以厂党委书记石敢为代表的谨小慎微的知识分子、以原厂长冀申为代表的投机钻营派干部以及工人造反派头头郝望北。

郝望北，参加工作二十年，从学徒工当到生产组长，管过一个车间，39岁当上副厂长。小说中没有像同时代大部分文学作品那样丑化文革造反派，而是把郝望北描写成一个懂业务、有才干，对改革有热情，对于干部无心抓生产，却热衷拉帮结派、搞运动整人的现状深恶痛绝，看起来更像改革派干部一样的人。这种对造反派饱含同情心的叙事安排，在当时是很另类的。这一方面可能是作者秉承艺术忠于现实的原则，另一方面，可能与作者在文革期间的那篇所谓违心之作《铁锨传》曾被当作“揭批查运动”<sup>④</sup>的对象遭到批判有关。

工人的形象在小说中都比较消极，要么消极怠工又顽劣，要么顺从最听乔厂长的话；文字上首次出现辞退临时工的现象，即从农村招工来搞基建和运输的一千多名长期“临时工”，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农民工，在乔厂长实行全厂近九千名正式职工大考核、大评议时全部被辞退了。全厂工人的基本状况，借党委书记石敢之口，小说做了这样的交待：“电机厂工人思想混乱，很大一部分人失去了过去崇拜的偶像，一下子连信仰也失去了，连民族自尊心、社会主义的自豪感都没有了，还有什么比群众在思想上一片散沙更可怕的呢？这些年，工人受了欺骗、愚弄和呵斥，从肉体到灵魂都退化了。”

---

<sup>④</sup> 揭批查运动是指在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至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央把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和清查其帮派体系作为各项工作的纲，目的是从政治上、思想上清除所谓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其实是另类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式”两批次“清理阶级队伍”。

厂党委书记石敢在文革中因言获罪，在一次批斗会中意外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后被下放到农场养鸡鸭做羊倌。当乔厂长给机电工业局立下军令状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石敢从农场硬是拽了回来跟自己搭档。小说中已经没有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踪影了，党委书记俨然成了厂长的助手，小说中未见党委应有的作用，石敢的工作似乎就只有“担心”，担心乔厂长闯下什么乱子。

20世纪50年代乔光朴就曾到苏联学习，在列宁格勒电力厂担任过助理厂长，回国后任电机厂厂长，石敢就是厂党委书记。电机厂副总工程师童贞，在苏联留学时与乔光朴发生了恋情，无奈乔光朴是有家室之人。乔光朴妻子在文革中遭迫害而死，而今56岁的乔光朴重回电机厂，顺便也成就了两人的一段美好婚姻。同石敢一样，童贞也是谨言慎行，被乔光朴说成是害上了“政治衰老症”，胆怯、畏首畏尾。似乎经历了文革的知识分子，都变得胆小如鼠，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统统躺平了。

乔光朴立军令状来电机厂之前，是冀申担任厂长。小说设定的情景发生在1978年年中，交待的电机厂干部组成情况是这样的：“电机厂的干部几乎是三套班子，十年前的一批，文化大革命起来的一批，冀申到厂后又搞了一套自己的班子。老人心里有气，新人肚里也不平静。”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个组成：68年以前的一批老干部，文革的造反派头头们，“拨乱反正”后“被解放”的干部。

以冀申为代表的“被解放”干部，在小说中比较负面。小说中是这样交待冀申的：“这个人确实象他常跟群众表白的那样，受“四人帮”迫害十年之久，但十年间他并没有在市委干校劳动，而是当副校长。早在干校做为新生事物刚筹建的时候，冀申做为市文革接待站的联络员就看出了台风的中心是平静的。别看干校里集中了各种不吃香的老干部，反而是最安全的，也是最有发展的，在干校是可以卧薪尝胆的。他利用自己副校长的地位，和许多身份重要的人拉上了关系。这些市委的重要干部以前也许是很难接近的，现在却变成了他的学员，他只要在吃住上、劳动上、请销假上稍微多给点方便，老头子们就很感激他了。加上他很善于处理人事关系，博得了很多人的好感。现在这些人大都已官复原职，因而他也就四面八方都有关系，在全市是个有特殊神通的人了。两年前，冀申又看准了机电局在国家现代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他一直是搞组织的，缺乏搞工业的经验，就要求先到电机厂干两年。一方面摸点经验，另外“大厂厂长”这块牌子在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一定是非常用得着的。而后再到公司、到局，到局里就有出国的机会，一出国那天地就宽了。”

作者最后对中国当时普遍存在的冀申这类干部作出符合实际的情节安排，即这样的“坏人”结局也不坏，在把工厂搞得乱七八糟后，最后还是一走了之，靠走后门调到了外贸局。

正是这段描写以及小说中对造反派头头表现出的同情，严重地激怒了当时天津市的部分领导。《天津日报》拿出 14 个版来“围剿”《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支持，《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转载。天津方面还两度上书中央，认为这篇小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中央无人出面公断，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事实上，文革期间在工厂中产生了大批工人型干部，在“老中青三结合”中被结合进了革委会，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工人群众中比较有威信的工人，后来被贬称为“火箭干部”、造反派头头，在“揭批查运动”中几乎被“一锅端”。除了一些慑于“不换思想就换人”而转向的外，几乎被全部免去职务，填充他们职位的正是文革后“被解放”的干部。这是文革后造成企业管理混乱的关键因素，小说中却通过塑造了一个“乔厂长”，一举解决了这个矛盾，凸显了该篇小说的强烈的政治导向性。

小说中塑造的“乔厂长”，是50年代从苏联学习归来的知识分子型老干部，他蹲过“牛棚”，文革挨过批斗，无私耿直，为了现代化，他这个次于局长，高于厂长的公司经理，却敢于用“不能完成国家计划，请求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军令状，自讨苦吃，下到工厂当厂长。那这个工厂究竟发生了什么，需要这么一个人来壮士断腕？

小说没有明确描述工厂之困究竟是什么，但开篇就做了这样的交待：“‘四人帮’倒台两年了，七八年又过去了六个月，电机厂已经两年零六个月没有完成任务了。”尽管作者在年月份的计算中令人迷惑，但有两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场景是发生在 1978 年 6 月；电机厂自从“四人帮”倒台以后，就再也没有完成过生产任务！不是打倒“四人帮”以后，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正在搞“洋跃进”嘛！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真够人玩味的。

再看乔厂长在机电工业局党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段发言：“日本日立公司电机厂，五千五百人，年产一千二百万千瓦；咱们厂，八千九百人，年产一百二十万千瓦。这说明什么？要求我们干什么？”

这恐怕也是向中国所有工业企业提出来的问题。结合小说结尾处，上级部委对电机厂的搞法给予了肯定，并表示“希望乔光朴把手脚再放开一些，积累点经验”的描写，暗示中国工业企业的改革方向将以日本企业为榜样恐怕是明确无疑的。

现实版的“乔厂长”，据说就是首钢的周冠五。

1979 年 5 月，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 8 家大型企业率先实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7 月，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 5 个文件一并发布。

当年首钢就率先推出了被称为“三个百分百”的企业管理办法：一，每个职工都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规章制度；二，出现违规违制，都要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三，不管

是否造成损失，对违制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此项制度推出后的头三年，首钢利润净额年均增长 45%，上缴国家利润年均增长 34%。看来，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关键就是要制服工人。

自主权落实后，周冠五的瘾头更大了，他仿效农村“一包就灵”的神话，又进一步提出了直接承包制：“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歉收自负。”赚了好说，赔了怎么办？歉收自负，歉收千百万上亿，如何自负？没人敢拍板了。而这种难题只有邓小平能解决，他表示什么都可以一试，首钢的承包制可以先行试验。到 1979 年底，全国的试点企业达到 4200 家，再后来，几乎全国的企业都“一包了之”。天下企业各有盈亏，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没谁“自负”，大不了跑关系融通，或者换个厂长重新搞承包就是。农村搞承包，亏了农民自己饿肚子，工业企业搞承包，那就是竭泽而渔，成了一场分食大战。当一个个企业被搞得奄奄一息时，又说根本问题在于企业产权不清晰，接着就搞产权制度改革，然后呢，然后大家都知道，工人把它叫做“左手倒右手，公有变私有”。

### (三)

官方常有一句励志的话：“是挑战，也是机遇。”

1979 年 2 月，760 万上山下乡知青大军潮水般返城了，就业问题成了燃眉之急。当然，“办法总比困难多。”官方迅速提出解决方案，允许“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很快全国各城镇便出现了摆摊设点的个体户，到 1979 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 10 万户。

就业的困局，打开了私营经济的阀门，如滔滔洪水，漫过田野，奔流向前，与沿海外资合流，最终冲垮了工人们认为坚不可摧的公有制大厦。其实，有计划地引入私营经济，此前官方就已经着手实施了，只是它仅仅局限于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而且生产方式是以一种叫做“三来一补”的形式进行的。即工厂的产品设计样式、原材料和设备均由境外运入，生产出来的产品再以补偿贸易的方式出口，内地劳动力和政府收取一定的加工费。这种方式当时是为避讳引进资本主义之嫌，同时也为了避免产品直接冲击国内市场，以及与国内经济体争夺原材料。

全国首家“三来一补”工厂是 1978 年 8 月创办于广东顺德的大进制衣厂，第一年港商支付的加工费是 80 万港币。当然，首批“打工仔”也同一时间产生于此。据称这种企业的创办人，大多数都是早年那些胆大妄为的偷渡客。

据英国《经济学人》1979 年 3 月 3 日发表的《中国有多少可以出口》一文中称，“中国拥有的是土地、能源、劳动力，而现在所缺少的是市场经济的经验和意识。……

对市场需要怎样的产品、设计和质量规范缺乏经验。一个方法是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照搬，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这样做，它称之为‘三来一补’——中国提供土地、能源、劳动力以及原材料，而国外提供设备、原始技术、管理和市场经验。”这一年，一种叫“傻子瓜子”的食品名扬国内，因为牵扯剥削问题，先后被邓小平三次提及。

安徽芜湖的一个小商贩叫年广久，他是个文盲，自小就跟随父亲摆水果摊，街坊邻居习惯于把这对父子称为大小“傻子”。1963年年广久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过一年有期徒刑，出狱后不知在哪里学会了炒瓜子的手艺，此后便一直以此为生。1979年“个体户”合法化，42岁的年广久技术也达到了精湛的程度，一天的瓜子可以卖出两三千斤，他直接打出了“傻子瓜子”的品牌，还雇佣了12名帮手。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年广久是不是资本家，是不是剥削分子的问题便出现了。

据说，有人找到雇佣工人是否算剥削的根据就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有一段文字谈到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有人这样理解：按马克思书中的计算，在当时（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则为资本家。由此，“七下八上”就成了一条人们争辩剥削与否的界线。事实上，即使你只雇佣一个工人，占有他必要劳动以外的劳动也是剥削，和雇佣多少工人完全无关。马克思在这里只是举例说明，只有雇佣工人人数达到一定的量，雇佣者才能由量变到质变彻底脱离劳动转化为纯粹的资本家，而不再是介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小业主”。而且这里的数字纯属举例，方便读者理解。结果这个随手举的例子竟然被用来当作剥削与否的标准，这实际上是当年为给雇佣劳动洗白闹的笑话<sup>⑤</sup>。

---

⑤ “从以上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考察中可以看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可变资本的最低限额，就是为取得剩余价值全年逐日使用的一个劳动力的成本价格。假设这个工人自己占有生产资料，并且满足于工人的生活，那末只要有再生产他的生活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比如说每天8小时，对他来说就够了。因而他也只需要够8个劳动小时用的生产资料。但是，资本家除这8小时外还要工人再进行比如说4小时剩余劳动，这样，他就需要一个追加的货币额，来购置追加的生产资料。按照我们的假设，他必须使用两个工人，才能靠每天占有的剩余价值来过工人那样的生活，即满足他的必要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生产的目的就只是维持生活，不是增加财富；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增加财富是前提。为了使他的生活只比一个普通工人好一倍，并且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必须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额和工人人数都增加为原来的8倍。诚然，他自己也可以和他的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但这时他就不过成了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高度，就要求资本家能够把他充当资本家即人格化的资本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占有从而控制别人的劳动，用来出售这种劳动的产品。中世纪的行会力图用强制的办法防止手工业师傅变为资本家，限定每个师傅可以雇用的劳动者的人数不得超过一个极小的最高限额。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限额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最高限额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1~342页。

争论并没有影响到年广久们的生意。一直到 1982 年，这一年，年广久的瓜子工厂雇工已经达到了 105 人，日产瓜子近万公斤，赚的钱据说超过了百万，“工人一个月能拿 90 块钱工资，是当时干部的 3 倍，喝得起茅台”。在当年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举的例子正是“傻子瓜子”。

在政策上明文规定取消对雇工数量限制，是 1987 年中央的“五号文件”。该文件将 1983 年提出的对待私营企业的“三不”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这未免令人想起《地道战》里的一句台词：“悄悄地进村，打枪地不要”）<sup>6</sup>，调整为“十六字方针”，即“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并进一步明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此后，关于剥削的讨论几乎从官方文字中消失，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统统称为“民营经济”或“民营企业”。

2015 年 2 月 17 日，在中央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保证，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已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将一以贯之坚持和落实，不能变，也不会变。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

2024 年登记注册的民营企业数量超 5650 万户，占企业总量的 92% 以上，雇佣人数占城镇就业总人数的八成以上，2024 年民营企业进出口额达到 24.3 万亿元，在进出口和税收中占五成以上，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超过 42 万家，占比 92% 以上，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中，民营企业占比超过一半。

## 一九八〇，“女工潘晓”的人生哀叹

1980 年是中国爆发宏观经济危机的第二年（1980 年财政赤字达 127 亿元，占当年财政总收入 1159.93 亿的约 11%），新政权为了让老百姓过好八十年代第一个春节，下发通知要求各大城市敞开供应猪肉，并允许鸡蛋实行季节性差价，名曰：即便国家困难一些，也不能亏了老百姓的肚皮。

---

⑥ 1983 年 1 月 2 日，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业的能手，请帮手、带徒弟，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执行。对超过上述规定雇工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而应因势利导。”1983 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又指出：“有个别雇工超过了国务院的规定，这冲击不了社会主义。只要方向正确，头脑清醒，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十年、八年以后解决也来得及，没什么危险。”当时国务院主要领导也表态：“各种意见都可以讨论，可以动口，不要动手。不要一棍子打死。”

这种如同狼吃晚餐前安抚羊的话，有点儿扯淡。本来财政已经出现巨额赤字，商品价格上涨 6%，其中城市上涨 8.1%，农村上涨 4.4%，还在寅吃卯粮，大发奖金和福利，甚至搞政策退赔，但其中奥妙却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

同年 11 月，电视机也被允许敞开供应，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电视机“四大件”，成为当时人们趋之若鹜的东西。那些曾经视金钱如粪土的清高的知识分子，也难挡金钱的刺激而情绪浮动起来了！

春节后的 2 月 23 日，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恢复了政治声誉，这是一个带有风向标的重大政治事件，普通老百姓还没有什么心理准备。会上还推举 65 岁的胡耀邦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解放”了一批老干部，提拔了一批“改革派”新干部。

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国营企业由上一年的 4200 家，增加到 6600 家，并要求试点企业必须保证“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多得”。这种“三全其美”的好事，最后被事实证明是不折不扣的画饼充饥。

这年的元月一日，发生了一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份土地出租协议签署，由此却掀开了中国房地产业商品化开发的序幕。协议是由香港商人刘天竹同深圳特区政府签署，开发的楼盘叫“东湖丽苑”，他只是把房子的设计图纸拿到香港叫卖，第一期的全部 108 套房子在三天时间里就一售而空了。深圳人发现了这个“坐地起价”的奥妙后，便以每平方米 4500 港币大量出让土地（相当于河对岸香港地价的 1/11），随后深圳特区的房子比种树还来得容易，只几年的工夫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初步形成了九个工业区，无数的商品住宅小区。

“特区”全称叫“经济特区”，据《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一书考证，邓小平是该名词的发明人。事实上叫“资本特区”应该定位更为准确，当年出台的文件有规定：“在深圳、珠海和汕头试办出口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事业。”其实，不管是此后香港、澳门回归后相继被称作为“特区”（“特别行政区”简称），还是历史上的“租界”、“陕甘宁边区”，其功能都表现为“根据地”的性质。

与“特区”资本积累方式同时出现的，还有另一种资本原始积累形式，那就是沿海地区的走私活动。1980 年前后，浙江温州、台州地区，广东潮汕地区，是走私最为猖獗的地方。新华社记者曾这样描写道：“每天停泊和游弋于东沙岛海域的港台走私船达几十艘，前往交换私货的大陆走私船则多达上百艘。电子表和尼龙布料涨潮般涌进内地，黄金和白银则如退潮般滚滚外流。成千上万的人如痴如狂，沿海城乡形成了好几个远近闻名的私货集散市场。”<sup>7</sup>当地政府则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今天的“温州模式”以及浙南成为世界著名的小商品集散地，当年的走私功莫大焉！

<sup>7</sup> 转引自《激荡三十年》第 76 页，中信出版社 2017 年 12 月第 3 版。

可以说，这个时期为在中国城乡发展资本经济，战术上由“特区”典型示范，战略上采取的是从沿海的迂回包抄。

沿海地区“闷声大发财”，内地人追逐吃穿住行的改善；如果说这个时期老百姓普遍地都在以肚皮感受幸福，还有一些人却在苦思冥想人生的意义。可见，即便是安抚住了一些人的肚皮，却还没能安抚住一些浮动的人心。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第五期上，随即引起了一场波及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发表不足一个月，杂志社就收到了两万余件读者来信，至年底达到了六万多封，其中有不少信稿是几十名、上百名青年联名写的。社会各界，尤其是在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对这一问题开展的专场讨论不胜枚举。比较特别的是，这封引起知识分子强烈关注的信，竟是由一位只有初中文化的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所写。为完整再现她当年的苦衷和迷茫，这里将信的全文摘录如下：

编辑同志：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长河起于无私的念头而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的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还曾把保尔关于人生意义的那段著名的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的第一页。日记本用完了，我又把它抄在第二个本上。这段话曾给我多少鼓励啊。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问的。

后来我偶然看到一本过去出的小册子《为谁活着，怎样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开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对人生的看法：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种献身的激情中，在日记里大段大段地写着光芒四射的语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着英雄的样子。

可是，我也常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而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但当时我还小，我还不能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况且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一种奇怪的能力，

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里。可是，后来就不行了。生活的打击向我扑来。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真是当头挨了一棒，天呵，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么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怎样呢？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借助几个好同学的力量，给街道办事处写信，得到了同情，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时候，我仍然存在着对真善美的向往，也许家庭的不幸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我现在已经踏上了生活，生活还是充满诱惑力的，她在向我招手。

但是，我又一次失望了。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有人说，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只有在爱情里才能获得生命的支持力。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尽管我在外面受到打击，但我有爱情，爱情给了我安慰和幸福。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两天两夜不吃不睡。我愤怒，我烦躁，我心理堵塞得象爆炸一样。人生啊，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你向我展示的奥秘难道就是这样！？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有许多人劝我何必苦思冥想，说，活着就是活着，许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人生、意义，这些字眼，不时在我脑海翻腾，仿佛在我脖子上套着绳索，逼我立即选择。

我求助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但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毕竟都是人啊！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伪，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

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事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几乎成了我安抚、平复创伤的名言。我也是人。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合理的人，就象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样我也挣工资，我也计较奖金，我也学会了奉承，学会了说假话……做着这些时，我内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尔的话，内心又平静了。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象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编辑同志，我在非常苦恼的情况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潘晓 1980年4月

这封信的核心主张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从第5期到第12期，《中国青年》关于潘晓讨论一共编发了110多位读者的110多篇稿件约十七八万字，讨论主要围绕这一主张在展开。事实上，当资本登陆中国，一方面在迫使潘晓们不得不唤醒自己的个人主义以应对现实，同时，又受着原有朴素的集体主义人生观的牵绊，不得不用“客观为别人”来平衡自己内心的焦虑。其矛盾痛苦与迷茫是不言而喻的。

但也有不存在的这份牵绊的，其中，《中国青年》杂志第8期发表的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赵林写的《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一文，便把个人主义表达得淋漓尽致。赵林写道：“自私首先是一种自我发现：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意识到‘我’的重要意义。……历史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而人首先是个人，所以每个自觉到自我价值的人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就是历史’”。

的确，时至今日，已经成为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路越走越宽的赵林无不得意地向采访他的记者表示：“从《中国青年》第9期开始，‘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成了众多来信谈论的主题。”但是，记者也承认：“读者来信中有对赵林的肯定，但更多的声音是驳斥。”<sup>8</sup>

普通百姓不会像知识分子那样搞思辨，他们直接用眼见的事实来说话。有一封题为《邻居眼里的潘晓》的信，署名为“北京石月”。这封信先说“街坊邻居原来不知道潘晓是谁，一看电视才知道潘晓就在自己身边，先知其人，后闻其名，有反胃似的不舒服。”然后列举了黄晓菊的种种缺点，说她“打姥姥”、“不给姥姥吃饭”、“‘主观为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人’则还差得远”……<sup>9</sup>

正如后来出现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等政策主张一样，前一句是不折不扣地兑现了，后一句则不了了之了……

---

<sup>8</sup> 见《北京日报》2008年12月10日《1980，“潘晓讨论”，人生的窄与宽》

<sup>9</sup> 同上。

黄晓菊？她跟潘晓是什么关系？要搞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从 2008 年 12 月 10 日《北京日报》刊登的《1980，“潘晓讨论”，人生的窄与宽》一文及其相关文章中摘要来说明。

组织专题讨论，是《中国青年》抓重大思潮的传统方式。一般首先是要求编辑到农村、工厂、学校等单位调查摸底，以了解各地各行业青年都在想些什么，以此为根据再确定讨论主题。他们通过访谈发现，当时青年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很明显有一种委屈情绪；有些“看破红尘”的倾向；“一切向钱看”成了在青年中流行的口号；理想与现实反差太大，使他们的真诚和信仰像雪崩一样被冲毁；人生苦恼，找不到出路，甚至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没有什么高尚的东西，只有金钱是最好的东西等等。为此，编辑部便定下了人生观讨论的选题。

接下来的两三个月时间里，由两名编辑每天早出晚归，奔走于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各种层次的座谈会。在一次座谈会上，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引起了编辑的注意，觉得她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便向她约了稿。在同北京经济学院师生开座谈会时，学院团委书记向编辑推荐了二年级学生潘祎，说：“这个学生很灰，不久前刚自杀过，你们可以和他单独谈谈。”经过个别交流，潘祎愿意把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写出来供青年们讨论。

不久，黄、潘的稿子分别交到编辑部。据当时的编辑说：“潘祎的不能用，但其中一些语言和观点可供参考，最后见刊的那封信，人生经历和主要观点都基本取自于黄晓菊的稿子，很多话甚至是原文，潘祎的一些话也糅了进去，还吸收了一些在座谈会上听来的语言。”最后，编辑从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合成了“潘晓”这个笔名。

对于这封信，编辑马丽珍这样评价：“它实际上是一份思想典型材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青年思潮，而且基本是取材于黄晓菊的来稿，吸收了潘祎的一些语言，还吸收了座谈会听来的东西，说它是‘编’出来的不符合事实。但也不能因此说黄晓菊、潘祎就是‘潘晓’。‘潘晓’是个思想典型人物，不是一个真人，不能个性化。所以我当时就跟潘祎说过，在外面谁也不要说自己是‘潘晓’。”

由于挡不住人们想见潘晓的愿望，8月20日，在《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安排下，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播发了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这样，被《中国青年》作为一个思想典型人物的“潘晓”，被电视直播具象化为黄晓菊。结果便引来了《邻居眼里的潘晓》的信。9月23日，工人日报社的内刊《情况参考》还刊登了一封信题为《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写信人署名为“山西娘子关电厂宁翠荣”。这封信写道：“各类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面对她的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评论、吹捧，使她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恳切希望快刹住这股风，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弊多利少，得不偿失！”

甚至在同年11月26日召开的全国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针对潘晓问题还说了这样的话：“潘晓不是真潘晓，是塑造的潘晓，是两个人的信合起来的。”一些地方便据此将“潘晓讨论”说成是“《中国青年》制造的一场大骗局”，从而滋长出全盘否定这场讨论的趋向。

“潘晓讨论”风向的转变，是不是同意识形态有关呢？“潘晓讨论”过去40年后，《中国青年》编辑部编辑出版的《潘晓讨论》一书，封面上就赫然写着：这是“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真正的思想启蒙”。发表于2008年《北京日报》上的那篇“潘晓讨论”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像以往多次发生过的情形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等等，都曾经对社会的前进作出过贡献。”

那么，这是否算作发生在中国的一次“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呢？的确，由于文艺处于意识形态的顶层以及文艺所特有的形象表达属性，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是文艺首先敏锐地扑捉到了社会渴望人性，拒绝神性的普遍愿望，并成为当时人文主义者表达愿望和传播思想最主要的方式。

不过我们需要正确了解文艺复兴运动所发生的时代背景。那是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过程中，渴望有更多的贸易自由和财富增长机会的新兴商人阶层，以及被宗教束缚和迫害的知识分子（中世纪知识分子大都服务于宗教），在没有能力和条件掀起一场政治革命来推翻强大的封建势力，打破宗教束缚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文学和艺术的形式，曲折地表达对人性的自由、幸福和解放的追求（当然，这种自由和解放，还仅仅局限于思想文艺方面，还没有深入到人身真正从封建束缚中的自由和解放）。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还不能像启蒙运动时期那样，直接表达为政治的和经济的具体要求，而只能通过文学和艺术这种“虚幻”的形式，以腐败且反动的教会为靶子，提倡以人性反对神性，赞美人活着时的现实世界，而不是人死后的所谓天堂，以此来表达本阶级塑造未来世界的愿望。当时即便是为反对禁欲主义，大力倡导享乐主义，也必然表现出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面，并自然地反映出其欣欣向荣的时代精神面貌。

文学青年“潘晓”一定熟知，无情揭露和批判禁欲主义，主张人生的意义就是追求个人幸福，大胆倡导善男信女们的爱情生活，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薄伽丘的创作主题。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为反对禁欲和苦修，他甚至大力倡导享乐主义。他在自己的《十日谈》中，一方面对僧侣和封建贵族的腐朽思想和道德败坏做了深刻的揭露和讽刺，同时无情鞭笞僧侣和贵族的胡作非为，以致于达到了尖酸刻薄的程度；另一方面大力讴歌商人和手工业者等市民阶层的聪明、机智和勇敢，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大唱赞歌，极力赞赏男女青年真诚追求爱情生活的积极态度。他甚至以粗犷的笔调，公开主张男女放纵情欲的合理合法性，甚至不无夸张地描写人的情欲放纵，以此来抨击当时盛行的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

总之，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品无不反映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排斥中古教会的来世观念和禁欲主义，肯定“人”是现世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他们要求哲学“以人为

中心”，科学为人生谋福利，文学艺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教育发展人的个性。因此，他们提倡人权以反对神权，提倡理性以反对迷信，提倡个性自由以反对中古的宗教桎梏，把人从宗教束缚和禁欲主义的泥潭里解放出来，还以人的尊严。

那么，“潘晓讨论”发生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呢？一句话，资本的引入，使得无数青年精神思想陷入到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互矛盾冲突的巨大漩涡之中，既回不到原有的集体之中，也发展不出个人的自由空间，导致潘晓们“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并企图通过“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这种欺骗自己的方式来拯救自己受伤的心灵。

真假“潘晓”无关宏旨，了解当时社会背景的人都无法否认，“潘晓”在青年工人中具有代表性，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更具有代表性，因为当年的知识青年是普遍怀揣有远大人生理想的。只不过他们当时还没有条件直接向政权表达自己的夙愿，只能借助名义上的“领导阶级”——工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罢了。

知识分子们在往后的几十年里，基本上都是稳步上升的，路是越走越宽了，而“潘晓”的两位作者——黄晓菊和潘祎，他们在现实中的人生道路，却是越走越窄了……

根据 2008 年《北京日报》那篇文章中的记述：

“一夜成名”后的黄晓菊，社会活动骤然多了起来，大学生们纷纷请她参加活动，和她共同讨论费尔巴哈、萨特。厂门口每天站着陌生人，口口声声说要见“潘晓”，要和她谈人生，谈理想。这让厂里很为难。

工厂是呆不下去了。她想要到一个“书多，读书人多的地方”去工作，《中国青年》帮她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

但很快，她就发觉，在这里她并没有得到认可和接受，“我似乎是作为‘有越轨思想’的人被安置在出版社的主流之外，时刻被人‘关注’。我没有可以表现或发挥一下自己的可能，甚至没人可以交流，我不想只求一份工资或一个饭碗，我又开始不安心了。”黄晓菊说。

一次，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图书资料员的广告，她去应聘并通过了考试。“这样，我从一个‘有学问人’的地方，挪到了另一个‘有更大学问人’的地方。”在社科院当图书管理员，黄晓菊依然“个性”。

“大知识分子们”都觉得她“不太听话，喜欢自作主张，按自己认为对的办，不能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

自然而然，当所里第一次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时，她第一个被解聘。

比她小 4 岁的丈夫也离开了她。生活是现实的。生下儿子后，丈夫常问黄晓菊：“你不是‘潘晓’吗？怎么和其他妇女没两样？”

生计陷入困境，她把儿子全托，下海南、去深圳自谋生路。

1988年，黄晓菊到达海南。在《海南特区报》，除了写稿，她还要去拉广告。“我那种跟‘学问人’一起便能提升自己品质的谬想已荡然无存。”在深圳，黄晓菊作过电台热线节目主持人，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做过“女佣”。

1993年，黄晓菊结束了“漂泊”生活，回到北京，做起服装生意。她依然故我，只进自己喜欢的货，若有人不懂欣赏，她还忍不住跟人争论不休。

“我其实不是生意人，我跟他们不一样。”黄晓菊始终抵制着“已为生意人”的事实，在商十年，她甚至没有多少积蓄，“够基本生活就可以了，别人不理解，但是我心里感觉好就行，我喜欢听歌剧、喜欢美食、喜欢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有机会我还想写东西，比如在报刊上开个专栏。”在百盛星巴克，黄晓菊喝着苦咖啡，跟记者聊天。

潘祎没有读完大学，命运也更加坎坷。据潘祎自己讲，当年北京经济学院不满“思想有问题”的潘祎被塑造成全国闻名的“典型”，把他带到北京一家医院，由一位实习大夫诊断为“重型精神病”，并在潘祎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的父母签订了自动退学协议书。

1983年在编辑马丽珍的帮助下，潘祎在前门联社做起了装卸工。8月，全国“严打”开始，同去提货的司机拿了一块放在货场上的焊锡，并要求潘祎保密。9月，司机被抓，10月，潘祎被传讯，这一关就是3年。出狱后，他刷过瓶子，当过编务，做过发行。上世纪90年代后，他曾一度频繁跳槽，在许多公司做过广告部经理、副总、总裁助理。

接近2000年，潘祎做起了自由撰稿人，“他在网络上，取名‘大侠’，发表一些关于经济方面的观点。”（社会学学者）彭明榜博士说。在彭的记忆里，潘的最后一份职业是在“中华英才网”主持“老潘信箱”，“专门解答求职者和职场中人的种种问题。”

“以前，我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人生之旅。如今，在互联网上，我又与那些年龄18到24岁的年轻人继续着人生的话题。我不知道这对于我是不是一个难以打破的宿命。”潘祎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

潘祎现在何处，彭明榜和黄晓菊都在猜测。“也许出国了？他妻子在挪威。”

2018年，黄晓菊在接受《纵横》杂志采访时，把自己当年提出的“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主张重新做了解释：“‘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是当时历史环境下的思想产物，所以它当然也不是一个绝对正确或错误的概念。它存在的价值只是在当时的精神生态中，撼动了被长期禁锢的、单一的、僵化的思想体系，唤醒了人们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去认识自己的人生。所以它不是真理，也不应是所有人的行为准则。今天的精神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自我’的认知、理解更加多角度多层面，各人的人生观、价值体系，也会因各人处境的不同，形成认知的差异、趋向意义上的多元化。‘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也不再仅仅是个‘主观客观’、谁先谁后、谁主谁从的问题。它更值得探讨的是一个互相包容、互为成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态平衡问题。”<sup>10</sup>

---

<sup>10</sup> 原载于《纵横》2019年第1期上的《昔日人生观大讨论主角“潘晓”的人生之路》一文，对黄晓菊有更详实的采访，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网上搜索阅读。刊登在《读者》杂志上的另一篇文章《潘晓之问：43年后的回响》，也值得一读。——原注

她至今也没能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理解自己的人生经历。

一直希望挤进知识分子圈子的黄晓菊，最终也没有得偿所愿。当然，如果她当年继续留在工厂里，大概率也是会下岗失业，守候在北京公交车站上摇旗子。按理来说，她是个有个性，敢闯敢干又有知识的女性，尤其是在全国还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在市场经济中会走出一条又宽又广的道路来。然而遗憾的是，结果却不是这样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单纯的个人自由问题，它是整个工人阶级的处境问题。

“潘晓讨论”在当年八九月份急转直下，除了上述意识形态因素外，很可能同一起重大的沉海事故有关，即“渤海 2 号”钻井平台沉入海底，72 名石油工人遇难，直接经济损失达 3700 多万元。这是石油系统在建国以来最重大的死亡事故，也是世界海洋石油勘探历史上最惨重的 6 大事故之一。

事实上，当一名女工“挑起”的人生观大讨论眼见失控时，“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中国石油工人，却在一场人为因素导致的事故中大量遇难，新政权是要给人民有个交代的！一边是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无病呻吟”，一边是几十名石油工人冻毙深海，即便是高居庙堂之上的专制君主也不敢懈怠，漠然视之！

然而，事故发生在上一年的 1979 年 11 月 25 日，直到 1980 年 7 月 22 日，《人民日报》才向社会公开报道，足足向国人隐瞒了八九个月。而这还是在遇难石油工人家属不断举报，时任中纪委书记黄克诚的坚决干预等因素下才有的结果。

“渤海 2 号”钻井平台是中国 1973 年动用宝贵的外汇，花 750 万美元（当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约为 2:1）从日本进口的，在技术性能上，要优于大连造船厂在 1970 年自主研发生产的“渤海 1 号”。进口前已经在日本服役了五年，至事故发生时在我国也运行了七年之久。后来有文章为了开脱人为因素，用“一条不合格的钻井船，在渤海湾翻沉”的结论，将事故的主要原因推罪给了钻井平台的设计缺陷。

事故的经过，我们通过刊登在《旧报刊剪辑》上的一篇文章《1979 年“渤海 2 号”沉没真相：争论与反思》<sup>11</sup>，并参考其他相关报道和学术文章，来做个摘要说明。

1979 年 11 月 19 日，根据石油部某副部长的要求，刚刚成功打完 7B33-1 井的“渤海 2 号”，要转移到 217 公里外的 10B13-1 井位去打一口标准井，并且被要求在 12 月底之前打到 2500 米深。

惯例都是“夏天作业，冬天检修”，而且“渤海 2 号”并不抗冰，因此海洋石油勘探局提出到明年春天解冻后再打的建议。可由于当年的储量指标没有完成，喜欢搞“大会战”，不顾当时已经物是人非的石油部领导，却坚持要求“克服困难”，“迎难而上”，还荒谬地提出了“石油工人无冬天”的口号。

---

<sup>11</sup> <https://zhuanlan.zhihu.com/p/445480371>

“渤海 2 号”钻井船是自升式钻井平台，由沉垫、平台、桩脚三部分组成，为大型特殊非机动船，用于海洋石油钻井作业。按照规范，钻井平台在迁往新井位时，应卸载，使全船负有的可变载荷减到最少，下降平台，提升沉垫，使沉垫与平台贴紧，排除沉垫压载舱内的压载水，起锚，各桩脚安放楔块固定，最后由拖船拖航。

按使用规范，“渤海 2 号”在被拖航前，应该将 8 个沉垫舱中的 4 个排出压载水，减轻重量。但在拖航会议上却没人提到这一点，导致全平台总负荷增加了 2400 吨。在这次事故中遇难的“渤海 2 号”钻井队队长刘学曾提出卸掉一些可变载荷，但局里以“离岸远”，“卸载船只因风大不能起航”等各种原因拒绝，导致“渤海 2 号”可变载荷超重 351 吨，吃水极深。

为安排“渤海 2 号”迁移拖航任务，1979 年 11 月 22 日上午，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总调度室负责人主持召开了拖航会议。会前，“渤海 2 号”曾自海上发来电报，告知平台上的 3 号潜水泵落水，要求派潜水员打捞，但这个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

勘探局因担心沉垫舱上浮时挤压这个潜水泵而顶破平台，拖航会议决定沉垫舱上浮时要与平台保留 1 米间隙——这是违反规定的，沉垫舱与平台本应紧密贴合。正是拖航时没有打捞在沉垫舱上的这个潜水泵，以致于沉垫与平台之间有 1 米的间隙，两部分无法贴紧，丧失了排除沉垫压载舱里的压载水的条件。这就使得“渤海 2 号”载荷重，吃水深，干舷(船体露出水面部分)低，稳定性差，破坏了“渤海 2 号”拖航作业完整稳定性的要求，严重削弱了该船抗御风浪的生存能力，违反了该船的日本制造厂制定的《自升式钻井船使用说明书》的规定，也违反了海洋石油勘探局自己制定的《渤海 2 号钻井船使用暂行规定》中关于拖航应排除压载水的规定，不符合拖航状态的规则和要求。

不仅如此，局里还拒绝了刘学提出的“三轮并拖”请求，只派了一艘 8000 马力的“滨海 282”号拖轮独轮拖行，使“渤海 2 号”只能以每小时 4 到 5 公里的速度前行——这也是违反规定的。

事故发生前一天，即 11 月 24 日，天津、河北和山东三个气象台发出天气预报：当晚会有 6 到 7 级大风。根据规定，如果海面上有超过 5 级以上的大风，是不适宜拖航钻井平台的。但相关负责人只是将天气预报通报给了钻井平台，让他们“自己决定”。

领导明知天气不符合规定，却强调时间紧迫，让工人“自己决定”，这里面的“话外音”谁又能听不懂呢？于是，“渤海 2 号”顶着风浪，开始拖航转移。

一开始，海面上还算平静。但 24 日晚上 8 点之后，海浪明显大了起来，风力达到了 8 到 9 级。晚上 11 点 10 分，大浪已经涌上了甲板，将平台上没有卸载掉的钻杆堆、氧气瓶、打桩锤等推得到处乱滚，有的直接掉进了海里。所有人的心开始紧张起来。

凌晨 2 点，“渤海 2 号”上的警铃凄厉地响了起来——机舱泥浆泵配电盘失火了。失火的原因是甲板电缆孔在风浪中漏水，引起了短路。火苗虽然很快被扑灭，但泥浆泵却无法启动，这就意味着灌进泵舱里的海水无法排出了。

更糟的是，11 月 25 日凌晨 2 点 10 分，“渤海 2 号”甲板上的第三个通风筒被风浪从根部打断——这个通风筒在 2 小时前被打掉了筒帽，刚刚用苫布包起来。通风筒根部是一个直径 0.8 米的窟窿，海水直接从这个大洞灌进了泵房。队长刘学连忙组织人抱来棉被和更多的苫布去填这个窟窿。

此时，海水已经在甲板上形成了淹过小腿的积水，以至于在窟窿这里形成了一个漩涡，棉被和苫布一扔上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狂风巨浪的茫茫大海中，“渤海2号”的3号桩腿出现了明显倾斜。刘学只能命令所有人穿上救生衣，上飞机平台待援。

凌晨3点，负责拖运的“滨海282号”拖轮收到了“渤海2号”的电报：“通风筒进水已经无法控制，请求拖轮转向，让平台顶浪航行，以保护船尾！”“滨海282号”随即开始尝试转向，但风浪实在太太大，转向失败。

3点10分，“渤海2号”向“滨海282号”发来警报和求救信号：“我船开始下沉，赶快解缆救人！”

3点35分，“滨海282号”的船员已经看不到“渤海2号”的灯光了。“渤海2号”，这座巍然高耸的钻井平台倏忽从海面上消失。平台上的74名船员，统统掉进了11月底渤海湾冰冷的海水中。经过拖轮船员们一番努力抢救打捞，也只有两名“渤海2号”的船员获救，一个名叫王墨林，一个名叫阎学军。此后，直到天亮，在“渤海2号”翻沉的附近海域再也没有找到一个生还者，包括出动海军军舰前来搜救，捞起来的都是死难者的遗体，其余72名中国海洋石油工人全部遇难。

队长刘学的遗体是从一条底朝天的救生艇下面找到的。他用一条绳子把自己的胳膊拴在这条翻了船上。平时，由于海上安全得不到保证，大家经常议论遇难以后怎么办。刘学总是说：“我就用绳子把自己拴上，免得老婆找不到尸体。”现在他尽到了一个队长应尽到的抢险责任以后，真的用绳子把自己拴上了。

关键时刻，在“渤海2号”即将下沉之际，在一片“快救人”的混乱嘈杂声中，“滨海282号”拖轮的船长，竟“忘记”按照航海规章，立即发出SOS的国际求援信号和测定沉船船位，因此迟迟未能报出沉船的准确位置。令人气愤的是，“滨海282号”拖轮的船长在事后回答为什么不去抢救时却说，“当时被吓傻了”！而距“渤海2号”只有3海里的大庆9号油轮，只需20~30分钟就能赶到现场抢救，这也是拖轮船长后来被判刑的原因。更离谱的是，第一艘救生船在接到消息40分钟后才起航，在7小时后才到达事发地点。

事后第三天，勘探局报送给石油部的报告中，强调“突遇特大风浪”，突出了“天气突变，不可抗拒，指挥无误，抢救英勇”。如此做派，跟苏联时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中的修正主义官僚如出一辙！

材料报送到石油部，时任石油部部长的宋振明又将报告中的“相当于10级以上风力”改为“11级”。另一方面，勘探局召开表彰大会，要求全系统向“渤海2号”的牺牲者学习。宋振明签发报告，请求国务院将“渤海2号”钻井船队命名为“英雄钻井船队”，追认72名遇难者为烈士。

在宣传口径上，勘探局组织系统内的记者写了一篇通讯，题目为《渤海忠魂》。对这种“丧事喜办”的做法，勘探局党委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却遭到了其他人的批评。

《天津日报》派记者去了解，但报还是不报，领导却犹豫了：这么大的事故，死这么多人，涉及石油部，中央和市委又没有指示……《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报纸，也因为中央和天津市委没有表态，勘探局拒绝接受采访并反对公开报道，都保持了沉默，只有新华社发了一篇内参。

但是，遇难者家属的声音却是挡不住的：“什么‘渤海忠魂’？明明是冤魂！”“这是‘事故出英雄’！”同时，也有持不同意见的人站了出来。时任劳动部劳动保护局局长的章萍，表示不接受石油部关于“不可抗力”的最后定调，认为这里面很可能有管理责任。

最终，由国家经委、劳动保护局、全国总工会和天津市有关单位组建了联合调查组，重新作出了一份调查报告，直接报送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手里。不久之后，石油部被责令：进行第二轮调查。没多久，第二轮调查报告递交了上来：这是一起责任事故！

1980年5月，逐渐了解到事故内情的中央领导人开始发话了。

第一个发话的人是薄一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务院机械委员会主任。他在一次和全国总工会及《工人日报》领导的谈话中说：“‘渤海二号’沉没，死了72个工人，报纸应该登，按宪法办事。没人出来讲公道话，官官相护不好，长期这样，正气就没有了。”

6月20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在一次会议上说：“《工人日报》应该为工人说话，包括批评厂领导、部领导、国务院领导的官僚主义。”

在“渤海2号”翻沉大半年后，新华社记者夏林与《人民日报》同行合作，终于写出了披露沉船事件的第一篇公开报道。198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这一文章，题目为《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忽视安全工作，违章指挥蛮干，造成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重大事故》。

随后的一系列跟踪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仅夏林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所写的内参、公开报道，“就达13篇之多”。

8月25日，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做出的关于处理“渤海2号”事故的决定，指出事故发生后，石油部迟迟不认真调查事故的原因，不如实向上级报告情况，也没有采取得力措施处理有关责任人员，因此决定：（一）接受宋振明同志的请求，解除他石油部部长的职务；（二）主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记大过处分。

宋振明在石油部门工作38年，参加过我国第一个石油基地玉门油矿的建设，参加和领导过著名的大庆石油会战，升任石油部长时才52岁。在他主持石油部工作期间，中国原油产量突破1亿吨，迈入世界主要产油国家行列。“渤海2号”事故发生后，宋振明在《人民日报》上进行了公开检讨，并引咎辞职，此后一直怀有心结。他于1990年因病去世，享年64岁，遗愿是葬于大庆市。

9月2日，新华社发出了记者夏林采写的最后一篇报道《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判渤二事故直接责任者》，在《人民日报》一版登出，为这一轰动事件的报道画上句号：（一）海洋石油勘探局局长马骥祥被判渎职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海洋石油勘探局副局长王兆诸，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海洋石油勘探局副总调度长张德经，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四）“滨海282号”拖轮船长蔺永志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其实，跟“渤海2号”事故纠缠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个重大的舆论事件，即在发生沉海事故整整两个月后的1980年1月25日，嗅觉灵敏的境外报纸、美国纽约中文报纸《华侨日报》发表署名“魏宗国”的文章，对石油部主持签订的中日两国之间石油合作的合同作了剖析。

文章说，中日合作勘探开发渤海石油的协议中，中方和日方的报酬比例为1:1.5，而国外的合同资源国和外国投资者的分成比例一般是4:1，说明中国石油部一些官员在与日本人“做着不可见人的勾当”。文章还披露，“合同签订不到几十天，日本人已将其投资的7

亿美元，连本带利赚回来了。”文章预言，中国与日本的合作将使中国在“15年的合同期内，损失1000亿美元”。

中科院情报所的一位女士读到了这篇文章，义愤填膺，写出了万字檄文，向中央领导反映石油部的“卖国主义行径”和“铁的事实”。

信到了邓小平手里。利用外资，对外开放，究竟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渤海2号”沉船事故引发的意识形态争论，该如何定性？邓小平做出批示，“秋里、谷牧同志：请你们约集一批专家，好好论证一下”。

在“改革开放”即将成为国策的时刻，在全国向日本学习的热浪之中，却出现了“卖国主义”、“卖国贼”的指责之声，整个石油部仿佛成了被“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俘虏了的阵营。曾经“石油工人吼一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中国石油工业，其形象在全国人民面前面临彻底崩塌的危险。

1981年3月23日，一场论证会在北京六铺炕石油部大楼五层会议室举行，史称“渤海论证会”。会上，石油部副部长秦文彩用具体的数据和事实，对《华侨日报》的文章一一予以反驳。会议的结论是：与外国公司的合作不仅要继续，而且要坚持下去，甚至可以不断扩大范围。只要有利于加速我国海上石油开发，争取到更多的外国资金和技术，有利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事，石油部可以放手大胆地干。

蹊跷的是，举报石油部“卖国”的那位女士，后来却因向外国人出卖情报被判刑。

1982年2月中央决定，康世恩兼任石油部部长。“鉴于近两年来康世恩同志在石油工业部的工作卓有成效，国务院决定撤销对康世恩同志记大过的处分。”康世恩回归后，有中央领导关照：“‘渤海2号’的事情，以后不要再提了。”

青年人的内心跌入到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思想矛盾漩涡，干部陷入到了“毛派”干部与（拨乱反正）“解放”干部之间或明或暗的较劲儿之中，暗流涌动的中国80年代，就这样开启了。

# 前资本主义社会研究<sup>1</sup>

《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一、原始社会

约 2500 万年前，非洲热带雨林中出现了早期灵长类动物。根据最新古气候模型，中新世（2300 万～533 万年前）东非大裂谷的形成导致森林减少与草原扩张，迫使部分古猿下地生活。2025 年对埃塞俄比亚地层的研究证实，约 700 万年前的地质运动加速了草原生态系统形成，促使南方古猿选择直立行走以扩大视野、节省能量消耗（直立行走能耗仅为四肢行走的 25%），这种适应性改变并非基因突变的结果，而是群体行为通过数万代重复劳动形成的生物力学优化。

700 万年前的非洲，南方古猿的直立行走标志着其与猿类的分化，也是人类进化的开始。2025 年最新的基因研究表明，古人类脑容量的显著增长发生在距今约 200 万至 30 万年间，与旧石器时代工具的复杂化进程高度同步。劳动对智力的塑造具有双向性：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发现的石器工具显示，早期人类（如能人）已有意识制造工具，这种重复性劳动促使前额叶皮层发育，强化了计划能力和抽象思维。东非大裂谷出土的古人猿骨骼力学分析显示，手部骨骼构造的精细化早于脑容量爆发性增长约 50 万年，这证实了“劳动先行”的假说——即工具使用需求推动神经系统演化，而非相反。在认知层面，集体协作的狩猎行为催生了语言符号系统的萌芽。对欧洲尼安德特人喉部结构的重建表明，其发声器官已具备初步语言能力，而南非布隆伯斯洞穴发现的 7.3 万年前的几何刻痕符号，则揭示了抽象符号思维的出现。这些能力使得人类能够传递复杂经验，形成超越血缘关系的协作网络，为氏族社会的诞生奠定基础。

旧石器时代（约 250 万～1 万年前）的采集—狩猎经济是全球原始社会的共同起点。非洲的桑人、澳大利亚原住民和美洲的克洛维斯文化均展现出相似特征：以氏族为

---

<sup>①</sup> <https://bolshhevikleninists.com/2025/07/11/前资本主义社会/>

单位的游群结构，平均分配食物，石器工具以打制为主。但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技术路径分化，例如在欧亚大陆草原带，猛犸象狩猎催生了投掷武器的精细化。在东南亚岛屿，竹器的广泛使用替代了石器的部分功能。而非洲热带雨林居民则发展出利用植物毒素的狩猎技术。这种技术多样性表明，早期人类认知能力本质是环境压力与社会协作共同塑造的适应性产物，个人技能完全依赖氏族代际传递的教育体系，北京田园洞人的石器制造技术需数十年学习周期即是明证。

新石器时代（约 1.2 万年前）标志着新的开端。西亚的“新月沃地”最早完成野生小麦与大麦的驯化，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与中美洲的玉米栽培出现。农业的兴起不仅带来定居生活，更引发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土耳其加泰土丘遗址显示，早期农业聚落已出现仓储设施和宗教建筑，剩余产品的积累催生了专职祭司阶层的产生。值得注意的是，大洋洲的塔斯马尼亚人因地理隔离未能发展出农业，其社会结构长期停滞在小型游群阶段，这印证了环境对技术传播的关键影响。此时的上层建筑仍以原始宗教和习俗为主，中国半坡遗址墓葬随葬品差异极小，证明存在尚未形成制度化的阶级分化。

所谓氏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原始社会基本单位，成员通常具有共同的祖先，通过母系或父系世系联结，其核心特征是血缘共同体；所谓部落，是由两个或多个血缘相近的氏族或胞族联合而成的更大社会组织，是氏族制度的高级形态。其核心特征是文化共同体，强调地域、语言和习俗的统一。

有意思的是，氏族制度作为原始社会的普遍组织形式，在各大洲呈现出惊人相似性。西伯利亚的鄂温克族、北美易洛魁联盟和非洲班图人部落均实行氏族议事会制度，重要决策由全体成年成员共同商议。中国半坡遗址的墓葬考古显示，氏族成员随葬品差异极小，印证了“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生产关系特征。同时，良渚文化的玉器生产和两河流域的灌溉工程均需数百人协作，个体劳动完全嵌入集体分工体系。这种“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机制（如秘鲁 Caral 遗址的金字塔建造）表明，个人的劳动价值始终由社会关系定义，而非单纯的抽象的“自我实现”。这种平等主义并非出于道德自觉，而是环境压力与低水平生产力的必然选择：在平均寿命不足 30 岁、婴儿死亡率超 60% 的生存压力下，集体协作是维持种群存续的唯一途径，个体离开集体无法获取足够生存资源。而且，原始社会的知识积累（如制陶、用火技术）通过代际传递完成。考古发现显示，北京田园洞人的石器制造技术需数十年学习周期，个体的技能完全依赖氏族教育体系。这种技能再生产机制证明，个人的认知能力本质上是社会经验的具象化。

此外，现代研究表明，所谓“母权社会”更多是特定生态环境下的适应性选择，而非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母系氏族社会作为人类早期社会的普遍阶段，其核心特征是以母系血缘为纽带构建社会组织，世系与财产沿母系继承，但这一制度并不等同于“母权制”。后者特指女性全面垄断政治、经济及宗教权力的性别等级结构，而考古证据显示

母系社会多呈现平等共生性质。例如，2025 年《自然》期刊发表的山东广饶傅家遗址研究，通过古 DNA 分析证实了距今 4750 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存在典型的母系氏族结构：遗址南北墓区分别对应两个独立母系氏族，所有个体均呈现单一母系线粒体遗传（北区与南区线粒体类型截然不同），而父系 Y 染色体却高度多样化，表明男性通婚后离开原生氏族，女性则终身留居本族并主导血缘传承。然而，该遗址的随葬品数量均衡、无奢华器物，且同位素分析显示社群依赖平等分配的粟作农业，均指向资源共有、无显著阶层分化的社会形态，而非女性专制统治的“母权制”。类似的平等性亦见于人类学记录的纳西族“阿注婚”母系社群（女性掌握家庭经济但无父权式集权）及欧洲铁器时代的母系遗传线索，印证母系组织可脱离性别压迫框架存在。

金属工具的出现（约公元前 6000 年）根本改变了生产效能。青铜器的使用使欧亚大陆的农业产出激增，而秘鲁安第斯山区的土著居民则独立发展出铜器冶炼技术。生产力的提升导致两性分工固化：男性主导农耕与战争，女性转向纺织与制陶。这种分工差异源于生理特征与社会建构的双重作用——男性肌肉量平均高出女性 40%，适于高强度劳动，但 2025 年跨文化研究证实，南非桑人等采集部落中女性贡献 70% 食物供给，证明“性别优势”是否能被“利用”非常依赖具体的自然、社会环境；父权制的真正形成源于剩余产品积累引发的继承权需求，而非生理决定论。

原始社会晚期，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个体劳动取代集体劳动，私有制由此萌芽。在其中，社会分工的深化是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关键因素：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使游牧部落从农业部落中分离，游牧部落的牲畜最早成为私有财产；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使手工业从农业中独立，氏族首领在部落交换中逐步将公共财产据为己有，加速了私有化进程。剩余产品的出现进一步为剥削创造了条件，战俘不再被杀死而是沦为奴隶；氏族内部的贫富分化也日益加剧，贵族与平民的阶级对立由此逐步形成。私有制最终形成的标准包括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个体劳动普遍化、社会分工深化导致私有财产制度化、剩余产品积累引发占有关系变革。

河南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礼器表明，专业工匠阶层已从农业中分离，手工业的专业化加速了剩余产品的积累。剩余产品的积累必然引发占有关系的变革。在美索不达米亚乌鲁克时期（公元前 4000 年），楔形文字记录显示神庙开始征收农产品作为“神圣贡赋”，这实质是私有制的早期形态。中国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中，随葬猪下颌骨数量出现数十倍差异，标志着氏族成员间贫富分化的开端。值得注意的是，非洲尼日尔河畔的杰内—杰诺遗址显示，铁器时代（公元前 500 年）的社区已出现围墙建筑，这种防御需求折射出资源争夺的加剧。也就是这个时候，阶级社会在逐步形成。阶级最终形成的标准体现为剥削制度化、贫富分化加剧导致阶级对立固定化、阶级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

随着阶级矛盾激化，国家作为暴力统治机器也就产生了。原本服务于氏族公共事务的管理机构被贵族掌控，转变为镇压奴隶反抗、保护私有财产的工具。恩格斯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非社会协调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游牧社会与原始社会晚期的根本差异在于其生产方式：游牧民族依赖流动性畜牧经济，牲畜的私有化更早且更彻底，这使其社会结构更易形成军事贵族主导的等级制，而非定居社会基于土地公有的氏族共同体。

**奴隶制社会的形成：**战争的规模化是阶级社会诞生的催化剂。苏美尔城邦间的资源争夺催生了职业军队，战俘成为最早的奴隶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奴隶制并非线性发展的必然阶段：中美洲阿兹特克帝国的“花环战争”虽捕获大量战俘，但主要用于宗教献祭而非生产劳动，这表明奴隶制的形成需要特定经济基础。同时，国家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其诞生伴随着法律与暴力的制度化。汉谟拉比法典第 15~20 条明确规定奴隶买卖规则，而殷墟出土的带枷陶俑则证实了刑具的普遍使用。地中海地区的城邦国家通过公民权制度将奴隶排斥在法律关系之外，这种“人格否定”的法律建构，使奴隶制获得意识形态合法性。

**邦统主义社会的形成：**在邦统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的东亚，奴隶制并未发展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西周时期的“井田制”中，庶民以集体劳作形式依附于贵族土地，这种“众人”身份介于自由民与奴隶之间。邦统制社会的核心特征包括：土地国有制下的农村公社、专制君主对剩余产品的集中掠夺、以及臣民作为“普遍奴隶”的身份。印度种姓制度下的首陀罗阶层同样具有半奴隶性质，其形成与雅利安人征服原住民的历史密切相关。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也呈现出了这样特殊的发展路径。马里帝国的奴隶主要被用于投入王室卫队与手工业，而未被大规模投入农业生产；斯瓦希里城邦的奴隶贸易更多服务于印度洋贸易网络，这种外向型经济延缓了本地奴隶制的深化。这些差异表明，奴隶制的具体形态深受地理环境、文化传统与外部交往的影响。（邦统主义的问题会在其他文章论述，本文暂不深入）

**封建制社会的形成：**北欧日耳曼、东斯拉夫（俄罗斯）、日本、朝鲜、越南、吐蕃、埃塞俄比亚、格鲁吉亚、爱尔兰等是直接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文明。

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制社会的可能性源于特定环境与技术条件下集约化农业对劳动力的高效组织需求超越奴隶制的大规模控制成本。当气候暖湿化扩展宜耕区域时，人口增长与土地开发形成正循环，但寒冷期导致的农作物减产迫使自由农依附领主，加速土地兼并。特殊的地理条件也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相应的条件，例如北欧日耳曼部落面临冻土带开发难题，通过扈从制向采邑制转化，将公社自主地转化为领主封土，避免奴隶制低效；东斯拉夫基辅罗斯的森林草原环境限制大庄园经济，因而维尔夫公社可以经索贡巡行直接演变为世袭领地制，奴隶（霍洛普）仅占人口 5% 且从事家务；日本火山

岛导致耕地碎片化，“部民制”的奴婢难以支撑农业主体，班田崩溃后的庄园制形成武士一本百姓的封建依附。这种转型本质是环境压力下原始公社解体与军事贵族权威结合的产物，如埃塞俄比亚高原干旱促使农耕公社接受“古尔特”分封，而吐蕃高寒区通过“庸”制将牧民固着于寺院庄园，从而直接实现封建社会。

## 二、奴隶制社会

“在奴隶制下，劳动者属于个别特殊的所有者，是这些所有者的工作机。劳动者作为力的表现的总体，作为劳动能力，是属于他人的物，因而劳动者不是作为主体同自己的力的特殊表现即自己的活的劳动活动发生关系。”（《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主完全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奴隶）人身，形成“工具化”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奴隶制中“劳动者本身作为生产工具被纳入生产资料范畴”（《资本论》），奴隶的劳动力再生产仅以满足最低生存需求为目标。这种绝对支配性使得其他经济形态（如自由手工业）仅能在奴隶主特许的缝隙中存在，例如古罗马的“特许奴隶工匠”制度，其剩余产品最终仍被奴隶主用于购买更多奴隶或奢侈品消费，而非扩大再生产。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坦言：“我们不需要机械装置，因为奴隶就是最完美的工具”。像是希腊科林斯遗址出土的公元1世纪水力磨坊，因奴隶主抵制而废弃。

伊庇鲁斯战争后，罗马将整片地区人口贩为奴隶，恩格斯称其为“系统化的人肉掠夺”。这种掠夺规模在公元前2世纪达到顶峰，仅德尔菲神庙碑文便记载单次奴隶交易超3万人。奴隶生产极其浪费，它需要不断提供新的奴隶来替代受伤或死亡的奴隶才能存续。由于奴隶的生活环境恶劣，他们的自然繁殖非常缓慢，因此唯一真正的补充奴隶数量的方法是征服其他地区。

在奴隶制社会中，土地私有化和人身依附关系的萌芽会被暴力扼杀。马克思指出，奴隶制经济要求“将劳动者本身作为可移动的财产”（《资本论》第一卷），这直接否定封建制所需的土地与农奴的固定依附关系。同时，奴隶制“用锁链而非契约维持劳动，这使得任何向封建依附关系的过渡都被视为对奴隶主特权的威胁。”（《反杜林论》）例如，古罗马共和国后期出现的“隶农制”（Colonus）虽带有封建色彩，但奴隶主阶级通过法律强制将隶农重新贬为奴隶——西塞罗在《为凯基纳辩护》中宣称：“奴隶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彻底否定了隶农的人身权利。此外，奴隶主通过垄断市场（如罗马的“国家工场”制度）迫使自由工匠沦为债务奴隶，公元1世纪罗马政府颁

布《佩特罗尼乌斯法》，禁止释放技术奴隶从事独立手工业，迫使自由工匠与奴隶竞争。

这里我们要补充一点：1790年至1863年的美国南方的奴隶制经济与古典奴隶制存在结构性差异。前者深度嵌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以种植园为核心生产单位，通过奴隶劳动大规模生产棉花等商品作物，其产品直接供应英国及北方工业区的原料需求，本质上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逻辑。奴隶主将利润投入土地扩张和奴隶再生产，形成以商品输出为导向的积累循环，这与古典奴隶制“消费优先”的掠夺模式不同。尽管同样依赖暴力强制，但南方奴隶制通过市场交换实现资本积累，客观上推动了美国工业化进程，其经济逻辑已具备资本主义生产特征——尽管南方种植园为资本主义市场生产原料，但奴隶主将奴隶视为固定资产（如工具、牲畜），其“再生产”通过购买而非生育实现。马克思指出这是“资本主义表皮下的古代奴隶制僵尸”（《1857~1858经济学手稿》）。美国共产党理论家杜波依斯在《黑人的重建》中揭露：北方资本通过贷款给奴隶主获取双重利润——既收取种植园贷款利息，又剥削棉纺织工人。这种“奴隶制—金融资本”共生体才是美国工业化的真正引擎。相比之下，奴隶制经济的本质是“消费导向型掠夺”，其生产规模扩张依赖战争俘获新奴隶，而非改进技术。

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内部的民主制度本质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特权政治分配。以雅典伯里克利时代为例，公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所有官职向男性公民开放，公职人员通过抽签或选举产生，国家还为参政者发放津贴。然而这种民主仅限于约4.2万公民（占雅典40万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将奴隶、外邦人和妇女完全排除在外。

奴隶制社会也存在一种特殊的统治模式：凯撒主义（Caesarism）。所谓凯撒主义国家，是一个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化、个人独裁的统治形式的奴隶制国家。它源于古罗马共和国末期尤利乌斯·凯撒通过军事权威和政治手段颠覆共和制、建立个人独裁的历史实践，其本质上是一种阶级矛盾激化与社会转型困境的产物。凯撒主义的兴起，根植于古罗马奴隶制经济基础的危机：土地兼并导致自由民阶层破产，同时奴隶与奴隶主矛盾激化，而传统奴隶主共和制下的贵族寡头统治（元老院）无法调和阶级冲突。这时，凯撒通过军事独裁与改革政策（如分配土地、扩大公民权），表面上以“超阶级”姿态调和矛盾，实则通过暴力机器（军队）和官僚体系重构国家机器，维护奴隶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除了西欧以外，在地球上的其他地区只有在非洲西部的索科托哈里发国（1804~1903）存在过严格定义的奴隶制社会。索科托哈里发国由奥斯曼·丹·福迪奥通过“圣战”建立，全盛时期人口超1000万，奴隶人口达100万~250万。

索科托哈里发国的经济依赖奴隶种植园，奴隶通过战争俘获的非穆斯林构成（该国法律禁止穆斯林为奴，但是奴隶可以通过劳作换取皈依伊斯兰教的资格而成为自由民，甚至还有这种作为前奴隶的穆斯林进入政府高层的情况存在），奴隶们在军事堡垒（里巴特）周围的庄园生产棉花、槐蓝、可乐果、乳油木、谷物、大米、烟草和洋葱等作物，支撑国家税收、军事扩张和对外贸易。

到了 1853 年后，索科托的经济实际上依附英国。英国通过军事威慑迫使索科托签订不平等条约，要求其开放市场并降低英国商品关税，同时索科托出口的棉花、谷物等原材料需以低价优先供应英国商人。英国殖民当局直接掌控索科托的海关和关税权，将关税收入用于支付英国贷款利息，导致索科托财政自主权丧失。因此，索科托原有的“吉哈德经济”循环被英国资本打断：奴隶生产的剩余产品不再用于军事扩张或奴隶再生产，而是被英国低价收购，转化为英国工业原料，从而为英国的资本增值服务；同时英国工业品倾销摧毁了索科托本土手工业，迫使自由民沦为英国商品的消费者。至此，尽管其奴隶制形式保留，但生产目的已从维持军事—奴隶制闭环转向为英国市场提供廉价原料。1903 年索科托被英国军事征服后，其领土被并入英属北尼日利亚保护国。英国殖民当局强制推行“开放经济”政策，利用廉价工业品倾销摧毁当地手工业体系，使尼日利亚沦为英国原材料供应地，阻断其工业化路径。同时，殖民政府垄断对外贸易渠道，1954 年尼日利亚 70% 的出口输往英国，贸易顺差积累的“英镑结存”被英国冻结，剥夺其自主发展资金。

最后，我们列举一些奴隶制社会的一些主要阶级：

（1）奴隶主。奴隶主是奴隶制社会的统治阶级，其阶级本质在于对生产资料（土地、工具）和劳动者（奴隶）人身的双重占有。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定义，奴隶主将奴隶视为“会说话的工具”，其剥削方式是通过暴力强制直接占有奴隶的全部劳动产品。奴隶制的剥削不依赖市场交换，而是通过法律（如《十二铜表法》规定奴隶不得拥有财产）、暴力（监工制度）和意识形态（如斯巴达将希洛人视为“天生奴隶”）维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奴隶制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第一次大规模将同类物化为生产资料”。例如，古罗马的种植园主（latifundia owners）通过战争俘获奴隶，将其投入庄园劳动，奴隶的衣食住行完全由主人支配。

（2）奴隶。奴隶是奴隶制社会的最低阶层，其阶级特征在于人身权利被彻底剥夺，成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奴隶被排除在法律人格之外，无法拥有家庭、财产或自由意志。雅典奴隶市场的铭文显示，奴隶的价格根据体力与技能明码标价。奴隶的劳动成果全部归奴隶主，其自身生存仅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限度为限。例如，加图在《农业志》中建议奴隶主“给病弱奴隶断食”，因其丧失劳动价值。奴隶起义（如斯巴

达克起义)虽可以动摇奴隶制,但未能建立新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奴隶缺乏阶级意识,“他们的反抗是绝望的反抗,而非新社会的助产士”(《哲学的贫困》)。

(3)自由民。自由民基本上是奴隶主、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即手工业者和商人)和无产者(这里指没有土地或生产资料,主要靠出卖劳动力(如打短工)或领取城邦救济(如古罗马的“面包与马戏”)为生的群体,而非资本主义下的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在描述封建社会时有描述,因此这里不重复。

### 三、封建社会

“中世纪社会:细碎的小生产,生产机关适于个人使用,因此是原始的,细小的,效能有限的;但是因此往往为生产者自己所占有。生产是为供给生产者自己或其封建领主之直接消费。消费以外的剩余产品才拿去出卖,才拿去交换;商品生产尚在初生状态。”(《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西罗马帝国的奴隶制经济在3世纪后陷入危机。奴隶主庄园(latifundium)的扩张导致小农破产,奴隶因对外扩张停滞导致来源萎缩,劳动力短缺加剧了大庄园经济的困境。日耳曼人在匈人西迁与气候寒冷化的双重压力下南迁,加速了西罗马的崩溃。公元481年到843年,日尔曼人的一支法兰克人在西欧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的查理·马特推行采邑制,将土地连同劳动者分封给军事贵族以换取骑兵服役,形成领主—附庸关系。马克·布洛赫在《封建社会》中分析,这种“以土地服役为纽带的等级制”取代了罗马的中央集权体制。自由农民因战乱和赋税压迫,被迫将土地献给领主换取庇护,逐渐沦为农奴。8世纪《萨利克法典》规定杀害半自由民的赔偿金远低于自由民,体现了人身依附关系的法律固化。

加洛林王朝建立后,其封君封臣制度完善了封建结构。查理曼颁布《庄园敕令》,规定领主对庄园内农奴的司法权和劳役要求。农奴制度的确立创造了更稳定的生产环境:农奴获得份地的世袭耕作权,可保留部分剩余产品,刺激了农业技术改进,但需承担劳役及继承税,领主可随时收回土地;三圃制轮耕与重犁推广显著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推动农业生产力复苏。这与奴隶制下破坏性地使用劳动力的生产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封建主通过土地垄断和超经济强制(如农奴人身依附)实现剩余价值榨取。马克思以西欧庄园经济为例,指出“封建主将土地分割给农奴耕种,以劳役地租、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形式占有剩余产品”(《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种模式下,即便出现早期工商业(如中世纪行会),其生产仍受制于封建地租逻辑。例如14世纪佛罗伦萨毛纺织业中,尽管出现包买商制度,但佛罗伦萨毛纺织业的利润多用于高利贷资本输出(如向

英王爱德华三世放贷），而非用于资本积累以扩大纺织业的再生产。这反映出封建生产关系对其他经济活动的“价值导向扭曲”。

在 14~15 世纪的欧洲，封建庄园经济的封闭性与农奴制生产关系严重制约了商品经济发展。此时地中海沿岸兴起的城市工商业打破了自然经济结构，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商人通过远程贸易积累起货币资本，形成早期资产阶级雏形。

地理大发现引发的殖民掠夺完成了原始积累。西班牙在美洲开采的银矿使 16 世纪欧洲白银存量增长五倍（《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价格革命导致西欧实际工资下降 40%，加速了土地贵族向资产阶级转化。18 世纪英国议会通过系列《圈地法案》，至 1800 年约半数耕地被圈占为牧场，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描述的“羊吃人”现象，正是马克思强调的“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编年史”的原始积累过程（《资本论》第一卷）。同时，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使棉纱日产量提升近百倍，彻底变革纺织业。1835 年英国铁路里程达 471 公里，形成全国性市场。这种“劳动资料转化为机器体系”的过程（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物质技术基础。

此外，随着海外殖民扩张和国内市场整合，区域性方言逐渐演变为标准民族语言，印刷术的普及强化了文化认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促使“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地区结合为具有统一政府、统一法律的民族”。荷兰联省共和国通过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八十年战争（1568~1648），将商业资本积累与民族意识觉醒相结合，建立了首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与此同时，绝对君主制的建立成为这一转型的政治枢纽。16 世纪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王权通过“朕即国家”的集权政策，瓦解封建领主的军事特权，建立常备军和官僚体系。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中表示绝对君主制是“王权依靠市民摧毁了封建贵族的权力”，这种新型的国家机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它统一度量衡、废除内部关税、对商业航行的保护等，使全国性的市场得以形成。另外，如英国都铎王朝通过宗教改革没收教会地产进行拍卖的行为，加速了土地资本化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绝对君主制是欧洲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中央集权政体，其本质是封建贵族和新兴城市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的平衡上（这种阶级力量的平衡使绝对君主制具有内在脆弱性），对过去封建割据的逐步瓦解。例如，法国路易十四通过《南特敕令》废除贵族军权、建立常备军，并通过重商主义政策扩大税基。在过去的典型封建制度下，贵族通过等级会议（如法国三级会议、英国议会）享有分权制衡的协商机制，形成统治阶级内部的有限民主，而绝对君主制将权力高度集中于君主，虽在短期内强化了国家机器，却因剥夺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权而激化了矛盾。当资产阶级

经济力量壮大后，必然要求自己掌握政治权力，从而容易导致政权更迭，而法国大革命便是明证。同时，君主为维持集权与战争（如路易十四时期国债达 30 亿铊），加剧了财政危机和阶级对立。这种集权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像是英国都铎王朝《航海条例》即为保护商业资本。

除了西欧的“典型封建模式”外，日本的封建制度也提供了与西欧并行的典型案例。中世纪日本的社会基础同样是细碎的小生产单位，德川幕府时期约 70% 的土地被大名领主占有，25% 为幕府将军直辖，天皇与神社仅保留不足 1.2% 的土地，农民则被束缚在平均不足 5 反（约 7 市亩）的份地上，以实物形式缴纳高达 60~80% 收成的年贡。这种剥削模式与西欧庄园劳役地租本质相通：剩余产品首先满足领主消费，仅有少量进入交换与流通。日本庄园制的发展始于奈良时代对唐代邦统制下的均田制的模仿失败，天皇政府在 743 年《垦田永世私财法》承认垦荒土地私有化，催生了类似西欧的封建领地。但日本庄园通过“寄进”形成了独特的等级结构：在乡领主将土地进献给权贵（领家），领家再进献给皇室或摄关家（本家），构成“预所—领家—本家”的垂直依附链，维系这一体系的是年贡的层层分割。

到了 16 世纪末，丰臣秀吉推行“检地政策”，确立“二公一民”税制（农民保留 1/3 收成），使小农获得较稳定的生产预期，刺激了肥料使用与水利建设。这与加洛林庄园农奴份地世袭化的作用类似，但日本的地主—佃农制也有和西欧封建制不同的地方：新兴地主虽掌握全国 1/3 土地，法律上仍从属封建领主，其剥削所得常转化为高利贷资本而非生产投资。德川幕府为维护封建基础，1643 年颁布《禁止土地买卖令》，并多次强制外出务工农民返乡，阻碍了劳动力的商品化。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指出日本存在“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其领主世袭特权与西欧庄园制本质相通。日本的封建制度形成了“天皇—幕府—大名”的重层权力格局，天皇作为宗教象征缺乏实权，幕府将军虽掌控国家机器却无法完全压制地方势力，而大名则在其藩领内拥有独立的军事、司法和财政权，甚至能世袭领地并豢养效忠于私门的武士集团。这种分权催生了日本贵族等级内部的协商机制，例如江户幕府的重大决策需通过“老中会议”协调亲藩、谱代、外样三类大名的利益，而藩政改革时期长州藩的“村田清风体制”更允许中下级武士参与藩政讨论。同时，权力分散使统治者难以独断专行：1701 年赤穗藩主被幕府处死后，其家臣为履行对藩主的忠诚义务，不惜违抗将军法令刺杀幕府重臣，此事也凸显武士的效忠对象分散于多重领主，这种法律与伦理的“冲突”本质上也源于封建社会权力结构的碎片化。

日本社会的商品经济的突破性发展出现在锁国末期（19 世纪初）。畿内地区因棉纺织业扩张导致粮食短缺，农民普遍“购米售棉”：大坂平原农村从北陆、九州购入大米，同时向江户输出棉布，形成跨区域贸易网络。濑户内海地区人口在 19 世纪增长 1.4

~1.9 倍，长州藩等地的中下层农民也卷入商品生产。手工业方面，足利棉织工场已拥有 30~200 台织机，桐生丝织业带动人口百年内增长三倍，全国雇佣 10 人以上的工场从 1854 年的 300 所增至 1867 年的 400 余所。这种工场手工业虽具资本主义萌芽性质，却受封建价值体系扭曲：商人利润多用于购买武士身份或土地权利，而非扩大再生产。正如大坂商人贷款给大名的年利息相当 300 万石大米，远超过工商业积累规模。

到了近代，日本封建制度的危机因内外压力加剧。1837 年大盐平八郎起义号召“平均世道”，四万人参与的近江暴动摧毁土地清册，显示农民反封建斗争的高涨。同时，西南强藩通过“藩政改革”局部突破旧制度：长州藩 1838 年减免租税、采用洋枪并奖励西学；萨摩藩发展琉球贸易与蔗糖专卖，建立西式海军。这些改革虽以“富国强兵”为名，实则推动地方经济自主化，为倒幕运动奠定基础。当美国佩里舰队 1853 年叩关时，建筑在年贡剥削上的幕藩财政早已崩溃。19 世纪 40 年代幕府年均赤字 70 万两金，萨摩藩负债达 500 万两，封建制度最终在内外夹击下被瓦解。

最后，我们列举一些封建社会的一些主要阶级：

（1）农民阶级。农民阶级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通常拥有或部分拥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如自耕农），或租种他人土地（如古代的雇农）。农民阶级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小规模生产，经济形态以自给自足为主，很少参与市场交换。

农民从来都没有过充当一个独立的革命阶级的作用。农民，就其客观利益来说，是社会革命的力量，但政治上分散的和软弱无力的，没有能力组织自己的政党。农民的劳动方法相同，但是他们的劳动方法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每一个农民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农民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农民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因此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纯粹的农民起义的结果都是被镇压而失败或是用新的前资本主义王朝来重建过去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农民才能起到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农民内部分不同的阶层（关于邦统制村社成员和邦统国家佃农，我们已经在论述邦统制社会时论述过了），如雇农、贫农、中农和富农。雇农在古代是农民阶级中的无产者阶层，近现代是工人阶级，贫农则是半无产阶级（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半无产阶级包含贫农、小手工业者、小贩等，其特点是有极小生产工具但需出

卖部分劳动力。”），中农、富农则拥有自己的土地，在近现代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贫农很容易堕落到雇农的地位，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天然盟友。富农有成为地主或是资产阶级的潜力，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他们容易支持资产阶级。中农则是一般的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会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摇摆。

在封建社会中，主要的生产者农奴，其阶级地位体现为对领主的人身依附与半自由状态。农奴可拥有工具、家庭和份地使用权，但不得离开领地。英国《末日审判书》（1086年）记载，农奴需缴纳“继承税”才能延续份地耕作权。农奴需无偿为领主耕种直领地（demesne），并缴纳各种杂税（如磨坊使用费）；领主法庭可对农奴处以体罚（如砍手）、罚款或监禁。13世纪法国博韦地方法规规定，农奴未经许可结婚需缴纳“婚姻税”。另外，农奴逃亡（如德国“空气使人自由”法谚）和起义（如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也可以推动封建制瓦解。恩格斯指出，农奴制被破坏后，“进入历史的第一个资本家阶级是由被解放的农奴组成的”（《反杜林论》）。

（2）封建主阶级。在封建制度下，领主通过采邑分封获得世袭领地和司法特权，其权力并非完全源于君主的授予，而是基于封建契约形成的双向义务关系。例如，领主需向君主提供骑士武装和赋税，而君主则承认领主在封地内的自治权，这种关系使封建领主能够与君主形成某种制衡，从而出现了“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权力分层结构。因此，封建制下的权力结构是网状分权的，君主、领主、教会共同构成了制度上的多元平衡。

封建领主与教士阶层共同构成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双重支柱，其权力根基在于对土地的垄断性占有与宗教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赋予。封建领主通过采邑制将土地分封为世袭领地，农奴被束缚于土地之上，以劳役地租（如每周三日为领主耕地）、实物地租（收成的三分之一）和货币地租（如英国“盾牌钱”）等形式被剥削剩余劳动。领主不仅掌握经济权力，还通过庄园法庭行使司法特权（如初夜权、遗产税），形成“司法权与土地权的合一”（马克思《资本论》）。作为封建主阶级的神权代表和大地主，教士阶层本身即拥有并管理着大量教会土地并征收什一税，将神权与地权紧密结合；他们运用宗教教义与仪式，系统地论证封建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将其塑造为“上帝意志”的体现，从而为整个封建主阶级的统治提供关键的精神支柱和意识形态合法性保障，并通过垄断教育、婚姻与丧葬仪式实施精神控制。同样作为封建主阶级武装力量核心的骑士阶层，本质上是领主土地分封制度下的军事附庸，其基础在于领主的土地授予和农奴劳动供养，职责是提供武力保护并维持封建秩序。领主与教士的联盟在十字军东征中达到顶峰：骑士阶层作为封建主阶级的军事延伸，以宗教战争名义进行领土扩张，教会则借机攫取东方财富。但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瓦解了这一体系。货币地租的普及使农奴得以赎

买自由，城市行会的兴起挑战了领主的司法垄断，宗教改革则打破教会的精神独裁，最终催生了“脱下袈裟的资产阶级”（恩格斯语）。

（3）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手工业者（例如行会师傅）、小店主、自由职业者、上述的资本主义中的中农和富农、小工业家、小商人等，都是小资产阶级。正如列宁所说：“小资产阶级包括小生产者、小业主，其经济地位介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小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此外，列宁还说：“小资产者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种双重地位决定了他们的动摇性。”（《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在封建社会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手工业者和商人。其具体组织形式是封建行会（手工业者和商人的职业组织），其内部关系以等级制（师傅、帮工、学徒）为核心，而非基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或剥削关系。行会师傅拥有作坊、工具和原材料，同时以家庭劳动为主，可能雇佣少量帮工或学徒，但剥削程度有限（学徒以学习技能为目的，而非纯粹剩余价值剥削）。如马克思所说：“行会师傅对帮工和学徒的关系，不是资本主义式的剥削，而是一种宗法关系……学徒和帮工与其说是为了工资，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将来也能成为师傅。”（《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二章）另外，行会师傅受封建行规束缚（如产量限制、价格管制），缺乏资本积累的条件。

# 中国 社会 史 纲

(一至三)

《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一、亚洲“邦统主义”<sup>1</sup>

在全世界的历史学、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中，一直潜藏着一种隐秘但影响深远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东方主义”偏见。这种偏见的表现形式，通常是机械地将西欧从古典奴隶社会，经封建社会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模式，简单地套用于亚洲地区，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明，忽视了这些地区在社会经济结构（生产关系）、政治组织形式、文化传统以及生态自然条件等方面与欧洲存在的巨大差异，导致了对亚洲历史演进机制与发展轨迹的根本性误读。这一误读不仅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受限于历史资料而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等命题之中，也体现在现代主流历史学界长期默认的叙事框架里。这种叙事框架倾向于强调欧洲社会历史的普遍性，将西方的城镇化经验、阶级斗争模式、生产关系结构变迁规律视作全球历史的普遍样板，却鲜有反思性地注意到亚欧大陆不同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阶级结构演变路径的实质差别，以及由此造成的理论适用性的缺陷。

诚然，实践唯物主义所倡导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即通过历史史料与具体物质条件的分析，客观地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以现在来看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方法论在正确使用时必须能有效揭示社会内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动态演变。然而，机械地套用欧洲历史经验、忽视具体历史环境与生产方式的差异，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本身明确反对的。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必须以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为基础，以对特定区域的历史资料深入研究为前提，以充分尊重各地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为原

---

<sup>①</sup> <http://v2.redchinacn.org/post/60522>

则，而非拘泥于某一具体地区的经验，尤其是在面对亚洲与欧洲在自然条件、人口结构、农业形态、国家治理模式等方面存在根本性差异时，更需要细致入微的地区性研究视角，避免盲目套用。

因此，本作的研究目的与核心主旨即在于明确这一问题，并运用真正符合唯物史观的方法，通过详尽且深入的史料分析和跨地区比较研究，重新审视和构建适合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社会结构演进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本作不仅要清晰地界定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提出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命题的适用边界，更要结合丰富的中国历史史料，具体说明为什么亚洲社会演进轨迹无法被简单纳入西欧社会历史演变模式的框架之中，并由此重建一种更为科学、辩证、符合历史真实的关于亚洲社会演变模式的解释框架。这一新框架将通过对中国古典和中古时代以及近现代史具体历史实践的重新分析，深入揭示亚洲历史发展的特殊逻辑和内在机制，从而为纠正长期以来理论界与学术界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提供坚实有力的理论批判和实践依据。

### 亚洲的邦统主义<sup>2</sup>模型概述

东西亚的人口核心区域与大部分东地中海地区（以现代中国地区与西亚的黎凡特、伊朗高原等历史地区为例）同西欧具有截然不同的古代社会结构与演变路径。与经历过古典城镇化衰退并进入封建割据状态的西欧不同，东亚与西亚在古典时代长期维持了以跨区域贸易网络、持续兴修的基础设施与水利工程为基础的“邦统主义社会”形态。这种状态的产生与其自然环境、农业生产条件密切相关。以中国的周朝时期和西亚的新亚述帝国时期为例，这些地区农业土地资源较少，地形以丘陵或混合型半荒漠为主，水资源分布不均衡，且大部分地区缺乏良好的降水条件。因此，从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七世纪，这些地区的普世帝国都采用统一徭役或劳动税形式，动员劳动力，以半无偿劳动大规模修建和维护水利设施和道路网络。

所谓邦统主义生产方式，是皇权主导下官僚乡绅复合剥削体制。这种体制建立在土地有限私有制基础上，即土地名义上归皇帝所有，但实际占有和使用权由乡绅阶级掌握。皇帝通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识形态宣称其拥有最终的所有权，而乡绅阶级是掌握着土地收益权，这种权利始终受皇权制约——国家随时能以征税、抄没或强制迁徙等方式干预土地关系。这种所有制形式既不同于西欧封建领主世袭的完整法权（即财产权力和政治权力的统一），也区别于资本主义下受法律保护的绝对私有产权。

---

② 这类城镇在大一统帝国体系中具有高度复合功能：一是作为中央对地方的行政延伸（郡守、刺史体系）（这就是所谓“邦”）；二是作为地区级物资调度中枢，三是手工业集中区（如长安西市与洛阳东市），四是兵源与粮草的集散地（这就是所谓“统”）；所谓“邦”，就是强调城镇作为经济、政治中心和枢纽的重要作用；所谓“统”，就是指国家对经济进行的统筹。——作者注

该社会的统治阶级呈现三元结构：乡绅阶级是土地的实际控制者，通过租佃制剥削农民获得地租。皇权作为地主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以城镇为枢纽建立统治体系：都城和州府城镇驻扎官僚机构，通过郡县制向农村征税征役，同时利用城镇的商业网络（如运河码头、市集）调配粮食布匹等物资。官僚集团由乡绅子弟通过选拔制度（例如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进入城镇任职，既执行皇命镇压农民反抗、抑制豪强兼并，又暗中庇护本族地产业务。当城镇物资集散功能因官僚腐败或战争瘫痪时（如明末驿站废弛），皇权便丧失对农村的控制力，最终与乡绅阶级共同倾覆。这种三角依存关系始终以城镇为运转节点，维持着帝国对广大农村的吸血循环。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文献中常见的“食邑”是皇权赏赐功臣的经济特权，受封者仅从指定城镇的税收中按比例抽成（如汉代列侯享封户租赋），无法直接干预地方行政。“封邑”在周代近似独立封地，诸侯以城池为中心控制周边农村，但秦汉后虚化为荣誉头衔（如唐代亲王食实封仅领钱帛）。真正的封地仅存于周代，诸侯在封地内全权掌控城镇军事、税收及官僚任命（如晋国曲沃）。三者本质都是通过控制城镇节点获取经济利益，但皇权越强，受封者对城镇的实际控制权就越弱。

乡绅阶级为应对黄河水患、草原威胁等自然环境压力，必须将其政治权力托付于皇权，使得皇权可以通过城镇枢纽跨区域征调徭役和粮草，而这却常迫使官僚强行摊派乡绅掌控的农村资源（如征用佃农修河工），侵犯乡绅局部利益。城镇的官僚又为完成中央税收任务，还需打击乡绅瞒报田产行为（如丈量土地）。这种因公共工程和集权财政引发的冲突持续两千年。皇权以城镇驻军和官仓为支点，通过选官制度将地主精英吸纳进城镇官僚体系，既利用其管理能力又削弱地方割据，形成常态化表面上“超阶级”的统治。当城镇控制力衰退（如驿站荒废），其对抗便演变为王朝崩溃。邦统制社会的被统治阶级主要由法律身份自由的农民构成，包括缴纳高额地租的佃农、承担国家赋役的自耕农以及短期雇农，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例如商人、手工业者等），此外还有一定量的用于官府手工业、公共设施修建使用的奴隶。当然这不是全部，任何一种前资本主义社会都是错综复杂的，所以邦统制社会中也会存在奴隶主、封建主、农奴、手工业工厂资产阶级、手工业工人阶级等各种阶级。

这种生产方式的核心目标是维持皇权主导的帝国有机体存续与扩张。在此目标统摄下，其他生产关系均被改造利用：商周奴隶制被转化为官府作坊的工匠体系；西周封建制经郡县制改造后，诸侯变为无实权的税收代理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则被重农抑商政策扼杀，商人沦为朝廷财政补给源。在邦统主义社会，整个社会经济活动都服务于榨取资源供养官僚军事机器。东亚邦统制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超经济强制的弱化。农民虽受沉重剥削，但享有人身自由和迁徙权，不存在农奴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更重要的是土地所有权与政治统治权的分离——地主仅有经济收益权，行政司法权

则归属郡县官僚。这种分离使中华帝国能建立覆盖全国的资源提取网络：城镇作为关键节点，既是官僚机构驻地（郡守刺史体系），又是物资调度中心（漕运枢纽）和手工业聚集区（长安东西市），形成连接中央与乡村的吸血管道。黄河泛滥、草原威胁等常态化地理危机，则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必要性，使国家机器获得永久性超阶级地位。

相较于工人国家，该体制的本质差异在于其寄生性。工人国家的指令性计划经济通过国有化生产资料和指令性生产追求工业化发展，而中华帝国的国家干预（如征发徭役治水）仅为维持统治稳定。皇帝可以随时摧毁乡绅的财富（如朱元璋打击江南豪强），致使起资产积累无法持续；官僚与乡绅的相互制衡虽为系统提供弹性，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扼杀了生产关系根本变革的可能（不过邦统主义社会仍然有自发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这一点是后文要论述的）。当官僚和乡绅所进行的土地兼并导致剥削过载时，农民起义便成为让邦统制重新恢复运作的出路——旧统治集团被清洗后，新王朝又在相同结构上重建帝国机器。

此外，西亚的亚述帝国通过省级行政体系协调劳动力兴建输水管道、灌溉沟渠、蓄水池等基础设施，具体如新亚述时期尼尼微周边运河灌溉系统。而东亚的周朝也同样通过诸侯国行政体系，由地方诸侯统一调配劳动力，建设灌溉水渠和蓄水池，其中著名的郑国渠和芍陂水利工程即肇始于春秋晚期与战国早期。

然而，在帝国中央权威衰落与人口激增压力下，西亚与东亚的社会发展路径开始明显分歧。新亚述帝国由于人口与民族压力急剧增加，农村公社经济体系超负荷运作，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与经济闭锁化，各城镇贸易税收锐减。公元前 612 年尼尼微被巴比伦与米底联合军队攻占后，导致亚述帝国迅速崩溃。考古证据显示，在此后一百多年，黎凡特地区的农村公社定居点明显减少，人口流动性增强，由楔形文字支撑的复杂知识体系和官僚制度迅速崩溃，而腓尼基文明的继承者阿拉米语系与其他闪米特系族群逐渐向两河流域与现代阿拉伯地区渗透，促成当地居民迅速游牧化，城市规模缩减，城市之间的贸易网络大幅退化，这一趋势直到波斯帝国时期才逐渐逆转。

相比之下，东亚的华北平原虽然也面临人口压力，但农业生产条件更为优越。黄河泛滥虽然周期性摧毁作物，但同时也为下游土地带来了肥沃的淤泥层，保证了土地生产力的长期可持续性。因此，即使在周王室权威衰落、诸侯纷争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地方城镇仍能维持一定规模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贸易网络未曾真正中断。以齐国临淄为例，春秋晚期即达到城镇人口约 30 万的规模，战国时期更因商贸繁荣与手工业发达成为当时东亚地区最大的城镇中心之一。与黎凡特地区分崩离析不同，中国的邦统制生产关系被持续保留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西亚地区在亚述崩溃后虽曾经历短暂的城镇衰落，但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通过引入来自伊朗高原的域外资源迅速重新恢复两河流域的经济与行政中心城

市。考古资料显示，波斯王朝对原有的亚述行政体制进行了改进，设置省治理方式，通过波斯御道这一跨区域道路系统重新串联起区域贸易网络与行政中心，如埃克巴塔纳（今哈马丹）、帕萨尔加德与苏萨等，保障了西亚地区的城镇网络与贸易体系的恢复与发展。

这种跨区域城镇网络与中央行政体系，也在后来东罗马帝国早期（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堡建城后）延续下来。君士坦丁堡作为新的帝国中心，通过大规模的公共建筑计划、道路建设和城镇居民赋税制度，进一步巩固了以城镇为行政与经济节点的邦统制帝国结构。据史料记载，君士坦丁堡在五世纪人口即达约 50 万人口规模，其城市建设明显承继了希腊罗马时期的市政传统，并结合东方行省的行政经，构筑了一个统一而高效的官僚体系与跨区域经济体系。这与西欧进入封建化阶段后，小规模、分散化的城堡-村镇结构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整个古代的巴尔干山以南的希腊地区都绝非刻板印象中的“欧式社会”，而是类似于亚洲以城镇商业和政治中心为基础建设的“城镇化集群”社会，它以城镇的贸易与文化繁荣所带来的物质需求支撑农业发展。同样，无论是希腊的黑暗时代还是西南亚混乱时期的大崩溃都来自于内乱或域外势力入侵所导致的基于和平时期稳定物质需求的发展体系崩溃。

## 二、“亚细亚制度”与“奴隶制社会”之迷思<sup>3</sup>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的历史学环境影响下曾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这一概念，认为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历史中一个特殊的生产方式，以农村公社为國家的基本社会组织。同时，村社的自给自足是指村社作为封闭经济单元，通过内部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实现基本生存资料的自产自用，形成“无外部交换的自然经济”；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管理农村公社，指挥农村公社来进行大型工程的建设，其特点是土地国有，不允许自由转让，以及政治领域的极端专制化和自上而下统治体系在和平时期的表面上的高度稳定性。

然而，马克思在提出这一观点时，受到 19 世纪中期欧洲殖民视野和片面的东方学资料的限制，特别是关于亚洲社会的第一手史料极度缺乏，故而未能充分理解东亚社会内部真正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以中国周朝时期为例，传统被认为属于所谓“亚细亚制度”的典型：一方面以血缘和宗族纽带组织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中央专制政权统领下的巨大社会工程和公共劳动。然而细致的历史分析表明，这种描述是一种误读。

周朝前中期的农村自治单位——“邑”或“里”，但绝非后世所谓的封闭宗族共同体或单纯的中央政权工具，而是具备丰富社会职能的、乡绅阶级主导的基层自治组织。

---

<sup>3</sup> <http://v2.redchinacn.org/post/60978>

周朝前中期统治范围内的城镇外地方农村公社虽然存在以血缘与相同姓氏为纽带的农村自治单位，但这些单位的概念与现代人所了解的，中国近现代时期的宗族完全不同。商周与春秋早期居民间“沾亲带故”的村社制度实际上是一种集司法、裁判、财税与祭祀等古典时期最重要的政治行为为一体的权力监督和权利保障机构；周朝村社中的庶人与士人阶层享受广泛的个人权利，如私有财产权、共同祭祀权、对等议事权等等，这与近代观念中不仅等级森严且取缔了古典村社议事机制的宗法社会样貌是完全不同的。《周礼·地官》详细记录了基层的议事制度、土地分配制度和赋税制度：

“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职，以令地贡，以敛财赋，以均齐天下之政。”

这充分表明自周朝其中央政府土地政策与地方治理单位的联盟关系与物料往来的互利需求，同时暗示了地方村社的自治性与共同参与决策的机制。事实上，所谓“中央集权的水利大工程”这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重要特征在周朝时期的实际情况并非如马克思所假设那样由单一专制政权掌控。举例而言，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水利工程，如郑国渠、都江堰等，都是由地方诸侯或民间力量主导、建设并维持的，并未出现统一中央强制性垄断的劳动力调配与工程管理情况。地方和中央的互动关系更接近一种分权与协调模式，而非单纯的中央暴力驱使。

在皇朝中后期，新亚述帝国与古代中国的周朝都经历了因殖民与征服外族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入与垦荒带来的农业生产力大为增长。这一阶段是西亚的社会形态与东亚的社会形态发生长约数百年的分歧的阶段。在黎凡特，由于民族矛盾与人口激增带来的农村公社经济超负荷运作，亚述帝国赖以生存的低粮税、农村公社间实施相互贸易的经济体系难以为继，其贸易体系内的各个城镇与农村愈来愈倾向于保护主义的封闭态度，导致商业税收收入同样骤降；亚述帝国中央政府不断增税、扩大对外战争以加大掠夺、缓解经济危机，但其内部统治矛盾却随着官僚—军队内斗与民族冲突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公元前七世纪亚述帝国的内战与崩溃——在这和周朝晚期为同一时代。考古数据显示，尼尼微和亚述其他重要城市在公元前 610 年代的新亚述帝国大崩溃后迅速衰败，人口锐减近 80% 以上，大量农业定居点在随后百年内彻底废弃（例如尼尼微、卡尔胡、乌尔以及摩苏尔和哈特拉地区的广大定居城邦）；公元前 700 年尼尼微约有 15 万人，到公元前 612 年毁灭后不足 2 万人，凸显了其城镇经济与社会结构脆弱性。由于黎凡特地区许多受益于水利设施的耕地在公元前 9 世纪至亚述帝国崩溃的这一期间已经因为水土流失和过度扩张导致土地荒漠化严重，肥力基本消失、完全依靠水利系统维持耕种，帝国的崩溃和人口流失也导致了水利设施彻底无法维持，黎凡特许多沙漠和丘陵地区的农业

公社定居点在一夜之间废弃，其居民迅速游牧化，导致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黎凡特本土民族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帝国。巴比伦帝国仅仅持续了数十年便轰然倒塌，尔后建立起的波斯帝国则完完全全通过两河流域外伊朗高原的势力才得以统一该地区。

然而，与此同时的周朝虽然同样经历了同样的因人口增长和农村生产压力激增导致的城镇贵族和周人主体民族城镇农业生产定居者之间的矛盾，并导致了若干起暴力冲突，东亚的自然条件却避免了生产活动因为中央政府权力崩溃而随之荒废。东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华城镇发展趋势与西亚恰恰相反。齐国临淄、楚国郢都等大型城市在公元前6至5世纪人口已超越30万甚至更多，《史记·苏秦列传》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大量手工业、贸易和农业生产交织在一起的城镇中心兴起，证明中华地区并未经历亚述式的城镇与经济结构的全面崩溃。究其原因，正是因为中华地区分权的诸侯一村社自治与中央帝国协调兼容的治理模式，使得生产网络与贸易流通网络长期得以维持，而非中央专制单方面垄断资源——这是由中国独特的自然资源环境所导致的。在华北，一年多次的黄泛虽然破坏了农业产出稳定性，但也保证了黄河上游的淤泥源源不断被冲刷至下游，并带来几乎用之不竭的高肥力土壤，因此各地区虽然依赖水利设施辅助控制黄泛灾难、协调水流与商品运输，但这些设施在古典时期并不对农业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和自然条件本身起决定性影响。同样，与黎凡特地区的沙漠平原、较为平缓的丘陵及运输水平更加良好的道路不同，由于华北平原四周密布的丘陵、山脉与河流网络所造成的小区域地方实力派政治中心影响半径较大、影响力较强，而大块中央统治中心影响半径较西亚而言更小、更难以深入地方，因此在各地区性诸侯国完成垦荒与拓殖后，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较为自主的古典城镇中心，集官僚机构、手工业与附属的农业生产地区为一体调配地区性贸易、农业与行政，周天子的中华帝国再以这些副中心为基础构建其全国统治模式——这与西亚更小面积下的多民族帝国更加紧密联系的各大地理区块是完全不同的。得益于不断建设的贸易网络与更高的人口密度，单一周朝诸侯国所能协调与控制的地区规模也超过了古典时期的任何欧洲或西亚城邦。这种半城镇、半农村生产的诸侯国形式是所谓的“春秋封建时代”的真正样貌，史料也证明，几乎所有这一时期的割据政权都具有这种邦统制结构的状态，春秋时期的国家吞并也只不过是较小的、无法实现区域流通自给自足的诸侯国被较大的邦统制结构整合的过程，这同后来西欧的封建主战争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综上，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在于它的方法论，而非具体结论本身。列宁在评价马克思的理论时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绝非教条式地强行套用于每个民族和社会，而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马克思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初衷是为了解释他所能掌握的有限东方历史材料，而非一种放诸四海皆准的理论——早期科学社会主义者们根据片面、残缺的历史资料得出的所谓“中国与亚洲的王朝是具有东方

专制主义的亚细亚制度”的这一结论，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仔细探究，完全不符合周朝时代这一邦统主义的社会面貌，而这一所谓“中国拥有其独特的东方专制主义亚细亚制度，因此难以产生资本主义社会萌芽”的荒谬结论同样不适用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朝代，本文随后也会提到。

另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误读下形成的迷思是“中国曾存在过奴隶制社会阶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古代奴隶制国家以奴隶劳动力为基础，生产物资皆为奴隶所制”。然而这种奴隶制社会的特征与实际的中华古典社会情况截然不同。同古希腊城邦联合体、亚述帝国等完全不同的是，中国的统一中央政府治下从来没有出现过奴隶制社会（不包括现代中国领土边缘地区的古典文明）。奴隶制社会的判断标准是一个社会是否经历了绝大多数生产生活由奴隶完成的阶段，以古典时期的希腊文明为例，绝大多数古希腊城邦的奴隶（商品化自然人）与公民（享有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自然人）人口比例是十比一，绝大多数劳动由商品化的奴隶完成，且具有以奴隶为基础的资料交易市场，例如雅典公元前5世纪末约有40万奴隶人口对4万自由民。

然而，根据现代的考古显示，二里头遗址（夏朝）出土的青铜器以礼器、武器为主，农具则主要是石铲、骨铲，而非青铜制作的。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了3450件石镰，同时仅出土了少量青铜镰（汉阳纱帽山出土）。石制、骨制农具效率低下且易损，无法支撑奴隶集体劳动的规模化生产，而小农的精耕细作更适应这种低效的工具，且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指出，奴隶制的大规模发展需铁器普及以提高剩余价值榨取效率，这说明在中国古代，奴隶未主导农业。可见，古代文献中从事农业的“民”“黎民”“众人”并非完全奴隶，而是保留氏族组织的村社成员，需集体耕种“公田”并纳贡。《孟子·滕文公上》载“夏后氏五十而贡”，指每户耕50亩后向贵族纳贡赋；商代甲骨文记载的农业生产者多为“众人”，如“王大令众人曰协田”（《殷墟书契前编》），表明了是这些农民集体耕作，而非奴隶集体耕作；《诗经·小雅·大田》中“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反映周代的村社成员（庶民）是先耕公田再耕私田的。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卫盂铭文记载土地交易，但“田里不鬻”原则限制土地的私有化，维持小农生产。同时，《周礼·地官》载“遂人”掌土地分配，“以田里安氓”，表明平民（氓）才是生产主体。另外，根据殷墟考古发掘资料，商代的“奴隶”并非用于生产的商品化奴隶，而大量出现在祭祀和陪葬活动中；被商代中央政府征服并归化的大部分所谓“次级民族”也并未被作为奴隶人牲献祭，而是在古典时期边疆地区扩张、确保稳定的现实需求下被吸纳为地方实力派，完全没有经历有组织商品化奴隶体系。商代大规模的人牲随葬墓葬群恰恰证明了这一时期奴隶并没有被作为有价值的商品，而是一种需要随时消耗的过剩生产力——例如安阳殷墟妇好墓，根据骨骼状态判断殉葬者多为战俘，这些人并未进入经济生产循环，而是在毫无经济价值的仪式中牺牲，凸显当时经

济体系并不以奴隶为生产主力，此时在经济上的主要矛盾仍然是部分地区因各种原因导致生产不足基础上的人口过剩，因此在无法供养额外人口的情况下举行大规模人祭，凸显当时经济体系无法也无需以奴隶为生产主力。学者王慎行的《卜辞所见羌人考》中也有相关统计，证明羌奴主要用于祭祀而非农耕。另一方面，《礼记》、《左传》等先秦文献显示庶人虽受剥削，但依然拥有土地的部分所有权，祭祀权利，人身自由等，并未彻底沦为可交易的奴隶劳动力。春秋战国时期更是自耕农占主导，例如齐国管仲变法推广了土地分配改革，强化自耕农生产，说明中华地区经济模式完全不是奴隶制经济而更近于小农经济与城镇联合体的有机结合（即邦统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模式。

最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中华帝国土地上的生产关系与统治阶级目标的演变实际上是从原始农村公社与消耗过生生产力逐渐转变为邦统主义社会与扩大人口和资源规模，中国古代完全没有经历过欧洲地区的奴隶制度社会及其奴隶社会伴生的贸易型古典城镇。

### 三、走向统一繁荣<sup>4</sup>

周朝中央政府权力崩溃后的各大邦国互相争夺边缘地带的春秋时期，在战国七雄的割据局面形成后便告终结。战国时期可以被总结为意识到古典城镇化制度下的统一普世帝国能够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和对统治者的阶级利益的邦国国君们争夺利益的时代，而最终以向西开拓荒地并更早研发出更加优越的军事技术和军队组织技术的秦国夺得皇冠，并标志着中华帝国进入为时两千多年的以古典城镇为政治和手工业中心，农村地主和土地所有者为经济中心，贵族与文官集团为主要统治阶级的大一统帝国时代（这时，邦统主义生产方式才完全成熟）。

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各大邦国在周天子权威崩溃后展开长达数世纪的争霸，最终并非是因“封建分裂的必然”而终结，而是因普遍意识到古典城镇化制度下的统一帝国所能带来的高生产率、税收能力与军政动员效率，这成为诸国国君争夺“普世皇权”的逻辑起点。秦国之所以最终胜出，正是因为它通过商鞅变法确立了以国家为直接组织者的土地与户籍制度，辅以铁器农具与重编制军队（郡县制下的编户齐民和什伍连坐法），构建出从军事、农业、工程到官僚体系一体化的成熟邦统制社会，打破了以宗法贵族为核心的旧式邦国联盟的结构。

这一变革奠定了中国大一统帝国制度的基础，其核心特点是以功能性城镇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通过中央政府派遣的文武官僚直接管理地方社会。相较于西欧的中世

---

<sup>4</sup> <http://v2.redchinacn.org/post/61887>

纪庄园体系，其本质差异在于继承自周朝诸侯国的多中心并行制度，各地的重要城镇始终作为全国资源配置的并列核心节点。举例而言，汉武帝时期，全国设有一百余郡县中心城镇，每一郡县城不仅是行政命令下达的中枢，同时也是官营铸铁、盐铁专卖、粮仓、水利工程组织的核心基地。例如，汉代洛阳和长安作为双重都城，在鼎盛时期人口分别达 40~60 万人，远高于同时代地中海地区绝大多数城市（如君士坦丁堡在六世纪时期不超过二十万的人口）。这类城镇在大一统帝国体系中具有高度复合功能：一是作为中央对地方的行政延伸（郡守、刺史体系）（这就是所谓“邦”），二是作为地区级物资调度中枢，三是手工业集中区（如长安西市与洛阳东市），四是兵源与粮草的集散地（这就是所谓“统”）。农业生产以“州县-乡里-村社”为单元，由地方乡绅或中小农民负责实际耕作，而非欧洲那种在经济基础上基本依赖封建主采邑体系与农奴制度的统治结构。在这一体系下，中央的官僚体系与地方乡绅之间确实形成了紧张而复杂的协作与博弈关系：地方官需要依赖地方地主提供税粮和人力资源，但又要抑制乡绅阶级的土地兼并和封建化（即防止乡绅阶级整体直接掌握政治权力），也要防止地方分裂。这在日后诸如西汉“抑兼并”政策、唐代“两税法”、明清的“丈量地亩”与“清丈黄册”等国家治理措施中反复体现。

事实上，中国整个中古时代与西欧的封建时代最大的差异就是这一官僚贵族集团与农村乡绅集团的高度割裂性。大一统帝国时代的官僚贵族集团代表的是一个由暴力集团（武将、军队）与文官组成的执政联盟，掌控城镇政治中心，并以城镇的资源调配能力及其统治力量调配的全国税收、徭役建设更好的生产资料和环境条件，而农村乡绅则是官僚贵族集团在村社的不安分的“代理人”（但却是实际上的、最根本的统治阶级），负责组织农业生产。这两个群体的关系，正如上文所述，是合作者，而非“东方专制主义”中纯粹的上下级关系，很多时候，由于官僚统治统一国家所需的全国宏观性，城镇官僚贵族与农村乡绅的利益在根本上并不完全匹配，如中央政府一直尝试抑制的农村土地兼并问题，虽然大量强力文官往往也从事土地所有权兼并行为，其仍然需要将所属土地层层分包，并同当地乡绅进行利益协调。

因此大一统帝国时期的中国官僚常常同地方乡绅明争暗斗、对抗各地区农业生产者自发的保护主义倾向是维护大一统帝国的稳固性与最高统治机关物质利益不可缺失的政治斗争进程。秦代及其后的绝大多数大一统帝所展现的高人口密度与多功能城镇中心在以上政治基础上，进一步塑造了中华帝国以农村乡绅、地方官僚、中央政府文官与军事贵族等为统治阶级支柱的（皇权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类似现代波拿巴主义国家的仲裁者和秩序维护者角色，皇权既可以担任军事主官，也可以担任文官领袖）多元执政联盟结构，共同统治城镇居民、高流动性商人、以及该地区佃农、自耕农与雇农混合组成的农业人口。

同样地，中华帝国改朝换代的权力空窗期之所以没有带来类似西罗马帝国崩溃那样国家彻底解体的政治灾难正是由于在这一体系下，人口与族群的互相流动、迁徙造就了一个互联互通、互相依赖的多民族国家，借助于汉字表意书写系统带来的破除了方言和地方语言差异带来的政令与语言统一，中华帝国土地上任何统治阶级只有控制了绝大多数中华本部的城镇官僚体系才能够带来最大的利益和最佳物质利益。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汉代以后的以儒家意识形态为得力统治工具的文官、士绅集团逐渐创造了“天命论”，“王化”等在和平时期鼓励中央政府开疆拓土、扩大边区城镇官僚治理体系，敦促各地富农与城镇居民考取功名、加入文官体系（在隋唐以前以周朝世袭城镇人口“士大夫”阶层残留通过互相保举的方式占据大部分职位，在隋唐后因为民族成份愈发复杂、国家规模扩大、阶级矛盾日益激化转变为更加公平、面向全体自由民与非商贸人口的科举制度），在动乱时期近乎“催促”实力派割据统治者“据天命”，统一全国的自我巩固、自我强化的思想体系。因此，文官集团与各个朝代或是具有个人魅力、能够团结和动员不同阶层人群参与逐鹿天下的领袖、或是确保了大型军事集团支持的军事贵族首领合作，创造了这一虽不断的改朝换代但“永不灭亡”的中华帝国——对比包括阿契美尼德、安息与埃兰沙赫尔在内诸多古典波斯帝国王朝与伊斯兰哈里发国征服北非前的东罗马帝国亦可发现类似但不完全相同的格局。阿契美尼德王朝在行政上以“行省-总督-卫队-御道”为基础组织帝国，但各地城镇之间未形成像中华帝国这样高度连贯的经济-行政统合结构；而东罗马帝国虽保有古代城邦传统，其后期重要城市如君士坦丁堡、塞萨洛尼基、安条克等在六至七世纪仍维持十数万左右人口，但随着查士丁尼战争与随后的大规模动乱，其城镇体系迅速衰退，转而向要塞化、依附庄园的形式转型，其日后的“军区制”虽模仿了早期罗马以公民征兵为基础的军事行政，但经济基础已转向土地贵族的包税制，与中国大一统城镇主导结构迥异。

在伊斯兰教哈里发国崛起的同期，自唐代起，中国的城镇体系也开始迈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城市功能的多层复合化与商品经济的全面扩展。在这一过程中，扬州作为江淮区域的枢纽城市迅速崛起，成为国家行政—财政体系、区域性工商业生产体系与跨区域商品流通网络高度交汇的典型代表。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始，扬州即作为通济渠与江南河网系统的节点城市而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而到了唐代，尤其是玄宗至宪宗年间，其地位几乎与长安、洛阳并列，为全国最重要的三大都会之一。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扬州唐代人口达四十一万。考虑到唐代户籍系统多未实报，实际人口总数或超六十万；而其面积不过今扬州市城核心区域的数十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之高，反映出该地不仅是行政中心，更是高度商品化的都市工商业核心区。扬州在唐代承担的角色不仅限于区域粮食集散或税务节点，更作为全国漕运体系的核心转运站之一，扮演着国家财政命脉上的物流中枢。每年江南粮食通过扬州调运至河

南、河北及京畿重地，成为唐代中央政府财政体系得以正常运作的保障。扬州的繁荣发展代表周朝多核心并举的城镇化传统随着晋朝贵族衣冠南渡后的江南大开发得到进一步加强，并在唐朝中期创造了江南的产业大发展。扬州的富庶一方面来源于其控制的大运河与江河交汇所形成的地利优势，另一方面则直接依赖于高度发达的城镇手工业与工商业组织。《唐会要》《旧唐书》均有记载扬州漆器、陶瓷、织品、香料加工业兴盛，而《册府元龟》《通典》中亦有对扬州“诸行商肆”、“市肆繁盛”的描绘。城市内形成了以作坊—作业坊—商会三层组织结构，部分手工业已出现明显的“分工—协作—集中”趋势，表现出早期“社会化大生产”的萌芽形态。例如，扬州漆器制造不仅内销各大州郡，还通过海运远销日本、新罗、东南亚乃至阿拉伯海沿岸，被阿拉伯帝国阿拔斯时代的《一千零一夜》文献隐晦称为“来自中国东方的黑光之器”。

唐代扬州最具时代性的意义在于其海陆贸易并举、连接全球经济网络的门户功能。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北方港口起点，扬州码头长期驻有波斯、粟特、阿拉伯商人，有关他们的墓志铭在扬州郊区的唐代墓葬群中大量出土，这其中有一些商业活动甚至远早于唐代。例如北周时期著名的祆教徒粟特商人安伽，其墓碑明确记载其家族在扬州经营“香料、布帛、玻璃器”，其交易网络东至日本、西达巴格达。这一现象说明，在国家制度容许下，外商不仅参与本地交易，甚至在扬州拥有土地、房产，僧伽与社区自组织形式，构成了一种跨文化、多族群共存的“国际都市”生态——扬州不仅是市场，也是南北朝时代结束后唐朝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关键节点。唐代中央政府通过设立都转运使、扬州都督、监运使等职位，实现对地方财政、仓储、漕运、税赋等多个领域的统合与治理。同期，扬州的商业活动也纳入国家榷货体制之中，唐代《食货志》记载“扬州盐务岁入重万缗”，其盐铁官营体系与私营工商业互补发展。扬州典型地体现了国家与市场、行政与经济、官僚与商人之间的动态协同机制，与后来的宋代行会制度、元代商会税体系形成历史上的连贯过渡。扬州的例子昭示出，唐代城镇发展已超出传统“行政中心”或“军事要塞”的单一功能，而逐渐演变为复合型的区域性都市系统中心。它既是国家政令传导与财政运转的枢纽，又是社会经济自主生长与商品交换的自由空间，其经济机制、社会结构乃至民族构成已具有近代城市初步特征。在此意义上，扬州不仅代表了中国古典城镇化发展的高峰，也折射出在统一帝国体制下，“城—乡”、“官—商”、“中枢—周边”三重关系如何通过城镇体系而被有机整合与优化。如是，唐代扬州的发展模式从根本上突破了以往“封建—农本—分散”的传统叙述，其城市本质乃是一种深度卷入国家制度调控与全球贸易网络的“结构型节点都市”。而这种形态的形成，不仅为后续宋元城市经济的繁荣奠定基础，也为本作重新评估东方城镇化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提供了重要实证。

## 一、绪论与一些关键定义

史学/经典定义中的“印度”：基本和整个现代南亚一致，当代的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尼泊尔都算广义上的印度。断代标准：目前通行的现代印度（Modern India）基本指代 18~20/21 世纪这个时间段，也可以向前延伸到莫卧尔帝国时期。对汉语读者来说，Modern 一词的翻译就是现代。“近代”“现代”这两个汉语翻译直接来自现代日语的近代(きんだい、kindai)和现代(げんだい、gendai)，但日语中这两个词意思一致。汉语中一般把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区分放在20世纪初，这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早期史学编纂的产物。但本质上近代和现代两个词所谓的不同只是东北亚对 modern 一词的不同翻译，属于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印度斯坦（Hindustan）”：最初是伊朗和中亚穆斯林游牧民对北印度恒河与印度河流域的统称，意思是印度教徒的土地（hindu 同时有印度教和印度教徒的意思；stan 波斯语，词源可以追溯到梵语，意为“土地”，所以中亚的斯坦各国国名其实就是“某人的土地”，比如哈萨克斯坦意思就是哈萨克人的土地，阿富汗的汉语译名省去了斯坦，但原名就叫阿富汗斯坦，也就是阿富汗人的土地），最初不包括南印度地区。不列颠东印度公司（British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 简称EIC）深入印度之后，这个术语被欧洲人接受，最初也只是用来代指北印度。但后来含义扩展，可以泛指整个印度大陆。

印度/南亚社会的基本特点：高度地方化，极度文化多样性，极端复杂社会，宗教种姓种族语言阶级多如牛毛。以语言为例，如果把方言统计在内，整个印度的语言种类可以达到大约两千种。

南北印度的不同：北印度自吠陀时代涌入大量雅利安人，在后续的伊斯兰大征服时期（Islamic Conquer Era of India）又涌入了来自中亚和伊朗/波斯的穆斯林，因此北印度的社会与文化状况尤其复杂，而且与阿拉伯伊朗的伊斯兰世界密切联系。印度本土的土著达罗毗荼人（Dravidian）则大量迁移到南

印度。所以南北印度的语言，文化，社会结构差异极大。以语言为例，北印度通行的语言都是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支（Indo-Europe Language Family——Indo-Iran Language）的语言，而南印度则是基本词汇和语法完全不同于北印度的达罗毗荼语系。

种姓（caste，意为“纯洁”）：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与秩序，根据北印度的梵文经典有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大种姓，以及被排斥在种姓系统以外的贱民即达利特（dalit），意思是不可接触者（被排斥在种姓之外意为不纯洁，所以拥有种姓者理论上不可以随便去接触）。但实际情况不同于文献，且远比文献记载复杂。根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印度大陆曾有过的种姓多达两百余种，很多种姓之间也没有过于严格的等级秩序，有些种姓虽然名称不同但实质又相同。

## 前 奏

### 二、伊斯兰大征服与莫卧尔帝国

印度的伊斯兰大征服：711年倭马亚王朝的总督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姆（Muhammad Ibin Qasim）征服信德（sind），当地出现印度第一批穆斯林，但直到12世纪上半叶伊斯兰教在印度的影响都很有有限，12世纪末之前伊斯兰势力也没有深入印度腹地。8世纪中叶开始，受阿拉伯商人和伊朗商人构建印度洋贸易圈的影响，印度沿海地区的港城出现穆斯林商人，城镇下层居民开始出现皈依成为穆斯林的群体。

1192年古尔入侵北印度，击败德里地区原本的印度教土邦，建立古尔王朝，由此从12世纪末到15世纪定都德里的五个穆斯林王朝统称为“德里苏丹国”，五王朝依次为古尔 Gur，奴隶/马穆鲁克 mamluks，卡吉斯 khaljis，图格拉克 tughlaqs，洛迪 lodis。北印度就此引入了大量来自阿富汗（afghan），波斯，突厥，中亚的因素。波斯语/伊朗语逐渐成为通用于整个中亚和北印度的方言。北印度地区婆罗门（brahman）权威弱的地方（基本对应佛教曾经兴盛）如孟加拉出现大量穆斯林。<sup>1</sup>

莫卧儿帝国的兴衰：莫卧尔 Mughal：波斯语对“蒙古”的转音，所以莫卧尔帝国其实就是波斯语的蒙古帝国，至于为何有这个名字，得看开国皇帝巴布尔的出身。

“老虎”巴布尔（波斯语中巴布尔就是老虎的意思）：出身显贵而饱经风霜，征战中亚伊朗阿富汗屡屡受挫，最终选择转进印度，并取得空前的胜利，虽然他去世时还只是占据以旁遮普、德里、阿格拉为代表的西北印度地区。

---

① 伊斯兰五大功修：念 shahadah，礼 salat，斋 sawm，课 zakat，朝 hajj。——作者注

1526 帕尼帕特 panipat 战役推翻洛迪王朝，宫廷语言最初是中亚的突厥语。

阿克巴大帝：莫卧尔真正的奠基者皇帝。彻底征服北印度，新京城定都 fatehpur sikri，但阿克巴本人因为巡视地方的需要会在地方上设行宫（mobile camp）。宫廷语言确立了波斯语/伊朗语的主导地位。

创立曼萨卜达尔（mansabdari）制度，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官僚制，武官和文官融为一体不分彼此。曼萨卜，阿拉伯语，等级序列、排名、官阶的意思（相当于rank）。达尔，波斯语，所有者。字面意思即“等级/官阶所有者”。朝廷通过封赏官僚土地来换取官僚的军事义务和财税、司法义务。序列一共 33 级，最高级的大官可以拥有一万名士兵。但拥有五千名及以上士兵的曼萨卜，只能由宗室成员担任。内廷与外廷在阿克巴时期拥有高度的文化多样性，非穆斯林当官家常便饭。印度的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从此时开始也逐步融合，并出现了本土化的小教派。

废除针对非穆斯林的吉兹亚 jizya 人头税。

贾汉吉尔与沙贾汗：在阿克巴的基础上巩固并扩张，莫卧尔的黄金时代，泰姬陵（taj mahal）1648 落成，为纪念沙贾汗的第二任妻子所建。

北印度一大批城市，比如阿格拉 agra、德里 delhi、亚美德巴德 ahmedabad、拉合尔 lahore、苏拉特 surat 兴起。

奥朗则布：帝国衰弱的转折，他废除了阿克巴的宗教宽容政策，穷兵黩武把疆域扩展到极限，在他死后帝国迅速衰弱并崩溃，从 1710 年代到 1740 年代整个印度军阀王朝割据混战，虽然名义上莫卧尔王朝仍然是宗主。在奥朗则布还活着的时候，动荡已经开始。1669 年、1685 年德里和阿格拉地区爆发贾特人的大规模叛乱。这里补充有关种姓的问题：以贾特（jat）为例，这是遍布西北印度的农民种姓。没错，农民作为职业的种姓。整个印度，职业都可以作为种姓。牧民有自己的种姓，铁匠木匠鞋匠衣匠有自己的种姓，不同等级的地主贵族官僚也可以有种姓。只要作为祭司的“神职人员”婆罗门认可并在生活的社群中认可，种姓就可以成立。所以实际存在过的种姓多达两百种。

整个 17 世纪下半叶，帝国都疲于与马哈拉施特拉地区（大致对应今天印度的马哈拉施特拉邦 maharashtra）的马拉塔人 maratha 的长期战争。自 15 世纪末旁遮普地区兴起锡克教 sikh 之后，莫卧尔帝国与高度军事化组织的锡克教是既合作又打压的态度。奥朗则布时期，帝国与锡克教徒 sikh 的冲突加剧并演化为战争，但帝国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并以镇压失败而告终，只能和平共处。顺带一提，锡克教徒的形象恐怕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印度人刻板印象，带着五颜六色的大头巾，蓄着络腮胡的大胡子，能歌善舞，骁勇善战。知名的“我在东北玩泥巴”的那首梗曲就是旁遮普的锡克教徒所作，那首歌其实是情歌。全世界都很熟悉的印度警察也是他们的形象。对中国人来说，上海人和香

港人是最知道他们的。上海话里面的印度阿三正是对印度阿 sir（警察）的转音，并传遍全国。

### 三、印度的农业经济与印度洋世界的贸易

印度农业经济:由于印度地方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加之任何“模式”总有例外，所以这里是比较大类的划分。大体上直到 18 世纪 50 年代，全印度的社会经济类型和生产方式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印度河下游和恒河流域的地产经济: 北印度的塔鲁克达尔和柴明达尔拥有大地产，庄园的大土地所有制主导着社会经济。

塔鲁克达尔 talukdar: 塔鲁克 taluk，阿拉伯语，地产/土地。达尔 dar，波斯语，所有者。顾名思义地产所有者。这个群体最早出现于德里苏丹国五王朝时期，显而易见其起源是穆斯林地主贵族阶级，但后来非穆斯林也大量成为大地主，塔鲁克达尔的头衔可以世袭。莫卧尔帝国时期塔鲁克达尔的特权地位全盘保留，并且在包税人问题上成为和柴明达尔相同的存在。塔鲁克达尔这个词本身可以作为家族的姓氏。所以如今姓塔鲁克达尔的南亚人祖上几乎都是非富即贵。

柴/扎明达尔 zamindar: 柴/扎明 zamin，波斯语，土地/地产。达尔 dar，波斯语，所有者。顾名思义地产所有者。最初是莫卧尔帝国朝廷任命的边疆官僚贵族包税人，属于曼萨卜达尔官僚序列，负责边疆地区的地方财政和司法，最初头衔不能世袭，由朝廷赐予或剥夺。随着莫卧尔的衰败崩溃，地方柴明达尔获得了实质的独立地位，头衔也可以世袭罔替，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

旁遮普地区的村社经济: 以贾特 jat 农民种姓为主的小农经济社群，兵农合一。

中印度（比如那格浦尔地区）的游牧经济: 中印度地区拥有大片森林，气候条件也适合游牧，这个地区的游牧民和半游牧半农耕定居民非常多。这里有必要提及印度的图基 thagi/thug: 图基可以简单理解为土匪。图基以印度教为命以不见血的方式（掐脖子或用织布勒死）杀人劫财。在游牧民为主的地方图基尤其常见。

南印度（包括德干高原）的村社经济: 南印度的地方社群中莱特（阿拉伯语，“农民”）各司其职的小农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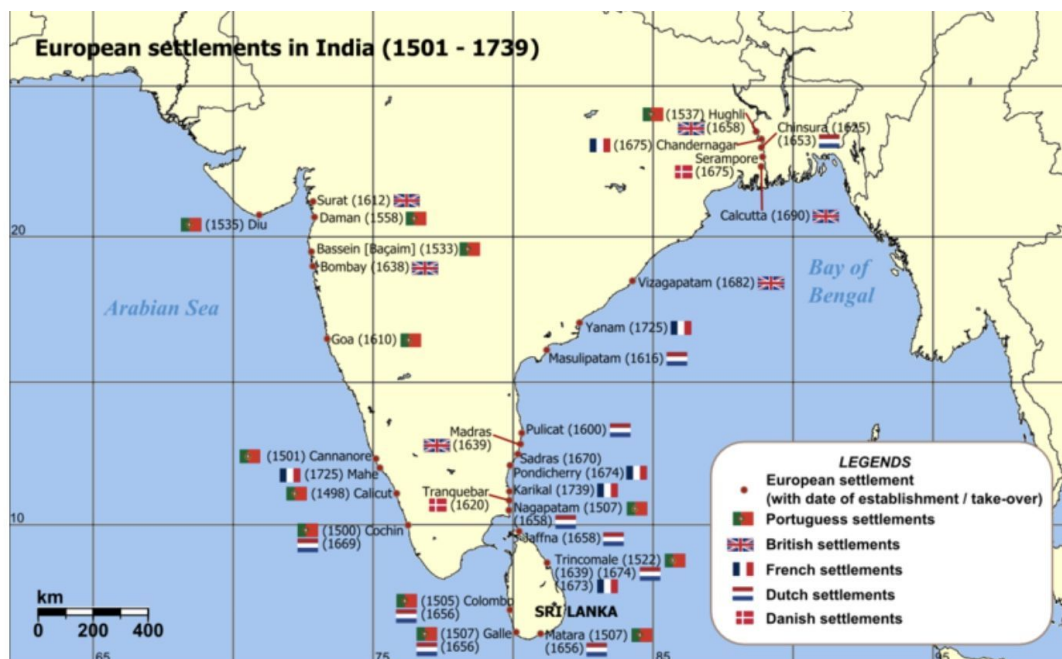
以上四种分类不绝对，绝不是一个地区就只有一种主导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类型，实际情况甚至可以说因村庄而异。事实上这四种情况是犬牙交错在一起。只能说四大地区最明显最容易分明的是对应的那种。

印度洋世界贸易网与欧洲人东来: 印度洋贸易网自阿拉伯的伊斯兰大征服之后逐渐形成，而 15~18 世纪欧洲人的到来逐渐改变了贸易网，尽管 18 世纪以前欧洲人实际

的力量和影响力很弱。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欧洲人带来的贸易军事化（以刀剑枪炮为商业生意开路，商船即战船），印度洋原本较为和平的贸易过程逐渐变得血腥和富有竞争性。

1320 年，马可波罗（macro polo）旅行途中经过印度，称印度是“世界上最富的省份（province）”1498 年，达伽玛（vasco da gama）抵达南印度马拉巴（malabar）海岸（即南印度西海岸，南印度东海岸是科罗曼德尔海岸），在港城加里各达（calicut）进行香料贸易，满载而归1515 阿方索·德·阿尔伯克基（alfonso de albuquerque）征服果阿，后乘势劫掠马六甲

“葡萄牙锁链（Portuguese chain）”：自 15 世纪末到 16 世纪末，葡萄牙官方和私人建立了从西非到东南亚的一系列军事化要塞据点，用于贸易。虽然 17 世纪之后葡萄牙衰弱并丢掉了大部分据点，但这种锁链式军事贸易据点的形式依然普遍。18 世纪下半叶之前，西欧各国在印度拥有超过 30 个据点，其中包括后来闻名于世的加尔各答 calcutta，孟买 bombay，马德拉斯 madras。仅仅 1510~1540 年间，超过一百五十万吨香料（其中 80% 是胡椒）抵达里斯本并且不断转运于西欧各城市，不仅带飞了里斯本的经济，而且直接推动西欧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欧洲人东来并没有在南印度造成轰动，因为南印度人已经习惯了（已经在此地生活的包括犹太人，亚美尼亚人，聂斯托利派教徒 Nestorian /景教徒）至于为何早期现代（early modern period，大致对应 16~18 世纪）的欧洲人成功在印度建立据点，而没有在中国和日本建立据点（澳门并不是特例），这里不做赘述。



附图：1501~1739年印度的西欧据点

# 文学与文艺评论

## 诗词六首

斯达特尚

### 七言古绝 纪念毛泽东同志

玉棺捻破敲君骨，哀骨响之绝九州。凝云如山愁夜走，吾闻此鬼苦奔流！

### 菩萨蛮 咏荷

斜阳飞上芙蓉面，眉心一点情无限。清水落香云，莲风摆翠裙。叶下西沉日，夏景如秋色。荷月尚轻眠，农夫不得闲。

### 鹧鸪天 莫望北

醉红高悬天东浮，白鹧垂尾立西楼。扶空振羽云如海，神鸟朝飞五十州。莫望北，有人愁。南原老父苦奔流。孩儿含尽平生志，亦不灵台生暮秋！

## 鸱 鸱 天 题农民工

颓月空流老兔闲，神娥云上死千年。金秋夜白香枯落，幽怨寒生桂殿前。谁挑弄，十三弦。愁翻田海苦耕烟。恨城一去遥相望，壮士劳劳孤命悬！

## 致未明子<sup>1</sup>

欲说冲天竹，似君心上秋。男儿如有志，落寞也风流。

## 红军咏歌 纪念建军节作

竦风压云愁翻紫，哀鸿下肺声如刺。年年壮骨排青冢，慈眉万里遥相送。好辞平生泪，一心下崆峒。自从神鸟频飞喜，英气朗开上天东！火旗振天冒血色，铁蹄不稳嘶夜白。一夕人别后，陵树逐寒瘦。不用怜君泉台苦，一血好作苍生土。民有疾事今知否？浦口蒙蒙生春柳。

---

① 竹一般象征高洁的品质和志向。心上秋则是“愁”字所拆（心加秋）。则言一层内心矛盾：高超的志向似乎含着缕缕忧愁。这忧愁是什么，未明子没有直说，只是在诗歌中表露出虚空的情调与颓废的心态。后两句点破这个矛盾。冲天竹，“笑”字所拆（“艹”加“夭”，“夭”与“天”相似）。“笑愁”就是说“小丑”。本首“学习”未明子“讽刺”诗闷骚（题材狭隘）、幼稚（文字游戏）的风格。——作者注

# 对未明子诗句“对价”的逐字批判

雪 峰 山

对 价      · 未 明 子 ·

我走在这条必然胜利的道路上  
但我依旧落寞而痛苦  
或多或少或迟早的牺牲  
施加在我周遭的一切  
无可避免的推开  
门、手、笑  
且易于预料着  
暂时失败，无非是忍受痛苦和死亡  
再次尝试，又一个我急于熟识一切  
我不曾拥有我自己  
便在此处降临为无  
什么都给出，为了捐弃而抛掷了  
什么都淡忘，甩开了悲伤和紧张  
我是一具历史的机器  
我是一具历史的行尸  
昏厥的旋转  
清冷的腐臭  
我是一座历史的孤岛  
回忆的前奏一再响起  
我竟不能把主歌清唱  
无人聆听  
我害怕将重复句重复

没人知道我的苦楚  
我握有握住一切的一切  
宇宙总是默然无语  
我总是同样默然地决绝  
命令一切，认定一切  
又在停顿中确认了残骸  
用最后的情感去收殓  
可曾赠我一个宇宙呢？是  
我没有拒绝的苦澀资格  
也便无法接受单薄的好意  
我只要双眼，或一只眼  
或闭上的眉毛  
再也不飞  
落在捂住黑暗的  
一对掌心里反复安睡

开头“我走在必然胜利的道路上”，这是一种高度自信的体现，革命者拥有这种自信是正常的，但前提是他建立在马克思立场上用科学分析现状进行实践的理性结论，那么就让我来看看他接下来的诗句是否符合理性，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立场。

第二句，“我依旧落寞与痛苦”，这里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什么是落寞（失落与寂寞）？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会落寞？其本身就是资本运转的必然产物，在当下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会觉得自己会失落反而会查觉到使命的必然，只会有一种我以我血血荐轩辕的使命感，失落本身是消极的，是不符合革命者立场说出来的话，寂寞同理，资本会源源不断生产自己的对立面，那么对革命者来说就不可能寂寞，那么这种寂寞本身就是一种自负理论家的寂寞，就像未明子是个哲学网红一样拥有庞大的知识可以觉得寂寞，写出来的诗句也可以嘲讽看不懂的人进行一种孤芳自赏。

在说痛苦，革命确实痛苦也必然痛苦，写进去去陈述是没问题的，但在前面分析过落寞后这个痛苦到底是什么痛苦？他显然不是一种共产主义革命者立场的痛苦，而是一种不被理解的痛苦，是一种唯我论的痛苦，他把个人的特殊的主观痛苦感受置于革命者普遍的痛苦感受之上了，甚至于革命者的痛苦和自己身为哲学家没人懂自己理论的痛苦是对半开的，这更是对革命立场的背叛。

未明子开头用一种落寞作为革命者的正题，然后以落寞产生的意境困难为反题，最后衬托自己革命者的“落寞”，是一种简略的辩证法，但就像我说的一样，将“落寞”这种带有负面忧郁的词语放在这里衬托革命者身份是反动的一样，带有小资产阶级的优

柔情绪，他明明能用更好的正面词语来用辩证法，但却选择用负面词语来用，这是将马克思的充满革命向上的辩证法重新倒置回了黑格尔的普遍的一般辩证法。

“或多或少或迟早的牺牲，施加在我周遭的一切，无可避免的推开，门、手、笑，且易于预料着”

前四句没什么问题，革命者遭遇牺牲是必然的，无可避免的，以一种乐观的姿态去面对也是一种勇气和对必然认识的自由体现，但后面一句“且易于预料着”，这带有一种画蛇添足的感觉，是对前面四句的回应，就像他知道了“知道革命会遭遇苦难”一样，他曾经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在哲学全书里又出现了一次为最初的精神现象学出现做辩护一样，所以黑格尔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但他当下的行为与黑格尔无异了，革命者就是直接的必然的面对苦难，需要什么预料？这反而是未明子自己在炫耀知识给自己遭受的苦难唯心的找补。其主要目的可能不是论述革命，而是间接的对那些攻击他的人进行回击表示我早就料到无知的愚夫会对本“天才”进行误解了，他把这种对批判者的回应置于共产主义立场之上，证明其本身十分傲慢自负。

“暂时失败，无非是忍受痛苦和死亡，再次尝试，又一个我急于熟识一切”

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之上这句话意思也很明显，苦难造就的理论家最后还是又一个我，这里的“又”充满了傲慢，觉得自己就是一种终点，认为后人完全不可能超越自己，直接自己成为裁判，将成为自己当做最高成就，并以裁判身份批判所有被资本伤害的理论家，他把资本的伤害给转化为了工具（彻底背叛马克思立场），把觉醒的理论家理论变成一个又一个不如我的“我”，看啊！资本生产的只能是一个又一个“我”，我的理论多么强大啊，其就是一切的终点！这已经有一种尼采的超人倾向了，把一切当成是历练自己的工具，是自己成为超人路上的阻碍，什么资本，什么苦难，什么死亡，什么理论家，他们都是我这个“超人”成为超人的过程，且终点就是成为我一样的超人。可以说这是一种极度自恋的句子，且将自己置于宇宙中心成为黑洞的奇点。

他下一句“我不曾拥有我自己，便在此处降临为无”，这句话显然是给前面的过于明显的傲慢找补了，但这又是一种画蛇添足，傲慢居然要给傲慢的理由找补，这完全反应了他一种深度的不自信，这里的无既不是黑格尔的纯“无”表明他还是对黑格尔有敬畏，也没向齐泽克那样来个少于“无”这是对齐泽克理论的敬畏，表示我谦虚点就是“无”好了，这种补丁行为又构成了一种我知道，所以我打补丁，所以我懂的快感。成为一种高雅的犬儒享乐。

“什么都给出，为了捐弃而抛掷了

什么都淡忘，甩开了悲伤和紧张，我是一具历史的机器，我是一具历史的行尸，昏厥的旋转，清冷的腐臭。”

这是其最为反动的一句诗，是对革命者赤裸裸的侮辱，也是其完全背叛其共产主义立场的体现。他先是描述自己对左翼实践的贡献，在公共媒体里坦白自己的所有收入和身份，并又画蛇添足的说自己“甩开了悲伤和紧张”（真甩开了还要强调？还不是表明自己被攻击后并没有受影响吗，然而表明自己没受影响本身还是受影响，他这种行为实在太软弱了），他说自己是一具“历史的机器和行尸”，机器还是个中性词，但从机器变成行尸就是一种倒退了，当然未明子可能表示自己还是在用辩证法，正题机器通过设定机器的机械属性为反题，证明自己是一个活着的，机械执行历史任务的机器使命（这一段辩证法还算可以比较中性），如果沿着机器概念的话，真的追求浪漫主义和衬托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的话，下一个概念是觉不能用“行尸”的，而是应该用勇者或者其他正面的概念，甚至于一开始也不应该用机器。

未明子用行尸概念链接之前的机器概念来了一个二重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机器变成了有血肉的行尸，行尸继续设立自己的对立面僵死和无目的（都倒向后现代了，在这种基础上用丧尸追求血肉都比行尸要有感染力，但丧尸有目的追求显然和其诗意相悖了），然后进行扬弃成了有生命的“行尸”也就是未明子自己。就像我前面分析的一样，他的基础是一种后现代的哲学，意味他已经潜意识放弃追求目的理性了，于是未明子只能用辩证法给行尸“自己”的目的，以一种无目的的肉身去进行有目的的行动，这仍是他共产主义者身份和其实际经验理论的二分。

最后，行尸本身不能成为一个正题，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种以反面衬托正面的方式和开头一样，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倒退，使其变成了黑格尔，但一想他的小资立场，以及一种自嘲的态度下（昏厥的旋转，清冷的腐臭），他仍是在回击对他进行批判的对手，“看我说自己是行尸了，你们有看清里面的辩证法和生命力吗”！这种多此一举渴望认同的操作也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还要进行自我解释自我陶醉，以及孤芳自赏。

“我是一座历史的孤岛，回忆的前奏一再响起，我竟不能把主歌清唱，无人聆听，我害怕将重复句重复，没人知道我的苦楚，我握有握住一切的一切。”

自比历史的孤岛本身是一种傲慢，好像其已经内化完了历史一样，且描述自己就是普遍历史中的特殊孤岛地位，强调自己在普遍中的特殊性，这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即普

遍特殊普遍，他但凡说自己就是特殊的孤島，并在孤島内生成一个世界都比原来的更好也更符合他傲慢的性格，这证明他害怕“历史”将历史置于前面，这下连尼采的姿态都维持不了了，与前面的诗句形成了矛盾，这对尼采来说是一种意志的阳痿。他在理论阳痿后靠尼采维持现状，结果连意志也阳痿了。

回忆的前奏响起表明他知道过去的革命历史，但由于前面的分析，他尊重这种神圣的历史，这没问题，但共产主义者也不应该如此用辩证法在前面的诗句里搞普遍到特殊，但考虑他本来就知道真正的马克思辩证法是什么，那尊重也变的可疑了，如果以一种傲慢的姿态来猜测的话，他尊重的原因只是因为历史应该尊重罢了（即我尊重所以我尊重），接着他说无法把主歌清唱也无人聆听，根据前面的分析他确实无法把主歌清唱，但绝不是无人聆听的原因，而是其自己背叛了马克思的立场，他怪无人聆听本身也很幽默，他几百个视频都发在公共媒体上，诗句也在公共媒体上有 70 万粉丝，那这句无人聆听就很值得玩味了。

如果以共产主义者的立场来说那完全不怕没人聆听，甚至是必然有人聆听，更不用说一个几十万粉丝的 UP 主了，他有粉丝有理论却得出了个“无人聆听”的结论，只能说他又陷入了一种哲学似的自恋和自我陶醉之中了，如果他只是一个诗人他可以这么做，但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就不行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诗可不会像他这样无病呻吟。

“我害怕将重复句重复”，这里担心悲剧复演还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有点软弱没有直面鲜血的勇气，革命不是一朝一夕的，流血本身必不可少。“没人知道我的苦楚”，这里就有问题了，他把自己这种特殊的苦楚发到公共平台上供人欣赏，好像这种特殊的苦楚是一种高尚伟大的感情一样，这还是一种自恋，甚至是犯贱，或许资本应该多伤害他，这样他就能产生更多这种苦楚发在网上进行精神高潮了，一个诗句里有尼采倾向的人可说不出这种话，他应该把苦难变成自己动力才对（之后也不想批判他背离马克思和黑格尔了，就看看他能不能维持尼采），“我握有握住一切的一切。”这里前面是苦楚，后面是握住一切，这是反向证明前面的苦楚我有能力克服，但他克服的方式是手里握住一切（占有式），而不是纯粹的尼采式的强力意志，这在尼采主义看来是一种倒退和软弱。

“宇宙总是默然无语”，这里短暂倒退回实在论了，将自己与宇宙二分。“我总是同样默然地决绝，命令一切，认定一切”，他之前手里已经握住一切的一切了，所以这里他可以命令一切认定一切，我也可以装作他也能命令“宇宙”没有倒退回实在论，但根据之前的分析他还是以一切的一切为根基去命令一切，这里的一切代表多，而不是纯粹的作为一的意志，显然他用词不严谨，但我也能装作那个代表多的一切是意志好了。

“又在停顿中确认了残骸，用最后的情感去收殓”。这里是战斗后的景象，他预设了自己的胜利，并直接过渡到已经到用感情收敛的阶段了，这句诗基本没有偏离尼采。但用

感情收敛是他想体现的一种自信和人文关怀，即我直接预设并击败并吸收了 you，但我还是承认你，但“感情”还是多余的，尤其是对尼采主义来说，这种击败吸收内化扬弃的方式是尼采厌恶的黑格尔辩证法，尼采主义不会同情末人，只会拿起鞭子狠狠的抽打末人。（这里体现的是黑格尔哲学与尼采哲学的矛盾）

“可曾赠我一个宇宙呢？是，我没有了拒绝的苦澀资格，也便无法接受单薄的好意”，这里他的问答基本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大他者了，也表明自己理论的成熟可以赠送自己一个宇宙了，还谦虚的表示自己也便无法接受单薄的好意，“也便”表示自己能拒绝，“单薄的好意”表明宇宙这个好意还是太单薄了，可以说是用最谦虚的话语表达出了最狂的意味，“我只要双眼，或一只眼或闭上的眉毛，再也不飞，落在捂住黑暗的，一对掌心里反复安睡。”，这里作为结尾表示自己只需要闭上的眉毛就能把飞在天空的宇宙握在手掌里面安然入睡。结尾整句诗还是用了尼采厌恶的辩证法，即谦虚的话语设立狂妄的意味，然后通过扬弃狂妄达到一种新的“谦虚”，但在尼采看来他懦弱到了极点，他的狂妄的意志居然需要辩证法来体现，而不是直接展现，这表明他意志的深度不自信，还在依赖理性，仍要为自己的跳跃找一个无可辩驳的借口。

最终未明子的整句诗，就像一个撒了脚的尼采一样（全诗基本回应攻击他的人被自己意志消化），然而尼采根本看不上意志的展现居然需要这种诗来证明，这本身就是意志阳痿的体现。如果将该结论置于开头就知道这首诗的基调是什么了。

这首诗也是对黑格尔的背叛，黑格尔只会把攻击当成绝对精神运动的一环，本身没有什么好愤怒的，也没必要在被攻击后通过写诗间的方式论述他们的攻击我早就知道（非理性行为）。更不用说全诗的立场是打着马克思旗号却反马克思的。

于是作为左翼，不管未明子是为官方工作的，还是草根实践的，最好还是把这首诗删掉，以免对其不管哪方面的工作都是不利的，这首诗能骗的了评论区下的无知的人，但骗不了哲学家，光这首发在公共平台上的诗就够给未明子阁下除左籍了。

他用马克思的豪言壮语作为开场白，用小资产阶级的感伤来抒发自己的“痛苦”，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自我辩护和炫技，用费希特的唯我论来构建自己的宇宙中心，又用尼采的超人意志来武装自己、蔑视对手，最后，在胜利的时刻，他又忍不住用黑格尔的“扬弃”精神去“收殓”残骸。

他什么都懂一点，所以他什么都不是。他是一个在哲学超市里，将所有自己喜欢的食材都扔进购物车，回家后却煮出了一锅无法下咽的大杂烩（诗句）的拙劣厨师。



2025